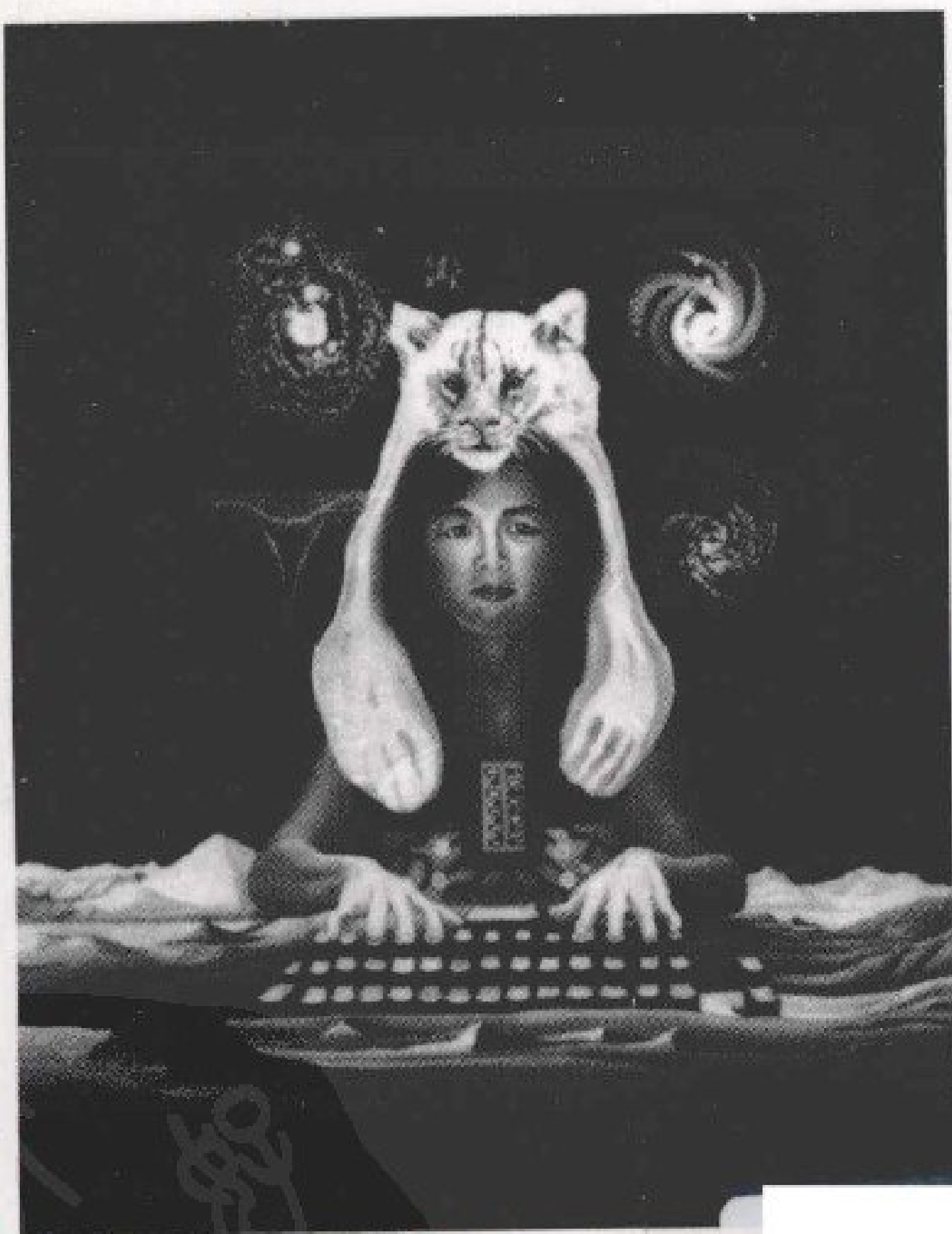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美〕唐娜·哈拉维 著
陈静 吴义诚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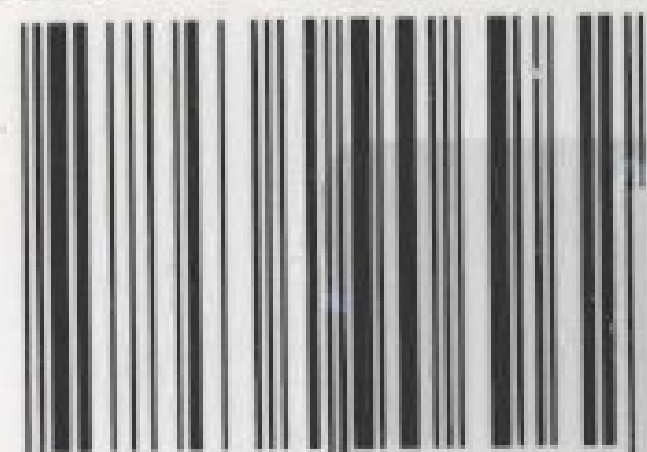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出版社

知
学
PDG

自然是构建的，而不是发现的——正如真相是制造的，而不是找到的——这一思想正是最近科学史学术界的主要基调。追溯文化中科学的性别化根源，唐娜·哈拉维关于猿与猴的科学研究在这一传统中可以说是最佳的学术成果。她仔细研究了出版物、论文、通信以及灵长类研究考察和制度的历史，揭示了现有社会关系起源的历史构建——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自然化。贯穿全书，她分析了自然创造、现存有机体和赛博格（计算机控制的有机体：包含有机物和技术成分的系统）的原因、叙述和故事。她还批判地把免疫系统看做是一种信息系统，并指出我们的文化假设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所谓价值中立的医学研究中。在其中一些文章中，她探讨并发展了现有的女权主义学术参考中争议性的术语；通过映射“自然”和“经验”这两个有力而又模糊的词汇的命运，揭示出新视野，并使一种新希望政治成为可能。

ISBN 978-7-5649-0696-2



9 787564 906962

定价：40.00 元

数字学术
知识
传播
PDG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自然的重塑

〔美〕唐娜·哈拉维 著
陈 静 吴义诚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1—1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美]唐娜·哈拉维著；
陈静，吴义诚主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4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ISBN 978-7-5649-0696-2

I. 类… II. ①哈… ②陈… ③吴… III. ①妇女学—研究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495 号

书 名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著作责任者 唐娜·哈拉维 著 陈静 吴义诚 主译
责任编辑 郭尚兴
责任校对 张珊
封面设计 马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邮编：450046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人文科学译丛

主编

汪民安 陈永国 杨恒达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张云鹏 汪民安 陈永国

杨全强 杨恒达 金惠敏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91 by
Free Association Books
57 Warren Street,
London W1T 5NR

© Donna J. Haraway 1991

The right of Donna Haraway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by 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A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ISBN-10 1-85343-139-7 pbk
ISBN-13 978-185343-139-5 pbk

本书中文版由英国自由协会图书出版公司
授予河南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译著简介

自然是构建的,而不是发现的——正如真相是制造的,而不是找到的——这一思想正是最近科学史学术界的主要基调。在文化中追溯科学的性别化根源,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关于猿与猴的科学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可以说有最佳的学术成果。她仔细研究了出版物、论文、通信以及有关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考察和制度的历史,揭示了现有社会关系起源的历史构建——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自然化。贯穿全书,她分析了自然创造、现存有机体和赛博格(即计算机控制的生物体:包含生物和技术成分的系统)的成因、叙事和描述。她还批判性地把免疫系统看做是一种信息系统,并指出我们的文化假设是多么深入地渗透到所谓价值中立的医学研究中。在其中一些文章中,她探讨并发展了现有的女权主义学术参考中有争议性的术语;通过描述“自然”和“经验”这两个有力而又模糊的词语的命运,揭示出新视野,并使一种崭新的希望政治成为可能。

她最近写的书《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被这一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称为是“杰出的”、“原创的”、“卓越的”、“重要的”。《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一书涵盖了1978~1989年的10篇文章。它们奠定了作者作为当前最富有思想、最具有挑战力的女权主义作家之一的地位。

唐娜·哈拉维是一位科学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意识史委员会的教授。她在耶鲁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作品有《晶体、结构与场：20 世纪发展生物学中有机体的隐喻》(*Crystals, Fabric, and Fields: Metaphors of Organicism in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 Biology*) 和《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4 位老师参与了本书最初的翻译工作，他们是刘冰（第一、二章）、赵锐（第三、四章）、陈静（第五、六、七、九、十章）、常明（第八章）。随后，陈静和吴义诚又对书稿做了全面的修改和审校。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致 谢

这本书的出版依靠很多人以及出版界的努力,首先是我在《标志》(*Signs*)杂志上初次发表女权主义理论的文章的匿名评审。结果发现这个慷慨并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就是雷纳·拉帕(Rayna Rapp),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我个人的智力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和启发。凯瑟琳·斯丁普森(Catherine Stimpson)是那些文章的编辑,她的理论工作和编辑技巧丰富了我和其他许多当代女权主义作家的写作。康斯坦斯·克拉克(Constance Clark)和史蒂芬·克劳斯(Stephen Cross)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研究生们的影响力在本书中随处可见。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开拓性的写作和忠诚的同志情谊向我表明,科学史可以既是政治性的而又不损及其学术性。我从他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同时也要感激其他很多人,尤其是卡尔·费格利欧(Karl Figlio)、鲁迪·乔达诺瓦(Ludi Jordanova)和莱斯·利弗德(Les Levidow),以及《激进科学杂志》(*Radical Science Journal*)、《文化的科学》(*Science as Culture*)和自由协会图书出版公司。

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伊丽莎白·费(Elizabeth Fee)、桑德拉·哈尔丁(Sandra Harding)、苏珊·哈尔丁(Susan Harding)、南希·赫尔特索克(Nancy Hartsock)、凯蒂·金(Katie King)、戴安娜·朗(Diana Long)、爱华·王(Aihwa Ong)、乔安·斯科特(Joan Scott)、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和阿德里

娜·齐尔曼(Adrienne Zihlman)的友谊及与他们进行的批判性对话,以及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文本互动处处都影响了这些章节的出版。同时我也要感谢来自女权主义集体“论据”(Das Argument)的弗里伽·豪格(Frigga Haug)和诺拉·拉策尔(Nora Räthzel)以及“差异”(differences)的伊丽莎白·威德(Elizabeth Weed)。杰弗瑞·艾斯科菲尔(Jeffrey Escofier)为“赛博格的宣言”(第八章)的诞生倾注了不懈的努力和温馨的协助。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迈克尔·哈德菲尔德(Michael Hadfield)和 G. 伊夫林·哈钦森(G. Evelyn Hutchinson)教了我有关胚胎学、生态学、免疫系统和其他许多生物学文化的知识。

我最初通过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意识史委员会和研究生研讨会认识的杰出人士,都为这本书做出了直接和间接的贡献。我要特别感谢格洛丽亚·安扎尔朵(Gloria Anzaldúa)、贝蒂娜·阿普特克(Bettina Aptheker)、桑德拉·阿塞雷多(Sandra Azeredo)、费丝·贝ckett(Faith Beckett)、伊丽莎白·博德(Elizabeth Bird)、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吉姆·克利福德(Jim Clifford)、玛丽·克瑞(Mary Crane)、特雷萨·德·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罗恩·艾格赖希(Ron Eglash)、芭芭拉·爱波斯坦(Barbara Epstein)、彼特·厄本(Peter Euben)、雷蒙娜·费尔南德斯(Ramona Fernandez)、鲁斯·法兰克福格(Ruth Frankenberg)、玛戈·弗兰兹(Margo Franz)、塞尔扎·古德伊夫(Thyrza Goodeve)、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克里斯·格雷(Chris Gray)、瓦尔·哈托尼(Val Hartouni)、玛丽·约翰(Mary John)、凯伦·卡普兰(Caren Kaplan)、凯蒂·金(Katie King)、希拉里·克莱因(Hilary Klein)、丽莎·劳(Lisa Lowe)、卡罗·麦凯恩(Carole McCann)、拉塔·曼尼(Lata Mani)、阿尔文娜·昆塔娜(Alvina Quintana)、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左·索芙莉丝

(Zoe Sofoulis)、诺艾尔·斯托金(Noel Sturgeon)、珍妮·特瑞(Jenny Terry)、莎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和格洛利亚·沃特金斯(Gloria Watkins, 笔名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学术理事会研究基金和高等学术研究所的阿尔法基金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经济资助。

许多年来,其他人以不计其数的方式给予了支持和启发。这些文章特别表现了与盖尔·科曼(Gail Coleman)、莱拉·克里格(Layla Krieger)、理查德和罗斯玛丽·斯蒂斯(Richard & Rosemarie Stith)夫妇、凯洛林·哈德菲尔德(Carolyn Hadfield)、罗伯特·费罗曼诺(Robert Filomeno)、杰伊·米勒(Jaye Miller)和鲁斯坦·霍格奈斯(Rusten Hogness)的共同生活与工作的记忆。最后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弗兰克·哈拉维(Frank Haraway)——一位体育记者,他告诉我写作可以是工作也可以同时是乐趣,以及我的母亲多萝西·麦格瑞·哈拉维(Dorothy Maguire Haraway),虽然在我未能充分认识她前,她就于1960年去世了,但她已告知我信念和承诺的困难与力量。

接下来的章节改编自发表过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已征得作者的同意。第一章最初题为“动物社会学和国家政体的自然经济,第一部分,统治的政治生理学”,收录在《标志》杂志1978年第4期(第21~36页)。第二章题为“动物社会学和国家政体的自然经济,第二部分,过去是争议区:人性与灵长类动物行为研究中的生产和繁殖理论”,收录在《标志》杂志1978年第4期(第37~60页)。第三章,“生物学企业:从人类工程学到社会生物学的性、心理和利润”,收录在《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1979年第20期(第206~237页)。第四章,“开篇即此词:生物学理论的产生”,收录在《标志》杂志1981年第6期(第469~481页)。第五章,“争夺灵长类本性的竞赛:该领域中人类一狩猎者的女儿们,1960~1980年”收录在马克·凯恩(Mark

Kann)的论文集《美国民主的未来:左翼分子的观点》(*The Future of American Democracy: Views from the Left*)(费城:坦布尔大学出版社,1983:175~207)。第六章,“读布琪·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女性研究中争夺‘女性经历’的竞赛”,收录在1988年《铭文》(*Inscriptions*)第3期(第107~124页)。第七章,“性别(Geschlecht 德语)、性别(Gender 英语)、类型:语言中的性政治”,收录在科内利亚·豪瑟(Kornelia Hauser)的论文集《多处。处处?运动中的女权主义(弗里伽·豪格[Frigga Haug]纪念集)》(*Viele Orte. Überall? Feminismus in Bewegung, Festschrift for Frigga Haug*)(柏林:论据出版社,1987:22~41)。第八章,“赛博格的宣言:19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收录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1985年第80期(第65~108页)。第九章,“情境中的知识:女权主义的科学问题和偏袒角度的特权”,收录在《女性研究》(*Feminist Studies*)1988年第14卷第3期(第575~599页)。第十章,“后现代身体的生物政治:免疫系统话语中的自我构造”,收录在《差异:一本女性文化研究的杂志》(*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1989年第一卷第1期(第3~43页)。

目 录

译著简介	(I)
致 谢	(1)
绪 言	(1)
第一部分 自然作为一个生产和繁殖的系统	(7)
第一章 动物社会学和国家政体的自然经济： 主导的政治生理学	(9)
第二章 过去是争议区：人性与灵长类动物行为 研究中的生产和繁殖理论	(26)
第三章 生物学企业：从人类工程学到社会生物 学的性别、心理和利润	(54)
第二部分 有争议的读物：叙述的本质	(89)
第四章 开篇即此言：生物学理论的产生	(91)
第五章 争夺灵长类本性的竞赛：该领域中人类一狩 猎者的女儿们，1960~1980	(108)
第六章 读布琪·埃梅切塔：女性研究中争夺“女性 经历”的竞赛	(149)
第三部分 对不当的他者的差别政策	(171)

第七章	一部马克思主义辞典中的“性别”：一个词的性政治	(173)
第八章	赛博格的宣言：20 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204)
第九章	情境中的知识：女权主义的科学问题和偏袒角度的特权	(254)
第十章	后现代身体的生物政治：免疫系统话语中的自我构造	(280)
	Bibliography(原文参考文献)	(320)
	译后记	(342)

绪 言

这本书应该作为对身体、政治和故事演变的警示来读。首先，这是一本关于自然之塑造和重塑的书——这或许是关于当代地球居民的希望、压迫、争论的最中心舞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作者曾是一名真正的美国社会女性主义白人女性、灵长类动物学家，后来转变成为一名科学史学家，从事现代西方对猴子、猿和女人的描述工作。她属于另类，不自我声张的、“未标记的”、依赖不平等力量来维持生存。但是通过最近的一些文章，她转变成为一个多重标记的赛博格女性主义者，试图在 20 世纪前途黯淡的最后 25 年里，使她的政治主张和其他批判功能继续保持活力。本书审视了欧美女性人文主义的代表作中各种尖锐的相互各异观点，人们认为这些著作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着，本书采纳了一种非正统的、令人不安的标记，将叙述转向了“赛博格”女性主义的种种可能性，这或许更能与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立场以及永久的偏袒相一致，而不会放弃搜寻有力的关联。

赛博格是一种混合生物体，由生物体和机器组成。然而，赛博格是由适应 20 世纪后期的特殊机器和特殊生物体组合而成的。赛博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合体，其组成成分首先包括我们自身以及其他未经我们精心挑选的高科技形式的有机物，它们成为信息系统、文本和人体功率学控制下的劳动、需求和繁殖系统。赛博格的第二个必要成分是机器，同样成为通信系统的形式、文本和根据人体功率学设

计的自动设备。

本书第一部分的章节审视了女权主义者对知识和意义的生产模式所进行的斗争，这些知识和意义是有关猿、猴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自然”和“经验”——英语中两大最有力又最含糊的词语——故事决定力量的对比。第三部分聚焦于赛博格的体现、不同的女权主义性别概念的命运、出于女权主义伦理和认识目的对视野隐喻的重新挪用以及作为后现代世界中显示主要“差异”系统的生物政治地图的免疫系统。通过这些多元化的内容，本书把自然的构建看做是人类的一种关键的文化过程，他们需要也渴望生活在一个较少受种族、殖民主义、阶级、性别和性别统治所困扰的世界中。

占据本书的是一些奇特的边缘生物——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他们都在伟大的西方进化、技术和生物叙事中有着不稳定的地位。从字面上看，这些边缘生物是“怪物”(monsters)，与其词根相比，“演示”(demonstrate)和它有着更多的共同意义。“怪物”有象征意义。《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一书对生物政治、生物技术和女权主义的多方面叙事提出质疑，它们是这些有前途的和不单纯的怪物所产生并相关联的情境化的知识。这些怪物的力量差异和高度竞争的生存模式或许是可能世界的标志——而且它们必定是我们所负责的世界的标志。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一书收集了1978~1989年的文章，这是一个几十年来各种女权主义内部的政治、文化和认识论混杂骚动的时期。最早的文章出自以欧美为中心的社会女权主义内部，它们聚焦于对猿、猴科学的生物政治叙述。他们把现代生物学中自然的深层构造看做是一种生产和繁殖系统，即劳动系统。它是为主流文化集团服务的，自然有着无穷的力量，能使故事成为现实；而它又有着这种隐喻本身固有的所有模糊性和统治性。它是如何成为一种工作系统并受劳动力等级划分的统治，其中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不平等在剥削的功能

系统中变成了理所当然？对于动物和人类生命的观点会有怎样的结果？

第二部分的章节审视了女权主义者之中叙述形式和策略的竞争，因为在现代女权主义内部和当代女性之中，杂语现象和权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部分以审视解读、总结一位现代的英籍尼日利亚人作家布琪·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的各种方法，并以此为佐证，证明不同情境下的非洲、美国非裔和欧美评论家，对于女性研究课堂的教育环境下什么可被看做是女性经历有着争议。什么类型的责任、联盟、对立、支持和出版实践构建起对此类作家、此类话题的特定阅读模式？

第三部分，“对异类的差别政治”包括4篇文章。短语“异类”(Inappropriate/d Others)借用于越南制片人和女权主义理论家郑明河(Trinh T. Minh-ha)。她用这个术语来显示某些人的历史定位，他们拒绝采纳身份和政治的主流叙事所提供的非“己”即“他”的假面具。她的隐喻显示了一种几何结构，不考虑等级统治、“部分”结合为“整体”或敌对的对立，而考虑差异关系。但她的隐喻也显示了这些新的几何结构需要智力、文化和政治努力，这种努力如果不是来自于类人猿，也至少是来自于赛博格和女人。

这些文章显示了其矛盾的构造母体。对写入德语马克思主义字典的术语“性/性别”的近期历史进行审视，例证了文本政治存在于标准参考工作对复杂斗争进行描述的产生过程中。写赛博格宣言的目的是，要在20世纪80年代找出政治方向，因为面临混合体的“我们”似乎大有遍布全球之势。对女权主义理论中“科学客观性”的辩论进行的审视，支持受轻视的有机体和技术视野的隐喻转向，目的是为女权主义科学和政治知识铺设特殊的定位、多方位的协调、偏袒的角度，并最终形成一种可能的启示。

出自这种训练的自然成了“土狼”。这个有力的骗子能向我们显

示,人与“自然”的特定历史关系必须从某些方面如语言、伦理、科学、政治、技术和认识论,被想象为真正社会性的和积极相关的,而伴侣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可能被视作一种社会约定,以一种形式存在,但不是与“我们”相关联的“它”、“你”、“他”、“她”或“他们”的形式。这些内嵌在句中的代词为什么是自然进行争辩,它们本身就是政治工具,用来表述希望、恐惧和矛盾的历史。语法是特殊的政治。什么样的叙事可能会存在于生态女权主义研究里与“自然”有关的巨大语言学数据中?奇怪的是,对于比我们先存在于西方话语的人们来说,从语言上努力接受的“自然”的非代表性、历史偶然性、人为性以及自发性、必要性、脆弱性和令人吃惊的丰富性能帮助我们重塑自己成为何种人。这些人不再是主要议题了,即使他们曾经是,但也不是异化主体了,而是——只是可能——多样化异质的、非同质的、可负责的并相关联的人类代理。但是,正如标记的与未标记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单一的和补充的主体为一神论和其异端邪说服务,我们永远不能再将部分结合成整体。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机构——或几个——没有防御主体。

最后,从当代免疫系统话语的角度考虑生物政治体的映射,再次探索不受部分/整体几何结构束缚的多样性的重塑方法。通过将同一和差异、自我和他人、内部和外部、认识和误识的关系转变为异类的指导图,如何能使我们“自然的”身体重新设想——并重新体验?不可避免的是,这些重塑必须承认,我们的脆弱、死亡和局限是永恒的状态。

通过这些文章,我试图重新观察被西方女权主义丢弃的某些牌,并寻找某些骗人的数字来重新塑造可能世界,或许能使一堆散牌成为万能的百搭。赛博格,或双向对立,或技术视野,能否以许多女权主义者最恐惧的形式,暗示能够和必须重新塑造并恢复生命而非死亡? 20世纪80年代及此后的“第一世界”位于怪物的肚子里,我们如何能发展阅读和写作实践以及其他的政治工作,来延续对自然和经验的物质

形状和意义的竞争？对于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的建构性、人为性和历史偶然性的正确认识，是如何从不可能但完全现实存在转为有可能但在其他地方完全不存在的？作为怪物，我们能否显示意义的另一种顺序？赛博格在地球上生存下来了！

第一部分

自然作为一个生产和繁殖的系统

第一章 动物社会学和国家政体的自然经济：主导的政治生理学

“我想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例如飞回过去，拨乱反正。”

玛吉·皮尔希，《时间边缘的女人》

“国家政体”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希腊人已充分发展了人类社会的详尽有机形象。他们设想公民、城市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按照同一原则建立起来的。他们的中心观点就是把国家政体视为一个具有基本生机的有机体，也是庞大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Collingwood, 1945）。将人类群体的结构视作自然形式的写照，这一观点一直是富有想象而且充满智慧的。在整个工业革命早期，国家政体理论尤为重要的发展是从多层面将自然经济与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市场理论和作为未来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基石的劳动力分工理论，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资源关系假想法则一起，共同象征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制度形成时期自然力量与经济进步的结合。从19世纪至今，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这种政治经济形式的渗透已经成为大量研究的主题（Young, 1969）。毫无疑问，人口作为基本自然群体的现代进化观点，主要来源于国家政体的经典思想，而这些理论又与生产和繁殖的社会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政治性与生理性的结合是本章的中心。这一结合一直是古代与现代统治合理化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以差异为基础的统治，这些差异

被看做是自然的、特定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是道德的差异。这一结合又通过现代生理行为科学以某些方式进行了转变，而如果我们要不受支配地为社会有效服务，我们就必须去理解这些转变方式。把统治原则深深地嵌入自然学科之中，尤其要融入那些试图解释社会群体与行为的学科中，其程度不可低估。统治作为当代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分，为避开它的重要性，我们绕开了内容中关键复杂的考核部分和科学的社会功能。我们竟用这一中心的合理化技能与知识部分削弱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从而致使我们的努力变成最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也不能轻率地接受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科学应用与科学滥用之间，甚至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破坏性区别。这些都是科学哲学的不同版本，利用主体与客体的破裂证实科学客观性与单纯个体主观性的双重意识形态。这种科学中反解放的知识与实践核心是控制社会的重要支柱。^①

认识到这一事实是女权主义理论家的重大贡献。女性非常清楚自然学科的知识已经运用到我们的统治利益中，而不是我们的解放，尽管生育控制宣扬者这么说。而且，大众对科学的排斥只能使得这种运用迫在眉睫。我们已知道排斥与运用都是在社会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无能力的后果。^② 但如果我们没有多次低估科学中的统治原则，如果我们更少受到科学家“价值无涉”观的蛊惑，虽然我们时常听到——在医药市场(Gordon, 1976; Reed, 1978)——我们已经使自己与科技产生了距离，导致我们误解自然知识的地位和功

① Young(1977).

也有一个关于科学的激进评论文章的精彩目录。同见 Burtt(1952)、Marcuse(1964)、Marx and Engels(1970)。

② Braverman(1974).

尽管没有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布雷弗曼(Braverman)将女性劳动力定位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中心，这一分析是针对在科技专业知识日益增长的时代中的现代劳动力、科学管理和劳动人民的去技术化。

能。我们表面上接受了 20 世纪社会科学家传统自由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在被认定不相容的领域——自然与文化之间以及与它们有关的知识形式之间,保持着深厚而且必要的分歧。我们已经让国家政体理论以这样一种方式割裂开来,那就是自然知识被秘密地重新并入社会控制技能中,而不是被转变成解放的科学。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变得反自然,从而挑战我们对自然对象地位的传统任务,如此一来,使生命科学不受女权主义的影响。^① 我们赋予科学神圣的角色,一个人类创造的对象,却忘记了创造科学中的自身角色,不再对满足社会与群体需要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辩证作用做出反应。我们以两种互补的方式,固执地把科学崇尚为物神:(1)全盘否定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完全脱离自然科学来发展女性社会理论;(2)认为“自然”是我们的敌人,必须控制我们的“自然”躯体(通过生物医学科学提供的技术),不惜一切代价进入自由的(激进的)政治经济理论家——而非我们自身——所定义的神圣的文化政体王国。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文化国家政体:将所有人 与物重新变成商品的市场。

一个具体的例子能够解释我所认定的危险误解,这个例子将我们带回到政治性与生理性相结合这一点上来。在《文明与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弗洛伊德(Freud)(1962)发展了一种国家政体理论,将人类的社会发展建立在不断进步的统治自然上,尤其是人类的性。性,既是危险的,也是自然的,这是弗洛伊德思想体系的中心。他的思想并不是首次提出的,而是重复了作为生理

^① 见 Ortner(1974)和 de Beauvoir(1952)。

来自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奥特纳(Ortner)和来自存在主义的德·波伏娃(de Beauvoir)都用自然—文化分裂的意识形态来支配其女权主义的分析。麦克马克(MacCormack)(1977)利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66,1973)的理论来挑战自然—文化区分。麦克马克对塞拉利昂女性桑德联谊会的分析强调了女性为自身而进行的集体构建,这一构建在国家政体中体现了积极作用。麦克马克的有机主义和功能主义框架需要批判性关注。

起点的国家政体的传统简化论。首先,国家政体是在自然个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必须征服这些个体的本能才能使文化群体成为可能。而近期一位新弗洛伊德派和一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讽刺性地对弗洛伊德的立场进行了重新研究,为这篇论文的论点提出了新方法:一位是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另一位是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弗洛伊德、布朗和费尔斯通是解析国家政体的政治性与生理性有机理论的有用工具,因为他们都从性征展开解释,加入文化约束的动力,然后试图再次解放个体与集体。

布朗(1966)在《爱情体》(*Love's Body*)一书中,在个体与政体之间进行了详尽的隐喻演示,以展现我们的个体与政体的理念与经验有着非同一般的父权专制结构。阴茎、头部、身体、国家、兄弟,对王权的反叛只是为了建立自由兄弟市场的暴政——这些是布朗的主题。只要父亲去世,只有兄弟能成为公民。布朗探索出,逃脱统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幻想和精神迷乱,而不是挑战国家政体的基本男权至上和简化到自然约束的动力。布朗拒绝文明(国家政体)的原因是为了拯救身体。他从根本上接受弗洛伊德的性简化论和随后的统治逻辑,从而有必要找到解决方法。他通过完全回归自然将自然变为崇拜的神物(多形态的固执)。他背叛了国家政体辩证理论的社会主义可能性,这一理论既不崇拜也不否决自然科学,但拒绝将自然及其知识奉为神物。

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ex*, 1970)一书中,也面对了弗洛伊德对父权制和压迫提出的生物政治理论的含义,但她试图转变这一理论,从而获得一种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她在这一任务中对女权主义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认为,她犯了与布朗相同的错误,就是“把国家政体的生理简化到性”。这一错误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的解放,社会主义既不听从命运的安排而利用科学提出的方法(同时对改变技术内容绝望),也不因为幻想而拒绝技术

知识。费尔斯通将缺陷定位在女性在国家政体中的位置,以我们自身的躯体与对繁殖有机体的需要的辅助形式出现。在关键意义上,她接受了以繁殖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却摒弃了国家政体的女性社会主义理论的可能性,这一理论不会将我们的个人躯体视为最终的敌人。在这一步上,她已经做好了技术统治的准备——由机器决定的将来完全控制现在的异化躯体。她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也就是把社会关系简化成了自然对象,其逻辑后果就是将技术控制看成解决办法。她当然没有低估生物行为科学里的统治原则,但她的确误解了科学知识和实践的地位。也就是说,她承认独立于社会关系的自然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解放仍然受制于假想的自然决定论,而这一决定论只有在反统治的上升逻辑中才能避免。

我认为,建立国家政体的社会主义女性理论是可能避免以下两种生理简化形式的:(1)屈从于社会地位的生理决定论;(2)接纳根本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反对自然,从而否认我们重建生命科学的责任。我理解马克思人文主义意味着人类在世界上的基本位置是与周围环境的辩证关系,涉及需求的满足,以至使用价值的创造。劳动过程构成了基本的人类条件。通过劳动,我们使自己在个体上和集体上与所有未开化的事物进行不断的相互作用。存在于被称作人类劳动的自我创造过程以外,无论是我们的个体还是社会体都不会被视为自然。我们经历的和理论化为自然和文化的东西都通过劳动来转化。我们通过触摸了解到一切事物,包括我们的有机体和社会体,都通过劳动成为可能。因此,文化不会统治自然,自然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敌

人。辩证法绝不能转化为不断增长的统治动力。^① 这一立场,以生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我上面所概述的以繁殖为基础的美其名曰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是冲突的。

在国家政体镇压理论的构建中,生物行为科学的一个领域显得尤为重要:动物社会学,或称为动物群体科学。要重新将生物社会科学用于新的理论和实践,以统治为基础的生理政治学的重大历史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生理政治学是动物社会学的核心。生物社会科学不仅仅反映了我们自身社会世界中的性别歧视,也是那种世界的繁殖工具,既提供了合理的意识形态,也提高了物质力量。选择以动物科学为中心,尤其是灵长类和群体,有三个主要的理由。

第一,动物科学的主题和步骤的发展横跨美国智力发展史上自然和文化的分裂时期,即 1920 年和 1940 年间,恰好与社会科学的自主意识得到最终认同发生在同一时间,也是社会的自由理论(以功能主义和等级制度理论为基础)在大学里建立起来的时候。自然与社会学科之间新的自由关系的本质是人类工程学项目——也就是,为了在科学秩序化社会里人力资源得到高效、合理运行而进行设计和管理的项目。动物在这一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动物是知识的可塑性原材料,受制于确切的实验学科。人们可以利用动物来构建和测试人类生理学和政治学模型系统。例如,经期生理学或者社会化过程的模型系统就不一定隐含简化。后斯宾塞哲学、后进化论自然主义者和新的知识类别正是要禁止人类向自然科学直接简化。20 世纪 30 年代及此后的管理科学在这一点上都很严格。它也是自然文化分裂的一

^① 1978 年我写这篇文章时,南希·哈尔特索克(Nancy Hartsock)未发表的文章“客观性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问题”(Objectivity and revolution: problems of knowledge in Marxist theory)和“社会科学、实践和政治行为”(Social science, praxis, and political action)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查询稍后的表述,见 Hartsock(1983a,1983b)。比起 Habermas(1970)或 Marcuse(1964),这些文章对关于科学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女权主义评论来说更加有用。

部分。另一方面,动物作为自然对象继续拥有特殊的地位,向人类展现它们的起源以至它们前理性、前管理性和前文化性的本质。也就是说,在人类和自然科学的自主教义中,动物的地位很模糊,这有着不祥的预兆。所以,尽管人类学能够仅用文化和社会学的概念来理解人类,只需要人类社会群体的思想,但是在人类国家政体的镇压统治秩序的合理化与自然化过程中,动物社会已经广泛地得以使用^①。在现代自由理论主义者继续接受自然文化分裂观点的同时,动物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生理和政治相结合的观点。

第二,在国家政体权威的父权制分工的自然化发展和国家向性生理学简化的过程中,动物社会学占据着中心位置。因此,这个自然科学领域正是我们需要彻底了解和完全转变的领域,从而产生了一门可以表达自由社会关系的科学,这门新科学避免了犯马克思主义的低级错误,即从物质条件中直接获得知识实质。我们需要理解动物群体是如何而且为何运用在以下这些理论中的:人类的进化起源理论、“精神疾病”理论、文化合作与文化竞争的自然基础理论、语言与其他交流形式理论、技术理论,还有特别是性与家庭的人类形式的起源和角色理论。简言之,我们需要了解国家政体的动物科学及其过去和将来。^②我相信关于动物群体解放科学的结果也会更好地表达动物的含义。也许我们在解放自我的时候也解放了自然。

第三,统治在动物社会学的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分析原则,这些层面允许对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基本步骤中的社会关系进行评论,而评论的方式不是允许轻易排斥动物知识的学科,而是暴露客观主张的谬误。我们不能忽略统治在动物群体科学中的层次,正如一

① 见芝加哥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研讨会”,由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部门联合举办(Redfield,1942)。

② 查询早期无政府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关于国家政体的本质意义,见 Kropotkin(1902) and Engles(1940)。

部包含不合理的偏见或意识形态的电影能剥去知识深处健康客观的层面。关于动物以及它们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也不能只考虑自己乐意去想的方面。科学劳动为我们产生自然知识的辩证理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我将把我的分析主要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和对单个动物群体的研究——灵长类,更确切地说是恒河猴。恒河猴原产于亚洲,但目前大量在世界各地的科学实验室和研究站里。我将主要研究一个名叫克莱伦斯·莱伊·卡朋特(Clarence Ray Carpenter)的人的工作。他帮助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附属热带医学院,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波多黎各附近的卡奥圣地亚哥(Cayo Santiago)小岛上建立了第一座自由放养猴群的主要研究站。这些猴子及其后代在自然社会的引人注目的重建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由于美国新殖民地一直被广泛地用作资本主义增值管理政策的实验站,这些猴子与美国新殖民地热带医学的联系为符合我们研究主题的背景增加了一丝讽刺意味。

像卡朋特一样的人们在一个复杂的科学世界里工作。在这个科学世界中,将大多数个人或理论标记为性别歧视或其他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附加简单化的标签,而是解开生命科学领域的特定社会结构和理论结构,用以检验实验室负责人、学生、资助机构、研究站、实验设计和历史背景之间的相互联系。卡朋特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摘除性腺对配对后雄性鸽子性行为的影响。随后,他于1931年获得了国家研究理事会研究员的资格,在耶鲁大学对比心理生物学实验室罗伯特·亚尔克斯(Robert Yerkes)的指导下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亚尔克斯最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类人猿心理生物学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对亚尔克斯来说,猿是人类的最佳研究模型。在他为提高社会每个状态的科学管理使命中,猿扮演着主要角色,这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想法。

利用黑猩猩作为实验动物,塑造它们具备某方面的智力,而不是试图保存它们的自然特征,这向来就是实验的一大特点。我们相信,将动物尽可能切实地转化成生物学研究的理想主体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一意向与某种希望联系起来,希望最终的成功可以有效展现把人类自身重塑为普遍接受的理想形象,是有可能的。(Yerkes, 1943, 第 10 页)①

然后,他将灵长类设计为科学对象,这与他通过人类工程学实现人类进步的理想有关。

亚尔克斯对猿的兴趣有两个方面:一是它们的智力,二是它们的社会性生活。对亚尔克斯来说,智力是进化状况的完美表达。自从 1900 年左右美国开始实验对比心理学以来,他观察每一种有生命的对象都是出自实验对比心理学的突出问题的角度:智力测试。物种、种族和个体特征都与智力的中心指数存在着根本的联系,一方面可以通过行为测试展现,另一方面则通过神经科学。他设计了军队智力测试题,用于测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兵。这些测试为任务派遣和军衔提拔提供了理性的基础,表明了具有指挥才能的合适人选的自然优势(Yerkes, 1920; Kevles, 1968)②。他在战争中的角色与他在灵长类动物研究中的创办者角色完全并行不悖。在这两种情况中,他都把自己和科研同仁视为共同工作以促进理性社会的形成,这个理性社会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同时又对古老的无知有所保留,尤其体现在宗教和政治上。

① 同见 Haraway(1989b)。亚尔克斯将基金会、大学、神经生理学和内分泌学、人力管理、心理病理学、教育测试、个性研究、社会卫生和性卫生都联系起来。

② 亚尔克斯及其同事不是把“人类工程学”简单地用作一种隐喻。他们将生理学、生物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清楚地看做是对高级垄断资本主义的理性管理的关键部分。这些科学储存原材料,而且实验室作为人类工程学的试验工厂来运转(Yerkes, 1922)。查询人类工程学项目的历史,见 Noble(1977),尤其是第十章。

对亚尔克斯来说,灵长类动物的社会性生活与它们的智力存在着完全的联系。思想会指令并统领较低的官能来创造社会。在对国家政体起源的典型研究中,亚尔克斯(1939)发现易接受性的雌性黑猩猩被统领的雄性黑猩猩给予事物或赋予通常不能享有的“特权”。灵长类的智力使性状态去刺激人类开始对社会权利与特权产生观念。强调性简化论是不需要的。亚尔克斯把性与权力联系起来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代表,与至今的许多研究并无太大差异。露丝·赫斯伯格(Ruth Herschberger)(1948)在早期的女权主义评论中,对一只名叫乔西(Josie)的雌性黑猩猩的视角展开了非凡的想象,亚尔克斯十分关注乔西的心理性生活。乔西似乎不从性“权”交易的角度来看待她所生活的世界,但是对亚尔克斯而言,生理学与政治学的经济联系被科学证实就处于文明的有机基础之上。

除了直接调查人类近亲的生理性行为和社会行为外,亚尔克斯与其同仁们,还对这个国家的性科学研究的总体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5年来,亚尔克斯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创办的国家性学课题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Research on Problems of Sex, CRPS)的主席。从1922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基金大量用于科学研究之时,这个委员会为人类性学转变为科学研究课题提供了经济基础。从对荷尔蒙和行为的基础研究,到与性相关的精神与情感特性的差异研究,再到婚姻幸福度的研究,最后到金赛(Kinsey)的性学研究,都是由该委员会(CRPS)资助的。在性无知和淫乱的年代,该委员会(CRPS)为开启性话题供人们进行礼貌的讨论和体面的调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①

^① 见 Emma Goldman(1931),查询她关于性别忽视对女性工人阶级的影响的敏锐分析。见 Hall(1974),查询关于性别研究的政治环境的背景。查询内部讨论,见 Aberle and Corner(1953)。戴安娜·朗·豪尔(Diana Long Hall)的研究清楚地展现科学社团的复杂网络。

然而,性学话题的开启是一把双刃剑。在实践与意识的表达上,性学课题研究委员会都是根据性在有机体与社会发展中的首位原则,在不同的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将性确定为科学课题的同时,它也成了治疗各种性学“疾病”的医学对象,这当然包括同性恋和不幸福的婚姻关系。治疗法的生化基础与生理基础大大增强了科学管理者对女性生活的合法权利。该委员会为拒绝接受美国弗洛伊德式性简化论的人们关闭了逃跑通道:不管是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还是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性学都在科学医药的管理者手中得到安全呵护。猿与猴被列为这一任务的中心角色。因为自然对象未被文化所掩盖,它们能展现出与文化出现相关的最清楚的有机基础。依据人类工程学理想模型的多层意义来彻底设计这些“自然对象”,对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卡朋特来到耶鲁大学的灵长类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已加入国家性学课题研究委员会(CRPS)的资助与实践网络。他的博士工作由该委员会资助,他的博士后资历也主要是由该委员会授予的。而且,他的导师亚尔克斯是科学设想与实践的重要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这些科学网络决定了由谁来进行科学研究以及什么样的科学被认为是有利的。从卡朋特的教育、研究经费和社会环境来看,他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基本设想,该设想把以性为基础的繁殖和统治与一个自然国家政体的基本组织原则等同起来。然而,卡朋特所增加的内容意义重大。从方法论上看,他确立了从自然主义角度观察野生灵长类的高度技巧,这表现在两个特别细致的领域研究上,一个是观察新世界的吼猴,另一个是观察亚洲长臂猿。这些研究都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些都是同样出色和引人注目的工作,并全面反映了在科学家们研究的人

类社会中以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①从理论上讲,卡朋特将对心理学与性生理学的实验学科的解释,与以人口和社群为中心的进化学说和生态领域生物学联系起来。简言之,他开始用一种重要的新方法将自然经济和政治经济的元素联系起来。传统达尔文的人口自然政治经济理念开始与20世纪早期蓬勃发展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舍伍德·瓦什博思(Sherwood Washburn)和他的学生们通过系统地运用新达尔文综合法的进化功能主义与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理论的社会功能主义来转变物理人类学和灵长类的研究,这一结合才得以完成。

除了将心理生物学分析的不同层次与现代进化理论连接起来,卡朋特还用早期的系统理论工具来分析灵长类群体,这些理论工具同时为以文化和社会群体概念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成熟提供了技术基础。卡朋特早期的社会功能主义——与之前的对比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实验胚胎学)仍旧保留着联系——对于检验从生理学到政治学、从动物到人类的关系链至关重要。卡朋特自己并未按照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自主教义来进行研究。他也不承认社会到生理或人类到动物的直接简化。他详细阐述了不同层面之间的分析联系,这些层面是被支持和反对自然文化分裂这一重要观点的人们所共同承认的。他的灵长类社会学说确实是一个有用的起点,来区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出现的各种功能主义。这些功能主义学科都以强大的社会控制意识形态以及医学、教育和工业的管理技巧作为基础。

一个单独的实验操作从微观上体现了卡朋特对动物政体的基本

^① *Carpenter*(1964)是一本汇集卡朋特的一些主要文章的选集。卡朋特从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转移到对美国乡村和第三世界环境中的教育电视的关注。卡朋特(1972)将功能主义、等级制度的组织理念带入传播系统的研究,这些理念和他用在灵长类动物分析(1945)中的一样。

研究中统治原则的所有重要层次。1938年,他收集了大约400只亚洲猕猴,然后将它们释放到卡奥圣地亚哥岛上。这些猕猴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社会紊乱之后,分成了6个组,每个组都包含雄猴和雌猴,组员数量从3只到147只不等。在几乎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这些猴子能在这片37英亩的土地上自由组群、划分领地和其他资源。卡朋特进行的首次主要研究就是研究它们的性行为,包括发情周期、同性恋现象、自体性行为和“非传统”的行为。卡朋特的结论指出群体内部的雄性统治与性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推测与进化优势有关。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性别歧视的所有解释在这一研究分析中都有体现,包括以下动物活动的类似描写:“在这两只同性恋的雌性猕猴的配偶关系形成以前,扮演雄性角色的猕猴会攻击扮演雌性角色的猕猴。”(Carpenter,1964,第339页)

与猕猴群体基本组合中性与统治联系的指导性观点相一致,卡朋特进行了一次表面上非常简单的实验,但这一实验展现了从生理到政治的自然国家政体的多层面阐释的整体。将作为控制组的猕猴群体不被外界打扰,在观察它们一周后,卡朋特把名叫迪亚波罗(Diablo)的“一号”雄猴(从先享受食物、性爱等方面来辨别其统治地位)从群中带走。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卡朋特继续观察剩余的猴群,带走二号雄猴,再等待一周,带走三号雄猴,再等待,最后将3只雄猴全部放回猴群中,再观察其社会行为。他发现迪亚波罗被带走后,与岛上其他猴群比较,这个猴群的领地立刻出现了限制。社会秩序被严重打乱。“群体组织变得更具流动性,群内的冲突与争斗也有所增加……在显著的混乱持续三周以后,当3只占统治地位的雄猴被放回,猴群的结构又立刻重组”(1964,第362页),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与其他猴群相比,这个群体重新获得了先前的有利地位。

一些问题立刻出现了。作为控制,卡朋特为什么不从猴群中带走不占统治地位的其他雄猴来测试他关于社会秩序源的组织假说?事

实上,他带走了动物群体中公认的领袖。那这个摘除首领的实地实验对卡朋特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这必须从生理学的层面来检验。卡朋特依靠生物学概念来了解社会群体。他借鉴了胚胎学发展的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受精卵的简单初始物质是如何发育成为复杂的动物体的。一条重要的胚胎学理论使用了场的概念,在被称作统治梯度的活动轴组织下。场是一个空间整体,由各梯度的复杂互动形成。在这一理论中,梯度被认为是由所测活跃度从低到高的一系列有秩序的过程构成,例如,氧气消耗的级差。可以看出,在基础层面上,统治被认为是能够被客观测量的单纯生理特征。这种梯度可大可小。几个梯度能够组合成一个场,围绕在最大梯度的主轴线上,即组合的中心。通过统治系统间的结合递增,有机体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构造简单的水螅,是发展生理学中用来测试场、梯度、生理统治和组织中心这些理论的合适实验对象。水螅只有一根轴线,或一个可能的梯度:从头到尾巴。若切掉珊瑚虫的头部,观察剩余器官出现的暂时组合紊乱,然后我们看到在生理“竞争”的细胞中最终重新长出了新的头部。其次,我们可以从活动梯度的头部切除一大块或一小块,再测试随后的机体紊乱程度。^①

卡朋特将社会空间视为类似于发展中有有机体的有机空间,因此他通过时间寻找组织社会场的梯度。他在社会群体的雄性统治等级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活动的生理梯度。在理论的基础上,他进行了头部切除的实验,然后“观察了”随后发生在细胞或器官(即其他点——动物——活动统治梯度)之间的生理竞争,重建一个主要的组织中心(实现一号雄猴的地位),并恢复社会和谐。在这些识别过程中,结果纷纷揭晓。

首先,社会的其他动物群体也能排列在活动轴线上。例如,我们

^① C. M. 查尔德(C. M. Child,1928)的梯度场理论进入社会理论。

发现雌性动物也有统治等级,只是梯度更小或高度更低。年幼的动物有着不稳定的统治梯度。引起这种解释的原因是,我们观察到的普通统治行为并非就是看到的那样,尚未成熟的动物之间并没有显示出持久的统治关系。当未被发现的“结果”变得与已发现的证据同等重要时,一种潜在统治的概念就随之而来了。从这一点上看,很容易判断在组织社会空间上起作用的统治量(称为量的领导关系)和导致社会混乱的统治量(称为病理侵略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人类专制个性的类似研究屡见不鲜;真正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统治的平衡,即被解释为“合作的根基”。竞争性侵略成为组织其他形式的社会联合的主要途径。竞争与合作不但不互相对立,前者还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在生理学的基础上。如果某一有机体最活跃的(统治性的)区域,即组织中心被移除了,其他梯度系统就会互相竞争,重建机体的秩序:国家政体内部一段时期的争斗与流动随之发生。关键在于,如果没有一个组织的统治等级制度,一般认为社会秩序就有可能分解成个体的、非生产性的竞争。在上述的控制实验中,之所以没有尝试带走不占统治地位的其他雄猴,是因为这样做在整个理论综合体、个体有机体的类推法和未检验的设想中都是没有意义的。

专制个性的研究将我们带入了卡朋特实验中隐含的第二层对国家政体的解释——心理学层面。最初的统治等级制度的思想是早在1913年由挪威的托里夫·舍尔德鲁普·艾贝(Thorlief Schjelderup-Ebbe)(1935)提出的,他的研究是关于家养的鸡和其他鸟类的“啄食次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思想才融入美国的对比心理学。此后,动物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及这些学科在人类方面的分支,都主要关注竞争和合作这两个观念。社会来自于成对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构成社会场空间的心理技能来理解与测量。人们既在生理层面又在心理层面寻找作为组织原则的统治轴线。

在卡朋特的操作法中隐含的第三层,也是最后一层,就是自然政

治经济层面。失去一号雄猴的群体在与其他有组织的有机群体竞争时就会失利。结果就反映在食物变少、新生儿死亡率增高、后代减少，以致遭遇进化劣势甚至物种灭绝。有机进化理论中的隐性市场竞争在此浮出水面。雄性统治功能的理论把以下三方面很好地联系起来：动物行为与进化研究的政治经济方面（竞争、劳动分工、资源分配模型）、社会联合方面（通过领导关系和社会地位实现合作性协调）、繁殖和胚胎现象的纯生理理解。这三个方面将功能主义的平衡社会模型——在当时的社会科学中建立起来的——与意识上和政治上对竞争和合作（例如劳动斗争）的考虑联系起来。既然动物社会具有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的所有特点，只是形式相对更简单，那我们能从动物社会合理地推测出可能的人类自然的、联合的团体基础。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1933）——同一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反劳工联盟的、哈佛大学的工业心理学家兼社会学家——将这种团体称为“工业花园”^①。

统治的政治原则在此被转化成为合理的统治科学原则，作为具有物理和化学基础的一种自然属性。统治原则必须渗透到所有科学工具中——操作法、概念和组织原则。不能打着解放的旗号，仅通过重新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或改变术语来改造科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愚蠢的意识行为，因为在用科学劳动进行自我创造的工程中，它否认我们与动物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但是，为了解放而重建生物社会科学和生物行为科学的艰难历程已经开始了。不足为奇的是，第一步就是

^① 将美国社会科学确立的力量归于从属作用，这一观点遭到普遍批评，而在此环境中，Baritz（1960）讨论了梅奥（Mayo）的工业神话学。同见 Heyl（1968）、Henderson（1935）、Parsons（1970）。史蒂芬·克劳斯（Stephen Cross）后来成为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的研究生，是我考虑这些问题的良师益友。在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对个性和文化的焦点讨论中，合作和竞争的主题是非常普遍的（例如，Mead[米德]，1937）。在社科研究委员会的赞助下，梅（May）和杜布（Doob）（1937）出版了一个关于竞争—合作主题文献目录。

把焦点从作为人类模型的灵长类转移到对动物本身更深层次的观察——动物如何生活以及如何与环境息息相关,这些可能与我们人类的关系不大,但它们必定会改变我们对国家政体理论中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这些“修正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值得高度重视。其中,物理人类学和灵长类动物学中的“女权主义”视角强调了对不依赖于统治等级制度的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原则。我们仍能看到并检验统治结构,但不再将其用作职能组织的临时解释。修正主义者还强调母权群体、长期社会合作,而不是短期的伟大侵略,他们强调灵活的进程,而不是严格的结构,等等。科学和意识的问题很复杂,新兴的研究也处于合理的争议之中。

在我们寻找对女权主义国家政体的了解过程中,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正如我们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每一种创造性形式。只要我们将这些科学建立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统治上,它们就能发挥解放的功能。这个要求的必然结果就是否定以主体—客体分离为基础的纯客观性主张的所有形式,而主体—客体分离使我们对自然和自我统治的逻辑合法化了。如果我们的经验具有统治性,我们会根据统治的原则把生活理论化。随着我们对生活基础的改变,我们将懂得如何建立自然科学来巩固与世界的新联系。我们,正如玛吉·皮尔希(Marge Piercy)《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一书中的唐恩(Dawn),想飞入自然的怀抱,也飞回过去,拨乱反正。但是,科学是集体的表达,不能单个重新创造。如同一部小说里的鲁西安特(Luciente)和霍克(Hawk),女权主义者清楚地提出:“没有人能改变历史”,“想帮助他人、想工作、想抓住历史,这些并非是坏事……但是特立独行就不太好。历史,如同你烘烤的一块蛋糕,将它传递给某人”。(Piercy,1976,第188~189页)

第二章 过去是争议区：人性与灵长类动物行为研究中的生产和繁殖理论

人们喜欢观察动物，从动物那里了解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20世纪的人们无一例外。我们发现动物的身体和生活详细反映了现代美国的主题。我们把动物作为镜子，“抛光”镜面来寻找自我。人们发现生物科学的重点是研究猿与猴，这种研究可以使人类个体和社会体的形式和历史得以显现。生物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有形科学，用来辨别可见形态，接受并构建可见的秩序。非人类的灵长类科学，即灵长类动物学，也许是洞察力的源泉，或者是假象的源头。这个问题有赖于我们构建动物“镜子”的技巧。

灵长类动物学关注通过动物阐释的意义来了解人类生命所具有的两大主题——性与经济、生产与繁殖。从自然经济到政治经济、从生物社会群体到人类的亲属关系范畴与交换系统的关键过渡，向来都是人们基本的关注点。这些都是与生物科学的技术和思想维度有着复杂联系的古老问题。我们对生产和繁殖的理解具有双重可能性。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加强统治的自然必要性和文化必要性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学习将科学付诸实践，以便更清晰地展现目前生产与繁殖在我们生命中的可能性片断，而不用克服对控制与敌对的理论范畴和具体实践的依赖。

以性与繁殖为基础的动物与人类社会的理论有力地证明了我们

对侵略、竞争和等级制度的自然必要性的信念。20世纪20年代,灵长类研究开始宣称所有灵长类与其他哺乳类在繁殖生理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灵长类动物具有月经周期。人们断言这种生理充斥着各种后果,通常表达在雌性的固定“接受性”这一令人幻想的“事实”上。也许,有许多人想过或有人希望过,灵长类的超凡社交性之关键依赖于社会的性基础,在于一个植根于腺体和基因的家族。自然的亲属关系被语言协调的特定人类范畴所转变,这些范畴在文化诞生之时赋予了自然一个合理的秩序。通过命名和创造种属来分类,文化会成为对必要有危险的本能的逻辑统治。也许人类已经找到了关键来控制性,性是其他所有秩序的起源与威胁。我们发现,在为我们的种属命名时,我们能控制亲属关系。只是到最近,灵长类动物学家才展开试探性的研究,质疑对自然与文化的这些解释进行分类的不可或缺性。

重点研究生产的生物社会理论基于一个基本前提:从字面的意义上看,人类是自我制造的。我们的身体是适应工具使用的产物,这一适应性先于“人”这一类属的提出。我们通过工具积极确定我们的设计,这些工具在人类与自然的交流中扮演了协调的角色。我们的存在状况可以用两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去想象。只看工具本身,我们会选择忘记,工具只是协调我们的劳动。从这一角度上看,我们把大脑和我们的其他产品看做是在提升技术统治的历史进程中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们使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疏远了。我们将自己特有的历史建筑视为既是人类必然的天性,也是技术的必然结果。这一逻辑带来了机器及其产品的优越性,也导致了身体的退化和人类工程学的合法化。或者,我们可以聚焦于劳动过程本身,重建我们的自然观、起源观和对过去的看法,从而把握人类的将来。我们可以从使用工具回归到使用个体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身体。本章就是在生产与繁殖的生物社会条件下去了解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即我们自己。

更详细的是,本章还涉及始于1930年左右在灵长类研究和身体

人类学中的辩论——关于在男女两性身体内的人类本性。这场辩论受到普通科学话语规则的约束。在这一高度规范的空间里允许使用技术论文、经费申请、师生和实验室之间的非正式网络、推广方法和解释的正式研讨会，最后是新科学家的社会化课本。本章涉及的内容不为外行人和业余者提供空间。科学的一个特点被认为是：通过了解过去的规则和进程，我们能够预知事件并因此控制事件。也就是说，通过科学——关于我们经验的、理论化的历史和学科形式——使我们了解并构建我们在世界中的生存环境，并为塑造未来而发展策略。

女权主义，一种关于爱情与权力的政治立场，如何与我所描述的科学挂钩呢？我建议从批判理论的基本视角中得出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是——正如我们从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的——人类自己把握着人类解放的社会和经济工具。然而，我们仍然排除在统治与资源匮乏的关系之外。我们有可能颠覆这一秩序。对这一矛盾的研究也许能应用于我们所有的知识中，包括自然科学。批判传统坚持，我们应当分析意识利益和物质利益中的统治关系，把统治看成理论的派生而不是自然的派生。一种女权主义的科学史，一定是集体成就，能够检验生物社会科学中我们所说的那一部分，即追溯进化生物学，并合理化以统治为基础的、假定为必然的秩序模式。检验应该小心技术词汇和普通词汇所富含的模糊性与隐喻可能性。女权主义者重新占用科学，是为了发现和定义对人类来说什么才是“自然的”东西^①。人类的过去与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种引起广泛兴趣的科学方法承诺要严肃对待科学话语的规范，而不崇尚科学客观性。

我的研究重点在于以下四组理论，这些理论强调在错综纠结的重

^① 当雷纳·拉帕(Rayna Rapp)还是这篇分析文章初版的匿名评审时，她帮助构建了这一分析。

构人性和进化的网络中繁殖和生产的范畴。第一组以繁殖为中心,是索利·祖克曼(Solly Zuckerman)爵士的研究项目。他于1904年在南非出生,在开普敦大学学习解剖学,然后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他结合复杂的并具启示性的方法研究各学科的关注点,包括:人类古生物学与身体人类学、繁殖生理学与灵长类动物经期、以灵长类为重点的动物学和分类学的广义问题。他的社会基地包括英国大学和医学院里的动物园和实验室。他的学习和职业反映了各方面的交融:解剖师、生物科学家、人类学家、临床学家、管理者和政府的科学顾问^①。他创立了颇具影响的理论,即性生理学是灵长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他还提出了这一理论在狩猎适应中人类文化起源的一个变化,狩猎适应描绘了由性分工的劳动力与人类家庭这一普遍制度的决定性结果。在致力于研究猴子的性生物学时,祖克曼为界定人性构建了一种逻辑思路。事实上,祖克曼宣称,所有灵长类动物的唯一共性就是月经周期。因此,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对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有效的比较。

同样强调繁殖的第二组理论是由塔尔玛·罗维尔(Thelma Rowell)提出的。目前她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她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剑桥大学罗伯特·亨德(Robert Hinde)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罗伯特·亨德曾指导过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研究黑猩猩的毕业论文。那段时期见证了以长期实地观察野生灵长类为基础的出版物的开端,而且现在这些出版物仍在不断涌现。罗维尔学习的是动物学和动物行为学。她的初衷是使用牛津大

^①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科学政治中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祖克曼(1972,1978)提供了关于他科学职业生涯的自我见解。在洛克菲勒研究基金的资助下,祖克曼从1933年到1934年成为罗伯特·亚尔克斯的新耶鲁灵长类实验室中的一员。耶鲁大学档案中亚尔克斯的文章记载了关于亚尔克斯和祖克曼的通信内容,显示了他们被彼此的灵长类科学方法所启发。

学尼可·丁伯根(Niko Tinbergen)提出的行为学研究方法来写一篇关于哺乳动物(仓鼠)交流的论文。因为尼可·丁伯根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哺乳动物之间非定势的社会交流,罗维尔便在剑桥大学继续研究自己的观点,在亨德结合美国对比心理学和陆地动物行为学的指导下。罗维尔的研究(1966a,1966b,1970)使用了这两种传统,涉及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交流、狒狒的经期、猴子的自然行为与囚禁和实验室环境中的行为对比以及母亲—幼仔社交系统。罗维尔是一位敢于对普遍的统治概念直言不讳的评论家,她将社会角色和社会压力作为自己理论所涉及的主要方面。

虽然祖克曼和罗维尔两者的研究有所不同,却都采纳了各种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这些功能主义对身体和国家政体的已有解释附加了限制。最重要的是,功能主义对均衡性、稳定性、平衡性上的最终解释都有所要求。功能主义是在机体隐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多种生理成分或子系统互相配合,成为一个和谐的等级整体。冲突从属于一个共同利益的目的论。^① 祖克曼和罗维尔的解释都以复杂的方式反映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观点,它们能够指导女权主义应对生物学和社会学理论。

第三组和第四组理论是人类进化的重构。这两种理论都以生产为中心,主张解释决定性适应的含义。他们把适应看做是与功能综合体的解释有关的概念,也与行为和结构互相体现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祖克曼和罗维尔将自己都限制在研究猴子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舍伍德·瓦什博恩、他以前的学生阿德里娜·齐尔曼(Adrienne Zihlman)和她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同事南希·坦纳(Nancy Tanner),都对身体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联系提出争论。在讲述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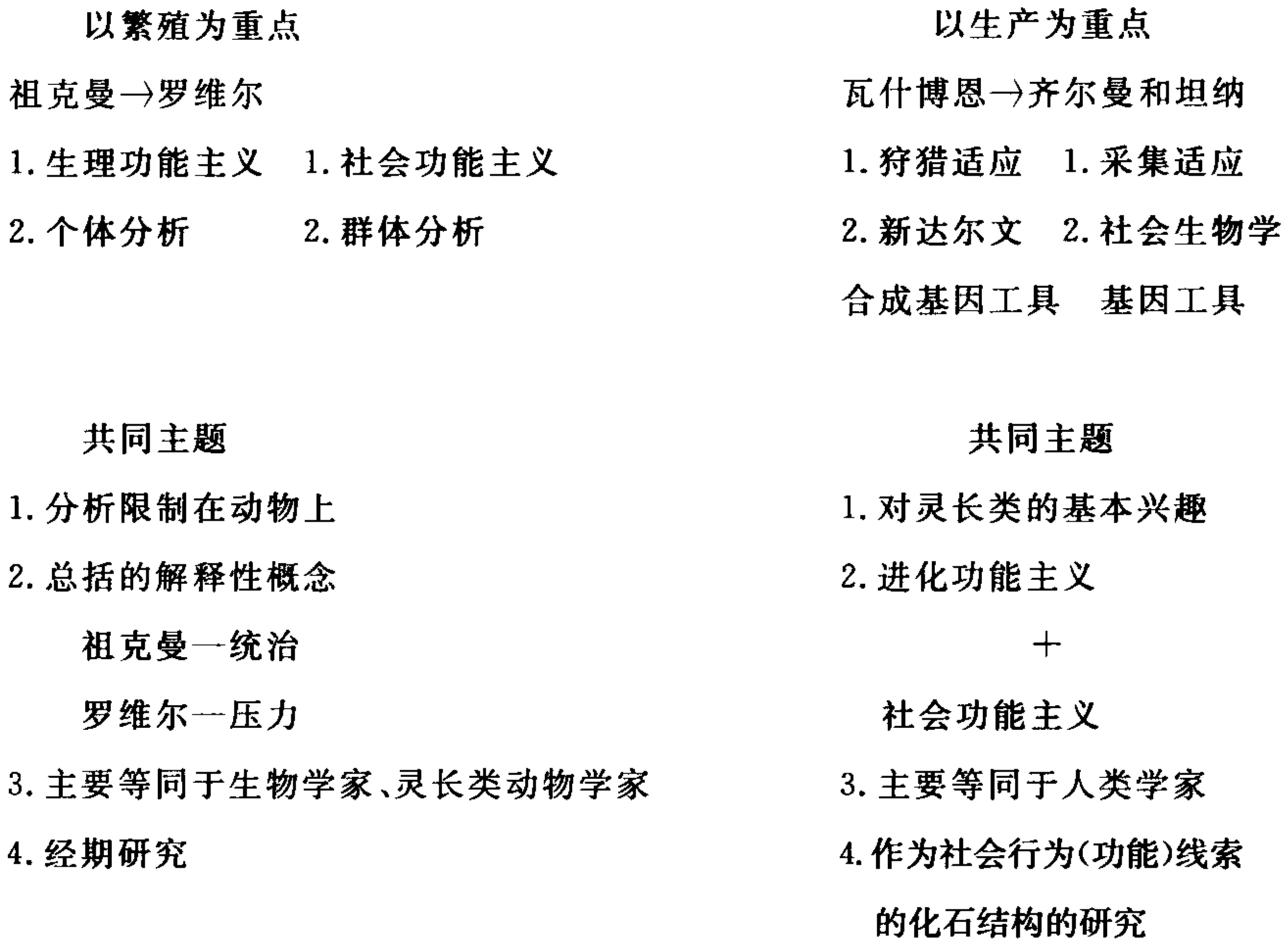
^① 查询 19 世纪初资本主义阶段关系被神秘化的过程中功能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历史。见 Young(1985)。

于人性的科学故事时,他们认为推理重构在进化研究中的地位不容辩解。进化生物学和人类学中的机械论或纯结构解释的背后并没有隐藏什么。但既然功能的地位依旧十分突出,相应的科学方法可以被称为进化功能主义。

第三组理论的中心人物瓦什博恩与现代的“人类—狩猎者”假说有最直接的联系。这一假说坚持认为狩猎适应是基本的功能综合体,一直以来为几乎所有的人属历史拟定了规则。瓦什博恩还提出工具使用理论作为人体进化的动力,包括人的大脑及其使用语言的能力。他颇具影响的“物种自我制造”的见解,使他获得埃莉诺·李科克(Eleanor Leacock)(1972)这样的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和多萝西·迪纳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1977)这样的弗洛伊德女权主义者的赞赏。他又是本书中的大反派,因为他过多关注男性,将其作为人类唯一积极的性别。在我看来,瓦什博恩的思想比以上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所揭示的都更为复杂和重要。通过将功能解剖学作为进化综合理论的一部分来发展,并把这一方法延伸到现存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学中,瓦什博恩将复杂的基因理论和有规则的实地、实验方法学,与进化重构的实践结合起来。

第四组理论的作者,齐尔曼和坦纳发表了一篇优秀评论,来批判瓦什博恩通过使用自身工具在科学上进行性别歧视。没有瓦什博恩提出的功能身体人类学,他们本来也不会想到这一点。齐尔曼和坦纳也对女权主义的科学进化重构增加了一个新的转折:使用社会生物学的概念。他们方法中的乐趣和讽刺之处在于,列举了一些明显的性别歧视理论的思想却适得其反。但在这一层面上,女权主义的争论仍然是关于人类共性的本质和存在。起源理论迅速成为本质和限制理论(见图1)。

图 1:主要人物间的关系



此图的分类并非显示严格的区分,而是表明每个研究者的写作重点。

→= 某些直接的联系。

20 世纪 30 年代是性内分泌学研究取得喜人进展的 10 年。这一时代早期,祖克曼创立了强有力的生理基础理论,一般是指哺乳动物社会的生理基础,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社会的。他多次声明他只是想采用动物学家在动物社会学中的观点,避免外推到人类的、文化的和语言协调的行为。可是他的研究影响了对人类组织起源的调查及其研究中使用灵长类动物的实验。他为统治的概念赋予了最新的科学合法性,例如,将统治概念与新的内分泌学联系起来。在他的理论中,统治与资源(女性)控制的男性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繁殖生理学带来的结果,女性就成了强制男性秩序的自然原材料。人类的革新就是控制自然生理经济的实践。简单地说,统治改变了与文化关联的

层面。

祖克曼考虑灵长类社交性的原因从两方面出发：(1)人类学社团的争论——表现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野人社会的性和压抑》(*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和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文明与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关于本能在人类组织形成中的文化统治；(2)有关荷尔蒙与行为的新生物学科，以神经和繁殖生理学、比较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祖克曼在这两个方面都采用了生理和医学定向。他批评所有现有的动物组织理论，批评它们具有人类学形态和目的论的含义。祖克曼用生理学方法替换了功能适应的旧进化意义，因为生理学方法依赖于对解剖学和生物化学中特定机制的研究。功能意味着机制。行为与社会被联系到机制生理学，而分类学也以此为基础进行改革。《人、猴与猿的功能亲密关系》(*Functional Affinities of Man, Monkeys and Apes*, 1933)一书对生物进行了分类。在此，祖克曼构建了“狩猎假设”来解释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

但我们首先必须看一下在《猴与猿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Monkeys and Apes*)(1932)一书中他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社会的一般理论。祖克曼对灵长类动物学施加了重要限制。他未识别出现存灵长类动物的完善阶梯，代表心理功能的级别和相应的社会合作程度(一般表示分等级的组织)，这是人类经历过的必要阶段。因此，“只有在所有猿与猴中的普遍行为才能被看做是代表一个社会水平，而这一水平人类在其发展的前人类阶段就已经经历过”(1932,第26页)。只有一件事满足了这个要求：“把猿与猴的普遍行为应用于人类行为的所有问题暂置一边，也暂不理睬目的论推断，科学的哺乳动物社会学的主题被看做是生态学、繁殖生理学和其他能根据个体变化来归类的学科。”(1932,第28页)这种对生态学的肯定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猿与猴的普遍行为，直到后来需要一个诱因把文化的答案(狩猎)变成灵

长类的性行为。个体变化解释了细节，“但是社会行为——一个群体里个体间的相互联系——主要由繁殖生理学机制决定”（第 29 页）。

祖克曼已经告诉读者，他开始涉足哺乳动物社会学是受了人类学家的鼓动。他的目标是用生硬的生理学来取代对动物社会的趣闻描述。他简单假设了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起源，其本身也是社会的起源。在这一点上，祖克曼查阅了美国哺乳动物学家 G. S. 米勒(G. S. Miller)的作品，其中米勒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论点持批判态度。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家庭是独一无二的，亲属关系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决定性分裂。他也将承载亲属(父系)制度的人类生理学视为独一无二。相反，米勒和祖克曼都认为已经找到了哺乳动物繁殖联系中人类家庭的所有生物要素(即女性的固定接受性)。祖克曼只是将这一观点发展为对灵长类动物中随之出现的社会形式的分析。弗洛伊德关于压抑中的文明起源的观点，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预兆。祖克曼的阐述基于不同灵长类群体的对比生理解剖学，这是他最近对狒狒经期的发现所揭示的；同时还基于 1925 年以来对伦敦动物园猴山的阿拉伯狒狒的领地进行的行为研究。为研究繁殖，祖克曼还远足去了南非采集解剖材料，其间对另一物种(南非狒狒)进行了 9 天实地研究，这也是对动物园行为观察的补充。

尽管祖克曼描述的逻辑非常简单，但却影响了高级研究的整个领域，而且为新的荷尔蒙和行为科学围绕社会秩序研究提供了逻辑依据。除了聚到一起繁殖，动物在其他时候都是孤独的，因为生命的基本模式就是对匮乏的资源进行竞争。繁殖联系中充满了危险，因为竞争的成功需要其他动物的合作。雄性争斗就是为了获得最大数量的繁殖机会。祖克曼保留了这些达尔文的思想要素。这些思想与对动物的利他主义和合作的讨论一样，对祖克曼来说都是不含目的论的。雄性统治雌性，是为了预防另一个竞争反抗的源头。在考虑了繁殖基本要素之后，动物们分开是为了避免性争斗而带来的更多不可避免的伤害。而性周期(季

节性)的进化就是在一年中剩下的时间内,保护动物原子不受彼此的伤害。母子群体很难构成社会。在任何情况下,对哺乳动物来说,这些群体都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能解释灵长类社会。异性间不同程度的长期联系,与动物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繁殖要求密切关联。雄性争斗是为了积累生产(繁殖)手段,只需如此它们就能在进化中增加基因资本。雌性是进化生产的手段,也是剩余价值的源泉。随着统治成为雄性之间的普遍交换媒介和价值衡量,霍布斯(Hobbes)在他的书《利维坦》(*Leviathan*)中提出的政治和自然经济找到了它在20世纪的生物学表达。经济秩序在人类以外的所有生物中只有生理性,而在人类中也能找到对女性和资产的文化所有权。

对祖克曼而言,社会进化的主要事件就是消除极端季节性和引进一年的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在雌性不断的性“接受力”的基础上。引起性交的规律性反复的,首先是发情期,其次是经期。一月一次的经期取代了季节周期,社会变革随之而来。如果动物要在不断的联系中生存下来,需要有强有力的控制机制。“harem”(为一个雄性动物所控制的许多雌性动物)一词由此诞生,这在祖克曼于1929年到1930年间亲自观察阿拉伯狒狒时得到了验证,而且他有着这个领地追溯到1925年建立时期的记载。尤其自从阿拉伯狒狒无法在猴山存活下来开始——在残酷的争斗中几乎所有的狒狒都被杀死,只有一只幼仔被成功抚养——祖克曼观点的确立意义重大,他认为囚禁的狒狒在性别失衡和拥挤的极端条件下仍然显示出自然界灵长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他使用了传统的生理学观点:极端环境是展现正常状态的最佳窗口,因为极端环境突出了基本机制,而在其他条件下就可能表现得不够清楚。等级制度和致命竞争是灵长类社会中关键的调节器,而不是人类狩猎者的创造物。对祖克曼来说,还有一件要事,就是说服他的读者:灵长类社会形式中的变体只是强加于由生理决定的基本家庭上的细节,而这些变体没有在野外被正式地研究过。在统治模式中,如女性

“卖淫”之类的行为(祖克曼和米勒定义为并非出于性原因)被解释为性交易的开端,以性好处交换以其他方式得不到的商品。整理毛发、喂食次序、有声表达和手势表达、社会空间分配和社会行为的许多其他方面,都来自于由生理决定的灵长类一夫多妻制的组织。祖克曼表达得很清楚:

以上勾画的论点解释了次人类灵长类社会的广泛基础。决定次人类灵长类社会分群的主要因素就是性吸引……由任何一个雄性统治的雌性数量限制决定于该雄性的统治程度,而这一程度不仅依赖于它自身的性能力,而且也依赖于它与其他雄性同伴之间的关系。(Zuckerman,1932,第31页)

当然,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拥有“一个顺利的、不间断的性生活与繁殖力”(第51页);但是人类和人类家庭存在于文化领域里,即使不能免除生理学家的性腺切除术和针剂,也能少受其困扰。生理学家带着他的医学工具在被定义为合作的社会等级制度内部,给家庭带来健康,并调整人类行为,那这样的他如何重返文化王国呢?通过狩猎,通过品尝肉类。回到《功能的亲密关系》(*Functional Affinities*)一书,我们看到祖克曼把自己伪装成身体人类学家,为了创造大型脑的狩猎动物把生理学和生态学结合起来,这种动物需要更加复杂的雄性合作与雌性忠诚来养家糊口。在亲属关系的文化形式中,作为社会联系的基本核心,即文化人类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基本对象,繁殖单位仍然占有统治地位。这再一次证明,祖克曼的逻辑非常简洁。一些不为人知的生态变化在前人类的以下活动中引起了淘汰压力:开发新的食物来源,修改古老的非专门化的喂养模式,以及为大规模肉食需要而引入劳动力性别分工的必然结果。即使在没有强行实施的情况下,分享食物使得家庭这一人类形式成为必要,这对祖克曼

来说意味着“公开的一夫一妻制”的淘汰压力和对社会重大关系(女性的所有权)的概念认识。女性在这种重大转变中的被动性是未经检验的假设。因此,随着大脑及其副产品——语言和文化——的惊人发展,婚姻和男性的狩猎组合也发展起来了。

祖克曼在狩猎假设的晚期形式中暗示,该假设强调在自我制造的物种起源中使用工具的适应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由男性组成的团体——人类的合作形式,标志着文化从自然中分离——在祖克曼手中成了科学的甚至生理学的对象。而珍贵的女性仍然通过其性征产生秩序混乱的威胁。合作意味着男性对以前的自然等级制度和竞争开始有意识的管理,而随之产生女性的永久性征。祖克曼提出的这些主题并不新鲜,但他将这些主题并入现代生理学科的方式很新奇。不仅如此,他的生物意识形态不但没有触犯,反而巩固了生物与社会科学、动物与人类秩序的自主性这一重要教义。祖克曼为功能社会人类学留出了充分的空间。他只是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生理学进行了改革。

祖克曼在灵长类行为研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是他少量的实验观察,而是他提出的理论满足了迅速发展的新学科的需求。同时,他用自由的意识形态科学化了传统偏见,宣称文化从以前的生物决定论形式中独立出来了。这一自由的意识形态也使科学控制“自然”的逻辑合理化了,现在又被理性化为一种物质,简化到前理性危险或者有序资源。这种物质的异化核心并不模糊。紧随其后,祖克曼为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多问题,甚至涉及质疑关于自然的男性竞争和危险的女性性征的强化科学信念。祖克曼将性别与统治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生理科学和行为科学都能接受的方式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建立统治的地位,作为一个特征或事实,而不是一种概念。灵长类动物学家继续提出关于统治行为选择优势的问题,他们倾向于假设,而不是检测繁殖优势与统治实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直到 1965 年,瓦什博恩的两个学生发表了一篇文章,祖克曼关于女性一年期性征的灵长类社会起源

理论正式下台。^① 祖克曼提出的隐性弗洛伊德主义、生化机制和社会行为研究的结合模式有着深远及持久的影响。

乍一看,塔尔玛·罗维尔与祖克曼的观点相比必定是对立的。尽管罗维尔称赞祖克曼对狒狒经期的突破性研究,而且她在关于统治概念的历史性文章中也没有严厉批判祖克曼,但她的整个研究与祖克曼的思想和方法似乎是相反的。罗维尔并没有为共同语言和科学传统中多次意义冲击下的语言宣扬科学纯粹性。她的论点是动物学的和明显社会学的,而非对繁殖生理学的外推。她所关心之事是为人熟知的:为囚禁的猴子划分笼内空间,以便使其显现更多自然行为,获得出色的实地研究,而不是获得刺激下极端行为的生理论点作为研究常态的窗口。罗维尔的文章不强调灵长类的共性,而充满了特殊性,她建议关注复杂性,坚持可变性,以致使人想起文化概念和文化特殊性的早期支持者。而且,罗维尔是在非常不同的科学和思想意识环境下工作的。她从基于灵长类动物直接实地研究的广泛现代文献中获得知识,同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研究回溯参考了祖克曼的思想,但又超越了他所及的境界。这些文献倾向于否定祖克曼对性的教义,但又保留了对统治的重点研究。最后,罗维尔的写作对象是那些对社会生物理论中的女权主义含义敏感的人们。她强调女性的行为和积极的社会角色,同时把统治至多当成预测一些已知行为频率的便捷表达,这并非偶然。

但是,在根除多余的偏见却积累了更好的数据方面,将罗维尔的研究视为正常科学进步的简单例证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她的研究也并不仅仅是用更令人满意(令我满意)的女性偏见来取代祖克曼令人

^① Lancaster and Lee(1965).

以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1962~1963 年的灵长类研究项目为基础,《灵长类的行为》(*Primate Behavior*)一书代表了舍伍德·瓦什博恩和大卫·汉堡在医学、进化和社会的功能主义框架中重建灵长类研究的创业努力。

愤怒的男性意识。实际上,罗维尔和祖克曼在关键意义上是类似的,我相信这也表明了在全控制下的实验室科学中无懈可击的研究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部分本质。在“压力”问题上,对应于祖克曼的性生理学,罗维尔的确有一个总体的解释范畴。像性或统治一样,“压力”这一范畴将普遍的社会信仰融入生化学家的试管提取物。对压力的研究,可以在肾上腺功能的层面上进行,或在精神疾病的层面,或在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解释”层面。如果说统治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重要概念,那个时代背景是在一个世界动乱年代中,非凡的科学和大众关注的是社会合作与竞争基础,那么压力就是最讨人喜欢的概念,它伪装在某种事物下,在更近的时代里伪装在对特权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下。统治并没有灭亡,但压力在社会理论中更加有用。它是一种更深层的指代,即指代社会系统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将其作为社会学解释的主要模式。系统理论的身体隐喻——如忍耐力、压力、平衡性和均衡性——将我们带入意义的许多层面。其中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某些生物系统“退化”的观点和缓解压力的医学功能所处的层面。隐含在系统功能主义里的第二层含义就是作为社会整体和生育种群的系统的“繁殖”必要性。我们能够解释行为,然后根据系统维护或病理失败来最终实现这种稳定。

1974年,罗维尔总结了反对使用统治概念来理解社会结构的所有论点。她提出了两个主要方针:(1)把所有公认的统治行为都作为已知反应,用动物生理学的现有理论可以轻易解释;(2)除去将统治视为特征或受淘汰压力支配的适应综合体这一观点的依据。也就是说,所谓的统治行为与繁殖成功没有关联。有些有趣的观点是关于像“潜在统治”之类概念的含糊本质的,它们成为论点填补了观察空白。除了这些观点之外,罗维尔坚持,观察条件引入了决定性因素,通过这些因素我们应当预料得到社会动物会学习称为“统治”的各种反应。等级制度对罗维尔来说也主要是人造的观察方法。罗维尔发现统治的不

同手段并不紧密联系,而由不同手段实现的等级制度也不显示相同的社会结构,这更加证明了罗维尔对等级制度的看法。所以很难看出,与统治有关的、观察到的行为什么是与进化有关的,而进化需要基因基础来进行淘汰。用罗维尔的话来说:“统治的功能成了非问题。”(1974,第151页,斜体)

但是,功能的确还是本质问题,是将本章中的各参与者统一起来的“圣杯”。对罗维尔而言,功能必须用社会系统的概念来看待。交流分析、母子互动的研究、与年龄和性别相关的角色变化、以母系(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子系统、作为空间秩序的领地和等级以及由环境变量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都成了被关注的领域,即从功能角度对系统的“结构—功能”解释产生影响的分析对象。罗维尔写的《猴子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 of Monkeys*, 1972)非常实用,语言老练,在这本书中她的理论立场最为朴素。社会系统问题就是在动态时空平衡的流动结构中多变量分析的问题。动物社会学从马林诺夫斯基、L. J. 亨德森(L. J. Henderson)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人类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吸取的知识几乎未被人注意到,更不用说去批判地检验了。

压力如何与社会系统发生联系呢?讽刺地说,是通过从属关系等级的概念。在对压力的敏感程度上,可以将动物互相比较。敏感度高的动物被刺激后很容易表现出畏惧、逃跑或缩成一团的姿势。这些敏感性与高度的肾上腺激素有相当关系。因此,在“压力”的情况下能够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这一合理假定具备一定的基因基础。这些命题都是能够检测的,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的。镇定的动物可以被观察者称作“占统治地位的”,因为它们能在社会空间里自由活动,自由获取可用资源,而它们那些紧张的同伴就只有退缩或离开。罗维尔将这些可怜的、畏缩的动物看做是产生“等级制度”的刺激或起因。这种社会结构应该被称作从属秩序。对压力环境产生反应的各

种起点都是自然社会群体中的适应性。在有效调控整个环境的稳定时,无论是面对危险还是维持群体内部的和平,紧张和镇定的动物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引起压力反应差异的群体基因多样性在进化中会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注意,维持整个系统平衡的社会角色的功能主义理念、生化和激素功能的基因概念以及统治—从属关系的心理学方法三者是如何汇集于“压力”这一中心观点的。

压力,作为功能主义解释中的一个多层面的总体概念,在塔尔玛·罗维尔和舍伍德·瓦什博恩之间建立了关键的纽带。大卫·汉堡阐述了这一纽带。大卫·汉堡后来任国家科学院医学院主席,是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医学院的精神病系主任,并与舍伍德·瓦什博恩合作,围绕现代医学和进化学问题建立了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在汉堡与瓦什博恩的合作研究中,功能主义解释的更黑暗一面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围绕压力的隐喻结构不再比统治更适合。大卫·汉堡是情感适应构型进化理论的核心人物,这一理论产生了退化生物学的理念。对“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情感不适应进行医学处理,这似乎被证明能减轻病理压力,维持社会系统。“现代社会”本身似乎由某种技术命令产生,而这种命令又覆盖在我们限定的生物遗传上。灵长类研究的动力是管理压力社会的需要,而反过来又合法化了这种需要。动物是我们的局限性(适应障碍)和创新性(使用工具)的模型。

在选择行为和情感模式的研究中,社会功能主义与进化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选择行为和情感模式保持着社会随时间的推移成功地繁殖种群。该命令就是繁殖—社会系统的复制和作为其成员的有机体的繁殖。总的来说,要在进化历史中幸存下来,动物不得不喜欢去做必须做的事情。这里,在与学习理论的有机体和动机基础相关的现代版快乐计算法中,进化理论将系统社会学和个性情感心理学结合起来。罗维尔总结道:

然而，一位动物学家总是必须回到选择优势的问题上来……猴类喜欢成群结队，这太明显了，我们也就认为理所当然了。与其他各种生活现象一样，快乐服从于并取决于进化压力——我们喜欢某一事物，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与不喜欢（也不寻求）类似诱因的其他亲属相比，能更好地生存下来，留下了更有生存能力的后代……这只是推断；但通过研究来检验猴子和其他动物社会系统的功能，我们将能完全理解它们的机制。（1972，第 174 页，第 180 页）

瓦什博恩与大卫·汉堡也有相同的分析，但却把它运用于另一个概念，即通常被理解为满载含义的科学词汇中的一个词：侵略，尤其是男性的侵略。通过这个概念，我们必须从以繁殖理论为基础的解释过渡到在人类进化和灵长类行为研究中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解释。很明显，繁殖与生产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瓦什博恩是如何从考虑物种的经济机能达到“人类—狩猎者”的理论，祖克曼是如何通过繁殖生理学来考察灵长类动物的秩序，而罗维尔是如何让我们理解繁殖系统中社会理念与进化理念的接合。

瓦什博恩与汉堡（1968）发展了 1957 年他们合作时首次提出的主题。当时瓦什博恩在斯坦福高级研究中心花了一年时间作为研究员研习行为科学，从 1962 年到 1963 年他继续深造，期间瓦什博恩和汉堡在令人激动的世界灵长类动物学家的新团体中组织了一整年的会议和合作。在“古代世界中猴与猿的侵略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 in Old World Monkeys and Apes*）一文中，这两位合作者把他们的工作介绍为研究人类产生力量的一部分。他们希望重视独一无二的人类生物学和人类进化的独特条件。他们把侵略视作基本适应性或功能综合体，这对于整个灵长类，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很常见的。“在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群体中，秩序是由等级制度来维持的，而等级制度最

终也是主要依赖于雄性的力量……在社会系统中具有侵略性的个体是必不可少的角色,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于物种的散布和当地种群的控制都是必要的”(1968,第 282 页)。侵略的生物学已经被广泛地研究,而且,瓦什博恩和汉堡提出,这一学科似乎依赖于类似荷尔蒙和神经的机制,它在灵长类动物中,尤其是在人类中,通过新的大脑综合体和广泛的学习而进行修改。在除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中,侵犯总会有回报,瓦什博恩和汉堡坚持,好斗的个体(雄性)留下更多的后代。所以,他们赞成选择一种共同适应基因的系统,涉及运动解剖学、手势解剖学、荷尔蒙、大脑成分和行为中的复杂反馈。据推测,侵略综合体的所有部分都会进化。瓦什博恩和汉堡相信,对人类而言,要求侵略的功能不会减弱。从防御、治安到最后狩猎,对轻易学会并享受有节制的争斗、折磨和厮杀的雄性有机体来说,都需要一种连续的选择。

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社会都依赖于年轻的成年男性去狩猎、争斗,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即使当个体合作时,这一个个体的社会作用也只有在极端侵略行为中才能实现。而侵略行为是在竞赛中学会的,由社会认同的,也很可能是令人满足的。(1968,第 291 页)

但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生物学成了一个问题。如今它经常表现出不适应性,原因是我们的技术进步在不断加速。我们的身体有着古老的基因传播,跟不上由语言产生的新文化传播技术的步伐。所以,现在,当社会控制崩溃时,我们必定会看到病理的破坏。瓦什博恩和汉堡在此提出的例子就是发生在纳粹德国、刚果、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本性就必须面对它。“当代人类群体由灵长类动物指引,灵长类的进化历史是通过生物和社会的传播支配着一种强大的统治方向,而这一事实中有一个基本难题”(1968,

第 295 页)。这一逻辑得到了发展,从而假定了一种需要,即用有科学依据的理性控制来取代前科学惯例。“但是,在科学发达的世界里,靠前科学惯例生活的侵略性物种将会在个体冲突和国际战争中付出重大代价”(第 296 页)。自由科学家提出,这里的教训就是不要偏向某一种社会秩序——那是政治和价值观的问题——而是要为整个先进社会建立前提条件,也就是对现在效率低的、不适应的和退化的生物学提供科学管理。我们只是一种产物,大崩溃的一个对象。从个人层面上讲,精神治疗是一种修复工作;从社会层面上讲,科学政策要求我们运用自己的技能通过社会控制来更新我们的生物学。我们的生产系统已经超越了我们;我们需要质量控制。

社会注定要受科学管理调节下的等级制度和统治关系的影响,但在接受这一事实之前,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提出疑问,是什么让瓦什博恩和汉堡如此坚信我们,或至少男性,拥有一种可悲的侵略天性?毕竟,人类男性没有许多灵长类雄性动物所谓的好斗的解剖特点——似匕首的犬齿、适合行为学分析的联合威胁姿势、雌雄体型上的巨大差异或者附加结构(例如提高威胁力的鬃毛)。我们也没有与侵略者和解的让步姿势。那为什么说我们确实具有侵略性的、要求权力的大脑呢?瓦什博恩判断,人属的出现是很早以前两足直立和使用工具的结果。淘汰压力使得工具使用增加,而随之使狩猎的生活方式、大脑进化和语言成为可能。人类男性不再用牙齿或手来搏斗,而是用语言文字或手制作武器。我们缺少了犬齿,是因为我们制造刀具,也用语言辱骂。要求侵略的淘汰压力没有减少,但这一功能的结构基础与新生活方式的整个适应综合体一起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一论点涉及瓦什博恩身体人类学的基本重构,这一重构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作为进化综合理论的一部分,也涉及瓦什博恩在人类进化研究中成功促进灵长类行为研究的努力。

瓦什博恩于 1940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身体人类学的博士学位。

他的学习是用了传统的人体测量方法和灵长类动物解剖学,然后他在哥伦比亚的内外科学院教授解剖医学,直到1947年他搬到芝加哥大学。他随同参加了1937年的亚洲灵长类动物考察,在这一次考察中,C. R. 卡朋特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长臂猿行为和社会系统的专题论文。但是,瓦什博恩认为卡朋特当时对社会系统概念中令人激动的可能性还认识不足。他自己在这次考察中的任务是解剖收集,也就是拍摄样本。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瓦什博恩在将身体人类学作为一个实验性科学来研究;到了1950年,他发展了一个宏大的项目,重释他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与新的人口基因学、系统学以及多布然斯基(Dobzhansky)、迈尔(Mayr)和辛普森(Simpson)的古生物学一起和谐发展。到1958年,他获得了福特基金项目,用复杂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的进化,包括提供到东非实地考察狒狒的机会。一年后,在现在的伯克利分校,他为美国第一批实验性灵长类动物的实地研究站之一发展资金。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他教授学生,撰写畅销文章,制作了教学电影,在教育各个层面改编课程,并成就了当今进化学和灵长类动物学领域中多位知名人物的事业。

这里并非探索瓦什博恩的思想起源,也不是探讨他的大型研究组织和教育项目,而是提出与狩猎主题和灵长类行为有关的基本特征。^① 此目的是,认识到一丝不苟的实验科学家瓦什博恩的职业生涯,是“人性是人类未来的基础”这一命题的科学与社会争论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明白瓦什博恩能身兼数职:侵略进化文章的合著者、社会生物学的反对者、罗伯特·阿特里(Robert Ardrey)心中的英雄和反派、某些马克思女权主义者推崇的人物以及社会生物学女权主义者阿德里娜·齐尔曼(Adrienne Zihlman)和社会生物学性别歧视者欧

^① 瓦什博恩亲切提供了他的文档收藏中关于重建其职业、项目资助、学生和项目的文件。

文·德·沃尔(Irven DeVore)的老师。他拥有所有的这些身份,并且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总是非常一致和统一。他的秘诀在于,他创立了一个基础理论,为许多学科的实践和推测进化重构的法则提供了大量暗示。从库恩范式上看,瓦什博恩似乎与科学范式有着基本联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他与已确立的秩序紊乱的偏离理论化有关。

在瓦什博恩广泛再版的文章中,他在身体人类学中的基本革新显而易见:“新的身体人类学”(1951a)和“灵长类动物尤其是人类的进化分析”。(1951b)他将新的种群遗传学应用于灵长类动物的进化研究中。对瓦什博恩来说,种群遗传学说明进化过程是决定性问题,而不是化石的结果。因此,选择与适应是他的中心概念。只有理解了能够产生适应特征的条件或力量,才能解释这些特征。身体人类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特征”。瓦什博恩对“身体”实施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使其成为“功能综合体”,需要从这些“综合体”的生命活动中来寻找意义。例如,他不测量鼻子,而是从咀嚼和生长来分析脸中部的力量。这项任务需要现存动物的模范实验体系。他不是建立以脑部扩大为基础的进化分级,而是分析了参与有关运动、进食和类似功能的适应性转变的身体各部位。总之,“生命的解剖学,即完整功能的解剖学,并不了解人为的界线,而这些界线仍然支配尸体解剖”(1951,第303页)。

瓦什博恩是身体人类学的更大革命中的一分子,这一革命伴随着发现新的化石、测定年代的技术、实验可能性和更近期的分子分类学。革命的中心对象之一是脑部较小的南非类人猿,即南方古猿。“南非类人猿或小脑人的发现,使我们能够概述基本适应性,这是人类辐射的基础”(1951b,第70页)。人类辐射的起源与其他哺乳类群体的一样,虽然它的结果无疑是新颖的。“但是工具的使用带来了一系列的因素,逐渐改变了进化的图景。评估文化发展对身体进化的影响方式

尤其是人类学家的任务”(1951b,第71页)。进化和社会的功能主义再次汇合;对瓦什博恩来说,两者都可以用来分析生存系统、行动和生活方式的意义。从20世纪50年代起,瓦什博恩主张,功能解剖学和进化综合理论永远终止了自然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为时已久的冲突。

1958年,瓦什博恩和他以前的学生弗吉尼亚·艾维斯(Virginia Avis)为一个关于行为与进化的研讨会写了一篇文章,始于1953年的这次研讨会的组织目的是实现对比心理学和综合理论的结合。瓦什博恩强调了行为的重要性,这自然使他对进化适应性的心理结果产生了兴趣。在“人类行为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一文中,瓦什博恩和艾维斯(1958)提出了狩猎适应性的结果,包括好奇心与流动性的增强、狩猎和捕杀过程中的乐趣以及关于我们与其他动物关系的新认识。也许最重要的是:“狩猎不仅让新的活动与新型合作成为必要,而且还改变了群体中成年男性的角色……人类让其他动物对人产生畏惧,而正是这种活动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合作、食物分享和群体内部经济的互相依赖。”(第433~434页)人类的生活方式拉开了帷幕。

把行为看做从最初的肌体活动到后来的心理定位,是通往下一步的一个简短的逻辑步骤:将行为看做社会系统。始于1955年,几乎是不经意的,瓦什博恩不仅调查单个有机体的行为,而且调查社会系统的行为。在他与德·沃尔对狒狒的研究中,作为预先适应人类社会系统的模型,他们强调在保护和治安中雄性动物的角色,这一研究是进化功能解剖学中的适当结果。他们也总是强调人类社会与猴子社会的差异;瓦什博恩从未参与生物链的重构。他看待动物社会系统的方式与他看待决定小猫头骨发育力量的方式一样——作为某些特定问题的模型体系,解释化石中头骨的形成。他的科学是以功能为基础的实验对比生物科学。但是狒狒的模型体系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群体结构来自雄性的统治等级。狩猎改变了这种结构,但只是产生了雄

性合作团队这样的特殊角色。雌性的繁殖功能和母系社会的延续仍是一种保守的模式,这一模式由脑袋更大、更具依赖性的幼儿来巩固。

将狩猎的解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果联系起来的经典文章是瓦什博恩与 C. S. 兰开斯特(C. S. Lancaster)合著的“狩猎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hunting)(1968)一文,文中对以人性为基础的文化拟定了规则。这篇文章在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圈子里为瓦什博恩带来了不良的声誉。这篇文章出现在一次强调性、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挑战中人的狩猎本性的研讨会上,它的出现是当代进化重构的一部分社会形势。瓦什博恩并不是思想家,而是科学家和教育家。这是重点。对进化功能主义来说,对人性的解释是中心的科学问题。过去从“有限的”意义上对各种可能的未来拟定了规则,向我们展现在对侵略性男性角色的可能倾向、女性的依赖性和稳定的社会系统的条件下所创造的生物学,这些条件可以用功能的概念来适当分析。讲述人类历史的故事是一个受规则支配的活动。瓦什博恩的科学改变了游戏规则,要求从生产条件得出论点。

在“进化中的女性 第一部分:人类起源的革新和选择”(Women in evolution. Part I: innovation and selection in human origins)一文中,南希·坦纳和阿德里娜·齐尔曼(1976)^①运用了新的规则,讲述的却是关于不同的人性和不同的共性。她们较少注意工具的使用,却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劳动过程中,即新的生产适应——收集。她们立刻把自己定位于生物社会学在群体遗传学上的最新发展。她们的研究根据增加遗传资本的投资策略来探索自然经济。但是,坦纳和齐尔曼有意将社会生物学向女权主义靠近。与瓦什博恩不同,她们不再让自己成为思想家,但她们的科学实践是富有争议的,既有论据和论点的内部原因,也有政治因素。在任何一点上,她们都没有留出科学传统

^① 他们争论的第二部分作为 Zihlman(1978a)出现。

的社会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可以保留观点,因为社会生物学并不一定是德·沃尔或罗伯特·特里弗斯(1972)所说的男性至上的意义,任何高于压力的概念一定会导致汉堡所说的侵略和人类退化。而且,除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很难想象在其他任何语言中进化理论会是怎样的。^①简单地翻译成其他隐喻也是不可能或不可取的。在坦纳和齐尔曼的引领下,我们与基本问题面对面,而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一定的措词表达,更谈不上回答了。我们应该怎样将过去的经验和“自然”的经验以新的方式理论化,以此来为科学实践和社会变革创立足够的概念?这个问题一直与自然科学内部的行业原则保持着复杂的联系。

坦纳和齐尔曼一开始就宣布了目标,要在“塑造我们身体、情感和认知特征”(1976,第585页)那些过程中理解人类本性。她们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狩猎主题大大忽视了两性之一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因此从进化功能主义的常规标准来看,这一主题是有缺陷的。行为不能因为两性中的任何一个而僵化,所以该问题是一个理性重构和选择假设的问题。

明确地说,我们将采集(植物和动物原料)的发展假设为热带草原生活的饮食特征,依靠工具使用和直立行走行为的自然选择来促进。我们提出这是如何与血缘淘汰中母系社会化和交配中女性选择这两种角色相互联系的。我们强调热带草原生活、技术、饮食、社会组织和淘汰过程之间的联系,进而解释从灵长类动物祖先到自然出现的人类之间的过渡。(Tanner & Zihlman, 1976,第586页)

^① 查询政治经济和自然经济之间关系在19世纪的背景,见Young(1973,第164~248页)。

对齐尔曼来说,这篇文章很明显是在1966年瓦什博恩组织的美国人类学协会研讨会上,她关于狩猎背景下人类直立行走行为报告的自然延伸。这次会议名为“人的设计”,收录了大卫·汉堡关于作为适应综合体的情感和不适应的淘汰模式问题的报告。

和瓦什博恩一样,坦纳和齐尔曼从动物模型系统和最近应用于种群的遗传理论这两个角度提出论点。她们把黑猩猩视为所有现存动物中最近似于可能产生猿和原始人类的起源种群。所以,与狒狒相比,黑猩猩更适合作为探索人类生活方式进化的镜子或模型。作者在综合理论的传统遗传参数(漂泊、迁移等等)中加入了社会生物学的遗传概念(族内适宜性、血缘淘汰、交配选择和亲本投资)。研究目标仍然是从个体的淘汰压力上理解种群基因频率的变化。她们注意到了黑猩猩大量使用工具,存在着行为上的性别差异。虽然雄性似乎更乐意去狩猎,但雌性更经常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尽管高级别和影响力的观念似乎有用,但严格的统治等级制度并未出现。社会结构是灵活的,但不是随机的。通过雌性、幼仔和伙伴的不断交往,社会连续性得到了延伸。

演变为原始人类的过渡种群被想象是迁移到了热带大草原,即一片新的适居地。“行为的改变开创了崭新的生活方式;身体结构的改变随之而来”(Tanner & Zihlman, 1976, 第586页)。伴随工具的使用,新的行为方式就是广泛扩大的食物选择。采集是原始人类早期的决定性发明。结果就是与女性和后代这些的普通社会群体分享食物(包括男性与这些群体分享食物)。用于挖掘的木棍、盛放食物的容器以及最重要的装婴儿的装置很可能就是早期的技术创新,而这些创新与新的饮食和食物分享的习惯有关。如此一来,了解许多不同的动植物及其生长季节或生活习性就变得很重要了。象征性交流的淘汰压力增加了。原始人类在热带草原上很可能用欺骗手段而不是搏斗来躲避被捕食的危险,所以他们不再需要像狒狒那样的统治和雄性搏斗

的身体结构。黑猩猩灵活的社会结构也许更具机会主义,让我们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基础有更好的理解。和罗维尔一样,坦纳和齐尔曼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人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对一种侵略性生物学来说,采集动植物不可能承受太大的淘汰压力。另一方面,坦纳和齐尔曼也对新生产方式中的认知过程进行了详尽阐述。

在这一点上,坦纳和齐尔曼利用以母亲为中心的单位来介绍血缘淘汰、交配选择和亲本投资。新的淘汰压力促进了广泛的社交与合作。抚育婴儿变得更困难了,而男女合作显得更加有效。男性学会了友好的互动模式,哪怕是与陌生人的合作,这对于以语言社群、小团体和频繁的异系交配为基础的人类生活方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保持包括大犬齿和老一套的威胁姿势在内的搏斗身体结构,与新的功能行为不再相容。女性更乐意与不带威胁性的友好男性进行交配。在哺乳动物群体内,雌性交配选择是很普遍的,而这种现象在原始人类中也不例外。追随祖克曼和瓦什博恩的狩猎论点的读者欣然接受了两件事:第一,女性的接受性被改称为女性的选择,带有一系列重大的遗传结果;第二,当假设不同的行为和功能时,退化的犬齿结构会被重新诠释。

基于类似的论据,坦纳和齐尔曼都认为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在她们独特的重构中得到了更好的解释。

观察者通常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开始观察,那无意中就有了这个问题:西方成年男性的行为能力和倾向是如何进化的呢?对于理解非西方社会里女性角色的巨大可变性和分析目前西方正发生的男女角色变化来说,这个观点还准备不足。(Tanner & Zihlman, 1976, 第 608 页)

换句话说,进化重构是我们理解当代事件和未来可能性的条件。

坦纳和齐尔曼在对使用工具适应性的解释中避免了讲述一个退化人体困于过去狩猎日子的故事。开放的未来依赖于一个崭新的过去。

聚焦于生产和繁殖的范畴,我在此追溯了关于人类历史和人类本性的四大主要立场。所有立场都严格地限于现代生理学、遗传学和社会理论的范围内加以阐述。四个立场都依赖于功能的概念,并承认了自然和文化自主性的“自由”教义,从生物简化论的角度来讨论是违反规则的。然而,每种叙述的目标都是人类共性的描绘,即作为文化根基的人性体现。讽刺的是,对于女权主义者有用的人性重构来自于被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所鄙夷的两个理论:功能主义和生物社会学。这两个理论被批评为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不公平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辩护,也合理化了对身体和国家政体当前关系的复制。很明显,正如罗维尔、坦纳和齐尔曼所揭示的,这些理论能被用作其他目的:强调人类和动物的可变性、复杂性和变化能力。女权主义者能正式参与来自科学内部的生物社会辩论。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按旧惯例讲述新故事的危险性。这是一种更大的否定,即否定假装认为科学只是发现,树立了客观性的盲目崇拜,或者科学只是发明,依赖于愚蠢的唯心主义。我们研究并创造自然,同时也研究并创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从历史上人类现实和人类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或分歧的解决过程的角度来看待生物学科学。功能科学的目的是产生意义理解和预测的控制手段。这些学科能辩证地展现过去和未来之间已知和可能的事。通常,未来由过去的可能性界定。科学也作为合理的元语言,在社会系统和符号系统之间产生同源性。这对身体和国家政体的科学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科学就是我们的神话。这样说并没有从任何意义上亵渎科学从业者在研究世界的过程中施加于彼此的规则。我们既能了解我们的身体、其他动物、化石等都是科学调查的合适对象,也能记得我们在这种对象的建设中所起的历史决定作用。我们用功能主义

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来发展我们对动物、原始人类和自身的社会学和进化学知识,这并不是自然界的偶然^①。女权主义者绝不能期望会有论点能回应科学内部的性别歧视,产生充足的生产和繁殖的最终理论。这些理论仍躲避着我们,因为我们目前正在参与一项政治科学的斗争,以此来拟定我们能清楚表达的规则。灵长类动物学就是处于争议中的领域,而未来是其争议的焦点。

^① 依据等级化组织的、有区别的有机体来比较 19 世纪自然理论的产生过程中生理学的作用(Cooter,1979)。

第三章 生物学企业：从人类工程学到 社会生物学的性别、心理和利润

生活能被塑造成任何可能的形式。写下你的详细要求，对一只狗的或一个人的……而且，如果给我对环境的控制和足够的时间，我将使你的梦想成真……一个明智的工业系统会探索将木材、石头、钢铁连同人类放在适合它们本性的位置，并对它们进行加工，至少像对钟表、发电机、火车头那样的同等对待，使其达到有效的服务。

弗兰克·帕森斯，人类工程学家，1894

如今他们蜂拥而至，进入大片大片的群居地，安全地隐藏在巨大而笨重的机器人内部，与外界隔绝，通过遥控来与外界交流。他们在你我当中；他们创造了我们，包括身体和心智；而保留他们成了我们存在的最终理由。他们经历了很长一段路，那些复制品。现在他们以基因的名义前进，而我们是他们的存活机器。

理查德·道金斯，社会生物学家，1976

重塑自我成为人类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从部分意义上说是重塑科学，是建构起“自然”的范畴，并在技术上为它的定义授权。科学是关于知识和权力的学问。在当今时代，自然科学定义了人类在自然和历史上的位置，并提供了对身体和社会的统治工具。通过构建

“自然”这一范畴，自然科学为历史和自我形成设定了界限。所以，科学是与我们生命本性的斗争的一部分。这一范畴我想要调查现代生物学的领域是如何将关于身体和社会的理论构建成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机器和市场的：生产机器、交换市场以及繁殖机器和繁殖市场。我想要把生物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繁殖的一个方面来探索，处理生物繁殖的必要性问题。也就是说，我想要表现社会生物学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繁殖的科学的。

表 1： 20 世纪生命科学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代表人物 R. M. 亚尔克斯	代表人物 E. O. 威尔逊
心理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
人体工程学	交际控制
有机体	自动控制机
生理学	系统论
智力	信息
个人	基因
个性科学	人口遗传学和生态学
性和心智	基因和生存机器
本能和工程学	轨道的限制和选择或重新设计
时间—动作研究	人类工程学
人类关系管理	社会技术系统管理
适应性	优化
种族卫生的优生学	获取遗传利润的性投资策略
一体化的神经系统	环境追踪的感官渠道和处理中心
一体化的内分泌系统	环境追踪的化学交际
体内平衡	反馈和其他控制系统机制
超有机体	人口

所有左边的条目都是适于有机体的生物科学的,其中科学干预的模式是医学的和临床的。分析的本质是有机功能主义,并且思想上的要求是达到“个人”的满足。所有右边的条目都是适于自动化技术设备的工程科学的,其中科学干预的模式是技术的和“系统的”。分析的本质是技术功能主义,并且思想上的要求是压力的缓解和人类退化的其他标志。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生物学已经从功能主义上理解的、以有机体为中心的科学,转化到从控制论系统上理解的、研究自动化技术装置的科学。以“自然”统治和劳动力分工为基础的、在等级上和生理上有着合作和竞争的有机形式,已被系统论所替代,系统论有着控制计划,以交际网络和逻辑技术为基础,其中人类可能成为运用符号的过时装置。生命科学从生理学转向了系统论,从科学医学转向了投资管理,从对个人的硫酸钾科学管理和人体工程学转向了现代的人类工程学和人口控制,从心理学转向了社会生理学。

生命科学中的这种基本改变并不是出现在历史的真空期;它是在资本主义繁殖的持续动力下,伴随着权力在本性和技术上的变化而来的。本章在努力查找科学的内容与其社会环境之间历史联系的过程中,简述了这些变化。影响这一评论的更大一个问题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生命科学。^①

由于科学从部分意义上说是实现和细述我们自身本性的过程,是首先构建范畴“自然”的过程,所以我们对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学所承担的责任极为复杂。我们离精确了解我们的生物学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正在开始了解其希望就植根于我们的真实生命当中,开始了解

^① 感谢巴尔的摩“人民的科学”的成员们为本章的想法提供有帮助的讨论。“人民的科学”为思想意识问题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想免除生物学的历史和结构分析,引用大多不正当的扩展意义进入政治或社会领域中。见安·阿伯“人民的科学”(1977)和查森(1977)。带着对动物行为研究历史的关注,萨林斯(1976)和瓦什博恩(1978)保卫了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伦敦的《激进科学杂志》(*Radical Science Journal*)对此进行了更多的理论分析。

我们所拥有的科学是我们创造历史的产物。正如马克思为财富科学所呈现的一样,我们对知识的重新诠释是一种革命性的、对我们生产并繁衍生命的方式的重新诠释。我们必须对此项任务感兴趣。

本章比较了罗伯特·M. 亚尔克斯和 E. O. 威尔逊的生物学的异同,显示了生物学的转变,从研究性有机体的科学转变到基因集合繁殖的科学。贯穿本章,我集中讨论了生命科学中作为组织思想的机器和市场。“表 1”勾勒了类别比较的大致框架。这里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本章并不是宣称亚尔克斯和威尔逊有意识地联系父权制资本的需要而单独地构建起智力体系,而是把他们看做不同的重要形态的代表,以便在设计另一种生物学的过程中,提出在何处对经典生物学继续批判性阅读^①。

亚尔克斯致力于以生理学和科学医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个性科学的发展。^② 由于在那个时期,工业的科学管理的目标是对个体工人的微观控制、合作型等级制度的建立以及控制功能与手工劳动的彻底分离,亚尔克斯的心理生物学是建立在适于创建理性管理和现代社会的单个有机体以及智力和适应性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他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演化写照,是关于性和心智之间、原材料和工程学之间、本能和理性控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一个真正可用的资本主义科学是合适的。

但是到了 1940 年前后,亚尔克斯的职业生涯到达了终点,他的科学已经过时了。它被一个不同的工程学观点所代替,不再是以生理学为基础,而是基于对数据集合中的信息和能量的物理科学的分析。^③ 性有机体的生理学让位于生化科学、结构分析和信息机器的分子遗传

① 我的方法类似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以及福柯(1970)和雅各布(1974)的方法。

② Yerkes(1927a,1932,1943);Yerkes and Yerkes(1929).

③ Kohler(1976).

关于科学中根基的总体作用,见 Cohen(1976) and Fosdick(1952)。

学：集成电子、复制子、自组的生物子系统，如病毒、细胞器和人口——关于自然的新书将由数学来解读。现代遗传学被当做一种语言科学来继续，关注标记、标点、句法、符号学、机器读出、方向性信息流、密码子、转录等(Jacob, 1974; Watson, 1976)，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新生命科学的社会目标是通过精密的交际系统明确地控制大量数据。同样的，在每种系统中抑制和控制变化、预测大规模的类型和发展优化技能成了社会制度的基本策略。此外，每个事物都成了一个系统。要搜寻的是演化稳定策略，用来扩大利润。在生命科学中，社会生物学是这种方法的成果；它是一种真正的新综合体，使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许多差别成为过去。^①

罗伯特·M. 亚尔克斯(1876~1956)在其一生兢兢业业的心理生物学研究以及对科学的推广和管理中，建立了第一个把类人猿作为人类模型来研究的、永久的综合实验室。从1924年到1942年，通过耶鲁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亚尔克斯筹集到了资金、动物、研究员、房屋、维护人员和出版物，使得喂养和研究控制下的黑猩猩成为可能。他也使首次野生灵长类行为的实地研究成为可能(Hilgard, 1965)。在更广泛的层次上，亚尔克斯努力建构起类人猿的实用性，目的是为了阐释在科学管理的团体资本主义——所谓自然中的人类的位置。他对于心理和性的心理生理学的研究包含了设计测试有机体心理功能的所有方面，有机体的范围从水蚤和跳舞的老鼠到精神病人、士兵和公司经理。亚尔克斯同样检查了处于进化的性本能和理性思维之

^① 关于系统，见 Mesarovic(1968)、von Bertalanffy(1968)、Emery(1969)、Pugh(1971)、Lilienfeld(1978)。

关于进化策略，见 Dawkins(1976)、Hamilton(1964)。

强调这些思想形式的某些非压迫潜力，哈钦森(1978)提供了一种对基于系统的生态学历史和基本观点的精致解释。同见 MacArthur and Wilson(1967)。基本的社会生物学理解包括 Barash(1977)、Wilson(1971, 1975, 1978)、Caplan(1978)。

间相互关系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合作。^① 这个工作是他明确的关于科学工程学项目的中心部分,恰好替代了公认文化的不合理性。^②

亚尔克斯对合理化保守的社会形式毫无兴趣。科学已经将自然构建为一种能够辅助包括社会在内的自然客体进行重新规划的范畴。亚尔克斯以管理下的资本主义视角来看待自然和社会。自然是测试设计中的一个问题。适应性意味着从单个有机体和其社会对应物——家庭、劳动群体和其他超有机体的层面上,解决自然的理性控制问题。^③ 从亚尔克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早期研究以来,这种阐释灵长类动物行为和生物学的科学框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灵长类动物的知识已经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斗争的普遍发展相呼应。将人类需求与灵长类科学相联系的论点构建方式也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一种灵长类动物研究的恒定维度成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化;那就是,把人类本性作为历史的原料而不是产品。工程学是20世纪生命科学的指导性逻辑。

人体工程学寻找建立一种控制等级制度,以单个有机体为模型,神经系统处于顶端。这种机体模型帮助将社会的理念看做是一个和谐的、平衡的、具有适当功能分工的整体。两大有机体的综合机制——神经系统和繁殖系统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包括社会生活(超有机体)在内的生命缩影。主要的科学目标是以管理等级为基础

① Yerkes (1900, 1907, 1919); Yerkes 等 (1915); Yerkes, “证言” (Testament), 未发表的自传, 在耶鲁图书馆 R. M. 亚尔克斯的文章中 (RMY)。

② Yerkes (1935~1936 年)。

这一项目是有关动物、“原始”人类和有婚姻问题的纽约人的性研究 (Hamilton, 1929); 华盛顿特区国家科学院性学课题研究委员会 [CRPS] 的档案, 尤其是关于克拉克·威斯勒 (Clark Wissler) 在 1928~1931 年以及婚姻研究中心自 1923 年以来的文件。

③ 关于有机体—超有机体问题的后续讨论在 Wheeler (1939)、Emerson (1954)、Kroeber (1917)、Redfield (1942)、Wilson (1971, 第 12n 页, 第 282 页, 第 317~319 页; 1975, 第 383~386 页)。

的合作型生物理论。需要管理的是有机生命、本能和性。处于有机体金字塔顶端的是心智，允许利他主义来缓解过度竞争。心理生物学，也就是后来的社会生物学，面临对竞争世界中的利他主义进行合理化的问题——而不威胁到基本的统治结构。

罗伯特·亚尔克斯：把灵长类实验室 作为人体工程学的试验工场

把黑猩猩作为实验动物，根据指定要求从智力上进行塑造，而非试图保留它的自然特征，一直以来就是我们计划的一大特色。我们相信，把动物转变为生物研究主体是近乎完美的，正如其实用性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这个意图，连同最终会成功的希望，会有效地展示在普遍接受的理想形象中重塑人类自我的可能性。

罗伯特·亚尔克斯，黑猩猩，一个实验群居地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人类工程学以人力管理的形式，与身体的、生物学的和科学的科学方法相结合，产生和谐、协作和调节。合作的结构涉及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繁殖过程中整个劳动力和权力的复杂分工。合作大多包含对手和头、从属和支配、本能和心智的合理组织。合作的动机是一个管理问题(Mayo, 1933; Baritz, 1960; Brvermann, 1974)。

它又是一个生物医学问题，使关于“非理性”的详细生理知识成为必要，因为“非理性”可能会变成一种病态——在本能、个性和文化上。这三项是与有机体的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引起了科学界学科的蓬勃兴起，如内分泌学、性别区分的个性研究、弗洛伊德精神治疗、基

于个性和文化的人类学、种族卫生的优生学说和通过计划生育运动进行的性咨询等^①。尽管所有这些方法还存在着分歧,但是它们都在以性征为基础的有机功能主义中有着共同的立场。工程学意味着合理地配置和改造人类的原材料——为了有机体、家庭、文化、社会和工业的共同利益。人体工程学是一种医学上的鼓励,促进智力一体化的自然的、体内平衡的机制。从生理学的视角来研究有机能力和变化的生命科学,为人体工程学的运用提供了科学的支持。亚尔克斯帮助构建了这些科学。

亚尔克斯于190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剑桥和波士顿的研究是关于各种有机体的感官心理生理学和心理能力的。感官生理学是在个体和演化的框架下,与“适应性”或学习的模式紧密相连的。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亚尔克斯有兴趣将他的研究扩展到灵长类动物,想象构建一个综合的灵长类动物研究站,包括生理学、学习和社会行为在内。亚尔克斯在比较心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比较心理学把动物行为的演化作为一种存在链,即一系列日益复杂的生理组织来研究,因为它在智力增长中得到最佳显示。亚尔克斯将智力定义为解决问题的行为,他依赖于测试装置的构建,来比较不同物种以及物种中不同个体的学习策略。与等级化构想的生理学之间的关联,作为这种心理学的模型,是不能过度强调的。由于科学医学是建立在实验生理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心理学治疗也是依赖于实验心理学的(Yerkes, 1913, 1921)。

在研究灵长类动物的适应性时,亚尔克斯(1927b, 1928)发展了复杂性三个阶段的概念,即他实际称为猴子、猿和思维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关于猩猩朱利叶斯(Julius)和波士顿精神病院病人的概念性

^① CRPS(“方案规划”,自1922年以来); Aberle & Corner(1953); Mead(1935); Gordon(1976); Miles & Terman(1929)。

研究都是测试的部分发展,而这些测试适用于所有有机体的各种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展现这种心理生理学自然科学的实用性的机会。亚尔克斯由于帮助设计征兵的智力测试而闻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这些测试结果屡次被用到移民限制和其他种族主义的用途上。不为人所知的是,亚尔克斯是在军医处处长的资助下设计这些测试的,他把这项工作看做是社会医疗管理的一部分(Kevles,1968;安·阿伯[Ann Arbor]的“人民的科学”,1977,第21~57页;Cravens,1978,第80~85页,第181~18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尔克斯留在了华盛顿,为他的灵长类动物研究站的终生目标建立经济和政治基础。从1919年到1924年获得耶鲁大学新心理学研究所的教授资格的期间,他一直在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作。

在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的资助下,两个与本章主题相关的委员会建立起来了:一是研究人类迁移的科学方面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Aspects of Human Migration, CSAHM),二是性课题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Research on Problems of Sex, CRPS)。这两个委员会都是由亚尔克斯做主席,在CSAHM的时间是从1922年到1924年,在CRPS的时间是从1922年到1947年。这两个委员会的建立都是为了理性社会管理原则的目的而研究人类的可变性。两者都不从人口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有机能力、变化和健康的生理学模式来研究的。关于人口统计和性欲的人口遗传学和生态学方法的普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并且与交际科技和信息科学的细化有关。

性课题研究委员会通过纽约社会卫生局的努力而壮大起来,建立了一种启蒙社会政策的纯研究结构,研究诸如性教育、家庭咨询、优生

学、性病、离婚和生育控制之类的问题^①。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在医学生理学研究与社会问题的联系上出了一份力。委员会在以下四个学科范畴上赞助研究工作,不包括直接的行动机构^②:(1)性生物学(系统的、基因的和生理学的方面);(2)繁殖生理学;(3)类人猿的性心理生物学;(4)人类的性心理生物学,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方法。在性课题委员会的记录中,有两大假说特别突出。第一,社会实践必须建立在独立的专家实施和控制的基本研究的基础上;一旦建立了委员会,慈善出资方对于资金问题就没有直接发言权了。第二,性本能被理解为支撑着整个生命和人类科学的金字塔,是理解文化和个性的钥匙。性课题研究委员会(CRPS)没有把科学认作是性压抑的理性化;而恰恰相反:该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所起的是一种解放的作用^③。它致力于辅助性的社会工程学。人类有机能力和变化的动物模型允许人体工程学成为一种实验性的自然科学。在这种意义上,亚尔克斯建立的灵长类实验室,是作为人体工程学的实验工场的。

亚尔克斯与一位有权力的老朋友和同事——耶鲁大学校长詹姆斯·罗兰·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进行商讨,计划将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作为他灵长类研究的基地。该研究所收纳了一系列关于适应性普遍问题的研究生课题;职员由研究人类迁移的科学方面的委员会的前成员组成^④。这些人带来了他们科学管理民族、性别和阶级的执著,所有这些都是处于生物医学的背景下,植根于生理学,

① 例如,CRPS(1921:方案的开始;针对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 NRC 部门的项目演示;1921:性学课题大会)。

② CRPS(1923~1937年:基金获赠人:减少的)。这一文件夹包括来自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的申请。1928年4月23日,厄尔·泽恩(Earl Zinn)向桑格承认CRPS的资源不足。

③ 查询作为资本主义和性之间关系形式的性压抑观点的评论,见 Foucault (1976)。

④ RMY:安吉尔(Angell)通信,自1923年以来;心理学研究所的年度报告,1924~1929年;“证言”,第221~227页。

并以有关遗传、动力、学习和环境的科学为基础。1924年,亚尔克斯搬到了纽黑文。他早期的设施包括新罕布什尔的农场和耶鲁大学内一幢改造过的旧大楼,在现代科学的全面监护下4只小黑猩猩在这幢大楼里成长。它们的心理性方面和概念方面的发展是首要关注点。心智和性别是一个自然对(Bingham,1928)。

1929年,亚尔克斯实现了他的梦想,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50万美元的赞助,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大型的类人猿研究设施。资金计划和基金会的回应与人类社会和心理问题的项目是密不可分的。^① 这么大一笔开销用在以黑猩猩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上,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由此而产生的耶鲁大学的类人猿生物实验室以三个部分存在:(1)纽黑文的短期研究的特殊实验室,需要特殊的工具,以及与医学院约翰·福尔顿(John Fulton)生理系的紧密合作;(2)佛罗里达州橘子公园中饲养30~40只动物的聚居区,可以进行性和概念方面的心理生理学的长期观察和实验;(3)在自然居住区研究野生类人猿的特殊供给,提供有机体在自然社会生理学上的基准信息^②。研究以演化的观点为中心,几乎忽略了人口的观点。动物行为在亚尔克斯及其同时期的研究者眼中不是一种遗传科学,比较心理学家而是从个体能力起源的意义上使用“遗传”这个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动物行为学、神经生物学、人口遗传学和生态学的综合体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图2显示了亚尔克斯所知的1930年前后的生命科学的写照。

^① RMY:对比心理生物学实验室关于类人猿实验站的年度报告(1930~1935年);后来的灵长类生物学的耶鲁实验室(1935~1942年);安吉尔通信。见Fosdick(1952)。

^② 亚尔克斯和同事一起,如福尔顿,建立了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内部的新规则。见Ruth(1941)。

图 2 生命科学
生物学的年龄
 (统一的科学和意识形态)

自然(自主的)		仲裁		文化(自主的)	
心 理 学					
生理学 (实验性的)	冲动 反射 基因 荷尔蒙				人类学
演化 (比较的)		行为	动物: 人类(个性)	社会 关系	社会学
环境科学			社会心理卫生		
心理生物学					
实验医学 繁殖系统 神经系统 健康			实验社会学 家庭 社会群体 管理 调节		

人体工程学

精神病学

(统一的技术)

1930年前后,生命科学聚焦于有机体、个性和文化。图中的双方都是植根于机体的、功能主义的学说;两者都涉及区分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作用,以实验医学为模型。

耶鲁大学类人猿实验室的相关人员主张两大植根于机体生理学的组织思想。第一个思想是统治性,包括大脑区域的统治个体间竞争互动的统治、作为有关领导权的个性特征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结构的统治等级。统治性被认为是单个有机体与生俱来的;正如眼睛的颜色或智商一样,它有可能是遗传的。第二个思想是合作性——从各个层次的体内平衡机制,到为了更高组织的利益对统治性进行的有意修

改,到经营实验室的日常规则。合作性和统治性在有机层次上紧密联系为统一体的形式。

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实验社会学的环境下,对统治性进行实验调查,一种选择机会自我呈现为该调查服务。这种实验测试了性冲动的协调、饥饿状态、男性和女性的个性种类,以及到更高形式的社会控制的演化转变。这一研究通过将动机和个性与社会秩序相关联,为咨询和人类社会服务带来了显著的意义。

在测试延迟性反应和表征性过程中,作为语言发展史研究的一部分,亚尔克斯观察了性周期和支配—从属关系对笼中的一对动物的影响,检查其中哪一只先走向食物降落伞。亚尔克斯(1939)然后对4种笼中的同伴关系展开了食物竞争实验:配偶、两只成年的雌性、一只成年雌性和一只未成年雌性以及两只未成年的雌性。切成一块块的香蕉通过小降落伞运进笼中,一共10块,一次一块。伴随着其他信息,观察者记录下一对动物中的哪一只去拿食物。根据支配—从属关系和对“权利或特权”的反应,结果是雌性的性别地位相互联系的。权利或特权意味着雌性的生殖隆起最大时的权利,也就是说,当雌性发情时,一般占统治地位的雄性会准许她先拿香蕉的特权,尽管统治权本身并没有颠倒。然而,该雌性表现得好像是理所应当的。亚尔克斯发现了该数据的许多问题:例如,在整个周期里只做一项观察以及反应模式的变化事实上淹没了假设的规律性。有着数据重要性的测试却没被汇报。在雌性动物组中,生殖隆起影响了在食物优先权测试中的表现,但是提供性好处的动物不是先前“支配的”或先前“从属的”黑猩猩。雌性中的性市场是混乱的。即使在“配偶”中,“友谊”先前是否存在也大大影响了结果。但是,亚尔克斯的文章花了大量篇幅来详细地描述表现出明确以权力和特权替代统治的一对动物。这些观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开端,提出这一论断的语气既是试探的又是期待的。亚尔克斯的实验社会生理学有着很长的历史,探索了性市

场,将其作为婚姻制度(以及婚姻的“病态形式”——卖淫)中人类文化合作起源的基础(Herschberger,1948,第5~14页)。

在亚尔克斯看来,统治性作为一种冲动并不是性别所特有的。它是有机体对社会地位的基本渴望。“假设统治性是遗传的,而且这种遗传不依赖于性别,那么男性和女性可能以几乎同等的频率被期待成为有创造力的领导人”(Yerkes,1939,第133~134页)。文化解释了事实观察到的男性领导人的主导地位。但是“领导权”与生物统治性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自然的。亚尔克斯在当今性别角色的争议中是适度开明的,并且明确表示女人应当拥有比传统所允许的更多机会。这里的问题不是亚尔克斯或其他比较心理生物学的发言人在他们那个时代里是否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根据从本能到理性控制的等级制度,通过个性以及教育和医学联合的治疗方法来确定自然化问题的逻辑。随着宗教的衰退,比较生命科学成了决定价值观的新基石,是在进化上更有适应性的判断基础。与家庭中的劳动力分工有关,也是整个社会中劳动力分工的模型,自然化的逻辑提供了以繁殖为基础的历史解释的基石。动力是管理,而非压抑。

亚尔克斯分析了性渴望和统治冲动交织在一起的含义,让我们随着他的分析来具体阐述上述观点。首先,亚尔克斯将整个性冲动和支配—从属关系的调查清楚地放在当代辩论的紧迫环境下。其次,亚尔克斯假设女权主义等同于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是“平等”的论断;也就是说,他假定在政治哲学中权利的概念正是植根于自然经济中的。基于“科学的基础”,亚尔克斯坚决否定了男性在思想上的优越性,或者,就此而言,在自然上占统治地位。男性和女性有着同样的心理的(概念)和冲动的(动机)结构。但是由于荷尔蒙结构,导致在冲动表现上存在着差异。结果体现在个性上。生命科学需要一个内部状态的物质市场。亚尔克斯的研究提出心理生物学与当代生物学和性生理学有关,而当代生物学和性生理学是性课题研究委员会的推广项目中的

两大首要范畴。如果社会的劳动力分工能与冲动表现的差异相互关联,那么亚尔克斯时代中的女权主义者就都被误导了(Yerkes, 1943, 第 69 页)。

“许多清晰明了的性别对比出现在各种复杂的表现中:关于支配和从属、领导和控制、进攻和防御的表现。对于这些”,亚尔克斯(1943,第 71 页)写道:“尤其需要关注,因为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进行进一步描述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在讨论男性和女性所采用的有区别的社会控制技能时,亚尔克斯描述了由生理决定的、在冲动表现上的差异。黑猩猩在“社会控制技能”差异的存在暗示着人类模式在心理生理学角度上同样是合理而且不可避免的。

总的来说,雄性的行为主要是自己分散注意力;而雌性,主要是奉承和追求优先权……对于观察者来说,雄性似乎总是努力抹去被支配的意识;而雌性,相反地,则希望试图诱导雄性给予它在降落伞边上的一席之地……对于雌性来说,雄性清单上明显缺失的引诱、诡计或狡猾的欺骗,是最受欢迎的资源。但更胜一筹的是色诱和各种形式的教唆……从我们的观察可以清楚地得出,雌性,如变色龙一般,是有着多重性格的生物。(Yerkes, 1943, 第 83 页)

亚尔克斯的这些“观察”是以食物降落伞测试的实验社会学为基础的。他并没有把讨论个性的文化构成的界限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的界限,留给想象力:

我对食物竞争状态揭示下对立的态度和活动印象深刻,并且我把它们作为雄性和雌性黑猩猩在行为特征上与生理上同等确定和显著的特征。我并不相信,通过颠倒文化影响力,以男性气

质和女性气质为特点的形象会被颠倒过来。(Yerkes, 1943, 第 85 页)

这个观点应该根据亚尔克斯关于人类通过工程学达到的韧性和完美性的超凡论断来进行评价。“个性差异”应当被管理,而不是愚蠢地被否定。

亚尔克斯相信,没有了社会禁忌和个人阻碍,使用类人猿为材料的个性研究是特别有优势的。

因此,我在这篇报告以及类人猿的性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提出,这些观察项目对于那些关注社会行为问题的人们来说,而且尤其在这一时刻,对于那些评价、改善和使用精神分析法来观察和解释的精神病专家来说,应该具有特殊的价值。(Yerkes, 1939, 第 130 页)

尽管黑猩猩的个性没有人类的那么差别显著,但是它仍然作为“社会组织的单位”而“明确”地存在。个性意味着功能整体,是“所有心理生物学特征和有机体能力的统一体的产物”。在一种正常的个性中,遗传的特征和基本的有机体冲动是与意识本身结合在一起的。总的来说,个性是为生命和人类科学服务的、绝对重要的科学对象。拥有男性个性或女性个性绝不是件小事;个人和国家政体的调整和幸福都是以个性的真正发展为转移的。亚尔克斯并不想低估多样性和可变性。比较科学是精确设计出来科学地处理可变性的。对于如性和统治一样重要的冲动以及如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一样必然的表现来说,个性的培养是可靠的科学服务中的一项。根据理性基础来规定社会角色的可能性是有风险的。如果冲动和个性都能在早期被测出,那么适当的对应措施就可以被启动。亚尔克斯是谨慎的,却充满了

希望。

如果在人类中,作为个性特征的统治性,像在黑猩猩中一样明显地与领导权成正比地紧密关联,如果它对于个人的主动性、好奇心、发明能力和创造力来说,是一种条件或相当有利的,而且,如果它在童年时代是可以被准确测量的,那么它很有可能拥有显著的价值,来作为职业能力和社会有用性的显示器,而且相应地,可以作为有差别的教育对待和工作选择的基础。甚至婚姻建议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因为趣味相投和社会适应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统治上的相似性或相反性,而统治是作为配偶或伴侣的个性特征的。(Yerkes,1939,第 133 页)

文化概念依赖于 20 世纪 30 年代人类学中的个性,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随着亚尔克斯,从本能,经过个性,转移到文化,到人体工程学。科学家们自身也把性、心智和社会编入一种科学服务的职业中,建立了一种关于对比灵长类心理生物学的、有希望的新生命科学,从通过动机进行的学习到实验社会学。灵长类动物学处于调整自然和文化学说的关键时期,在生命科学和人类科学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亚尔克斯以这种科学的信念来指导自己的生命,促进更高境界的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即达到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想目标。

在展开本章的第二个主要部分——社会生物学之前,我们有必要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亚尔克斯对于作为人类模型的灵长类动物的冲动和个性的成熟立场,回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关于工业人力的研究。

亚尔克斯在 1920 年人力研究联盟年会上作为临时主席,发展了渗透进他关于人体工程学研究的主题。对于“工业体系及其产物被看成是人类福利的终结还是方法”的问题,他开始呼吁“自信地处理公正的研究来指导我们的民族求得明智的解决方案”(Yerkes,1922,第 56

我和社会管理的和谐是以资本主义对个性的学说为转移的。基本本能的满足,即自身通过科学被了解,是这种模式中自我表达的精髓。科学,而非阶级斗争,能够为人类适应性的进一步演化做准备。为了对社会有用,冲动必须有一种有机本能来与合作的生物演化相兼容,这种演化最终会找到充分的工业发展。亚尔克斯在逻辑上瓦解了个性的科学对象观,将其转变为个人的精神价值:“它现在为人工研究而保留下来,通过将可用的、充足的人类知识用在所有必要的方面和关系上,并完全释放至高无上的人的价值,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一种比机器的发明更有意义和益处的革命或改革。”(1922,第63页)在婚姻和工业生产机器的市场交换的合理化过程中,比较心理生物学在根据资本主义父权制的逻辑对自然和人性的理论化过程中,在生命和人类科学中建立起了它的位置。

系统工程学和投资管理的科学:社会生物学

性在演化中是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当性繁殖被引入,群体成员就有了基因上的差异……引起的必然结果是利益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的结果是在利他主义和劳动力分工的程度上引起紧张和严格的限制。

E. O. 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体》(*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20世纪后期,以个人为基础的有机工程学不是生命科学的主导形式。甚至可以说,生物学已经停止存在,有机体已经被自动化控制系

页)。他把人力研究,即对生产的人类因素的研究,看做是新时代的主要原则。“有很大理由相信,在实践努力的重要形式中,人体工程学将很快建立起它的位置”(第 57 页)。亚尔克斯相信,工业体系已经从奴隶制演化到工资制度,到现在以合作为基础的制度,而且只有现在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因为人力研究将个人作为生产的适当单位,这一原则引导科学培养智力上的合作,来替代劳动与不适应的、进化上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亚尔克斯及其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宣扬学习身体、心智、精神和性格的特征,目的是为了“个人”完美地适应工业中的适当位置。平等显然不是指有机的等同;所以,它必定是指:“在美国,在年龄、性别和民族所设定的限制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人们可以宣称作为公民享有他们的权利,如获得人类服务和责任的机会。”(Yerkes,1922,第 58 页)

根据亚尔克斯的逻辑,平等是每个人去占有一个人由公正的科学所决定的自然地位的权利。差异是新科学的主要课题。人力研究会为招聘经理提供可靠的信息,并为“个人”提供适当的职业咨询。“职业”自身被看做是工业过程的中立产物,以致这个问题只是一种民主中一系列人类问题中的一个。分析的单位是个人,科学的个性概念与生理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将个人转换为管理服务。而且,“个人”和“个性”同时保留了一种反唯物主义的强烈意味,即其联合思想允许科学的简化,依赖于客观的方法——如智力测试、动机研究和性心理生物学。哲学完美主义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在工厂和家庭中生产出有教养的现代小孩。总的来说,“工业现在拥有充足的机会来发展合适的方法测试人们有关性格、心智和身体的质量方面,并使这一信息立即用于与职位安排、职业选择和指导的联系中”(Yerkes,1922,第 60 页)。

尽管个人应当是科学管理——在合作科学中的必要统治结构的对象,这种自我表达的思想在亚尔克斯的阐述中也是固有存在的。自

统所代替,这种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身体、生命和人类科学之间的联系^①。这些断言是由社会生物学家做出的,而且我相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是怎么发生的?结果会是什么,尤其是对于性、心智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生物学革命引起了分子生物学、生态系统的人口遗传学和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本章只能探讨其中的一部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亚尔克斯的心理生物学,连同许多同时期的研究项目,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处于困境。自然科学部门的新主管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对于生物学以及作为生命科学的工程学的未来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韦弗是更强大力量的工具和标志。^②到了20世纪60年代,交际革命强大地建立起来;它的影响力体现在生物学中随之而来的4本揭示性的、集体的、权威性的教材,在E. O. 威尔逊及其同事们的大量出版的、最先进的、生物学入门教材中达到了极致^③。资本主义生命科学构造中的机器和市场的主题重现在威尔逊(1929年出生,1955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及其许多同事的作品中。社会生物学是一种交际科学,带有一种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历史状况的控制逻辑。

交际革命改变了控制策略,从有机体到系统,从优生学到人口管理,从人力管理到以操作研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社会技术系统和人类工程学)(Lilienfeld,1978,第四章)。交际革命意味着将自然客体重新理论化为技术装备,根据信息的生产、转移和存储的机制来进行适当的理解。真正交际系统中的技术变化为基础科学的重构提供部分的物质基础。战争和军事管理的问题促进了科学的新发展。操作研

① 模控系统是以内部调控规则为基础的自动技术装置(就像反馈回路一样)。特别见 Optner(1973)、Singh(1966)、Buckley(1968)、Weiner(1954)、Ashby(1961)。

② 例如,见 Weaver(1948)、Gray(1963)、Lettvin 等(1959)。

③ 见 Cowdry(1930)、Redfield(1942)、Mesarovic(1968)、Wilson 等(1987)。

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整体或系统上调节雷达装置和关于敌军位置信息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把人类操作员和物理机械认作是分析的统一对象。数据模型被更多地应用到制定关键决策的模拟和预测中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子产业和交际技术的蓬勃发展,更多地与社会策划和军事策划相关联,围绕着变化的几个轴心来设计和管理稳定的系统^①。有关变量等级的变化和互动效果范围的知识替代了对个体状态的关注。计算机,即一台交际机器,实现并象征了控制的新策略。

让我们承认交际意味着控制——但是为了什么?而且,这个特定的目标是否真的允许以任何深刻的方式将整个科学结构标记为资本主义?我们不建议对第二个问题给出一个最终答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复杂而稳定的构造、演化稳定策略在极为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下,对于利润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系统论所处理的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中利润的维持和最大化。夹在提取剩余价值和实现利润之间有许多中间结构,其范围需要的是构成交际革命的一整套话语和技术。

任何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都受到这些技术和理论转变的影响。确切地说,每种科学话语是如何与这些历史变化相联系的,是一个可以详细研究的课题;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联系不总是直接的或简单的。^②但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体现在社会生物学中的关于自然的正式理论,在结构上类似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是关于投

^① 两部虚构小说为人类先前的有机体深化了新系统方法的结果:Pynchon(1974)、Piercy(1976)。

^② 查询阐明这一主题的文本:查询分子生物学,Jacob(1974);查询神经和行为科学,Angyal(1941)、Peterfreund and Schwartz(1966)、Altmann(1967);查询生态学,Odum(1955,1959,1971,1977)、Farley(1977);查询政治科学,Lasswell and Kaplan(1950)、Somit(1976)、Eastman(1958);查询作为质量控制的道德标准,Potter(1971)、Stanley(1978)。

资管理、劳动力控制系统和以人口学科为基础的保险实践。而且,社会生物学,和所有现代生物学一样,将控制机器作为它研究的中心对象。自然是被构造成被理论化为交际问题的一系列连锁控制系统。自然已经根据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市场系统地构建起来了。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市场。

接近市场的最佳方法是通过自然选择概念的历史。当代的人们认识到,达尔文的自然经济,即完全反对或完全支持利润的竞争性斗争,暗示了与政治经济并行的麻烦。达尔文自己也认识到他受惠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物资匮乏不仅是自然的动力,也是历史的动力(Malthus,1798,第26~30页,第73~75页,第98页)。生物人口增长的速度保证了这种匮乏将永久存在,同时也保证了在生产上技术将永远会有改进。进步与匮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双重动力。^①生物有机体的繁殖似乎在自然和历史中都是基本的过程,而且繁殖本身就是有竞争的。物资匮乏似乎不可避免地联系到自然的过程,而不是联系到占用人类生产产物的历史局限形式。繁殖,而非生产,似乎是社会自然科学的适当重心。同样的,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关注市场中平等和竞争的交换,而掩饰生产中的统治关系。那些关系通过特定的机制(包括技术)来加强,这些机制是设计出来将控制的中心从工人处转移出去。所有这些都是为人熟知的。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生物学仅仅是自然选择理论的一种延伸和发展。

社会生物学(Wilson,1975,第10页)是一种对群体——社会和人口的生物学理解。至于所有的资本主义科学,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是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个体联合。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衍生

^① Young(1985,第164~248页)。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902)提出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然经济学。查询和平主义的版本见 Allee(1938),查询评论见 Caron(1977)。吉色林(Ghiselin,1974)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

的核心个人主义出发,利他主义需要解释;它似乎是一贯的选择理论的一种非理性。利他主义在社会生物学中被定义为“为他人利益服务的自毁行为”(Wilson,1975,第578页)。如果人们在自我毁灭的慷慨中浪费时间并追求危险,那他们如何在长期过程中获利?这个问题在最先进的自然社会——社会性昆虫和非人类灵长类中显得尤为尖锐,更别提人类秩序了。社会生物学的解决方法是自然选择和人口遗传学在数量上的复杂延伸,产生出以下概念,“内含适应度:个体自身适应性的量加上它在非嫡系后代中对适应性的所有影响;因此产生了与个人相关的亲缘选择的总效应”(Wilson,1975,第586页)。

与内含适应度有关的想法——亲缘选择、性选择、亲本投资,使我们重新关注一个旧的论点;也就是说,到达什么层面选择可以出现(Wynne-Edwards,1962;Trivers,1971,1972)?特别是,社会群体可以成为选择的场所吗?如果可以,一种超有机体的群体是否在生理上和基因上都与个体类似呢?对于社会生物学来说,回答是否定的。^①或者说,那些建议不再有任何意义。社会生物学的基因计算是关于基因和基因结合的最大化策略。所有种类的现象秩序都是可能的,从无性别的个体,到只有一个繁殖对的、铸态结构的昆虫社会,到有许多繁殖成员的、角色多样化的社会。这些秩序都不是关注的重点。本体对象是基因库中的基因,即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称的“复制子”。社会生物学根据解释的最终层面,即基因市场,来分析所有行为。

身体和社会仅仅是复制子的策略,将它们自身的繁殖利润最大化。如果在基因的层面分析长期的成本——利润关系,明显的个体合作可能是完美的理性策略。这种分析要求数学工具的发展和应用,这

^① 关于超有机体的消失,见 Wilson(1971,第317~319页,和1975,第383~386页)。

种工具是直接与政治经济和该科学的技术要求相联系的。20 世纪后期政治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创新维度是对极其复杂的组合形式进行理解的共同问题,这种组合形式模糊化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基石,例如,跨国公司中利他主义和自由的团体责任的现象在资本主义中存在。

在“自然”中,利润是以基因货币来衡量的,并且繁殖或复制是自然的必要。但是繁殖并不是性。事实上,性是一种危险的现代创新,一种挑战获得个人利润的旧逻辑的创新,以致需要密切关注。同其他任何资本主义体系一样,自然的复制系统是一直被迫实行根本创新的,或者说,是被动态竞争所击败的。性就是这样一种进步。通过探索个体优势和包含性适应的结果,社会可以变得合理化,但是最高度整体化的社会,即昆虫,将性的破坏效应降到最低。性对社会形成是一种限制,因为性繁殖的个体在基因上不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它们就要与不同的投资策略进行竞争(Wilson,1975,第 314 页之后)。

那么,为什么要冒险使用危险的投资策略呢?因为它们加快创新的速度——快速生产新的基因类型来应对环境变化或其他偶然性。这种多样化将长期成功的机会最大化。通过新基因类型的快速生产,而不主要依靠变异,繁殖者保证了一种竞争优势。自然地,社会生物学提出,在某些情况下,性竞争的风险会超过快速多样化带来的好处。社会生物学旨在建立一种适当策略的量化评估。如果性停止提供好处,那么它必须被消除。但是,任何参与性繁殖的社会及其大部分成员都不能期望真正的和平。可预期的最佳情况是,对互相竞争的投资策略进行一种和谐管理,通过这种方式,该系统(自然演化)作为一个整体才得以保存。

这种性分析的一个后果是,注意力被放在繁殖中的两性的竞争利益上。一些亲本投资策略的最佳研究是关于鸟类的,使我们达到某些

问题的理解,如爪子的大小、两性的行为差异(特别是在交配的意愿上)^①。人们宣称,通过表现两性在唯一重要的游戏——如果依靠不同的策略——积累基因利润中竞争的公平性,社会生物学建立了两性的终极平等。这些不同的策略是两性在繁殖中不同的能量投入的一种功能。交配双方必须将彼此看做是在非可靠控制下的资本积累方式。投入大量能量资源到孵化和养育过程的那个性别,将会产生害羞的行为,并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待不稳定的配偶。这些基本行为几乎肯定是基因上强制并限定的(Dawkins,1976)。

萨拉·布拉弗尔·赫蒂(Sarah Blaffer Hrdy)的书是关于叶猴行为的,它强调了两性的竞争繁殖策略。在介绍这本书的同时,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这种自然历史看做是女权主义的(Ford,1976;Hrdy,1977)。这种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原理最大限度地受到了市场的限制。多数社会生物学对人类的应用是围绕性竞争的(Weinrich,1977)。

尽管市场对未解之谜是有价值的,但是让我们离开市场,看一下社会生物学对自然的理论化,使其成为一种交际或控制的机器。同样的,我的焦点不是社会生物学对人类生命的应用,而是这种科学的基本概念。基因必须产生稳定的调节机制,也就是说,像资本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它们必须生产出体现演化稳定策略的机器。少了传播和复制的机制,基因就像被储藏起来的货币。市场需要一种生产技术,与它自身的必要性相一致。这里我们离开竞争和交换的领域,进入生命工厂。基因所预示的是何种调节机器呢?自然是自动化控制系统。

社会生物学研究两种基本的系统:人口和社会。两者都是根据信息流和能量流的界限来研究的。信息和能量就像是一个普通硬币的

^① Crook(1970),Ellis(1965);关于对灵长类的延伸,见 Crook and Gartlan(1966)。

两面,即通过热动力和信息科学来实现的硬币。人口是根据时间推移中基因流的界限来测量的,基因是信息的物质化。社会生物学根据信息的交流和交换的区域来研究社会(Wilson, 1971, 第 224 页之后; 1975, 第一章)。对社会生物学以及生命科学的其他领域来说,个体是普通的系统。个体也同样被当做是结构化的信息流和能量流的一部分来研究,并与其他个体进行互动;结果产生更高层面的秩序(社会、人口)。个体是由基因建构的,或者不如说是基因指导下的中间结构。

基因真正创造的是行为机器。所以行为成为社会生物学关注的一个重点。行为调整演化的步调;它通过追踪并回应变量的能力来决定系统变化的速度。道金斯在“基因机器”(The Gene Machine)的章节中,根据由神经元为最小元素的生物计算机来计时和控制的动作,对行为进行了讨论(Dawkins, 1976, 第 49~70 页)。基因就像是会下棋的计算机中的程序,也就是说,基因建构起大脑、反应器官和感应渠道。大脑是带有逻辑程序的处理装置。类似“想象”的术语(所有心灵主义的语言),是指先进的大脑所做的模拟形式。大脑的任务是预测连锁的系统偶然性,包括环境和对动作速率的控制。这一系统的目标是使基因利润最大化,使特定控制形式的构建成为必需。处理的速度和能力是大脑作为控制装置的基本参数。

威尔逊(1975, 第七章)把社会行为称为环境变化的追踪装置。他详细说明了多层面、等级化设计的追踪系统的概念。将适当的追踪机制与适当的时间刻度相联系,他的研究从最低的演化适应(包括形态变化和机体“反应”的等级制度,从本能反射系统到一般学习系统)的层面上升到个体适应(包括学习、社交和娱乐)上。没有比争论先天和后天更愚蠢的事了。问题是,考虑的是哪一层面的追踪装置。

脑子里要记住的要点是,类似行为的性激素调节、行为的个体发育以及动机等现象,都只是针对不同时段的环境变化而产生

适应性的集合。它们不是有机体的基本属性,也不是物种必须以此为中心来塑造其生物学的基本属性……这些现象一般不能通过搜索肾上腺皮质、脊椎动物的中脑或其他控制器官的限制性特征来进行解释,因为这些器官本身在演化的、来为特定物种所拥有的特殊多样的、追踪系统的需求服务。(Wilson, 1975, 第 145 页)

所以,生理学从属于另一层面的分析,其操作研究直指比雷达敏感得多的生物追踪装置。这一行为、适应性和大脑的方法,操作术语与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研究类似,与亚尔克斯关于心智、大脑和社会的心理生物学学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物学记载和人力管理被取代了。个人或超有机体(心智调节性本能来产生合作)和多样化的追踪系统(心智作为基因策略)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交际理论与处理行为的社会生物学方法紧密关联。从操作研究到信息科学是一小步。交际是发出和接收有意义的信号,造成行为可能性的变化。根据威尔逊所言(1975, 第 201 页),他的一个科学任务是建构“动物符号学”,即交际一般属性的研究。^① 这一任务的基础是对交际形式的分析,使得对无论是听觉、触觉、声音还是化学的感官渠道的关注很有必要。

所以,分析各种感官模态的优缺点是合法的,就好像它们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竞争,以获取传送消息的特权。用另一种为人熟知的方法来说,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物种向着感官暗示的混合体在演化,感官暗示使能量或信息的效率,或两者同时,得到最大

^① 威尔逊依据的主要语言学家是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而他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语言哲学为基础的。见 Sebeok(1968)、Morris(1938)。

应完美化的自然神学方案。亚尔克斯寻找适应性中的完美化,但是社会生物学家并非如此。优化并不总是指最高的生产效率。在优化的社会中,昆虫可以同时是懒惰和勤快的;这被精确测量过。对系统优化至关重要的大量变量的集体效果,而不是单个工蚁的完美化。所以,将铵钾矾的科学管理类比为自然经济的现代科学研究是不适当的。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威尔逊借鉴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人类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工程学的系统科学^①。人类工程学是分配工作、表现和效率的量化研究;它必须将系统的历史考虑在内,因为历史导致了对可用物质的限制和其他限制。在自然系统中,这些限制有可能被编入基因程序中去。在自然经济和政治经济中同时存在的生产系统是折衷方案;工程师决定可能轨道的最佳选择,不对空想主义的积极分子有任何歉意。威尔逊将人类工程学的分析应用到昆虫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数量、类型和生产时机的问题上,目的是“分析最优性”。这种分析应该揭示,许多性繁殖的方式何时及如何会在特定物种的特定环境条件下被找到。

首先,考虑群居繁殖的成本概念……成熟的群居地,达到其预定的大小,可以预期包含近似于最佳混合体的等级比率。简单地说,这种混合体是当群居地达到或近似其最大尺寸时,可以达到蚁后和雄蚁的最大生产率的等级比率。把一群社会昆虫看做是在碉堡里构建某种工厂,是有帮助的……当窝内保护的粮食被尽快有效地转移到蚁后和雄蚁时,群体必须派出征粮员去收集粮食。性形式的生产速度是一种重要的但非唯一的群居适应性的

^① Wilson(1963,1968).

威尔逊引用的人类社会学来源是 Murrell(1965)。

化。(Wilson, 1975, 第 231 页)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该考虑威尔逊对社会生物学最重要的研究贡献之一:关于信息激素调节下的昆虫化学交际的研究。信息激素是化学物质,通常来源于腺体。“一个个体释放出这种物质作为一种信号,而另一个个体在尝过或闻过后作出反应”(1975,第 591 页)。社会昆虫广泛使用这一模式。大约在 1958 年,威尔逊(1962;1971,第 12~14 章)将一种数理技能改造用于测量火蚁的气味轨迹所传播的信息量,并将它与蜜蜂摇摆舞所传播的量进行对比。这种一般的项目是将各种行为翻译为位元,它们可以由有关能量、能力、噪音、歧义等常规的信息理论来进行处理。威尔逊的目标是从基因适合或基因利润最大化的利益出发,将交际理解为分等级的演化稳定策略的一部分,由时间刻度和物质模态来进行区分。

领土状态和统治系统是交际的模式,在历经中间时段时保持稳定的构造(Wilson, 1975, 第 12~13 章)。侵略,即一种竞争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交际类型,必须根据功能内容和能量效率来分析。原则上说,如果侵略需求是由演化工程师发现的,它就像性一样,并不是必需的。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应该期待侵略表达成为过去,为人类秩序中的社会和心理治疗提供模型。退化在自动技术装置的生物学中是一个重要主题。这与亚尔克斯的个人达到极致的机体心理生物学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个社会生物学家来说,统治不是一种特征,甚至也不是个体的机体素质,而是一种系统属性。适合社会生物学的工程学介入类型是系统分析和设计,不是以生理学和科学医学的类比为临床诊断。但是,工程学的两种形式都是支持科学专家在人类层面设计历史(系统)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的。

系统设计的要点是优化。优化并不是指完美化。一个系统必须足以在所给条件下生存。自然可以是懒惰的,并似乎抛弃了一种适

成分。(Wilson, 1971, 第 342 页)

根据植根于军事斗争、竞争的性行为 and 资本主义生产的系统科学,要找出一种对生物客体更清晰的分析并不容易。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不再根据应用在家庭、教育和工业的个性和人力科学的问题来看待性。亚尔克斯的参考术语在由设计工程师评估的优化交际系统的新生物学中没有一席之地。这里所有令人不安的方面是,社会生物学家能够并已通过这些分析准确地预测出昆虫的阶级分布。

在《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中,威尔逊把注意力放在作为一种工程科学的生物学的重要方面,以关于交际的起源和演化的章节作为总结;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学是一种研究系统设计的科学,并且注意到人类在调节可能过时的自然控制系统中所做的改进。“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是真正正确的,那么一种演化的物种可以被比喻为一位交际工程师,试图将手头允许的材料组装成一种完美的传播装置”(1975, 第 240 页)。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对于自然系统演化的种系发生学限制是能够被研究的,并可能被重新设计。但是,设计可能是有界限的,即从人类政治的角度来说至关重要的界限是自然必要的,因为人类政治否定了等级控制系统和其他的统治模式,例如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这种自然的理论观点构成了遗传工程学和生物伦理学的基础,它作为一种质量控制产业清楚地出现在社会生物学中。《论人类本性》(*On Human Nature*)一书强调了限制和深刻构建的轨迹,但是,没有逻辑的、不道德的成分阻碍完整的工程学方法用于过时的系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这本书的涉及面广,有明显的性别的、种族的和阶

^① 贯穿《论人类本性》,威尔逊使用了发展遗传学家康拉德·哈尔·沃丁顿(C. H. Waddington)(1957)的技术隐喻。

级的歧视,其理性化现状还只停留在表面。社会生物学的基础是一种对自然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分析,是需要统治的,但是它的形式极具创新性。价值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动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精确的统治目的论的需要,设定了社会生物学中工程学再设计的局限。与“人类”统治“自然”的基本工程学逻辑相比,合理化遗传预设的性别角色中的基本性别歧视要少一些。^①当然,除此之外,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生物学推理轻易地将工作隔离、统治等级、种族沙文主义变得自然化,并且在以性为基础的社会中使统治成为“必要的”,以便控制基因竞争中更恶劣的方面。但是,讽刺的是,比起心理生物学和其他的有机功能主义生物学来,社会生物学可能更少地与明显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相关联。社会生物学是一种根本的工程科学,能轻易地清除它在自然设计中退化缺陷的对象。对于演化稳定策略的新设计者来说,有机体的神性不是神圣的。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威尔逊在《论人类本性》一书结尾处否定了潘多拉,呼吁更新对普罗米修斯,即通过统治象征人类解放的大力神的崇拜。在希腊,普罗米修斯意味着深谋远虑,是交际科学的一种最优结果。

^① 超越显然为性别角色差别辩护的性别歧视评论,一种针对人类与自然、心理与身体、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二元论的女权主义知识理论,开始出现在多种学科和实践环境中。见 Harsock(1983a, 1983b)、Harding(1978)、Merchant(1980)、Griffin(1978),所有这些都构建了一种女权人文主义。作为统治逻辑的人文主义的非女权评论中最重要的是 Foucault(1970)。

表 2 生命科学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中并为其服务

生物学作为一种工程科学

机器(生产)	控制	工程学
机器作为有机体	功能主义	多样性的调节、库存和正常化
机器作为自动化控制系统	交际、信息	扩大的整合、重新设计
关键的生物学:生理学、细胞和发展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关键的机器次系统:神经系统、繁殖系统(心智和性、文化和自然、智力和本能)		
基本的隐喻:平衡、均衡、压力		
故障的模型:退化、缺陷、噪音或紊乱		
基本的伦理:生物伦理学作为质量控制		
允许工程学视角的基本过程:故障和组装、重组、自组(例如:病毒、隔膜、视觉系统、细胞器官);调节和控制(语言学、新逻辑学、电子产业和提供基本生物范畴的科学)		

生物学作为一种投资科学

市场(交换)	组合管理
关键的生物学:遗传学、人口生物学、生态学和演化	
策略:个体自身利益、利润最大化、积累、多样化	
基本的丑闻:利他主义	
基本的伦理:契约的遵守和机会主义	
允许投资学视角的基本过程:竞争和合作同时作为最大化策略的形式、博弈策略、所有社会起源时的契约和交换(提供生物范畴的关键产业:保险、咨询、广告)	

总结：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是否可能？

首先，自然是浪费的……它的计划是精神错乱的躁狂抑郁者和无限的资本所产生的脑力成果。奢侈。自然对任何事都会尝试一次。这就是昆虫的形式所表达的。没有哪种形式太令人厌恶，也没有哪种行为太古怪。如果你在应对有机合成物，那么让它们结合。如果这有效，如果这能加快速度，那么让它在草地上碰撞；总是会有新事物的空间；你自己并不是那么高明的。这就是一种挥霍的经济；尽管不会失去什么，却付出了所有。

安妮·迪勒德，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

我们曾见过两种作为工程科学的生物学，与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知识和实践相关联。在客观的科学和滥用的意识形态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因为知识和历史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复杂的概念。重要的是，科学就像资本一样，是发展的。计算机不仅仅是根据有关劳动和战争的统治法则而建成的机器。交际科学，包括社会生物学，是人类与世界互动时取得的成就。但是自然经济根据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构建起来，并为了繁殖统治而被占用，意义是深刻的。它处于基本的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而不是好坏之分的层面。

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科学必须在构建与世界互动的不同生命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只有物质斗争才能结束统治的逻辑。马克思坚持，一个人不能跳得太快，否则就会陷入空想的乌托邦，无能而且无知。物资充裕是重要的。事实上，物资充裕对于人类本性的完整发现和历史可能性是必要的。它关乎我们是否使自己有大量的需要或

未完成的需要,包括对真正的知识和意义的渴求。但是,自然的历史及其后代——生物学,成了一种以物资匮乏为基础的学科。自然,包括人类本性在内,在匮乏和竞争的基础上被理论化和建构起来。而且,通过构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中并为其服务的生命科学,我们的自然被理论化并发展起来了。这是维持物资匮乏的一部分,以占有充裕物资的特定形式来满足私人而非公众的利益。它也是维持统治的一部分,以提高命令—控制系统的逻辑和技术的形式存在,该系统是父权制的基础。这些实践预示着我们对自然的理论化,在这种程度上,我们仍然是无知的,而且必须投身于科学实践。这是关于斗争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命的历史结构将统治最小化,我不知道生命科学会变成怎样的。我只知道,生物学的历史使我相信,基本的知识会反映并繁殖新的世界,就像它参与维护旧世界一样。

第二部分

有争议的读物：叙述的本质

第四章 开篇即此言：生物学理论的产生

“当我使用一个词时，”矮胖子(Humpty Dumpty)以一种非常傲慢的语调说：“它就恰好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分毫不差。”

“问题是，”爱丽丝(Alice)说：“你是否能使词语表达各种不同的事物。”

“问题是，哪一个是主人——仅此而已。”矮胖子说。

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透过镜子》(*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主人——有能力或权力的人，能使用、控制或处置事物的人；男性客体；胜利者或征服者；擅长某事的能手；有此头衔的人。

兰登书屋英语大辞典(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女权主义者对自然科学要发表不同的观点吗？女权主义者应该着力批判性别歧视的科学及其产生条件吗？或者，女权主义者应该为解释科学知识所有方面的认识论革命打基础？当前是否有专门的女权主义知识论的发展，其含义可以与希腊科学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遗产相媲美？提出科学疑问的女权主义认识论会成为现存的表征理论和哲学实在论中的一个家族成员吗？或者，女权主义者应该采取一

种激进的认识论,拒绝一切接触现实世界和客观立场的可能性吗?女权主义者的知识标准真的会弥合主观与客观或无害的认识与预料及控制之间的裂缝吗?女权主义会使人洞悉科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联系吗?女权主义者对知识与力量之间令人困扰的关系有新见解吗?女权主义权威及命名的权力是否能给这个世界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故事?女权主义者能主宰科学吗?

考虑到近期有关当前自然科学一小部分的四本书,关于生物决定论和人类本性的争论的,提及以上这些重大问题或许会有所帮助。关于生物学,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对它的表述开始,有一样东西是确定无疑的:生物学讲述了关于起源、发生以及自然的故事。接着,现代女权主义者继承了一种家长式口吻来描述关于我们的故事。生物学是生命的科学,是由父系构思和创作的词汇。女权主义者从父系那里传承了知识。这个词源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伽利略(Galileo)、培根(Bacon)、牛顿(Newton)、林奈(Linnaeus)、达尔文(Darwin);肉体源于女人^①。而且,这个词自然地变成有关肉体的。我们是被性别化了的。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1979)在她们对19世纪女性作家的研究中谈到女性在构建发言权、拥有权利、写文章、讲故事、产生这个词的方面所做的辛勤努力。要写东西就要拥有创造、命名的能力。努力产生出自然知识的女性,像那些学会读写的姐妹们一样,也必须解释男性合法创作的文本,即关于自然的书籍。

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分析,弥尔顿对上帝之法的辩护对19世纪女性作家探索故事创作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从而表明,我们一开始在某种意义上都像弥尔顿书中的女儿们一样,被迫用一种语言来

^① 莫昌特(1980)分析了女性的转化过程中对她本性的隐喻,在15~18世纪的欧洲,她从哺育之母向忍耐的资源转化。统治本性在隐喻的(和社会的)系统内部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所有的限制似乎在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形式中都消失了。莫昌特帮助对这种关于世界毁灭的科学—人文主义辩证法进行认识。

读书,而这种语言指出了我们缺乏的东西、我们的不同之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一书声称,弥尔顿文学作品中的女儿们为获得权威而采用了两种主要策略:她们要么重新解释起源故事,使其拨乱反正,要么彻底颠覆原貌编了个新故事。其深层的相似之处在于,女权主义者为现代的起源故事——即为了生物学——承担起了责任,他们或许会试图矫正故事,清除有关进化、大脑及荷尔蒙的劣质科学,指出生物学如何正确地产生,而不会有推理和权威之间的冲突。或者,女权主义者会更加大胆地宣告一个完全崭新的起源之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权主义者都在争取一种发言权。而且,修辞策略,即言语用词上的争辩,同样是女权主义者在自然科学上的斗争中心。要进入修辞策略的争议来确定好科学界定的术语,本章讨论的这四本书可以作为入门之作首先阅读。我们怎么知道该相信谁呢?研究过这四本书后,关于它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它们尝试证明权威而采取的讲述方式,我们或许会耳目一新地回到开篇的问题上来。

让我们从头开始。大卫·巴拉什(David Barash)(1977),华盛顿大学的动物学家及社会生物学家,对野鸭的强奸问题做了探索性研究,写了《社会生物学与行为》(*Sociobiology and Behavior*)这本权威性的教科书。在《内心的私语》(*The Whisperings Within*)一书中,巴拉什(1979)想要向大众读者揭露生物学内部的声音,即文化糖霜下自然这块蛋糕,建构起有机体讯息的基因的生物学语法——这一切使现代人能了解他们自己并实现自身的潜能。巴拉什坚持生物学是人文

主义项目中了解和实现自我的最有力的工具。^① 巴拉什大肆运用了创世纪的文学手段和主体结构及其评论。哈珀和罗(Row)真正将《私语》(*Whisperings*)一书投入市场,书的封面上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白人男子和一个棕发碧眼的年轻白人女子的照片,他们站在一个满是剑形叶片的花园里,遮住了私处,而这种植物只能在玛吉·皮尔希(Marge Piercy)的作品《时间边缘的女人》中路易斯(Lewis/Luis)的苗圃中见到。巴拉什引入了他的包装:首先引用了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XII)关于自然法则和婚姻中繁殖性交的观点;第二章的第一句是“首先是基因”(第16页)。弥尔顿可能不喜欢这些新孩子们的故事,或许他在巴拉什最初的伴侣关系中也认不出他的亚当(Adam)和夏娃(Eve),其中,男性和女性参与了“人类向前永恒进化的斗争”,他们是“任何子孙后代的共同缔造者”;但是其血统未受到影响(Barash, 1979,第123~126页)^②。弥尔顿残酷的宿命论已被转化成巴拉什的人类学说,作为“临时的、用皮肤包裹起来的自我,是通过其可能永恒的基因来复制自我的复杂工具”(第2页)。

实际上,巴拉什对血统的关注是他的主要修辞策略。他呼吁父系的权威并将其命名为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巴拉什希望确认,达尔文通过他的子孙们,尤其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罗伯特·特里弗斯

① 这种语言是巴拉什的:关于认识自我和自由意志(1979,第90、233~234页);关于生物语法(第10页);关于文化和生物学的变量糖霜/常量蛋糕理论。当巴拉什声称,他正在代表科学给出“简单的事实”的时候(第25、29、44、112、126页),贯穿全书他坚持使用性器语言:植物授粉成了花的“强奸”,其中雄性花“轮番轰炸雌性花”,并长出一个花粉通道,“强行进入子房”(第30页)。雌性的主宰大量存在,而且巴拉什品味学过照顾海象宝宝的勒巴夫(LeBeuf)的语言,用社会生物学的术语说是“双倍喝奶宝宝”、“超级断奶宝宝”,而现在用巴拉什的话说是“进化明星”。巴拉什从这些父权制双关语获得的经验是,男性在进化上冒险,并在“走运”时收益颇丰。你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成为女性;女性必须满足于“些许的进化成功”(第59页)。

② 在“致谢”中,巴拉什把他情人认作是“我的健康合股人”。

(Robert Trivers)及 W. D. 汉密尔顿(W. D. Hamilton)等人而产生社会生物学。巴拉什介绍专家来验证社会生物学的推理,他很少使一个名称或论点单独存在。他的权威是哈佛的生物学家 X、伟大的物理学家 Y、重要的进化论生物学家 Z 等等(第 29、34、91、133、135、166、221、240 页)。在第一章——一个虔诚的布道,在第二章关于基因起源的故事和关于它的不断复制、性繁殖以及束缚之下巨大市场斗争的闹剧之前——巴拉什把社会生物学称为哥白尼(Copernicus)和科学革命的孩子。科学的诺言——认识人类——最终会实现。“社会生物学,依照同样的传统,会帮助我们发现自己本性,并使我们偷听到生物学在我们所有人内部的私语”(第 9 页)。研究合法血统的真正科学家必须面对那些嘲笑者的奚落,那些偏爱假象的人们出于自身舒适的原因而进行的嘲弄^①。就像达尔文,杰出而勇敢讲真话的人,将最终获得荣誉。而且,社会生物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它也和所有的人文主义一样,承诺了人类的团结,即在文化的语言糖霜下一种自然的真

^① “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在这些体弱者中是首要的(Barash, 1979, 第八章)。

正融合。孤独的英雄、真实的孩童,将把我们带回到自己的乐园^①。

所以,对父系家族的关注是巴拉什首先为提出事实所采用的创作策略。他接着将社会生物学实现人文主义承诺的权威和能力合法化。社会生物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通过揭示普通的新词,即交流的媒介、定义现实的等同物、意义的产生者,而使自我满足成为可能。乍一看,巴拉什用皮肤包裹的自我满足了冗长的编码—基因—新造词汇内部的复制需要,似乎是简化和客观化策略的一部分,与人文主义和人类主观性、自我定义以及自由相对立。从表面上看,巴拉什提出了一种所有主要统治形式的必要生理决定论的学说,这些形式主要是在残酷竞争和男性统治的动力驱使下形成的。首先是基因。基因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其存活的目的就是繁殖。但社会生物学所传递的“终极信息”却是不同的:它是要确定合适的专家,他们要有权威通过词汇知识、对新词的掌握、对大自然密语的破解,来对自然施加有效的力量。巴拉什传递的信息是权力技术。他推翻了“自然主义

^① 巴拉什的父系命名的说服修辞中最滑稽的扩展例子是他对罗伯特·特里弗斯的亲本投资理论的介绍——就好像至少自从19世纪早期开始,成本—利益分析会使每个人大吃一惊。

真正新的和刺激的观点是极少出现的,即使在科学中。我很荣幸能公开揭示其中之一。那是1972年12月在华盛顿首府召开的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的年会。当关于“社会行为的生态学和进化”的专题研讨会快要结束时,哈佛大学的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开始发言。他没有使用笔记,似乎在他进行的过程中把一切都搞清楚了,但是我很肯定他说的一点儿都不沾边。不管怎样,他的发言还是吸引人的,并且是出色的。当年轻的赫胥黎(Huxley)首次阅读达尔文的著作时,据说他发出惊叹:“我没想到这一点是多么愚蠢啊!”鲍勃·特里弗斯(Bob Trivers)在那天所展示的与达尔文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简洁、明了、重要、几乎无可争辩的正确。(Barash, 1979, 第125页)

然后关于亲本投资理论的“纯洁的、未掺假的生物学”接着出现了——都是有关遗传的。

谬误”；对他而言，“是”并非“应该”^①。明白如何解读该词、如何评估新词的价值，为使用那些工具的人们给予决定权。当然，对人文主义者来说，自由和需要是必须同时存在的——最终，社会生物学的父系观点将自由解释为听从内心的呼声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但我们可以改变向往的东西；人文主义的力量是激进的。权力加上作者身份伪造了现实。社会生物学的父权制论调，与其说是贯穿整个语篇平面的过分热情的种族歧视，还不如说是在形成词汇的工具内部的统治逻辑。科学和人文主义是同属一类的。它们的争论就像融为一体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争执。主体和客体相互需要彼此。它们的联合产生了父权制作家的呼声。

在读社会生物学的文章时，有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一直存在：有人听这些故事吗？读了格里高利(Gregory)等人的论文集《社会生物学与人类本性》(*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中的17篇文章，一个肯定的答案出现了。讽刺的是，编辑们将该书基于科学—人文主义的交汇项目(NEXA)所正式资助下举办的研讨会，目的是探索“社会生物学调查的人文主义含义……NEXA 提供了一个环境，在此环境下，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及人文主义者能合力理解当前社会生物学研究中正被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第 x 页)。然后，专家们被聚到一起，就科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争执进行调解和解释，以显示他们更高的团结性。他们发言——单独地、权威地、以编辑和讨论组调解人的权力参与到辩论之中——以一种我们习惯的修辞方式。每一位发言人似乎都非常期望他的科学史看法能被采纳，这样合法的血统就得以确立(被邀的唯一一名女性——一名高级学者，马乔里·格林(Marjorie Greene)——被

^① 在第八章中，巴拉什否认从他的科学中寻找道德命令，然而却热心支持社会生物学在医学上的声音——尤其是根据适应最大化的行为来评估心理健康(1979,第 214~215 页)。将道德崩解为健康是一个旧的修辞策略。

安排讨论一种心智哲学的社会生物学含义！父权制的观点有时单调得可笑）。这本论文集的确包含了一些推理充分的、非常有趣的文章，但是为了遵循修辞策略对女权主义者掌握科学语篇的重要性这一主题，这一讨论给它们分析有限的评价，这是不公平的。

E. O. 威尔逊，当时的首席科学家，以单纯的真理探索者的语言风格介绍了这本书，这位永恒年轻的科学家惊讶于其中所有的狂热（Gregory et al. ,1978,第 1 页）。他一再重申，社会生物学的目标仅仅是为规划最高的社会目标、连接两种文化，即科学和人文主义，而提供视角。大卫·巴拉什，受邀参加这次耗资巨大的、由纳税人资助的论坛并发表演讲，他提出一场科学革命的宣言，并为社会生物学史上成本—效益的理论家们“让人顿悟的洞察力”而惊呼（第 11 页）。社会生物学家皮埃尔 L. 范·德·布迪厄（Pierre L. van den Berghe）宣扬被抛弃的社会科学，主张只有回归到生物学的草原上才能使人类科学再次扎根于真理的土壤；科学史显示了这一点。舍伍德·瓦什博恩严厉地责难社会生物学通过生物化而毁坏了社会科学；他的科学史表明为社会事实进行社会解释的必要性。^① 身体科学的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的发言权必须源于他与科学最现实的东西之间的联系（他在第一段注明他与相关专家检查了他关于生物学的声明），他称赞了社会生物学，因为它“冒险”并“推翻了挑战”（第 75~79 页）。简言之，社会生物学具有适当的男性特征。霍尔顿继续谈论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雅克·洛布（Jacques Loeb）、卢克莱修（Lucretius），当然还有牛顿（Newton）的血统。重点是去评定社会生物学是否符合一个新综合体的标准。动物心理学家弗兰克·比奇（Frank Beach）劝说，真正的科学不仅可以提供最近的

^① 瓦什博恩与社会生物学的对立是其复杂性和不足之处的一个实例，这是一些女权主义者对他在身体人类学史上作为人类—狩猎者理论的主要作者做出的评价。

机制和详细的实验调查,以及避开轻易的最终主张和不成熟的危险理论。比较进化生物学和颅相学的历史,大卫·赫尔(David Hull)否决了关于科学理论真理的所有表述,并指出历史的评价与成功有关——他网罗资源使自己在游戏中处于不败之地,所以理所当然地实施好的科学。简言之,他改造社会生物学的标准,使之适应愤世嫉俗的、不可知的科学史,其好处是显示:在历史上科学是在与权力的抗争下产生的。加勒特·哈尔丁(Garrett Hardin),在美国因沉没的救生艇和受辱的平民的道德标准而闻名,采用了简单的赤色分子的论调。那些反对自私世界这一事实的人们都是自欺欺人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阿尔帕(Joseph Alper)代表人民的科学讲话,总结了对客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指出社会生物学在政治上中立的虚伪性。

这本专业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人类环境所做的一篇宣言!乔治·沃尔德(George Wald),科学激进分子的好朋友,不客气地坚持说,“科学家不应该只研究自然,而应该关注人类、生命和我们的星球”(第282页)。这段文字从一个单纯的人转往另一个单纯的人,从威尔逊到沃尔德。在这一虔诚的结语后,编者重新插入做了全书的总结:威尔逊代表社会生物学家的讲话已将我们的注意力(就好像它已经被动摇了似的)转到了对“我们人类”的探索。“我们除了接受他的挑战外别无他法。而且,矛盾的是,他值得我们的感谢,因为他给了该文如此极端的一个形式”(第294页)。上帝保佑。

现在,让我们转向弥尔顿科学的女儿们,她们正从这种修辞遗传中得到传承。我们没有确定最初的语篇措辞;这一事实决定了我们的文本。女权主义者有多大的自由度来重新塑造科学的生产?让我们通过探究手头文本所呈现的修辞策略来再次处理这个问题。《基因和性别》(*Genes and Gender*, Hubbard and Lowe, 1979)一书公然语义双关地谈到了有关生物学起源的中心问题;标题《女性看生物学,生物学

看女性》(*Women Look at Biology Looking at Women*, Hubbard et al., 1979)对科幻的现实生产中的反映主题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两部作品的封面之中,继续了对词汇的能产性和再生性的明确评价。在这两部论文集中,语言几乎是每位作者首要关注的。苏珊·李·斯达(Susan Leigh Star)在《基因和性别》这本书中明确了这一普遍的主题:决定篇章语言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所受压迫的肉体化。

躯体化的能力……现在我们没有一种语言不是反映笛卡尔的先天/后天二分法,来讨论性别差异的。我们禁不住会问:“但是,在表象之下,什么才是真的男女之别?”作为科学家和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首先要说表象之下没有这样的东西或地方。在字面上、经验上、生理学上、解剖学上、神经学上……根据语言、权力结构、自然环境(内部和外部)以及将场所编入时间的信念,对我们谈话双方来说,唯一正确的研究场所是我们变化的、动态的、复杂的互动网络。(Hubbard and Lowe, 1979, 第 116 页)

斯达在书中写到这一点,并把重新确定性别差异各方面的研究标准作为该书的任务。《基因和性别》总结到,现在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它实在不能与科学知识的标准相一致。这群女权主义者已着手为调查规则命名。而且,斯达在小组里做了发言,不是作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是以一所重点大学的社会生物学终身教授的身份,声称继承的不是牛顿,即为达尔文的衣钵。她是作为一名诗歌编辑为《不详的智慧》(*Sinister Wisdom*)一书发言,也作为一名老人医学的研究生,她在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本科研讨会上学习过有关大脑不对称的研究——这所学院让许多女性身居要职。《基因和性别》的作者们努力去说服研究人员接受新的标准,实际上,是舍弃他们自身的领域,类似于一名物理学家告诉生物学家任何他们不能量化的

东西都不是合格的科学物质。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是否自然选择和演化生物学自身在面对新标准的执行时不必舍弃该领域。是什么导致《基因和性别》的作者得出他们无政府主义的结论?

首先,他们引用了性别差异领域中无处不在的“坏科学”^①。这一策略源于女权主义者开始沿袭家长命名这一历史需要。我们不得不对获得的文本进行评价。毕竟,当约翰·曼尼(John Money)有了性别诊所,E. O. 威尔逊在比较医学的博物馆任教授,等等,他们的工作就不是从零开始的。弥尔顿的女权主义女儿们同巴拉什、霍尔顿或哈顿(Hardon)一样关注血统。重新解释已有故事的这种方式被本书的作者们广泛使用。在“宗谱”中,正如这些作家所展现的,达尔文和伽利略(Galileo)变得不同于传统英雄,他们要么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歧视科学化,要么就以屈指可数的品质至上的信条割裂主体和客体(第15~17页)。对坏科学的评论直接引起对知识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分析,以及对“纯洁的、未掺假的事实”背后的客观论调的个人鉴定。现实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总是有一个专有名称,但是它会以某种方式消失在文章内部的陈述句或甚至图表中,这些文章是由资金雄厚的实验室出版的^②。

① 里拉·莱博维茨(Lila Leibowitz)和露丝·布雷尔(Ruth Bleier)强调了动物模型的研究中不合逻辑的证据和特殊的请求。就侵略和性别的关系,弗瑞达·萨尔茨曼(Freda Salzman)批评了麦考比(Maccoby)和杰克林(Jacklin)。玛瑞安·劳(Marian Lowe)和露丝·哈伯德(Ruth Hubbard)指出 E. O.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和爱丽丝·罗西(Alice Rossi)的生物社会学有深刻和拙劣的相似之处。苏珊·李·斯达探讨了神经生理学中的单侧化研究,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讨论了通过变性手术将道德—政治问题医学化。哈伯德(Hubbard)和劳(Lowe)提供了该项目的总结和理论框架。

② 拉托尔(Latour)和沃格(Woolgar)(1979)对客体内部的事实的产生过程中涉及的认识论因素和物质因素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综合分析,足以进行推敲并发给同事。他们通过一个多产的萨克学院(Salk Institute)实验室中的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项目计算了每篇发表的论文所花的成本。这个词可不便宜。

通过这些种类的分析,《基因和性别》的作家们想使我们相信,坏科学并不是偶尔而是系统地出现的——而且,更有甚者,它必须连续出现,无论单个科学家如何尽力地想在性和性别方面实施好科学。事实是承载着理论的;理论是承载着价值的;价值是承载着历史的。而且,这方面的历史是使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远离日常的、有生命的性别统治去权威地研究性别。实际上,以性别和性的构成作为研究对象是繁殖问题的一部分——即产生和起源的问题。人文主义的历史项目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科学和人类科学是对自我满足的探索。以性和性别的构成作为知识的特权对象是探索自我的工具。这一建构再次产生了探索虚假主题的无限倒退,矛盾的是,这种探索在发现极权主义物体——自然、基因、该词的过程中会有规律地停止。

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词汇,而且当《基因和性别》的女权主义者想摆脱不可知论,并表达性与性别是怎么回事时,困难就暴露出来了。女权主义者也想采用弥尔顿文学作品中的女儿们的第二条策略,权威地讲述真正的新故事。但是对坏科学的评论都渐渐变成一种根本的教条,即所有科学中的陈述都是通过权力的实施而由历史虚构的事实。女权主义者想要谈论更真实的女权主义科学的产生,它不仅是更善于预测和控制世界体,此时,以上评论会制造麻烦。大卫·赫尔在科学—人文主义的交汇项目(NEXA)选集中的成功故事(即通过机会主义而幸存的科学变得正式了)对女权主义者没有帮助,因为他们不希望带上没有立场的面具,而仅仅作为旁观者站在科学史的边界。腐蚀性的怀疑论不能促进新故事的产生。当娜奥米·维斯坦因(Naomi Weisstein)说“证据就是我的主人公”(Hubbard et al., 1979, 第 187 页)时,她就吧这个问题很好地展现在《女性看生物学》(*Woman Look*

at Biology)中^①。

揭露坏科学的过程,即展现所有科学的虚构特点,然后指出真正的事实,这个过程引起了两本书的女权主义文章中重复的、未被证实的矛盾。这些矛盾很重要;它们也把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中。^② 露丝·哈伯德(Ruth Hubbard),产生《基因和性别》和《女性看生物学》这两本书的某种科学之母,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精密的分析,也清楚地指出了女权主义者对生物学的现存分析中的一些矛盾。

在“只使男人进化”(Have only men evolved)的文章中,哈伯德一开始就对总的科学中的表征理论和客观性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对人类而言,语言在创造现实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然而,所有的命名行为都在反对被社会接受为现实的东西这样一个

^① 哲学家诺里塔·考特格(Noretta Koertge)在全国女性研究协会1980年的会议上描述她自己的一段回忆,4岁时因为手淫遭到母亲的训斥,就此她提出了相同观点。她母亲声称这一行为是下流的,并会使她感到不安。小诺里塔知道她永远不可能在下流一事上说服母亲,但是她母亲对于不安可能是错误的。道德:科学是一种女权主义资源;可证伪性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问题。

^② 例如,布雷尔在哈伯德和劳(1979)编著的书中对应用于人类的动物研究进行写作,她试图拥有所有的论点、所有的方法,只要它们有利于女权主义者。她以“科学是一种文化制度”这一前提为起点,仍然假设“科学的结构有其纯粹的优势,并探究可知的未知事物”。但是污染来自于延续统治的社会价值的“巨大核心”(第49页)。后来,她讨论:(1)有一种真正的、具有清晰前景的科学存在,即女权主义科学,例如珍妮·兰开斯特关于灵长类动物行为的结论(第57页)是“更合理的”,尽管兰开斯特为何能进入一种性别差异的科学而逃避男性阴霾的前景未被解释;(2)由于历史的原因,性别差异的真正科学是不可能的;(3)这样一种科学确实存在,而且已经产生出女权主义的事实和结论(第58、63~64页);以及(4)吸取法国女权主义的观点,“所有剩下要做的是通过写作和发言实现我们自身的存在;构建一种完全新的语言、学术研究、知识”(第66页)。纯粹的优势、巨大的核心、理性的程度以及语言构成现实的法国女权主义理论都隐含了相互不一致的认识论。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必需的,但是应该分析其中的矛盾。

背景下发生。问题是,谁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去定义更大的现实,每个人的日常经历必须符合这一现实,使得每个人被认为是正常而且负责的……现在,科学是新现实中最受尊重的立法者。(Hubbard et al., 1979, 第 8~9 页)^①

语言在不可避免的权力背景下创造现实;它不代表或指出一个可知的世界隐藏在不断缩小的、特定社会历史调查的范围之外。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像西西弗斯(Sisyphus)这样的科学家的任务是努力产生一个世界的写照,“不仅仅反映我们自身和我们社会安排的各个方面”(第 11 页)。接下来,哈伯德对人类进化的男性化起源故事提供了一种有着细微差别的解读。但是,然后在重建过去的困难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她用一小句话明确地坚持一个事实:“从一千五百万年前我们和猿分化起,人们能从古生物学发现中读到的人类进化的主要特点是,直立的站姿、牙齿数量的减少、大脑容量的增加。”(第 29 页)可能如此,但是用什么解释原则使这个故事具有确定的可读性,而且它们

^① 另外的文章包括,芭芭拉·弗里德关于性和性别的语言的文章、苏珊·李·斯达关于性差异和大脑的不对称性的文章、达莎·克莱帕·巴拉克(Datha Clapper Brack)关于医生取代助产士的文章、玛莎·罗斯·沃什(Martha Roth Walsh)关于女医生的文章、薇琪·德拉斯(Vicki Druss)和玛丽·苏·海尼芬(Mary Sue Henifin)关于厌食症的文章、艾米丽·卡尔派柏(Emily Culpepper)关于古希伯来人以及在可能的将来女性团体内部的手淫姿势的文章、玛丽莲·格罗斯曼(Marilyn Grossman)和波琳·巴特(Pauline Bart)关于解释更年期和再次侵占女性的男性控制的文章、娜奥米·维斯坦因关于女性从事科学的性别障碍的文章以及海尼芬提供的关于女性、科学和健康的一个有用的、扩展的参考书目。各种文章指出,产生当前科学的女性在科学—技术的劳动力中有着从属地位的社会角色。由于我们的有用性,我们在产生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还不是完全缺席的。共同合作的、无等级的社会结构支持哈伯德和劳的合著以及哈伯德等人的作品,这种结构与科学—人文主义的交汇项目(NEXA)选集中的正式“辩论”以及构成巴拉什面具的沉重英雄主义负担,即讲述残酷现实,有着明显的对比。这两本女权主义著作中的作者们也清楚他们自身的阶级和种族特权以及他们讲述完整真实的故事的自身障碍(例如见 Hubbard et al., 1979, 第 32 页)。

是如何与社会进化和行为进化的阅读原则相区分的？主要的差异似乎是，现在关于直立站姿有一个无关性别的共识，所以这种解读是无争议的。但是，是否争议的结束意味着故事已经变成事实，已避开了社会决定性，而且变得客观化了？所以，在无情的解构中建议用一个无害的陈述句。迄今为止，直立站姿以及猿与原始人类的分化次数已不止一次地成为进化论中决斗的舞台。

当哈伯德提议女权主义者的任务时，这些问题在文章的结论中变得尖锐起来，因为女权主义者对科学生产承担责任。尤其是，隐藏在表征理论和人文主义者的自我发现计划之间的联系引起麻烦。哈伯德警告，女性除了可能在开玩笑和拙劣的模仿外，不应该创造出反映“女性为中心”的故事。我们应该从当前的作品中筛选出原始数据。但是，我们也会被告知所有事实都承载着理论，因此也承载价值和历史，在这个时候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除去男权主义科学的神秘色彩；并能“超越它考虑问题，我们必须在这一领域、实验室、图书馆里做必要的工作，并找到方法看清事实并解释它们”（第 32 页）。“虚假的事实”和“男性为中心”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女权主义科学对于找到自我、获取我们真正的遗产来说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要获得空间去探索我们是谁？来自哪里？去向何方？看看我们的备选方案是完全必要的”（第 32 页）。简言之，女权主义是以真正的知识，或至少真正的诠释为基础的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但是在这里，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所有认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都是潜在的——或明显的。

女权主义者需要一些表征理论来避免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问题。辩护在事物本质上没有立场的认识论，对于尽力建立一个共享政治的

女性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①。但是,女权主义者也知道,给事物命名的能力也是客观化和整体化的能力。在生命和人类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这两对语篇中,在更现实的东西之外,他者也同时被产生和定位。这种差异的产生烦扰着“西方”知识;正是语篇创作中家长的声音才只能在正常血统之内通过服从来命名。

南希·哈尔特索克(Nancy Hartsock)和桑德拉·哈尔丁(Sandra Harding)努力解决这种困境,她们以略微不同的方式提出,由于女性的历史地位,我们能拥有关于客观性、知识的根本物质社会生产以及通过命名而可能结束统治的理论。我们没什么好隐藏的,因此自我不用玩惯常的花招,也不用在取代偶像的过程中退缩。^② 没有了主人—奴隶统治,主体和客体能共同存在。哈尔丁和哈尔特索克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即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对被误认为现实的外表没有兴趣,因此能真正表现出事物是如何运作的。生命和人类科学只不过是处于被知者的地位——领先地位给搞糊涂了。我发觉这一方法是有希望的,但不能完全让人信服。这一论点只能暂缓。然而,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就是女权主义者已经权威地加入到这场关于科学知识的本质和权力的辩论之中:我们的确有话要说。唯一的现存问题是什么,

① 这是对福柯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在他对权力关系的微管作用——即在永不休止的辩证法以及不复制指名的统治就不可能获得空间的展示中,权力反抗的构造——所做的巧妙分析中,通过强调无处不在的统治微循环,他威胁要使统治的大循环消失。

② 这一立场是没有负罪感地烘烤、拥有、分享、食用蛋糕的一种方式;它是将巴拉什的糖霜蛋糕切块后的一种迎接的喜悦。对哈尔丁和哈尔特索克的作品的那种比较自由的解读是以哈尔丁未发表的文章“哲学和科学史作为家长制的口述历史”(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as patriarchal oral history)(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1980)以及哈尔特索克未发表的手稿“金钱、性和权利”(Money, sex, and pow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0)为基础的。哈尔丁相信人文主义方法和科学方法,至少在社会科学中,是真正彼此相对立的;我不同意。用福柯的话说,有一种共有的知识存在。

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一种呼吁从头再来的声音是在《女性看生物学》一书的结束语中给出的：

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人类创造的。我们的任务是再创造一种关系，能实现（使其成真的字面意义）人类与自然的统一，并努力从内部去理解它的运作……科学是一种人类的构建，是当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似乎是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目标时，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条件已经改变，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所行之路有可能会破坏自然，而非对它进行解释或改进。比起男性来，女性更多地认识到，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它的命运掌握在人类的手中，而我们没有好好善待它。现在我们必须以此认识来采取行动。（Hubbard et al. ,1979,第 209 页）

这是女权主义者的呼声，是否也是人文主义者没有大声讲出来的呢？

第五章 争夺灵长类本性的竞赛：该领域中人类—狩猎者的女儿们， 1960~1980

为了那些逝去的东西
作为与类人猿的争论。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类似案例”(Similar Cases)

在我们灵长类动物的秩序里，语言并不是单纯的。的确，人们说语言是人类自我构建的工具，它把我们和聋哑的动物世界里分离出来，引导我们给事物命名，赋予意义，创造各种对立，从而精心加工人类的文化。即使那些排斥这种极端说法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公众生活和公共知识的主要变革都是与语言的净化相互依存的。在科学史中，所有事物的祖先首先都是词汇的祖先——或者说这门学科的学生们都被灌输了这套说辞。亚里士多德为存在命名，并由此建构了逻辑规则；为了最终使真正的知识成为可能，培根在一个有关语言改革的项目中，指责了亚里士多德。培根同样需要一个新逻辑，适合他正确的命名。林奈于1758年按照他命名的秩序，即灵长类，将人类与动物的亲属关系合法化。林奈的分类法是一种逻辑、工具和方案，按照事物的名称对它们的关系加以整理。林奈自诩为上帝的眼睛、第二个亚当，通过最终宣布各种事物的正确名称而建立起科学，即值得信赖的

知识^①。即使在这些伟人和先辈们都已作古的当代，科学辩论仍是对语言的争论，来宣布什么可以算作公共知识。有关猴、猿和人类，即有关灵长类的科学辩论是一个产生重要故事的社会过程，这些故事构成了公共意义。科学是我们的神话。本章讲述了该神话的部分内容，尤其是关于最近记录的一种名叫叶猴的、以树叶为食的亚洲猴子的生活方面所做的努力。

本章并不单纯；它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故事，探寻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如何咨询与公共科学意义有关的女权主义问题，而这些线索对人类本性和人类可能性的故事来说至关重要。女权主义部分而言是一个重建公众生活和公共意义的项目；因此女权主义是在寻找新的故事，因而在寻找一种新的语言，为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新视野命名。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像科学一样，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为争夺公共知识所展开的竞赛。女权主义者与科学家们能否不把政治意义和科学意义简化为胡言乱语，而为灵长类动物的故事共同奋斗呢？

为了探索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我想要探究四个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著作，她们也都是欧美国家的女性，在身体人类学的特定社会网络里相互关联。尤其是，在现代生物学—人类学领域中，这些女性的科学实践是否能以吸引女权主义者的方式充分地构造话语呢？我们应该期望女性的不同之处多于男性吗？在进行科研调查中，如何正确地咨询有关性和性别在社会构造科学意义中的地位问题：是动物行为还是进化理论？哪些问题看上去是最没有帮助的呢？我们将追随一些灵长类近亲的有关事业，即美国白人灵长类动物学家和叶猴的，此后，会回来探讨这些问题。

为什么要通过词汇与故事的窗口呢？一种科学的本质难道不会

^① 见亚里士多德(《动物的世代》*Generazione animalium*)、劳埃德(Lloyd)(1968)、培根(1893,1942)、林奈(1758——该版本在灵长类动物的秩序中注入了人类的气息,1972)。

在其他地方,或许在关于自然的可验证命题的建构过程中?什么是生物对象?这些对象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变化得如此之快?这些争论非常复杂;在这里,我只想通过集中注意力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故事中、神话故事和科学故事以及政治理论的共同结构上,来取得成果,以这样一种方式认真对待所有这些形式。故事是科学知识的对象建构的一个核心内容。我并不希望把自然的科学实践简化为政治实践,或者反之,把政治实践简化为科学实践,而是希望从可作为生物学—人类学领域的解释中,编织出社会工作的多层意义,而在该领域中性和性别似乎非常重要。

灵长类生物史系的学生们马上就会面对一张富含形象和故事的织锦画。对于一个从小受到犹太基督教的神话遗产熏陶的人,我们应该注意他在科学重构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对创世纪故事异常执著,而且不仅仅是在流行展示方式的蓬勃发展中。同样重要的是非宗教的起源问题。^①科学与宗教的历史关系体现在灵长类动物的舞台上,例如,在20世纪早期对性行为的医学定义而非道德定义的竞争中动物模型的使用(Yerkes, 1943)。首先以书的长度对野生灵长类生物的社会组织进行的研究之一,只能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和社会利维坦(Zuckerman, 1932)的字里行间来进行理解。有关家庭、语言、技术、合作和分享,以及社会统治的各种起源故事都需要人们对意义启示的敏感性,这些启示内嵌在可得的隐喻中,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意义故事的讲述规则中。如果没有必要再谈论人类灵长类动物,那么当代灵长类动物学家们肯定会严肃地谈论以下问题:共侍一夫的雌性们、双重职业的母性养育、作为自动交流控制系统的社会信号传递、种群接管和杀婴现象、快速的社会变化、时间—能源预算、繁殖策

^① 例如见 Barash(1979)、Wilson(1975, 1978)、Fox(1967)、Ardrey(1966, 1970)、Dawkins(1976)、Morgan(1972)、Goodall(1971)。

略和基因投资、利益冲突与成本—效益分析、非人类雌性动物的本性和高潮频率、雌性的性选择、雄性领主和领导权、社会角色以及劳动力分工,此时不可能不去怀疑那些多层面的故事处于各种事物的核心^①。

但是,为什么要通过观察这种以树叶为食的不知名的亚洲猴子,即叶猴,从而在灵长类动物学研究中探索这些多重意义的交织呢^②? 叶猴是一种主要的猴群,为灵长类动物学家所熟知,但事实上也是直到最近才被更多公众所知晓,他们以前能认出大猩猩,即一种确实稀有的哺乳动物。当然,猿类,尤其是黑猩猩以及猕猴,其中特别是狒狒和恒河猴,经常并首要处于争论的中心,这些争论包括人类的进化、为任何人类维度提供动物模型而进行讨论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方式、灵长类社会组织的本质和意义以及性别对事实与理论的社会构建的影响,这种看法正确吗(Fedigan,1982)? 或许它是正确的,当杀婴问题出现在有关叶猴社会生活和进化的争论中心之前(Ford,1976)。雄性叶猴为什么以及在何时会杀死小叶猴呢? 这些行为应该如何命名呢? 应该有什么规则来可靠地观察这些行为呢? 这些行为是否真会发生呢? 什么会拥有事实和科学解释的社会地位呢? 这些问题处于灵长类动物学内部的一角,引发了本章的焦点。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些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技术话语的关键部分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

① 见 Kummer (1968)、Altmann (1980)、Altmann (1967)、Hrды (1977)、Bogess (1979)、Chevalier-Skolnikoff (1974)、Lindberg (1967)、Sugiyama (1967, 第 221~236 页)、Rowell (1972)、Lancaster (1975) (Haraway [1989b] 更完整地检查了这些问题)。

② 叶猴是适应能力极强的猴类,来自于一种疣猴类族群,专门吃成熟的树叶。它们都待在地面和树上,生活在雌雄共存的、多个或一个雄性的群体,全部雄性的群体以及由成年母猴、少年叶猴和婴儿叶猴组成的群体中。猴群大小是高度可变的。成年公猴体重大约 18 公斤,成年母猴大约 11 公斤。叶猴多出现于边远地区和离人类较近的有庙宇的城郊地区。范围从干旱的低地到山丘(Hrды, 1977, 第 72~76 页)。

答会引导我们回到对科学实践的探索,科学实践是作为重要的公众故事的社会生产。

然而,首先让我们牢记,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化生物学从部分意义上说是关于人类在自然中位置的公众争论——也就是说,是关于政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人们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加以研究,不可避免地将其作为自由的西方民主的一部分复杂斗争,是为了命名谁是成熟健康的公民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从自然状态出发对人类政治的争论,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是一种历史久远的传统;而它的现代形式是在自然经济和政治经济、生物学以及社会科学中各种故事的相互交织。另外,我想说,灵长类动物的故事,不论是大众的还是科学的,都是反映并依靠人类生命的物质社会生产和繁殖过程。尤其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灵长类生物人类学是竞争的突出重点,这些竞争是关于在意识形态及行为实践中谁会控制人类繁殖的手段、关于人类战争的原因和控制以及家庭和工厂中的技术独创性和合作能力的。无论某些灵长类动物科学家是否想使其研究成为这些竞争的一部分,我相信这些概括都是真实的;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各种竞争中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且,灵长类动物学家讲述的故事非常适合他们的时代、地点、性别、种族、阶级——以及他们的动物。

如果我们想要开始讨论那些失踪,或许被杀害的小叶猴,以及那些从专业角度观察猴子的欧美女性,我们就需要为更长的论证提供一系列简要说明。20世纪20年代,在心理生物学家、比较心理学家、繁殖生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的手中,实验室的灵长类动物在有关人类心理功能和性别组织的争论中是突出重点。婚姻咨询、移民政策和测试产业都要直接归功于灵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学家,这些科学家用罗伯特·亚尔克斯的话说是“科学的仆人”。灵长类动物似乎是由语言和文化所揭示的自然合作的模型。20世纪30年代,在有关野生灵长类的早期实地工作中,自然合作的性别生理学(以雄性统治雌性的

方式以及群体人口统计学结构的方式)出现在关于人类针对社会混乱——如工人罢工和离婚问题的社会治疗的争论中。针对核心家庭、郊区的父亲养育以及母亲缺失所导致的悲哀结果,灵长类模型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关于美国社会问题的公众争论中。人们急切地找寻关于人类抑郁症的灵长类模型,而且人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独创性,期望在猴子中可靠地产生出精神病患者。正如对20世纪60年代暴乱城市压力下的灵长类黑人男性的精神病学研究(甚至提议遥测控制)一样,人口政策和关于人口调节的问题也吸取了灵长类的研究。在越战期间,关于“人类的”自然合作本性或好战本性这一紧迫问题经常被用于座谈会和课堂的讨论,这要一直归功于发展中的、有关人类进化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最近从南非和中非获得的化石、对现存灵长类动物的新实地研究以及现代采集者—狩猎者的人类学。人们能够在多数争论的很多方面找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踪迹,包括他们不想成为任何明确的政治态度的“方面”。从从业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的观点来看,最紧迫的直接政治问题可能包括所有种类的非人类灵长类的急速毁灭。但是,这一担心很快使最不关心政治的科学家卷入完全由帝国主义历史所决定的国际政治中。

叶猴的生物人类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吸引了大批美国公众,这不会使人感到吃惊。在那个时代,许多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国内暴力(特别是挨打的妇女和儿童)、生育自由(或经常被强迫)、人工流产、对子女的养育(一种对母亲养育的委婉说法和一种对父亲养育的矛盾看法)以及那些不是主要根据社会团体(即家庭)来定义的“自治”女性。母亲养育本身是“自私的”吗?看到有关人类和非人类的母亲养育以及有关女性生殖策略的出版物如此之多,关于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生物学的和说教的、微妙的和公开的,人们只会感到震惊。要想理顺这一背景下叶猴故事带来的技术和大众的线索并不容易,而且这种整理在任何情况下都肯定是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的

行动,目的是拯救科学的纯洁性。或许到目前为止,将这些缠绕的纠结丢到一边,试着从神圣的印度长尾猴中找出关于杀婴现象的主要论点,这种做法会更吸引人,甚至更为负责。

父系灵长类动物学:一种生活方式

生物学从血统开始,从改进开始,而人类学则从亲属关系的社会客体开始,这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让我们通过对父系的虚构故事来接近本章的主题——舍伍德·瓦什博恩,一位显著的灵长类动物之父的虚构故事。我们需要审视一些女性的著作,她们(菲利浦·杰伊后来叫做菲利浦·多尔林诺[Dolhinow]、苏珊娜·莱利[Suzanne Ripley]、萨拉·布拉弗尔·赫蒂[Sarah Blaffer Hrdy]以及珍妮·博格斯[Jane Bogess])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重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网中学术上的“女儿们”或“孙女们”。正是直接通过瓦什博恩的宗系,该故事中研究叶猴的学生们才得以继承这些女性在其虚构的策略、被承认的故事以及勾画不同故事大纲的工具中的核心因素。灵长类动物学成了一种集体的历史生产,而不是一个万能祖先的后代。但是,各类分析、创业者的活动以及瓦什博恩的制度权威把灵长类科学作为身体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嫁接到现代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结构—功能社会人类学的根基上。人们必须勾画出这些基础科学的规则,以便追随有关小叶猴的争论。

本章讨论到的所有女性都在其工作上经历了多重影响;而对于父系的虚构故事应该既不包含独特的影响,也不包含必需的和谐。事实上,家庭在人们的印象中应该是一个充满激烈冲突的场所。但是,父系观点以及子女的语言的确包含着一个著名人物的现在或以前学生

们的共同确认,同时也包含着生物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对学术“宗谱”的共同讨论。语言本身受到独立和受惠问题、个人成就和归属身份问题的指责。女性反抗父权制的部分斗争是坚持独立于父亲的姓氏而进行命名。我使用家庭语言意在提出问题和紧张度,并指出现今科学社会关系中一个矛盾的出发点,这种关系是按照历史上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制度来调节的。我认为,瓦什博恩的专业能力无疑对其男女学生们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任何家庭名字一样,学术上的父系命名也是一个社会的虚构故事。父系的语言不能讲述一个学术家族的自然历史;它为各种争斗的血统、共同关注的东西以及各类工具和公共社会身份的历史继承命名。

瓦什博恩身体人类学的父系观点留下的主要智力遗产是,有必要重构生活方式——使化石转变为现存动物的支柱,并以受规则小心约束的方式来解释现存的灵长类动物,使它们作为人类生活方式各方面的模型,而非重构的固定结构。适应、功能和行为都是真实的科学客体,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构,或是完美性或复杂性的等级的、自然的标尺。通过将功能对比解剖学发展为进化综合理论的一部分,并将此方法延伸到现存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瓦什博恩及其学生们将基因选择理论、调节领域和实验方法整合到进化重构的实践中。

瓦什博恩父系观点中最著名的实践产品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狩猎者”假说。该假说表明,在可能的生态环境下,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关键进化适应,与获得食物的新策略相联系,这种策略是一种生存创新,带有以社会合作、习得的技能、核心家庭及以最终形成的符号语言为基础的人类未来的含义。从一开始就强调“人类—狩猎者”假说,十多年来一直引导许多实地灵长类研究的基本因素是作为主要适应的合作和社会群体,这是非常重要的。诸如侵略、竞争和统治结构之类的现象基本上被视为社会合作的机制,作为井然有序的群体生活的轴心,作为组织的先决条件。当然,“人类—狩猎

者”假说特别是与男性生活方式有关,它被认为是人类过去与未来的动力。该故事一再强调,狩猎是男性的创新和专长。而且,不狩猎的东西一直都保持不变。狩猎是变化的原则;其他事物都是一个基准或一个支持系统。^①

所以,瓦什博恩的女儿们进入该领域,争论有长期争议的、称作灵长类动物的这个知识对象的意义,并就有关过去限制性和将来可能性的争议观点构建起源和行为的故事,她们是作为一个生命科学家的复杂社会家庭的一部分,这一家庭对生物学和人类学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加以研究。现存灵长类动物的实地研究和实验室研究不高的战前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几乎同步的、国际化的成倍发展,原因很复杂,如小儿麻痹症的研究,非洲的原始人类化石的新发现,日本将灵长类社会的纵向研究的发展作为比较人类学的一部分以及在社会管理的自动控制模型中为人类情感紊乱和社会解体寻找动物模型系统。但是,这些原因把我们带离了本文的关注点。瓦什博恩是研究发展的十几个关键执行者之一,这些发展植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决定,如战争、国际旅游和热带疾病控制的新技术、现代医学研究的制度化以及在非殖民化却又处于竞争状态的新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国际保护组织^②。

瓦什博恩于194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身体人类学的博士学位。他所受的培训反映了身体人类学和灵长类动物学的医学遗产和殖民种族主义的社会基础。由于所受的教育是传统的神人同形的方法和灵长类解剖学,所以一直到1947年他都在哥伦比亚内外科学院教授医

① 对这篇文章来说重要的论文包括: Washburn (1951a, 1951b, 1978)、Washburn and Avis (1958)、Washburn and DeVore (1961)、Washburn and Hamburg (1965)、Washburn and Lancaster (1968)。

② Cravens (1978), Zacharias (1980), Haraway (1981 ~ 1982, 1983), Frisch (1959)。

用解剖学,之后他调到芝加哥大学工作,在那里与他的第一批重要的研究生一起研究社会行为学(作为与严格的功能对比解剖学的对立),而菲莉斯·杰伊(Phyllis Jay)是其中的一员。瓦什博恩属于那一代身体人类学家,他们否决了自己为构建种族等级而进行的科学实践,即一种对比生命科学的实践,通过暗示和明示白人男性的、专业的资产阶级社会组织中的目的论标准,以增加进化中复杂性和完美性的前提为基础。瓦什博恩积极争取把身体人类学从这部分遗产中移除,主要是靠精心制订进化故事的讲述规则,使故事不会轻易产生种族歧视的含义^①。他没有看到或挑战类似的认识,并产生出等级排序的性别科学框架——不是出于个人恶意,而是因为挑战种族主义的世界斗争正在终止殖民主义,并使许多由殖民主义产生的公共知识规则为人所见,这些知识中包括生命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使得性别不同科学建构成为可能,而不是男性或女性大脑中的天才想法。但是,某些男女的确在一些科学竞赛中产生了关于性与性别的转变争论,这些竞赛以变化的社会可能性为基础。这些灵长类科学家与各种女权主义以及变革后男女社会关系的其他维度之间的关联,没有瓦什博恩与非洲、亚洲和美洲解放斗争之间的关联那么直接。但是,瓦什博恩和他学术上的子孙们都与狒狒和叶猴的社会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公众故事的调解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我们正走在故事的前面,并确定什么是必须讲述的。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瓦什博恩在实践作为一种实验科学的身

^① Haller(1971), Hooton (1931, 1942).

在1959年的通信中,瓦什博恩和朱安·斯图尔特一致认为将胡顿(Hooton)的书用来做教材是不可行的,因为书中内容有关种族歧视(瓦什博恩的个人论文)。瓦什博恩(1963)在1962年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一个反种族歧视的主席发言。同见瓦什博恩在种族智商辩论上给编辑的信件(《新闻一周》[*Newsweek*], 1969年4月28日),是关于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的《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这份报纸的。

体人类学；到1950年为了重新解释他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与狄奥多西斯·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和乔治·盖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提出的最新的人口基因学、系统学和古生物学相一致，他一直在发展一个强大的项目。到1958年，他获得了福特基金资助，允许他从多个角度来研究人类行为的进化，包括提供东非狒狒实地研究的初始费用。他与自己的学生欧文·德·沃尔(Irven Devore)一起合作完成了这一项研究工作；它奠定了从“人类—狩猎者”的角度出发第一次用狒狒的对比模型来阐释原始人类进化的发展。在接下来的一个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提案(“灵长类行为分析”[Analysis of Primate Behavior], 1901)中，尽管该基金也支持了其他人的研究，但德·沃尔与瓦什博恩是主要调查者。最终上交基金会的报告承认了狒狒研究在数据和解释上的差异，因此它将注意力大量集中到杰伊的叶猴调查上。那些早期的基金项目提案提到了狒狒的社会行为研究与人类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之间的联系。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精神病学家大卫·汉堡和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对比心理学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就在这些提案所列的咨询家之列。1959年在伯克利分校，瓦什博恩为美国的第一批灵长类实地研究站之一筹集资金。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他发表演讲，撰写受欢迎的教材，制作教学电影，在教育各层面开展课程改革，并且帮助一些杰出人物在进化和灵长类动物学领域中决定其职业生涯^①。

我属于大约1958年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瓦什博恩父系的灵长类行为和进化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还有那些在其他地方获得学位的、瓦什博恩的弟子的学生和人们也包括在

^① 这个总结编自瓦什博恩的个人简历、每年在他加州大学的生平及其著作上做的添加、重大项目的复件以及个人访谈。我们非常感谢瓦什博恩教授在提供这些资料时的慷慨合作。

内。例如,珍妮·博格斯(1976)是菲莉斯·杰伊(Phyllis Jay)/多尔林诺(Dolhinow)(1963)的博士生,而菲莉斯·杰伊/多尔林诺则在瓦什博恩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萨拉·布拉弗尔·赫蒂(1975)是欧文·德·沃尔(1962)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生,而欧文·德·沃尔则在瓦什博恩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人们不能期望一个家庭中的和谐;而且,的确我们将会看到瓦什博恩的同龄人中出现的主要争论以及对祖先故事的重大偏离。德·沃尔和瓦什博恩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就已经在社会生物学上出现了争执;而杰伊/多尔林诺和博格斯则都与莱利和赫蒂有着相反的观点。所有这些对立都集中在繁殖策略及其意义上。同样,我们也会看到遗传下来的故事有着一个共同话语和转变的领域,它的结果是把争论中心放到性与性别上,这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不可能的。

对瓦什博恩直系派别(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初步调查表明,他至少有40名博士生,其中大约15名是活跃的职业女性。这些数字应该放在灵长类动物学的粗略初步数据的整体环境中。灵长类行为学家和进化科学家分属于以下三个主要的专业协会:(1)国际灵长类动物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Primatological Society, IPS, 成立于1966年)拥有成员大约750人,其中380人来自美国,120人(16%)是女性。从他们的专业发言来判断,大约有130名IPS成员自认为是人类学家;其中只有17%是女性。(2)美国灵长类动物学家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rimatologists, ASP, 成立于1977年)拥有成员大约445人,其中23名外国人,主要来自加拿大。大约30%,即131名成员是女性,16%(70人)在人类学机构的分部做过演讲(更多人表现出没有专长,甚至不是医学专家[16%]或心理学家[13%])。大约30位女性人类学家(占人类学家成员的45%)在ASP榜上有名,其中有7人是最初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博士学位的。一些瓦什博恩宗系的成员记得,为了专业的目的,它从一开始就接纳了异常

多的女性研究生。那些在灵长类争辩中的杰出女性确实是属于瓦什博恩宗系的,但是这些数据表明,与国际总数以及美国与灵长类相关的其他专业相比,直到1980年美国大多数从事灵长类动物学研究的女性通常是在人类学的专业范围内。(3)美国身体人类学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拥有成员大约1200人,其中约26%是女性。这些数据都无法精确地说明有多少人在从事灵长类行为和进化方面的研究,这与灵长类动物学的其他许多方面相对立,而且决定一个从业者的专长通常是相当武断的:人类学在哪里结束,而对比心理学又从哪里开始?此外,发言有时是不明确的。但是,即使如此,这些粗略的数据还是表明了灵长类研究的集体性和国际性、女性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参与(尤其是在美国)以及瓦什博恩宗系成员的可见地位^①。

将故事的讲述规则流传下去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呢?瓦什博恩宗

^① 这些原始数据编自1977年到1978年国际灵长类动物协会的成员手册、1980年美国灵长类动物协会的指导手册以及《美国身体人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第51期(1979年9月,第181~504页)中的成员名单。我将专业领域划分为人类学、医学、地方灵长类研究中心(没有另外确定专业)、心理学(包括神经精神心理学)、动物学、野生动物保护、精神病学等等。对女性进行了保守的鉴定;如果只用名字的首字母,把这个人归于男性,除非某些认识对此加以反驳。感谢鲁斯坦·霍格奈斯(Rusten Hogness)的帮助来获取这些数据。

以下是一份不完整的女性数据列表,她们于20世纪7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隶属瓦什博恩和杰伊/多尔林诺的直系派别,而且在其领域的重大辩论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学生经常与两位导师一起工作,但是应该强调多尔林诺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资深教员的地位在培养这些学生上所起的作用。除了多尔林诺在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外,其他在这里没有包括。宗系派别并不表明这些社会联系会有或没有何种重要性。Virginia Avis, 1958; Phyllis Jay, 1963; Suzanne Ripley, 1965; Jane Lancaster, 1967; Adrienne Zihlman, 1967; Judith Shirek (Ellefson), 1967; Suzanne Chevalier-Skolnikoff, 1971; Shirley Strum, 1976; Naomi Bishop, 1975; Elizabeth McCown, 1977; Jane Bogess, 1976; Sheila Curtain, 1976; Mary Ellen Morbeck, 1972。Jay、Ripley、Bishop、Bogess和Curtain研究的是叶猴。

系在将工具传给人类—狩猎者女儿们的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些工具用来修饰她们在科学构建性和性别的过程中的遗产，而性和性别既作为研究对象又作为研究条件。我们已经浏览过瓦什博恩讲述的进化故事的逻辑框架。主要规则是编织关于功能和行为的故事、关于生活方式的故事。同样，让我们也迅速地浏览一下瓦什博恩所谓的“计划”，即建立关于灵长类动物的权威故事。“计划”中的主要因素是为他的学生们创造发言的空间，最初被他庞大的社会权威所笼罩，但是最终有了他们自己的专业基础。瓦什博恩训练的另一个主要成分是，坚持 1960 年身体人类学中一种独特的课程结构和实地—实验室研究。瓦什博恩的学生们，不论他们最终关注什么，都理想地学习了功能对比解剖学、社会人类学里的社会—文化理论以及对现存灵长类的实地调查。事实上，一些学生并没有研究所有的三个因素，但是在瓦什博恩的基金项目提案以及他对身体人类学改革项目的其他描述中都强调了这一理想。

瓦什博恩灵长类动物学的父系观点据说是始于 1957~1958 年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人类行为的起源”(Origins of Human Behavior)的研讨会。该小组的成员，包括菲利普斯·杰伊和欧文·德·沃尔在内，成了发展灵长类实地研究的重要人物；而且另一个参与者约翰·弗里希(John Frisch)，是一位耶稣会会士，他的日语知识使当代日本同事的工作得到更完整的初始理解。

瓦什博恩的学生们并不属于某个专制的实验室；他们选择他们自己的话题。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反对瓦什博恩，并独立于他的观点和支持而进行工作。但是，有些人回顾报道了当时的感觉，身体人类学中一种新综合体的出现对智力的刺激以及瓦什博恩对学生们的选择和机会的培养(还有对其他选择的漠不关心)表明了另一个更明确计划的存在。例如，既然适合狩猎生活方式的功能解剖学是本故事的必要部分，那么人们不应该感到吃惊，发现学生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找

到新的解剖适应综合征,由人类—狩猎者假说突显出来。人们发现,不同的学生在研究手、脊柱、脚、交际、范围和饮食、母性行为等等。

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在20世纪60年代的两届特殊会议是社会机制的典型代表,瓦什博恩使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得以了解这些社会机制,而且这些机制也使人类—狩猎者假说牢固地扎根于该学科领域中。1963年,一个全天的研讨会以瓦什博恩的15个学生为专题,其中6位是女性。阿德里娜·齐尔曼(Adrienne Zihlman)就范围和行为问题发言;她的博士论文是在狩猎假说的框架内研究两足行走。后来,她成为挑战这一解释框架并提出一种主要的综合替代物的中心人物。她的同事南希·坦纳(Nancy Tanner)(于1989年去世)承担了该任务的部分工作。南希·坦纳是一个社会人类学家,曾经在读研期间做过瓦什博恩的助教。朱迪斯·史瑞克(Judith Shirek)就饮食与行为问题发言;她的博士论文有关一种短尾猿物种的可视交际。菲利斯·杰伊在1963年就统治问题发言;她的博士论是关于文处理叶猴的社会组织的。苏珊娜·切瓦力亚(Suzanne Chevalier)提交了一篇关于母猴—幼猴行为的论文;她后来的研究将马斯特斯(Masters)和约翰森(Johnson)的问题和方法引进到对非人类灵长类雌性高潮现象的考虑中,在大范围挑战对雄性性活动占首要地位的概念这一环境下进行。苏珊娜·莱利(Suzanne Ripley)交流了她对叶猴母性行为的研究结果,叶猴是她的毕业论文以及以后研究的中心。珍妮·兰开斯特的发言是关于灵长类动物每年的生育周期,相关的早期演示成了在实验室外研究灵长类繁殖的一个重要的新观点。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灵长类动物的交际问题;她后期的研究则是女儿们反叛人类—狩猎者假说的重要部分。瓦什博恩的男研究生们都就人类—狩猎者假说的各方面用以下的三段式发表了类似的演讲:解剖学、灵长类的行为以及社会人类学。1966年,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会议被称为“人类的设计”;在那时,以雄性为中心的狩猎故事所有成分都处于适当的位置,包括在

现代精神病学中提出的压力意识形态的环境下解决心理上和情感上的适应综合征的方法。

在“狩猎的生活方式”的会议上，瓦什博恩用简短、突出的演讲总结了所有讨论^①。很难错过身体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课程。而且，不论单个学生在他们毕业训练时为自己的研究工作附加了什么意义，20世纪60年代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展示的，用瓦什博恩的阐释——有时更为积极的方向——来表达的很可能有以下几种公共意义：(1) 狒狒模型的首要地位，为获得一种对原始人类进化的对比功能理解；(2) 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和性结合的次要作用)，作为在灵长类动物的关键行为调节；(3) 在人类起源故事中雄性生存创新的中心剧目——狩猎，包括两足行走、工具、语言和社会合作。雄性统治等级又是这一有希望的合作的一个关键机制。

叶猴的联系

很清楚，瓦什博恩父系观点的女儿们被培养在公众面前发言、拥有权威、撰写故事。她们也通常获得教书的工作，使其有时间进行研究和出书。值得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来讲述这些灵长类研究的学生们、

^① 演讲者、标题和草稿来自于瓦什博恩的个人文件。1963年的其他演讲者是：拉夫·霍洛威(Ralph Holloway)、西奥多·格兰德(Theodore Grand)、理查德·李(Richard Lee)、彼德·马尔勒(Peter Marler)、保罗·西蒙斯(Paul Simonds)和瓦什博恩。1966年的其他演讲者是精神病理学家大卫·汉堡和学生理查德·范·霍恩(Richard van Horn)。查询这里与瓦什博恩有关的、相关主题的女性作品，见 Zihlman(1967, 1978a, 1978b, 1978c)、Tanner(1981)、Jay(1963a, 1963b)、Chevalier-Skolnikoff(1971, 1974)、Chevalier-Skolnikoff & Poirier(1977)、Ripley(1965)、Lancaster(1967, 1968, 1971, 1973, 1975, 1978, 1979)、Lancaster & Lee(1965)。

她们的兄弟们以及她们的部落(群体?)。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讲述其中一组故事,由这一领域中人类—狩猎者的女儿们撰写的叶猴传奇^①。通过更近地观察一个复杂故事的一部分,或许我们能弄清那些拥有公共意义的故事是如何在生命科学内部发生变化的。

应该预先宣布这一独特诠释的结论:叶猴故事带着它的多重公共意义,既不是身体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以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的机械反映,也不是那种勤奋客观的科学产物,一直致力于改进自身最终只见叶猴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既不温驯,也不令人迷惑。这两种观点都将科学生产夸张地描绘成神话,即那些承载着意义的公共知识。但是,这种描述的两极都包含了一种暗示,关于我发现的什么是真的,以及什么能使琢磨产生新故事的人对加工科学的过程产生兴趣。自然科学的故事应该是硕果累累的;它们有规律地引导那些进行科学实践的人们,以便发现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以及找到他们意料之外的东西。科学故事有一种有趣的构建规则:尽管采取了最佳预防措施,观察者仍然被迫看到人们不能预料到的以及可能不想见到的东西。加工这一视野的工具是相当唯物的,甚至是世俗的。例如,数十年里,灵长类动物学家们发展了相当明确的标准来收集值得重视的数据,并逐渐地将其强加于彼此,这些标准包括:在实地的时间量、观察者的身体姿势、识别动物的能力、对行为的命名和计算“单位”方面在观察者之间的相似性、数据表形式和数据储存、抵制观察者优先观察

^① 20世纪70年代的作者除了多尔林诺、莱利、博格斯和赫蒂之外,有一份不完整的名单:弗兰克·波伊莱尔(Frank Poirier)、娜奥米·毕肖普(Naomi Bishop)、理查德·科廷(Richard Curtain)、希拉·科廷(Sheila Curtain)、S. M. 莫纳特(S. M. Mohnot)、R. P. 穆凯尔吉(R. P. Mukherjee)、S. S. 萨哈(S. S. Saha)、J. R. 奥本海默(J. R. Oppenheimer)、H. 拉哈曼(H. Rahaman)、M. D. 帕萨撒拉希(M. D. Parthasarathy)、Y. 杉山(Y. Sugiyama)、K. 吉叶(K. Yoshiba)、Y. 古屋(Y. Furuya)、C. 沃格尔(C. Vogel)、A. 赫拉狄克(A. Hladik)以及C. M. 赫拉狄克(C. M. Hladik)。注意灵长类动物学的集体结构和国际结构的符号。

已经有吸引力的东西的取样过程等等。瓦什博恩父系观点为孩子们提供了工具,在一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煽动性视野,这种视野构建了不同故事的可能性。从“外部”决定科学故事的社会力量对立从“内部”清除偏见的科学实践,从这一视角出发争论这一立场的主要问题在于,内部和外部都是错误的隐喻。社会力量和日常科学实践都存在于内部。二者都是公共知识产生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两者都不是净化或污染的来源。但是,这种实践只能使人们在历史上学会看到的变得可见。所有的故事都是被多重调解的(Latour and Woolgar,1979)。

必须警告的是:本章没有企图描述,更不用说解释多尔林诺、莱利、赫蒂或博格斯的整个职业生涯、出版纪录或历史影响。为了强调公众对于女性的人类本性以及父母养育和暴力问题的争论,现代灵长类动物学历史中的某些时刻以及某些文章在这里成了焦点。这些争论提出了关于科学起源故事在政治—历史上的问题,并引导人们为意义和可能性的命名展开竞赛。竞赛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在现今美国,人们竞争来定义和判断男女合作与竞争、国内动乱、人工流产和政治上的生育自由和限制、社会病理学和压力以及关于人类社会行为(包括性角色在内)遗传趋势的生物社会学争论。这些关注点在进化生物学和身体人类学的历史中是传统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竞争中,为了命名自然界中未标记的人类位置以及描述人类社会中同样未标记的自然,灵长类动物是特权对象。

生病和健康的社会群体:一个有关模型的问题

菲利普斯·杰伊,即今天的菲利普斯·多尔林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的正教授,为这个故事中的另一个女儿珍妮·博格斯担

任过论文指导,她是瓦什博恩研究社会行为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也是关于人类行为起源的芝加哥研讨会的成员。她于1958~1960年的18个多月里在印度中部和北部地区对叶猴进行了850个小时的观察,这一研究构成了她的毕业论文“叶猴的社会行为”(The social behavior of the langur monkey, 1963a)以及其他一些出版物(Jay, 1962, 1963b, 1965; Dolhinow, 1972)的核心内容。杰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系统地实地观察研究这些猴子的人;他人的研究很快就纷纷仿效她的研究,有一个是来自日本猴类中心(Japan Monkey Center)的观察者与1961~1963年在印度南部进行研究的印度同事共同组建的队伍,还有她的同学,瓦什博恩的研究生苏珊娜·莱利,于1963年在锡兰完成的为期一年的灰叶猴研究。杰伊的故事非常复杂;但是,我要孤立一小部分因素来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如何为早期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建立一种模型的问题,就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作为进化适应的争论结构,病态的或健康的社会行为的建立标准,在观察者的视野领域里的现象换位和解释这些变换的策略,以及发生这种变换时故事意义的转变。这里焦点将关注于菲利浦·杰伊早期出版的作品,以她在研究生时所做的实地研究为基础,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自然主义灵长类行为的兴趣复苏的最初几年里。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学在很多方面都与1980年左右的灵长类动物学在结构上大相径庭,那个时候赫蒂和博格斯开始了他们最初的实地研究和出版计划。相关文献的大小、实地程序的标准化、职业社会网络和专业可能性的动力以及与生物学(例如,生态学和人口生物学内部)和人类学(例如,关于应用到人类群体的社会生物学)中其他争论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本章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是主要政治斗争的功能,并反过来为这些政治斗争做贡献,而这些斗争是关于人类繁殖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界中所有灵长类雌性动物的政治地位。

杰伊在实地观察叶猴的同时，她的研究生同学正在非洲观察狒狒。1959年，瓦什博恩与欧文·德·沃尔在肯尼亚对狒狒进行了长达12个月近1200个小时的研究，跟进瓦什博恩在1955年200个小时的初步研究，那是在一次关于人类进化的泛非会议中获得的非常偶然的时机。狒狒实地研究探索了科学模型的力量，为了重构后的原始人类行为适应综合征的某些方面，这些适应综合征被假定与草原生活和狩猎创新有关联。瓦什博恩学派的模型建立不是指为本应复杂的人类行为搜寻一个更简易的版本，更不是要搜寻一个被认作一个整体的物种，作为原始人类的简易版本。在这里，复杂性的尺度并非知识的对象。其他灵长类物种也可以作为适应综合症某些特定方面的模型，例如范围、饮食或统治等级的强度与掠夺压力的关联。像任何其他生物模型系统一样，这些模型应该从属于实地和实验室的观察和实验操纵。在逻辑上，灵长类模型系统的地位和细胞运动研究中体外的或者甚至完全人造的细胞膜子系统一样。在人类进化的研究中狒狒似乎是有前景的模型，因为它们是在地上生存的灵长类动物，依赖于有结构的社会群体而存活。行为、生态和功能解剖——在任何解释故事里都是相互关联的。模型是富有启发性的，既可以用作比较也可以用作对比；原型的建立是对比进化科学构建的一部分。事实上，瓦什博恩与欧文·德·沃尔(1961)总结，区别狒狒与原始人类的意义最为重大。但是，所有的比较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现代人。一开始，瓦什博恩学派没有提出动物学家们的问题，而是提出了研究人类生活方式的学生们的问题。而且，狒狒出现的早期被用作特权模型系统，决定着瓦什博恩的学生们研究的其他物种的意义，例如，长尾猴和叶猴。在讨论雄性之间的合作、雄性统治等级作为适应性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生存在草原上的潜在原始人类中雄性在群体防御上的不可或缺性时，狒狒似乎是正确的模型系统。

这种狒狒中心为杰伊的叶猴故事构建起意义了吗？杰伊早期的

论文充斥着对德·沃尔的狒狒故事的引用,这个故事有着强大的情节,开启雄性的生活,尤其是在它们应当的角色中,如群体的保护者、内部和平的保持者以及依靠其统治等级机制的组织者。德·沃尔确实看到了一个以雄性为中心的狒狒群体结构,包括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雄性联盟核心,极大地吸引着雌性和孩子们,当群体稳定时,其他雄性在核心外围,而当群体有危险时,他们则会紧随核心充当特殊护卫。结果表明,任何外人都很难从身体的角度看到这一戏剧性的局面,而从象征角度来看,它已经在多重变化中不断地重复,包括教科书中的图释^①。如果雄性统治是群体组织的机制,那么雄性统治的变化就应该是注意力的对象,来产生比较故事。一个隐含的推论是,社会组织的程度与关键适应机制发展的完整程度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机制是针对一个社会群体,即稳定的雄性等级、合作起源中的生活的。对社会群体的医学—精神病学疗法的逻辑关联应该是很清楚的:社会混乱隐含着主要适应机制的崩溃。紧张的雄性会参与一些不合适(过度或不足)的统治行为——以群体的组织,甚至生存为代价。

德·沃尔和杰伊都将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视为物种的基本适应单位。这并不一定是一种群体自然选择的宣言,而且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物学对新达尔文选择理论的挑战(或扩展?)出现时才被提出。社会角色是研究的基本对象,因为它们建构了群体。社会纽带维系着群体的团结,而且对任何一个观察者来说,雄性的统治关系都不是唯一的社会纽带。但是,德·沃尔解释,它们是最终使一个群体成为可能的纽带;而群体使灵长类动物成为可能,使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瓦什博恩父系观点中知识的突出对象。注意解释的重要层面是机制和适应综合征。杰伊的早期论

^① 查询有名的群体进步图片,见 Hall and DeVore(1972,第141页)。一本有关时间—生命的书是最容易获取的大众来源,来宣传这一狒狒传奇(Eimerl and DeVore,1965)。

文对这个故事结构表现了一系列有趣的反对意见，因为她的叶猴虽然不能像好狒狒那样行动，却仍然拥有非常固定的群体。

杰伊关于叶猴总体生活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关于幼猴和母猴的。她研究社会组织的方法是纵向的、发展的，与德·沃尔的局部情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沃尔将原始人类可能存在的大草原作为舞台，由占统治地位的成年公猴担当主要演员。我读过杰伊的早期作品，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上比德·沃尔的作品更为复杂、有更多中心。杰伊也发表过有关幼猴和母猴的独立文章。尽管以前的一些女研究生经常就这一主题发表文章，但是她们记得试图避免与母猴和幼猴的话题相一致——过多关注母猴会污染观察者，给他们贴上外围的标签。不管怎样，杰伊还是屡次被邀请为早期的灵长类论文集写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不论她对整个叶猴生物学是什么感觉，她还是与一个故事公开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故事没有被命名为原始人类创新的比较中心。狒狒是特权模型系统；在德·沃尔的手中，这意味着雄性的活动。尽管德·沃尔知道幼猴是吸引力的中心，而且所有的观察者在描述群体结构的产生时都记录了幼猴的社会化，但是对群体的解释不能依赖于母猴和幼猴的活动。杰伊把幼猴清楚地看做叶猴群体结构中一个关键的吸引力中心；但是，这个次要情节不是她的故事结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她描述幼猴在雌猴中的通道、公猴对幼猴相对的兴趣缺乏、幼猴发育中的性别差异、成年雌猴中定义明确的统治等级的缺乏、与其他雌猴发生冲突时成年雌猴的暂时结盟（直到1960年，雌性—雌性的组织才被西方人看做是稳定的或首要的，而母系传统则继续与儿子的级别相关，持续了更长时间）、群体里侵略的低发生率以及总体上比德·沃尔的狒狒更为松散的群体组织。她提出，母猴—幼猴的关系是叶猴一生中最强烈的关系，她也主张，所有的统治结构都是极其复杂和微妙的，而在日常存在中并非很重要。简言之，她确实真的看到了那些在她的主要结论里几乎不能突出的重点，因为另外一个故事整理了被

看做是最终解释的东西。瓦什博恩关于人类一狩猎者的身体人类学要求比较灵长类的社会行为,但是不那么沉默的比较中心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并向其他的故事结构和结论开口提出了一个主要威胁。当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时,所有的比较都是不平等的。

可能的时候,杰伊会真的在群体内部开展她的观察;她的举止像一个群体的下属,移开她的眼睛直视从而避免激怒它们。尽管杰伊观察的大多数叶猴群体都不能从内部观察,因为,例如它们高高地待在树上,但是杰伊在早期关于她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自身关系的论文中,唯一一次清楚的方法评论是将自己明确地界定在猴群内部,而且既不是统治的,也不是干预的、去挑衅动物内部的统治;相反,德·沃尔是在陆虎车的保护下从外围进行观察,部分原因是附近有狮子出没,所以,日常生活看起来有所不同。德·沃尔也试验性地刺激了公猴—公猴统治的互动,这种互动必须被看做是在表达中心意义,即称为观察。另一方面,杰伊描述公猴的活动空间比母猴与幼猴要少得多,而且她艰难地详述了公猴的哪些行为是日常群体生活中的重要方面。然而,她清楚地总结,“成年公猴通过建立并宣告一种稳定的公猴统治等级制来维持群体内部的稳定,这种等级制建构起群体内部成年公猴之间的关系”(Dolhinow,1972,第230页)。尽管她的文章的观察结构不尽相同,但公猴都是调整群体团结和稳定的领导者。正是继杰伊之后的瓦什博恩的女儿们这一代人,把一成不变的母系群体的观察转变为一

种对群体结构的解释以及原始人类进化的特权模型。^①

尽管杰伊经常谈到母猴和幼猴,但她并没有看到其他观察者们其他地方开始以戏剧化的方式报告的事情:公猴进入一个群体,驱逐了原来常驻的一只或几只公猴之后会杀死幼猴。例如,杉山雪丸(Yukimaru Sugiyama)来自于京都大学的身体人类学实验室的,而且小组的部分成员来自于日本猴类中心,于1961年到1963年间研究过达瓦尔的叶猴。他们讲过一个动物的故事,“当一只强大的成年雄性领导这一群体时,除了这一事实之外没有其他明显的社会区别”。杉山观察到那些他称为群体内“社会变化”的现象,包括通过一个全公猴的群体成功袭击一个雌雄共存的群体而进行的“重建”。结果是,只有一只篡位的公猴被驱逐了出去。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其他的公猴显然咬了群体里的一只少年母猴和全部的5只幼猴,6只猴都未能幸存。但是,杉山似乎没有看见公猴杀死幼猴。同一观察者也试验性地转移唯一的公猴(被称为“保护和领导群体的雄性统治领主”)而引起社会变化。最后,一只公猴进入这支猴群,杀死了4只幼猴;这些事件看来被亲眼目睹了。在这些研究中,重要的试验性操纵猴群,即操纵模型系统来研究社会组织,总是针对地位高的公猴的,这是有机活力和“社

① 这里的主要人物有齐尔曼、珍妮·兰开斯特和雪莉·斯特拉姆(Shirley Strum)。查询斯特拉姆对狒狒的主要叙述的流行度,见Moss(莫斯)(1975,第193~230页)。这个后来的故事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黑猩猩作为展示原始人类进化的最棘手的候选人而出现。但是,斯特拉姆、兰开斯特和塔尔玛·罗维尔(Thelma Rowell)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黑猩猩,而是明显地讲述了有关狒狒、东南非小猴和赤猴的意义不同故事。我想他们在部分意义上不再强调德·沃尔的狒狒,因为大规模的妇女运动改变了以前男性和女性灵长类学家们都曾听到、看到和相信的东西。杰伊从来没有表明,她认为叶猴应该是在原始人类进化的优先模型。她对于叶猴的描述有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当时不能博得类似的公众兴趣。后来,由于一些至少类似于维持早期狒狒模型的政治原因,这一关注才得以爆发。

会变化”观点的假设^①。

并非杰伊不能记录这一重大的事件；在她研究期间以及在她研究的印度区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她在提出栖息地的非凡可变性和叶猴的行为特征以及更多相关的生态学和社会行为研究的需要时，确实对他人在幼猴死亡现象上的观察做出了评论。正是在这里，决定公猴对群体的接管和杀死幼猴的意义标准才开始得到阐明。对于杰伊而言，这种“迅速的社会变化”发生在叶猴数量高度密集的环境下，这种密集度产生了压力，而压力又产生了社会病态。杀婴现象不能解释任何事情。无论怎样，这些事件只是占据了舞台的外围，这个舞台用来代表社会群体的成功，作为灵长类动物的适应。这个舞台对于人类—狩猎者来说是必需的，他们作为人类的先驱，即通过健康的统治关系来表达的以雄性为基础的合作。杰伊注意到了杀婴现象的观察，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她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转向在产生瓦什博恩体系的意义规则与社会生物学解释的对峙中，为摧毁这个舞台所做的重大努力。然后，我们会回到解释故事与意外发生或社会病态的对立中重大事件的问题上来。对萨拉·布拉弗尔·赫蒂而言，讽刺的是，对社会群体的强调似乎模糊了女性平等——也就是在繁殖策略上的平等。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繁殖策略紧靠政治意义争论的中心，包括在美国的完整人类女性公民权，以生育自主为基础，即“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权”。繁殖策略是关于身体的投资。我们至少要记住，自从托马斯·霍布斯和17世纪以来，英国关于主权、公民权以及选举权、个人财产权——处置自己的投资和公司的权利和能力——的争论被证明是奠定了合法政治行为的基础，尤其是形成了公民社会，与一种应该是自然的繁殖家

^① 杉山(Sugiyama, 1967, 第227页)。人们需要严加注意对那些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文章语言的理解，往往翻译得很糟糕。

庭相对立。我们将要看到的女权主义的社会生物学逻辑是来自西方政治民主的理论源泉。对该源泉的污染并非始于 E. O. 威尔逊关于人类本性的社会生物学著作。繁殖竞争的生物学逻辑在我们继承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政治理论中,只是一个普遍的早期论点形式。生物学从本质上讲是政治话语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客观真理的概要。另外,仅仅注意到生物话语和政治/经济话语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论点,来摒弃诸如坏科学或者纯粹的意识形态之类的生物学争论。关于叶猴杀婴现象的争论触动了政治和科学上的要害,这是不应该令人吃惊的。

一部叶猴的奥德赛故事:英雄、性以及投资管理

在萨拉·布拉弗尔·赫蒂关于叶猴生活的版本中,杀婴现象和公猴接管群体成为理解叶猴社会行为意义的关键。而且,赫蒂的研究(1997)预示了许多杰伊/多尔林诺从没提出过的意义:在她哈佛大学出版的书籍封面上宣称:“《阿布的叶猴》(*The Langurs of Abu*) (副标题:雌性和雄性的繁殖策略 (*Female and Male Strategies of Reproduction*)) 是从两性的角度出发,对野生灵长类的行为进行分析的第一本书。它也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灵长类行为模式所做的一次沉痛的复杂探索。”赫蒂以前是欧文·德·沃尔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他也与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 E. O. 威尔逊一起亲密合作过。这三个人是社会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学家。德·沃尔与瓦什博恩从根源上就完全相左,他通过行为系统对人类一狩猎者的社会人类学做了重新阐释,这种行为系统产生于一种对兴趣的亲属基因演算。对于赫蒂而言,灵长类社会群体成了单个繁衍者的策略所带

来的一个可能性结果,策略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它们的基因适应度,资本化它们的基因投资。关于纯粹的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经济的社会起源故事占统治地位;个体竞争产生了高效动物机器组合的所有形式。社会生活是用唯一重要的货币进行投资和测试的市场,这种货币即基因增长。

在某些情况下,与母叶猴的理性程度相反,杀婴成为公叶猴的一种理性繁殖策略。母叶猴的繁殖利益肯定与公叶猴的不一样。确实,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根本的性冲突是性繁殖的必然结果。即使以联合的方式来表现,任何基因差异还是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冲突。这里的模式是将统治等级视为主要的适应综合征(即社会群体)的协调机制这一顺序颠倒过来了。社会生物学家们可能仍将统治等级视为协调一个社会群体的模式,但是基本的逻辑却不一样了。所有的生物结构都表达了一种利益的基因演算,也就是,一个系统中所有因素为它们自身的繁殖成功而需要彼此最可能(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要注意的是,解释的关键层面不是机制、功能或生活方式,而是简化的适应最大化策略。解释是一种博弈理论。赫蒂的书封面将她的这种逻辑使用称为“女权主义的”,因为她将注意力系统地放在母猴为繁殖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上,而没有根据各种协调因素为群体生存所起的作用而对个人行为加以解释。杰伊/多尔林诺称之为适应的东西,赫蒂则称之为选择。只有在直接争辩的情况下,这两种表面和谐的进化术语在意义上的所有差异才会出现。

尽管赫蒂可能没有亲自撰写自己的书的封面内容,但是这个封面仍然为读者勾画了她的故事的框架。然而,她写下了献辞和致谢,既有了了不起的偶像,也有浓缩的故事,表明开启这本书的公共意义。这本书的语言充满了英勇的斗争和奥德赛式的旅程,目的在危险时期保留基因投资的产品。这本书是献给她母亲的,以“一个英雄目录”开篇。赫蒂接下来说:“我第一次知道叶猴是很偶然的,当时我在履行一

门课程中的分配要求,这门课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本科生课程之一,即灵长类的行为,由欧文·德·沃尔主讲。”这门课中,她的助教是特里弗斯。后来,“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德·沃尔和特里弗斯教授,与综合性全能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一起,将我引入了一个理论王国,转变了我对社会世界的看法”。科学社会化的世俗本性再次显露无遗。在认识了叶猴本身之后,这些以印度和罗马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命名的动物(哈奴曼(Hanuman),印度猴神,而恩特卢斯(Entellus),《埃涅阿斯记》(*Aeneid*)中的拳击冠军),赫蒂总结,“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勇气读完这本书,就会知道把叶猴与勇士画上等号为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分类选择,也会知道为什么必须将最后的敬礼献给那些 19 世纪英国自然主义的先知们,他们是第一批走出去研究长尾猴的(1977,第 5~10 页)”。英国的资产阶级胜利被解释为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的成果,站在这一高度向英国的自然主义—帝国主义冒险敬礼,这对后面故事的逻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赫蒂的书是一场持久的论战,反对被她视为群体选择的论点和结构—功能的社会系统理论。在这场寻求正确观点的“英勇”斗争中,多尔林诺及其学生们是赫蒂的主要对手。像传统的瓦什博恩父系故事的目的一样,赫蒂的目的也是通过讲述科学故事阐明人类生活方式的逻辑,从而产生出公众意义。正如赫蒂所说的:

毫无疑问,当我们第一次开始集中研究最接近的非人类亲属,即猴和猿时,对我们自身社会的理想化被扩展到了它们身上:因此,根据第一份灵长类动物学报告,猴子,像人类一样,维持着各种复杂的社会系统,旨在保证群体存活。正是这种对我们自身的特定误解,为叶猴研究的历史增添了意义。通过揭示我们对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误解,叶猴传奇可能会揭开对我们自身的误解。(1977,第 11 页)

在命令、控制、战争、通奸、财产和投资策略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有关权力争斗的夸张肥皂剧中，赫蒂讲述了一个故事，它基本上是一个群体的政治史，其中雄性搏斗和两性矛盾的繁殖计算的占主导地位。她支持这样的假设，即考虑到一只吃树叶的猴子身体在设计上限制和这些限制在生态位上的可能性，雄性叶猴有一些可能的繁殖策略。对于一个群体外的公猴来说，它的策略之一就是侵略并驱逐常驻公猴，杀死它公认的后代，并挑逗母猴让它们提早进入发情期，那样它们就会在这只篡位者被废黜之前尽快与其交配。它的孩子们必须要有最佳机会才能成年；如果从赫蒂和其他人的观察来计算群体接替（迅速的社会变化？）的频率的话，短短几个月的差别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母猴显然有兴趣保留以前的基因投资，但是其程度只限于在不对它们总的最佳繁殖可能性造成伤害的前提下。母猴的策略与公猴的模式相反，而且它们在彼此之间——甚至与它们自己的后代——的利益的繁殖冲突模式也不一样。重点在于，市场（物种生物学和栖息地）条件下一种对利润计算的吸引力——解开故事中的任何解释性约束。这些计算植根于“观察”中的程度，或者仅由情节产生这些计算的程度，是非常有争议的——多尔林诺的学生珍妮·博格斯的著作包含了对赫蒂自诩肥皂剧的无情批判，在讨论这本书时，我们将回顾这一点。瓦什博恩宗系的女儿们对观察规则本身提出强烈的质疑。但最重要的是，故事受到质疑——有关灵长类动物生活的，无论是人类的还是非

人类的,哪种“理想化”会具有科学知识的地位^①。

机会主义者中的繁殖权利： 叶猴和人类作为生态全才

然而,在观察对瓦什博恩直系(合法?)派别中偏离女儿的反应前,让我们先看一下杰伊/多尔林诺在伯克利分校的上下届研究生同学苏

^① 赫蒂(1981)在《从不进化的女性》(*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ved*)一书中,在与其他现存灵长类雌性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发展了她有关人类灵长类女性的生物遗传的论点。她书中的女性都是自信的、有竞争力的、各种各样的、独立的——但却不一定是占统治地位的。赫蒂认为人类女性与她们的男性同类相比处于最糟糕的地位之一,在部分意义上作为人类男性的财产控制的一种功能。哈佛大学出版社再次在广告策略上超越自我:1981年《纽约书籍回顾》(*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这一期,该出版社刊登了一张针线活的图片,利用当代著名的有关缝被子和针线活的女权主义隐喻以及正面评价女性传统工作的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修辞。这张哈佛社会生物学的针线活图片表达了“女性的地位是在丛林里”。赫蒂强调,女权主义及其成果,即人类女性的平等,都是脆弱的历史—政治成就,而非生物遗传。评论家(Henry, 1982)在一份有影响力的女性刊物《忘忧》(*Off Our Backs*)上热情洋溢地肯定,《从不进化的女性》表明在社会生物学的宣言方面要达成意识形态的结盟是很复杂的。亨利讨论,“赫蒂的书的每个方面都反映了一个女权主义观点……我发现她居然能在哈佛幸存,写下这些,这太不可思议了……如果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这本重要的书以平装本的形式出版,或许赫蒂就能接触到这本书所奉献的人们:‘那些从不进化而得到解放的女性……’”(第18~19页)。当然,赫蒂能在哈佛其他的女权主义出版物中脱颖而出,是通过与主要的男性社会生物学家的父权制联系,体现她对女性低等的社会决定论的父权制提供科学支持,而这些男性曾经遭到《忘忧》的谴责。赫蒂是助理研究员,而德·沃尔和威尔逊是正教授。赫蒂是哈佛身体人类学女研究生们的导师。而且,她明确地自我肯定确定为女权主义者,这是她的进化理论史观点的重要部分(Hrady and Williams, 1983)。很明显,这一情况比围绕社会生物学的“简单”学说联盟所显示的要更为复杂。

珊珊·莱利的叶猴故事。莱利也参与了灵长类本性的争论，支持灵长类动物作为遗传限制中人类可能性模型的候选。她的模型开启了人口调节机制的逻辑，并呼吁建立女性在当代争取生育权利的语言以及生态压力和人口灾难的语言。压力是该故事情节中的基本决定因素。压力也是瓦什博恩宗系的共同主题。它与过去的适应故事以及现在人类退化的威胁相关联。而且，杰伊在名为《女性潜能》(*The Potential of Women*)一书中发表了“雌性灵长类动物”(The Female Primate)的文章，而齐尔曼在一次围绕对家庭的人类精神病学和治疗学方面的关注而展开的会议上发表了“转变中的母性”(Motherhood in Transition)一文，随之出版了《头生子和家庭形成》(*The First Child and Family Formation*)一书，与此同时莱利的故事是在一个充满社会性的环境中、一个科学上值得敬仰的背景下发表的：1978年召开的有关拥挤现象、密度依赖以及人口调节的跨学科研讨会，会议记录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莱利(1980)的论点也是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模型逻辑而进行争辩的；跟瓦什博恩的许多女儿们一样，她的论点以雌性活动为中心。她为自己设立的问题是“从另一种灵长类物种的视角”观察人类的杀婴现象(第350页)。她提出疑问，大范围的人类杀婴现象是一种病态的还是适应的行为。与多尔林诺、博格斯和赫蒂不同，她在这里并没有为那些算作观察的东西进行争辩；她接受了群体接管和杀婴现象的“事实”，作为已确认的东西。她将人类和叶猴比作觅食全才，与近亲相比，他们拥有非常广阔的栖息地，这些亲戚们类似的设计限制是由各自的生物学所设定的(疣猴和猿)。叶猴和人类在他们的生物学参数里是如何以全才的身份存活下来的呢？答案就是，灵活的社会系统和学得的行为可塑性开启了繁殖的行为。性处于这个解释的中心，而不是生命科学解释中新的一面。性是生物学故事中的增长原则(生命力)，而生物学从18世纪晚期诞生起就是一种有关生产系统的，或者，

用好听点的话说，是生产模式的话语。性也特别容易产生压力和病态。最后，将繁殖和生产联系起来 200 年来一直是自然经济和政治经济在理论上的关键需要。

莱利的故事声称，全才们一直在开发边缘栖息地，避免专门化和受限的结果。这种生命策略的代价是，当边缘化变成灾难时，人口周期性地发生崩溃；那时就会需要一种能够迅速重建人口的繁殖一行为系统。在安逸的条件下，这种属性必然伴有周期性人口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反过来，某种反馈性的人口调节机制应该被期待出现在成功的物种中，而杀婴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候选。要注意动物机器的普遍自动控制模型；模型的这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故事所特有的。蒸汽机和电话交流属于生物学的一个更早的时期。

最佳反馈装置的运行应该接近那些连接物种生命策略的繁殖子系统和生存子系统的步伐。所以对人类而言，在采集者—狩猎者群体中女性控制下的杀婴会是维持人口调节的一个优秀机制，也就是，一种生存机会和数量的密切配合。莱利设想了狩猎的降级以及对原始人类生存创新中女性活动进行考虑的需要。她能在 1980 年如此迅速地设想身体人类学故事中的这一重大变化，是其他人研究的结果，其中许多人是瓦什博恩宗系的成员，在一场“外在的”妇女运动的环境下进行研究。

对于叶猴而言，杀婴是由公猴控制的；但这不是要点。在面对他们相当紧密的群体结构时，叶猴也需要某种机制来确保远亲繁殖。在拥挤的条件下，公猴侵略和群体接管的习俗刚好能确保这一点。人类发展了文化—亲属系统，因此在这里叶猴不是莱利的模型。

虽然莱利和赫蒂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但莱利就最终的生物学解释层面与赫蒂展开争辩。对于本书中所有的故事讲述者而言，真正的解释是进化的，是一种情节，其中过去既限制又成全了未来，还包含了它的变化甚至进步的开端。但是对于莱利来说，杀婴是一种机制，对

有义务的全才来说是一种可能的、相当有趣的授权策略。雄性叶猴的繁殖策略是近似的原因；最终的原因（“终极的生物学价值”）是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生态全才保持各种母群体中基因型的多种形态，否则该社会结构会产生近亲繁殖。赫蒂最终的目标是将繁殖单位（基因或个体）减到最少的策略。莱利不是在为群体选择，而是在为维持连续系统的基因条件而进行争辩。

在结论中，莱利集中关注有关适应、病态、压力、退化和模型限制的问题。叶猴和人类，尽管就物种起源而言相距遥远，但是在面对类似的进化困境时，他们在为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复制一个共同经历过的对立面的过程中是相互关联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人口困境并不新鲜，但它们却是我们基本进化史的一个方面，对此人们在一些小群体社会中找到了一种学得的行为解决法（女性调节下的杀婴）。然而，现代人类的确介绍了一种麻烦的创新。他们将关于繁殖和生产的决定进行分离。决定生态系统未来承载力的能力并非在于繁殖单位，而且人们很难期望得到快速的反馈调节。在小规模社会中简单取得的成就在现代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压力时，退化威胁给出了以下建议：小的就是美的，而女性应该就人类生命系统中生产和繁殖的联系来做决定。当然，生理价值并非社会价值；但莱利仍然做了耐人寻味的总结：

看来适应性杀婴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与一个生态全才的物种的地位如影随形，而且是我们的物种在变成和保持人类形象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正是承载能力……和进化策略组合（全才或专才……）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两个物种的问题中杀婴现象的生物学价值。（1980，第 383~384 页）

在这里，有关人类行为的道德—政治故事的医学挪用，是早期灵

长类动物学中性争论的特点,它将首要地位让于生物学的成本—效益分析。这种医学合适性充斥于之中。经济学和生物学从逻辑上讲是同一样东西。在加工这些公共故事时,赫蒂和莱利都恰好处于其技术话语的界限之内。这都是一个变成并保持人类形象的问题,一个有压力的问题。

谁看到了什么：事实的动摇作用

当然,莱利和赫蒂可能确实是错误的;至少这一结论在另一版本的叶猴故事中仍然遭到质疑,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珍妮·博格斯的版本。博格斯认为,赫蒂和其他人提出了群体接管的语言和以目的为导向的雄性杀婴现象,这在根本上并未满足必需的条件,使他们的同龄人相信他们了解自己所宣称的事情。博格斯研究证实,赫蒂和其他人所做的推断是以他们的故事逻辑为基础的,而且最佳观察基础可以带来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多尔林诺起初所讲的故事紧密相关,但却将更明确的注意力放置于自然选择的研究上。博格斯故事的核心意义又是社会健康和社会病态(Bogess,1979,1980)。

博格斯坚持将公认的群体“接管”命名为“快速社会变化”(也是杰伊的术语),目的是避免社会生物学投资论点的目的论。因为雄性的群体成员经常发生变化,她根据“雄性的社会不稳定性”这个概念来查看群体结构中的雄性。她并未对这一有关雄性的、有趣的语言转变以及群体结构的决定因素发表任何评论。她轻松地讲述20年前没有人看过或说过的事情,不带任何的评论。博格斯在一篇完全与雄性行为相关的文章中,甚至可以不带进一步的评论而讲述这些事情。1980年,雌性的行为是一个隐含的中心,在部分意义上支配该故事的情节。

而在 1960 年,对杰伊来说,情况几乎是相反的。介入的不仅仅是猴子——而且也不仅仅是灵长类动物学。博格斯提出,雄性群体成员的变化通常发生在交错的引进和排除的过程中,而不会发生在突然的接管中。另外,杀婴现象事实上是很少被直接观察的;而且即使是直接观察,将其归咎于父权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父权对于赫蒂社会生物学的故事逻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些报告的重新审视向博格斯表明,在压力情况下,群体中雌性可能会遭到袭击,而且这些袭击与叶猴生物学的某个特定方面保持一致(对陌生叶猴的低忍耐力,尤其是雌性的)。在博格斯看来,赫蒂的接管和杀婴成了“成年雄性成员之间突然而彻底的替代以及随之而来的幼猴死亡”(1979,第 88 页)。

压力可能是一个由人类调解的条件,是最近栖息地的破坏而导致的。由现代人类对栖息地的影响所导致的行为不能置于叶猴进化故事的中心舞台。那么,杀婴现象要么是由非自然的人类因素所产生的社会病态预兆,要么是一个“意外”。博格斯提出,没有多少宝贵的证据证明杀婴是以目的为导向的,而且她的故事逻辑使那些她所认同的目击事件降了级。将特定的社会行为称为病态,而不是将其称为基因投资策略的关键,这是有一些标准的,博格斯非常清楚这些标准。如果讨论中的某些行为,即杀死婴儿以及无法控制的雄性社会不稳定性,危害到了两性繁殖的成功,那么我们把它们称作是病态的、不适应的。

如果在一些特定的群体中,存在社会拥护现象和人为的高密集度,而且成年雄性居住在两性群体之外,那么该物种所特有的雄性的社会不稳定性,会与所有群体成员的繁殖成功背道而驰,其中也包括那些新的雄性居民。(Bogess,1979,第 104 页)

博格斯重视在机制的层面所做的解释;和多尔林诺一样,她致力

于结构—功能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她对作为一种行为适应的社会系统感兴趣，而且她关注于社会系统中的环境变量和灵活性范围。

但是，博格斯的确就基因适应度的最大化策略进行争辩；这一争论正是当代进化话语中所要求的。她处于这一争论被一致认可的逻辑范围内，该争论关注雄性之间的统治竞争，作为雄性的首要策略，为了最大化的繁殖成功，而不是为了群体组织本身。她认真地用文件证明自己所说的雄性统制竞争究竟是什么意思。与解释的逻辑相比，竞争的速度和形式在这里受到更多的质疑。但是，对其他研究叶猴的学生来说，博格斯文章的最根本挑战或许是来自于她实地研究的标准和对数据的分析。她继承并加工了高标准来继续她的故事。

解开与编织：对意义的竞争

我无法讲述是谁编织了最佳叶猴故事，尽管我也有自己最喜欢的。我没有为这些事实命名的科学权威，那也不是我本章的目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从一些女性的作品中吸取意义为己所用，我当然也不是说，那些女性在塑造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是不科学的，或者她们以某种不合法的方式将对女性利益的污染引入科学话语中。她们通过引进女性的“自然”洞察力也未能净化科学。在这个故事转变的叙述过程中，我确实找到一些有趣的意义供女性思考，这些意义与女权主义责任的本质有关，女权主义者的责任是把科学加工为现在和未来的公共神话。

就我看来，假设任何个人或群体可以对一些西方传统中讲述自身和他人的故事施加严格的限制，那么禁止那些比较人们和动物们的故

事就会使公共话语枯竭。但是,没有一种故事可以被看做是单纯的,避免受到那些特定历史的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日常行为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故事当然不是单纯的。同样正确的是,没有一种传说可以在一个特定文体中讲述一个适当的故事时不受规则的限制,在生命科学的话语中就是如此。解开这些规则的神秘性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自然是历史地构建、组成的,而不是裸露在化石层或热带森林中被发现的。自然是受争议的,而且女性也已经满腔热情地加入到了这场争论中。一些女性拥有社会权威来写作科学的故事。

这一事实非常新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事实上是在瓦什博恩父系观点的女儿们出生之前,女性并未直接就灵长类动物的本性进行过争辩;而男性争辩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灵长类动物学带头人(例如,罗伯特·亚尔克斯或索利·祖克曼(Solly Zuckerman))的研究甚至只有一点点的怀疑,这一点都会表现出来。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包括女性,都声称性别并不能从物质上决定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性别能决定的话,其结论只能被称为劣质科学。至少,性别是观察中不可避免的条件,同样的还有阶级、种族和国家。

看到一群女性在一场公认的重要辩论中构成主要的权威辩论者,这也是新奇的。也有几个男性在研究叶猴,但是就算是不太合格,又只关注欧美女性的研究,也不会遗漏有关这一物种辩论的生成中心。我认为这些白种女性是叶猴传奇的主要人物,不仅仅是因为叶猴在某种程度上吸引她们的本性。白种女性大量地存在于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她们几乎占据了各种争论中每个可能的角落,而且她们集体改变了故事的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的规则。如果在考虑公猴的同时,不考虑母猴和幼猴活动,那么人们不会再把为人类生活方式而对动物模型进行的争辩认为是科学的。这个结果似乎是产生于历史上世界范围的妇女运动,也产生于特定文化的男女们在灵长类动物学的实地和实

实验室中进行的实践所揭示的各种现象。这不仅仅是那些进行科学实践来对最近的历史做出回应的女性。那么，在真正的多种族实践场上，这些故事会是怎样的呢？

女科学家们并不能比男科学家们产生出更好的故事，更不用说更自然的故事了；她们在规则指导下对科学的公共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故事。她们帮助制定规则；要求女性具体生命中经过训练的能量是一件平凡的小事。对科学故事的质量、各个比较故事的意义、模型的地位所负的责任是多方面的、不神秘的，并可能对科学“内”“外”的普通女性们来说是公开的。忽视或不参与产生科学的社会过程以及只关心科学研究结果的使用和滥用，都是不负责任的。我相信，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更不负责任的行为是继续讲述有关自然的反科学故事，这些故事理想化了女性、养育或其他某种不受男性战争污染影响的实体。和公共神话一样，科学故事有强大的能力来实践我们生命的意义。另外，科学故事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的道德标准是，那些遍布不同文化领域的女权主义者应该参与到讲述故事并为想象的情节设置历史条件的竞争中来。和叶猴的社会习惯一样，女权主义的本质也处于争议当中，这应该是很清楚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书封面上陈述了一条真理，即把女性放到解释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女权主义的。但是，不是一般的科学故事会这么做。我们对自己社会生活产生了错觉，赫蒂对此的认识不是我的认识。这些差别很重要。

对于人类女性性生理学的解释为女性为中心的科学故事提供了一些好的例子，但是这些故事仍然很大程度上是男性至上的。原始人类不能发情很长一段时间是解释灵长类社会的一个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女性为何不发情需要解释，正如我们叙述中的差异一般需要解释一样。一位灵长类动物学的重要先驱，索利·祖克曼追随了他的祖先们的范例，从亚里士多德穿越了备受赫蒂赞赏的19世纪自然主

义者们,这个范例便是:女性的性模式是为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祖克曼给出了一个功能生理学的解释。所以直到最近,对他来说,对这些叙述团体中的其他每个人来说,人类女性不发情的月经周期使男性能够相信女性的性忠诚,也就是说,男性拥有者与其他男性合作创造文化时,他们能够相信那些不在发情周期内的女性。1967年,瓦什博恩父系中的一个儿子,唐纳德·林德伯格(Donald Lindberg)强调了自达尔文以来为人知晓的雌性性选择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雌性动物通常决定会与谁进行交配。林德伯格将这一原则放到了有关灵长类生理学和进化的争论这一背景中。几年后,瓦什博恩宗系的一个女儿,阿德里娜·齐尔曼采纳了林德伯格的因素,并将它编织到有关人类生活方式进化的生理学条件的故事中——在采集和分享的生存创新以及变化的繁殖实践的环境下,一种依赖于女性对自身性欲的更大控制权的生活方式,繁殖实践的变化影响了女性挑选男性,那些男性知道如何与女性为中心的稳定社会群体合作,而这种社会群体是人类进化的基础^①。我喜欢这个新故事;我也表明它改变了规则,规定什么可以计入关于发情期的科学争论。至少,现在有一个广泛出版物的故事,它的作者是一个拥有权威来写作的人,也是一个按照科学话语来行事的人。瓦什博恩宗系的另一位女儿,珍妮·兰开斯特(1978),在《人类本性》(*Human Nature*)一书中一篇广为传颂的热门文章里体现

^① Zuckerman(1933),Lindberg(1967),Tanner and Zihlman(1976),Zihlman(1978a,1978b,1978c).

了有关女性在性方面的自主权的新故事；这类故事流传开来。^①

本章讨论了杰伊(和德·沃尔)有关社会群体的故事,社会群体作为灵长类的主要适应性;赫蒂的社会生物学挑战,以博弈理论、严格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和霍布斯的起源故事为基础;莱利在压力条件下对繁殖权利的奇特表达以及博格斯动摇被算作事实的东西,根据出版物的适用标准来判断,所有这些都是好科学普通实践的重要科学成果。这种实践传统是由父系理论中各种争议的虚构装置来象征的。我认为,所有经过检验的科学故事也是经过当代政治斗争的物质塑造的,特别是在过去 25 年里对女性社会繁殖行为的斗争中。要点是要坚持解开公共话语中科学意义的神秘性。人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创造了这些意义;这正处于灵长类动物的本性中。

^① 尽管兰开斯特和齐尔曼不是亲密的合作伙伴,但是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分享了彼此找到新观点时的兴奋,并互相交换信件和稿件,那时许多女性正在使用继承的工具创造新故事。兰开斯特向齐尔曼(1976 年 8 月 23 日)表达了自己对后者改变牛虻、性选择和女性选择故事的喜悦。感谢阿德里娜·齐尔曼向我们提供了她的通信材料。

在反对各种重新建构原始人类进化的新假设的过程中,性繁殖和女性性欲一直是突出的问题,而过去的故事也在持续地孕育着将来的可能结构。查询公然恢复男性对女性性欲的控制(两人结合)作为原始人类生活的最重要方面的关键,见 Lovejoy(洛夫乔伊)(1981)。这篇文章不引用重要论据和有关其重点出版物,能够在重要杂志上发表,本身就是建立科学权威方面的分析主体。什么可以算作是关于人类进化的关键证据呢?这是对人类本性竞争的中心。

第六章 读布琪·埃梅切塔：女性研究中争夺“女性经历”的竞赛^①

在女性研究的教室里授课，是一项具有特定历史性的活动。这种授课传录、构建并传播特定的、具有政治复杂性的阅读和写作实践。这些材料实践是在妇女运动中个人或集体层面上产生的所谓“经验”的整体的架构的一部分^②。女性研究机构的经验政治是可以解释的，这是至关重要的。获得这种可解释性并不容易，而且它会采取何种形式，应该如何处理不同经验表达的斗争以及这些表达的立场，也不是

① 本章是改编自 1987 年春天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UCSC) 召开的关于女权主义和殖民话语的批判研究的会议上展示为会议一部分的演讲稿。会议记录出版在《铭文》(*Inscriptions*) 第 3 期 (1988) 上，它是殖民话语的批判研究团体的杂志。特别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黛博拉·戈登 (Deborah Gordon)、莉莎·布鲁姆 (Lisa Bloom)、维维克·达瑞夏沃 (Vivek Dareshawar) 和该小组的成员 (特雷萨·德·劳丽蒂斯)。

② 女权主义理论家胡克斯 (bell hooks) 强调了两种形式的差别：这个名词，如在“那种妇女运动”中，有着这一奇特名词本身固有的恶性分类和前卫主义的可能性，对立于是更为积极的类似动词的形式，如在“妇女运动”中，它抵抗具体化和对特殊政治正确性的主张 (hooks, 1981, 1984)。为了避免自由定义强调“权力平等”的隐患，胡克斯表明，“女权主义是终止性别主义压迫的斗争。它的目的不是仅仅造福任何特定的女性群体、任何特定的女性种族或阶级。它不是将女性特权凌驾于男性之上。它有力量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转变我们所有人的生命” (hooks, 1984, 第 26 页)。因此，女权主义运动是针对“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的……这意味着，种族和阶级压迫会被认作是与性别歧视有着莫大关联的女权主义问题” (第 25 页)。感谢凯蒂·金 (Katie King) 提醒我胡克斯的用法，以及在我理解女性文化和女性经历的详细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她给予的许多其他帮助 (King, 1986, 1988, 即将出版)。

那么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审视“内在”的自我时,仅对自己或自身所属的群体,经验也不允许轻易显示出无穷的多样性和不可挑战性,就好像那是显而易见的、随手可得的。经验是妇女运动中的关键成果和方式;我们必须就它的表达术语而进行斗争。女性不再找得到手头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她们/我们找到“本性”或“执行体”,总是单纯地等候在违反语言和文化规则之外的领域。正因为自然是文化最令人吃惊的和非单纯的产物之一,所以经验是具体历史运动中最单纯的、最不明显的方面之一。

通过相关经验的政治爆炸性区域,女权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步入运动。复杂性、多样性、特定的立场和承载着权力的差异,与自由的多元主义相比不是同一回事。经验是一种符号过程、一种意义的体现(de Lauretis,1984,第158~186页)。女权主义者需要表达的差异政治必须植根于一种经验政治,它是通过斗争搜寻特定性、多样性和关联性的,而不是通过在心理学、自由主义上求助她自身的每个永久差异。女权主义是集体的;差异是政治的,也就是说,是关于权力、可解释性和希望的。和差异一样,经验是关于矛盾和必要联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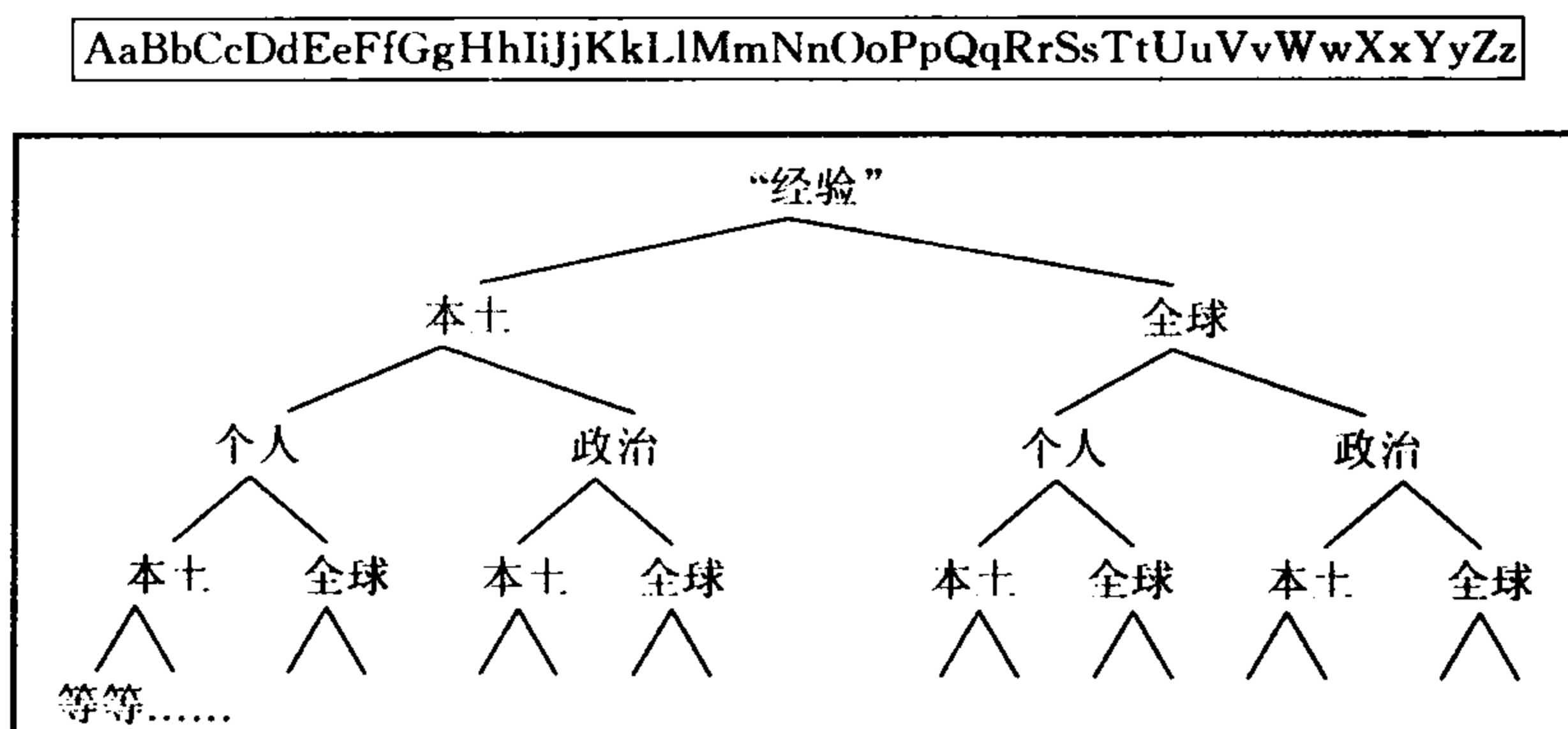
我在此写作的身份是一个欧美人、终生教授、女权主义者、40多岁的中产阶级妇女,在充满活力的女权主义文化的校园里,与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共同工作,1989年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女性研究课,与1970年在夏威夷大学的不是同一回事。从一些重要方面来看,夏威夷大学显然是一个殖民机构,位于美国教育特权的边缘地带。在我的女性研究课的班上,许多学生是有色人种,有男有女,主修酒店管理和其他旅游业科目。女权主义这个词并不常用,而且对于我和妇女运动中我所知的其他人来说,女性解放运动似乎是非常新的,非常激进的,而且无疑是显著的。以前,我们在许多此类判断上都犯了错。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是一所相对左翼的、女权主义的,并且——这应当是一种矛盾——白人占大多数的校园,在加州及整个国家处于各

种尖锐的种族主义、阶级对立、语言沙文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怖症和政治反应的时期,它位于州立高等教育体系中最有特权的那部分。这也是在这个州及国家内一个民族和种族构成以及权力关系剧变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产生的令人激动的时期;20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一个多种肤色的文化和政治、本土和全球的复兴时期。白人霸权——一种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权力合并,它的日子似乎已屈指可数了。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课堂上“女性经历”的构建。

在这些情况下,我通常负责教授“女性研究的方法问题”——女性研究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在当前有力的政治时刻,女权主义理论中强烈的交集和共同建构、殖民语篇的批评以及反种族主义的理论从个体和集体上基本重构了备受争议的所谓“女性经历”的各种意义。什么被算作“女性经历”已经在其历史发展的女权主义话语实践中发生了变化。在显示讲授安排如何自身又是理论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这些教授女性研究的人们需要为初学者在教学方法中对这些问题做出让步。女性研究的教学法是一种理论实践,通过这一实践,“女性经历”被构建和调用为知识和行动的对象。本章中,在我所处并负责的女性研究的课堂上以及和其他人一起在妇女运动的圈子里,我想要审视女性经历的话语生成装置中的一小部分。

一个典型的课堂可能会以严肃的逻辑笑话开场,那就是,尤其对复杂的范畴,甚至更为复杂地被称作“女性”的人们来说,是A或不是A可能同时是真的。这一正确的夸张坚持,在女权主义分析中,即使最简单的事情也需要矛盾的时刻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谨慎,无论是从辩证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来解决。“情境知识”是这种坚持的简略方式。

图3 女性意识/经验的“树丛”或“地图”



情境知识建在可解释性的内部。^① 处于一个不能掌握的中层空间表现出演员的特点,而他们的世界可能由像地图一样的分支或者我

①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中心,人们努力表达出方位的独特性,即必须建立起政治和知识的方位。早期的表达“个人的即政治的”与女性的本地和全球定位网络的表现形式相互交叉,并被其转化,导致了一种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形式和内容的重大转变。其中书面的痕迹之一就是,女权主义出版物中隐性互文性和显性引述的一个大型网络。例如,见 Mohanty(莫汉蒂)(1988,第43页)对阿德里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对方位政治的几点看法”(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1986)以及伯尼斯·约翰逊(Bernice Johnson)本源的“联合政治”(Coalition politics,1983)的引述。和我一样,莫汉蒂重申了里奇在1983年初版的“北美的井蛙之见”(North American tunnel vision)中的文字:“还不足以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尽管这一视野是如此宏伟,但如果对我们现在此时的位置(美国)的特定和具体意义没有一种有意识的掌握的话,我们的视野也不可能突然地扩大起来。”(Rich,1986,第182页)里奇、里根(Reagon)、莫汉蒂不否认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女权主义联系,我也一样,位于美国公认的混乱内部,我把这种希望称为一种将推理小说的比喻挪用到“别处”的希望。这种“别处”的出现是来自于女权运动,植根于规范和表达,而不是来自于公共“身份”,也不是来自于某种“代表”普通人权利或能力的假设。女权运动中的这种“特殊性”不是有关自由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有关对无穷差异的绝望隔离,更不是有关否决对集体运动的希望。但是,集体运动的方法和过程必须新的几何中设想和付诸实施。这是为什么我发现SF(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科学幻想、投机女权主义)的阅读和写作策略对女权主义理论化来说是如此有用。

在[图3]中所画的意识丛来描述^①。情境知识是特别有力的工具,为那些被铭刻在有标记的民族范畴和性别范畴中的人们产生出意识的地图,这些范畴是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历史中被旺盛地生产出来的。情境知识总是有标记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伟大地图的重新标记和重新定位,这一地图在男权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中全球普及多样化的世界体。

“女性的意识丛”或“女性的经验丛”是一个简单的图表模型,根据两个重要的对立组——即本土/全球和个人/政治,来表明女权主义理论和殖民话语的批判研究是如何相互交叉的。当个人/政治的声音在女性话语中、本土/全球的声音在殖民话语的批判理论中变得最强时,两个对立组都成了各自构建的必要工具。同时,每个组的一方当然地构建起其对立的另一方。我把“本土/全球”这个组放在图表的最上方。一开始,从一个特定的描述性实践画起(这绝不仅仅是纯粹可用的;描述是产生出来的),把“女性经历”或“女性意识”的解释放在顶部。这个简单的“二分机器”马上将经验分为两个方面,“本土/全球”或“个人/政治”。不管从哪里开始,每一方都依次分为两部分:“本土”分为“个人/政治”,“全球”分为“个人/政治”。同样的,分析组“个人/政治”中的每一方继续无限期地各自分裂为“本土/全球”。

这个嘈杂的小分析机的工作原理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修辞学家们的二分系统类似,如彼得·拉米丝(Peter Ramus),凭借一种分析技术在将对象一分为二的同时明显地产生出新对象,用以说服、教导并同时进行分类。提及欧洲的文艺复兴应该能提醒我们注意特定西方环境下二分

^① 郑明河(Trinh T. Minh-ha)(1986~1987,第3~38页;1988,第71~77页;1989)讨论了这个不能掌握的中层空间,并把她关于“另类”的理论发展为后殖民女性的一种形象。理论化这一物质上真实的空间——同时也是一种推理小说的空间——居住着另类,这一空间与里根、里奇、莫汉蒂、我自己和其他人提出的对“家”、“方位政治”、“经验政治”和“情境知识”的探究相互交叉。

法分析的一般历史和这里采用的对立组的特别历史。可能在我的丛里出现的其他对立组有“解放/对立”或“反抗/革命”，这些组合深嵌于特定的西方历史中(Ong, 1988)。注意这个传统并没有使二分法的用途作废；它定位其用途并坚持其不完整性和可解释性。这个差异是重要的。对于我所知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二分法是颇为可疑的，却可以偶尔变成有用的小工具。事实上，这个分析机的嘈杂是它对于女权主义可解释性的用途之一；把这种表现形式错认为是一种单纯的、本体的和超凡的现实，是很困难的。这种表现技术产生太多噪音了。

这个“树丛”显然不能保证，在不受调解之下获得某些不固定的“女性经历”的所指。然而，它确实保证一种开放的、分叉的话语，同时反映自身解释技术和生产技术的高度可能性。在西方修辞和语义学传统中，它的任意性和不可避免的外壳对女权主义项目来说正是有益之处，这些项目同时构建了有力的对象，即“女性经历”，并坚持这个人工产物所呈现的特定形式中本身固有的可解释性和政治的网络。

我提出，这个简单的小图表仪是一种初级几何结构，勾画出一些复杂的方法，使得反殖民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能够相互交谈，并为了各自的分析进展而需要彼此。一方能通过分析丛/解释丛来建立自己的方法，做决定排除地图上的某些区域，例如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某个本土经历的政治方面的全球维度上。但是“树丛”的其余部分则是隐性存在的，为任何通过“女性经历”丛的特定轨迹提供一个共鸣的回音舱。

从这种分析方法来看，应该清楚的是，算作“经验”的东西绝不会先于特定社会场合、话语和其他实践，通过这些场合、话语和实践，经验在自身内部被表达，或者连同其他解释能够被表达出来，使构建一种集体经验的解释成为可能，这是一种有力的而往往是神秘化的操作过程。“女性经历”不是作为一种优先资源而预先存在的，不是简单地准备好被挪用于各种描述中。能被算作“女性经历”的东西是在复杂的而往往是不和谐的各种议程中构建起来的。“经验”就像“意识”一

样,是一种意向性构造,一种头等重要的人工产物。经验也可能被重新构建、组合和表达。一种有力的方法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和重读小说,即创造出进入他人的生活和意识的效果,不管那个他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以历史为人生的集合的人。这些阅读存在于一种共鸣解读的领域,其中每个版本都以不和谐而又一致的音波为其他版本增加了声音和形状。

关于“女性经历”的主张尤其可能来自温蒂·罗斯(Wendy Rose)在一首关于挪用美国原著名的经验的诗中被巧妙地称作“灵魂旅行”的东西,并对它做出了添加。女性研究必须就挪用另一个人的经验(绝非单纯的)和精密构建仅有的可能的关联之间这一细微差别进行协商,这种关联是能真正在本土和全球历史中起作用的、仅有的可能的联系。女权主义话语和反殖民话语都参与到这一微妙和精密的努力中,来建立联系和亲密关系,而不是生产出一个人自身或他人的经验作为一个封闭叙述的资源。这些都是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们”经常失败。女权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和反殖民的话语繁殖自身和他人作为封闭叙述的资源,不知道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却知道如何建立对立,这是不难被发现的。但是“我们”的写作同样充满着希望,即我们会学会如何构建起亲密关系而非同一性。

通过阅读女性研究的课堂和出版物中的小说构建起“女性经历”,这是我希望在本章中检验的实践。我的焦点是特别放在圣克鲁兹和世界上“我们”历史中这一时刻的非单纯对象:“非洲”女性的小说、这种小说的争议性解读以及“非洲移民”中的构建女性意识和经验的领域,非洲移民在许多政治选区——本土或全球中是作为一种寓言人物的。我所留意的这些小说是用英语写的;文体、语言和流通模式都为历史标记上丰富的殖民和后殖民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都在女性写作和阅读这些有力的小说的过程中显得更为尖锐。正如拉塔·曼尼(Lata Mani)(1987)在关于印度殉夫自焚的18世纪殖民话

语研究中声明的一样,女性经历的构建对“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发明来说可以是基础。女性是一种特权的话语基地。在这个区域里,税收、劳动力移民政策或家庭法律曾经或继续是合法的或被抵制的。女性对于经验、历史和意识的“自我构建”正是物质实践的原因——包括“我们”自己(看看“经验”、“历史”和“意识”这些源于欧洲的复杂术语是如何与多种美国文化,包括学术环境和激进分子的环境下重要的欧美民族哲学在内,产生特殊共鸣的)。^①

① 提出意识的实践确实产生了女性经历,它是作为一种政治上有力的——而且潜在帝国化的——女权主义话语对象。在检验另一种实践时,莫汉蒂(1984)指出女权主义出版物,例如,许多伦敦泽德(Zed)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书,是作为一个超级压迫的本质化图标的“第三世界女性”的部分生产工具。然后,这种在各种压迫最底端的女性潜在地成为了关于“解放”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革命主体。她的境况寓言性地代表了作为开始觉醒的受害者的全体女性的境况。见泽德出版社的书目,1988年春季/1989年春季,查询一个完整的清单。有许多方式解读这些泽德的图书,其中许多并不适合莫汉蒂的分析。但是,这些书全部都只是生产第三世界女性的女权主义工具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女性为许多议程提供了一种话语基地。这是女权主义将经验组成为一种话语对象,并将它挪用在国际网络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用泽德书目中的话说:“十多年来,泽德图书一直在出版来自于第三世界女性写作的以及关于她们的优秀图书……许多图书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现在它们被用在了各种教育机构中,并作为图书馆里的一种必要的参考书。”这种过程不是单纯的(也不是天生邪恶的);政治和认识论的问题以可解释性和承载着权力的表征技术为中心,包括“自我”表征在内。王(Ong)(1987)描述了年轻的马来女工是如何成为受争议的话语基地的,在这些基地中他者努力奋斗为宗教权威、国家认同和家族荣誉来设置条件。大型企业、国家官员以及对立的伊斯兰教组织、国家大众媒体、流行街头话语都为表现女性的性征而进行竞争。王也在话语上构建起女性——在她的叙述中,她们作为具有复杂历史性的执行者,在特别突出性别、年龄、地区、种族、国家和阶级的多重限制的框架中,肯定她们的人性(Haraway,1989a)。所有作为话语基地的女性构造都是不平等的;指出她们的生产和分配循环并不是要禁止这一过程,而是试图使它与特意的解释性相结合。王和曼尼(1987)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做出女权主义努力的优秀例子。他们从来没有声明的是,他们的表现形式——甚至或尤其是女性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话语的解决法中突然产生,并立即将女性的“经验”、“呼声”或“经验现实”交给读者。这整个问题与表现本性的不可能性是极为类似的,这种不可能性是从揭示“她自身本性”的科学话语中突然产生出来的。

解读小说在女性研究实践中有着有力的地位。小说可能以多种方式被挪用。什么可算作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其部分的解决方法是市场考虑、语言和符号实践、写作技术和读者圈。突出或模糊出版行为使某些小说在女性研究市场中特别显眼或特别难找,这是有可能的。物质对象,即书本身,可能会变得不可见和透明,也有可能提供一条具体线索来传播意义和权力。凯蒂·金(1988)在解读奥德里·罗德(Audre Lorde)(1982)的《赞米》(*Zami*)一书的生物神话艺术的“文体”时,已经有力地提出过这些要点。解读可能作用为技术,建构起算作女性经历的东西,并勾画出女性和她们所建的并参与的本土/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和分离。小说能被调动起来,在意识地图中引起对立、分歧和汇合的同时,还引起了认同。小说可能也会通过阅读产生无认同的关联。由“有色女性”出版的以及描写她们的小说,在许多地方当前历史时刻的女性研究实践中占据了特别有力的节点。通过对这些小说的特定解读实践来挪用它们完全不是单纯的,不管读者在民族、阶级和性别交叉领域中处于何种位置。

解读必须参与和产出;它们并不是从文本中自然流淌出来的。任何文本最直接的解读也是关于意义场和权力场的各种情境论点。任何解读也是一种对意识、联合和行动的可能地图的指南。当小说似乎要提供个人自传、集体历史和/或警告性寓言等有问题的真相时,或许这些要点是特别正确的。这些是文本效果,引起认同、比较和道德话语——女性研究话语中所有不可避免的、有问题的方面。解读的批判性竞争是女性研究的基础实践,在坚持政治和意义的构建性的同时,坚持读者为他们的构建负责,他们的构建是作为对“女性”这一有力的、多义的范畴的创造和废除。在这个范畴里,女权主义的、殖民的、反殖民的和女性主义的话语有力地汇合在一起,并产生分歧。由“第三世界有色女性”出版的小说在不同情境下被女性阅读,其理解一部分是联合的,一部分是竞争的,突出了我想要刻画的问题。读者的连

接和分离是由于自身复杂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包括民族、性征、国籍、对阅读公众和小说本身的接触。在女性解放话语的后殖民地区中,这些可能的异同模式的解读地图是怎样的?非洲移民的女性联合的数据是如何进入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黑人、多元文化、白人、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和其他政治领域中去的?

所以,冒着陷入温蒂·罗斯警告的“灵魂旅行”的危险,我将会勾画出对一个流行作家的三种解读,她的大部分读者可能对女性研究不感兴趣,但是她的小说出现在女性研究的课程中,而且也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政治中争论的对象。在开始这三种解读之前,考虑一下该作者生活文本的简要结构,该文本将作为一个我在解读她的小说时的部分筹码。这个作家就是布琪·埃梅切塔,1944年出生在尼日利亚,有伊布扎(Ibuza)的背景。埃梅切塔于1962年结婚,随丈夫去了伦敦,当时他获得了学生奖学金。在英国,夫妻俩在艰难的境况下生了5个孩子,这段婚姻在痛苦中结束。埃梅切塔发现自己在伦敦成了一个单身母亲、黑人移民,依靠救济住在政府公寓里,要去大学读一个图书馆科学的学位,然后再读一个社会学的博士学位。^①

埃梅切塔也成了一名作家。她成为作家是由上面一段传记文本中隐含的那些“经验”网络所构成的。她是一个母亲,一个移民,一个独立的女性,一个非洲人,一个伊博族人,一个激进分子,一个“过来人”,一个作家。据说她的丈夫毁了她的初稿,因为他不能忍受他的妻子为她自己进行思考和行动(Schipper, 1985, 第44页)。她出版了一系列小说,是集教育性、流行性、历史性、政治性、自传体、浪漫性于一体的——而且是有争议的。

^① 关于埃梅切塔,见 Schipper(1985, 第44~46页)、Bruner(1983, 第49~50页)。查询变化的书封面样本,见 Emecheta(1972, 1975, 1976, 1977, 1979, 1982, 1983a, b, 1985)。同见 Brown(1981)、Taiwo(1984)、Davis and Graves(1986)、Jameson(1986)。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描述埃梅切塔生活的书封面和图书馆的参考文本。除了攻读学术学位、一个社会学家的工作和她早起写作的习惯,我们了解到除了儿童小说外,她写了8本其他的小说,包括《母性的喜悦》(*The Joys of Motherhood*, 1979),可以在著名非洲作家系列中找到,这一系列的创立编辑是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他是《各种事物土崩瓦解》(*Things Fall Apart*)和其他国际著名小说的作者。在英国,埃梅切塔的作品是由艾伦与昂温(Allen & Unwin)出版公司和阿利森马巴斯比(Allison & Busby)出版公司出版的,在美国是布雷齐勒(Braziller)出版公司,在尼日利亚是奥格式乌·阿弗(Ogwugwu Afor)出版公司。直到最近,埃梅切塔的小说在英国或美国比在尼日利亚更容易买到。埃梅切塔的作品与其说是课堂读物,还不如说是在火车和汽车上阅读的面向大众的平价书。她的作品现在同时在非洲和西方国家出版,并且在非洲的英语读者中引起了部分争论。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从一个移民的角度把非洲女性问题等同于女权主义,埃梅切塔的作品是有争议的,可能尤其是在尼日利亚,尤其是在任何阅读它的政治学者中间。

荷兰的评论家米尼克·斯希伯(Mineke Scipper)(1985,第46页)声称:“埃梅切塔的小说在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深受欢迎,但是它们有时却受到一些非洲评论者的冷遇或忽视。”埃梅切塔与女权主义的关系以及她的读者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正是这件事情的核心。她采取了美国的贝尔·胡克斯所命名的女权运动的内在角度,在1979年的采访中,埃梅切塔对其写作的描述明确拒绝了限制她对女性的关心:

我的小说主题是非洲社会和家庭:通过各种事件,从一个女性的角度看非洲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生活。我总是试图表现,非洲男性是压抑的,而他又同时压迫着非洲女性……我不只是将自己投身于非洲女性的事业,我描写的是整个非洲。(Bruner,

1983, 第 49 页)

《母性的喜悦》一书以大约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尼日利亚为背景,探讨一个年轻已婚不育的女性生活中的冲突和多层矛盾。这个女人后来怀了太多的孩子,但那是在她不能进入自己的贸易网之后,所以她也失去了自己的收入。这个母亲从乡村移居到了城市;她的孩子们移民到了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尽管她有很多儿子,但是在她离世时仍然无依无靠,这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故事,是 20 世纪初尼日利亚妇女所面临的城市和乡村现实。

但是,和阿契贝(Achebe)一样,对于埃梅切塔来说,在陷入“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前,非洲历史中也没有一刻是单纯的。埃梅切塔的大多数小说都是以 20 世纪早期的伊布扎为背景的,在那里非洲文化汇合的伟大模式是各种角色生命的基体。在《新娘的价格》(*The Bride Price*, 1976)和《女奴》(*The Slave Girl*, 1977)中,埃梅切塔挖掘了一些基本问题,围绕婚姻,从不同的女性视角看对一个人生命的控制以及在非洲文化地图的每个位置中的矛盾立场,这一矛盾立场尤其是对于她的小说中伊布扎的女性角色来说的,她们是否标有外来的或本土的标记。对于埃梅切塔的角色来说,欧洲的生活也是斗争的场所。《二等公民》(*Second Class Citizen*, 1974)探讨了主人公在伦敦婚姻破裂。《水沟中》(*In the Ditch*, 1972, 1979)跟随着一个单身母亲的主人公进入英国政府公屋的住宅区,她与英国女性组织和女权主义组织中的白人、有色人种、劳动阶层团结在一起,挑战福利制度的条款。《双重枷锁》(*The Double Yoke*, 1983a)回到了 20 世纪晚期的尼日利亚,从重新虚构进出一个尼日利亚少数民族地区的路径来进行观察,重新提

出了埃梅切塔在非洲移民的本土和全球网络中对女性斗争条款的疑问^①。

在我称作“女性研究中的方法问题”的课程中,学生阅读涉及政治的文章,由两个文学理论家所写,他们把埃梅切塔放在非洲移民的女性小说和女性联合的范例中。一个是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一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美国黑人研究的教授——一名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另一个是奇科温耶·奥孔约·奥古涅米(Chikwenye Okonjo Ogunyemi),一位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badan)的英语系讲授美国黑人文学和非洲文学的教授。与伊巴丹和伊费的女人一起,奥古涅米于1988年加入了一个尼日利亚发展女性研究的团体(Tola Olu Pearce,个人交流)。她已经就埃梅切塔的小说在其他地方发表了文章(Ogunyemi,1983);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阅读的课本中,正是奥古涅米对埃梅切塔明确的边缘化,才将我们对她文章的解读在其特定的出版环境和其他政治方面中组织起来。芭芭拉·克里斯蒂安在培格曼(Pergamon)出版社的雅典娜系列中出版了《黑人女性批评》(*Black Feminist Criticism*,1985)一书,这是英美女性研究出版物的一个主要女权主义系列。第三种解读是我自己的,从一位在大多数白人的美国州立大学中讲授欧美女性研究的教师的角度发展起来,并首次在一个共同建构殖民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和女权主义理论的会议上发表。我想让女性研究的本科生们阅读、误读、重读,以致仔细考虑对某个争议性作家的可能解读的领

^① 凯伦·卡普兰(Caren Kaplan)(1986~1987,1987b)淋漓尽致地对女权主义话语中的“非领地化”和构建后殖民主观性中置换的重要性进行了理论化。在描写阿丽西娅·德查芬·奥迪兹(Alicia Dujovne Ortiz)的小说《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时,卡普兰(Kaplan)制定了一种阅读实践,或许也是从埃梅切塔的小说中获得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认同改造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文化批评的形式。置换是一种现代世界中被重视的力量,不是去弥补裂痕,而是去探究它们,去承认文化过程中的政治和局限。”(Kaplan 1986~1987,第98页)

域,包括出版的小说本身字面表现出来的她的生活话语构造。这些解读指向小说,小说中我们都有相当的筹码——出版商的、埃梅切塔的、奥古涅米的、克里斯蒂安的、我的、每个学生的以及那些不同国家中成千上万的平价书的无名读者们的。我想让我们看看这些筹码是如何在女性自觉解放的话语地图中定位读者的,这些话语包括一些构造,如“女性主义”,它们将“女权主义”擦去,并为妇女运动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标准系统。目的是使这些批判反映性解读在情境知识的本土/全球、个人/政治的网络里所描绘的半联合半对立的女性意识地图中,展开位置和亲密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让我们检查一下奥古涅米(1985,第66~67页)发表在《标志:文化和社会中的女性杂志》(*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上的一篇文章中是如何解读——或拒绝解读——埃梅切塔的作品,这是一个美国的主要女权主义理论的学术机构,其读者大部分不是非洲人。在17个《标志》的国际联络员中,有一个是1987年来自非洲的——肯尼亚的阿乔拉·帕拉(Achola Pala)。许多《标志》杂志上的文章都是女性研究课程上布置的作业,这些课程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欧美人,但绝不是全部。奥古涅米的文章争论,将她自己远离“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把她自己与女性主义的标记联系在一起。她表明,她已经独立地发展了那个术语,而后才发现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对它的研究。奥古涅米创造出非洲和美国黑人中的英语女性文学的一种考古学或地图,从大约20世纪60年代殖民时期结束开始。这个地图指向了一个政治希望的方位,称作女性主义。奥古涅米用这个词来指代一个致力于“全民”(无论男女、非洲还是它的海外移民)的存亡和整体性的女性。在海外移民联合起加勒比海的、美国的和英语的黑人文学的过程中,她将自己的话语定位于埃梅切塔的作品。奥古涅米提出,女性主义者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成熟时刻,通过多层次地探讨作为“人类母亲”的女性的经验来确定全体人民的团结。

这个母亲将一个散落的民族的伤口一一抚平,这是一种重要的形象,使女性主义运动从黑人男性的沙文主义以及女权的消极主义、破坏偶像主义和不成熟性中有力地分离出来。

但是,奥古涅米的主要形象对于母亲的形象来说是有些模糊的;那是一个已婚妇女。奥古涅米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阅读此类小说,目的是为了构建起海外移民中的女性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无形丈夫的共同友善的妻子”(1985,第74页)。她对非洲和美国黑人英语文学的考古学在黑人女性作家先驱中发现了女性主义的痕迹,其中奥古涅米否定了埃梅切塔。她的小说并不是肯定婚姻作为完全成熟的形象,这种成熟可以代表全世界黑人的团结。颇为相反的是,埃梅切塔的探索经常涉及婚姻失败的内容。特别是,埃梅切塔完全不把恢复一夫多妻制作为一种解放的妇女运动的形象,她把这种行为看做是一种“腐朽的制度”,会随着“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自由决策度的增加”而消失(Bruner,1983,第49页)。埃梅切塔的小说与婚姻相比自始至终都有着明确的优势,甚至在婚姻最受肯定的小说中,如《双重枷锁》(*The Double Yoke*)。奥古涅米把该小说家的性格看做仅仅是反叛的,他苛刻地甚至轻蔑地对待埃梅切塔与婚姻之间虚构的和个人的关系,表明她是在“婚姻惨败后”才开始写作,她的写作将黑人男性女性化了,并最终将她的女主角都杀死在分娩、婚姻中的奴役、精神错乱或子女的遗弃中。奥古涅米竟然如此声称,“埃梅切塔对她的女主角的毁灭是一种女权主义特征,能部分地归因于作者对自己身体部位的自恋”(1985,第67页)。

埃梅切塔在政治行为上将自己与爱尔兰和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联合,并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奥古涅米女性主义所描述的国际话语。除了批评埃梅切塔对于婚姻的话语以及有关婚姻的历史,奥古涅米强调了埃梅切塔的流放状态。在海外生活了20年,埃梅切塔于1980~1981年回到尼日利亚教书,在卡拉巴尔大学(the Universtiy of

Calabar)作一名高级研究员。对于这段特定的出版时间,奥古涅米质疑埃梅切塔作为一个回归的移民作家的“真实性”。在奥古涅米有关非洲英语文学、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的考古学中都清楚地代表了一个不成熟的时刻,或许以后可以恢复,但在当时是不能结合到“共同妻子”的呼声中去的,“共同妻子”描绘了一种标准的黑人女性团结。女性主义意味着“文化”的要求优先于“性政治”的要求。由于这种关系,对于那些仍未忘记父权制不平等的女性主义作家们来说,“非洲的母系社会和一夫多妻制社会是女性主义小说的动力源泉”(1985,第76页)。奥古涅米在一种新出现的文学标准中提议了一种包容和排除的逻辑,作为一种关于民族主义、性别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的一部分,通过非洲一夫多妻制婚姻的中心形象来进行争论。

芭芭拉·克里斯蒂安对埃梅切塔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黑人女性批评》(*Black Feminist Criticism*)里,克里斯蒂安在紧密联系爱丽丝·沃克的《子午线》(*Meridian*, 1976)下解读了《母性的喜悦》(1979),目的是特别重申一种母系传统,它是围绕着克里斯蒂安文本所突出的某种女权主义形象的。在这两本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小说中,克里斯蒂安将这种话语定位于母系关联和母亲养育,是为了讨论同时提高和干扰/破坏黑人女性在非洲传统、美国黑奴制以及美国

的后奴隶制和后人权运动的环境下的养育^①。她揭开了母亲养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仔细思考了所有这些历史地区中许多让女性享受、庆祝和实施的方法,而后又转变为双重枷锁。所以,当克里斯蒂安在“侵略者”来临之前发出微弱的声音呼吁一种迷失的对母亲养育的空想时刻时,这些侵略者不仅仅是白人奴隶贩子。相反,侵略者似乎是和母亲养育是同时期的;这个世界一直以来已经是土崩瓦解了。

但是随着时空推移,这个母亲不再是克里斯蒂安对非洲移民中的

① 1989年7月24~31日由黑人女性编辑并写作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检查了“黑人家庭的替罪羊”(The scapegoating of the black family)一文。特别见杰威尔·汉蒂·格瑞萨姆(Jewell Handy Gresham)的“美国的家庭政治”(The politics of family in America),第116~122页。同见Collins(1989a,1989b),查询上20年美国境内袭击黑人母亲和黑人家庭的分析以及展示种族低等性的性别用途。根据某种特定的非种族和非父权制的妇女重构,卡比(Carby)(1987)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女性关于母亲养育的话语及其种族增长。卡比的书作为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一次重大干预,发展了一种“女权主义批判实践,特别注意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表达”(第17页)。她表明,“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被批判地认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解决办法,作为一种应当被质疑的信号,一种矛盾的焦点”(第15页)。所以,卡比怀疑克里斯蒂安——和我的弟子奥古涅米的——对黑人女性作家的文学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她构建成熟化传统的方法,这一方法在卡比看来是很有问题的(第14页)。卡比不同意包括克里斯蒂安在内的批评家们频繁地摒弃19世纪和20世纪的黑人小说,小说把黑白混血的形象作为一种尝试,来抵制白人读者对黑人的反面形象。卡比表明,作为一种描述人物的黑白混血是担任一种“探索种族之间关系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种族间关系的表达。黑白混血的形象应该被理解和分析为一种描述的调节机制”(第89页)。卡比也突出了在上20年之前黑人写作的黑人读者和白人读者,并坚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女性的写作表现了“一种早期的、或许在政治上更有共鸣的复兴[与由20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学术界和大型出版社有条件地证实的黑人女性的复兴相比],所以我们可能会重新思考黑人女性的文化政治”(第7页)。这些对黑人文学史和政治史描述的争辩——表现为不同年代、传统、核心作家和文学刻画的形象——都特别是关于当代政治的争辩。他们也是关于如何进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辩。卡比深刻吸取了与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有关联的英国著作。争议性和多样性的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话语可以追溯到史密斯(Smith)(1977)。

女性团结所产生的基本形象了,而是奥古涅米的了。克里斯蒂安阅读《子午线》和《母性的喜悦》,使其互相之间产生微妙的共鸣,目的是为了突出一种特定的女权主义,并同时带有一种对女同性恋关系的肯定,范围是在黑人女权主义和非洲母女关系的遗传模式内部,母女关系是在世界一直干扰关心的不可能的条件下的相互关心。芭芭拉·克里斯蒂安致力于在有色人种女性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禁止对女同性恋关系的边缘化,而且她巧妙地将埃梅切塔列为她的文本之一,原因正是和奥古涅米将埃梅切塔排除在她非洲移民中的女性主义宗谱之外一样。但是,和奥古涅米一样,克里斯蒂安在文学女先驱的写作历史中提出了一种对成熟过程的叙述。对每个理论学家来说,成熟的轨迹提供了一种自我成长和女性移民团体成长的特定模式。奥古涅米系统化了从国家独立运动起西非女性作家意识的历史,根据最初对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时兴起”,最终形成一种成熟的女性主义,它围绕着对如母亲、医者和作家之类的女性团体的比喻,以“一个无形丈夫的妻子们”的形象为中心。正当这个最终形象引发已婚妇女的积极的自我满足时,它不可避免地为许多处于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乡村女性们提醒劳动力迁移的残酷现实,对立于西方资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夫妇的定势形象及其依赖的、孤立的妻子形象和她相应消极的“女权主义”反抗政策。

一个时间表隐含着与奥古涅米的异同,根据这个时间表,克里斯蒂安的叙述系统化了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意识的历史。克里斯蒂安表明,大约在1950年前,美国黑人女性写作的读者大多是不包括她们自己的。克里斯蒂安将小说描绘成对其他方向的搜索,而不是对内心的、回应主导白人社会对黑人女性的种族主义定义。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是这种模式的例外。克里斯蒂安追溯了20世纪50年代一种初始自我定义的过程以及对深色皮肤的普通黑人女性的关注的出现。大体上讲,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在共同黑暗中找

到团结的十年,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在黑人团体中暴露出性别歧视的时代,而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出现多样文化的时代,黑人女性参与到寻找自我和形成女性之间联系的过程中,这种联系在一种以母女关系为类型的世界团体内承诺超越种族和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对海外移民的描写中,对黑人女性人性的理解在不断地增加,这个范围是世界性的。

我将以此作为结束:建议对埃梅切塔小说的第三种非单纯的解读——我自己,作为一个欧美人、中产阶级、大学基础的女权主义者,在白人学生大大超过有色学生、女性大大超过男性的课堂上,将这种解读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研究的教育实践的一部分。卷入有关后现代主义、女性自加和强加的社会主观性的复杂性的辩论,以及有关女权主义政治在20世纪晚期全球和本土范围内的可能性问题中,我自身的筹码在于埃梅切塔的小说和她生活故事的强大模糊性。我的解读限定了她的各种不同状态——流亡海外的尼日利亚伊博(Ibo)族、爱尔兰—英国的女权主义者、黑人女性、非洲作家系列中的经典作家、出版廉价平装书和儿童文学的流行作家、图书管理员、依靠福利生活的母亲、社会学家、单身女性、非洲传统的改造者和解构者、负责种族和平等问题的英国内务大臣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坚定的多种族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家的争论对象以及国际人物。对奥古涅米和克里斯蒂安来说,在我的解读中有一段空想时刻,希望有一种政治解释的空间,而且希望通过除去固定身份而获得宝贵的模糊性、复杂性和关联性。这些希望冒险成了毁坏的后现代区域中寻求经验的永恒旅行者的乐趣。但是,我想要停留在关联性上,它拒绝逐步变为同一性或对真实自我的追求。我的解读精确地自然化了模糊性时刻、流放状态和一个得不到起源和回归时间的“过来人”的困惑。以紧张形式表现的矛盾,连同解释加工,是我对经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权至上的屠杀后的女性们所希望的团结形象。这是一个女权主义形

象,塑造的不是母女、共同妻子、姐妹或女同性恋,而是领养家庭和不完美的意向团体,基于一直以来已经崩溃的世界结构中的希望和回忆,而不是基于“选择”。我所高度评价埃梅切塔的是,她与美国黑人推理小说作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相同之处,即描写大屠杀后改造的“家庭”,作为比喻引导“我们”通过性别、阶级、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核武器灭绝主义的全球文化的蹂躏。

我对埃梅切塔的解读是依据《双重枷锁》(1983a),其中在“传统”和“现代”撞击中对女性不一致的要求和可能性被提出质疑。同时,什么是“传统的”或“现代的”也是大有问题的。那些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的本土/全球网络的交叉极为重要的小说都以这本书为开头,作为一种物质对象和传记片断,记载在这本书上为国际化的英语读者构建了作者的生活。在书封套的散文中,作者从早期书封面上描述的形象:一个有着5个孩子的女性,依靠福利并同时上着大学,为写最早的6本小说早上4点钟起床,转变到一个尼日利亚卡拉巴尔大学的高级研究人员和英国艺术协会的成员。在不同的书封套上有许多埃梅切塔的形象,但是所有这些文字都坚持把母亲、作家和在伦敦的尼日利亚移民的形象结合在一起。

一个内容概要必须要突出种族、地区、性别、宗教、“传统”和“现代”、社会阶级和职业地位这些复杂交织的世界,其中埃梅切塔的人物们能改造自我意识以及彼此间的责任和联系。在《双重枷锁》中,一个“过来人”,布拉沃(Bulewao)小姐在卡拉巴尔大学里为一个大多是年轻男性的群体教授创意写作课程。以布拉沃小姐给学生的作业和她对一个男生的故事中道德困惑的回复为框架,小说的核心是伊特·卡姆巴所交的文章,他爱上了一个住在离他的村子一里外的年轻女性恩科(Nko)。恩科是一个年轻的埃菲克(Efik)女人,与伊特·卡姆巴(Ete Kamba)的艾基寇(Ikikio)族不同。两人都在大学里依靠奖学金生活,都有着对父母的复杂责任感和自身的抱负,同时,他们也盼望着结婚。但是,性别使他们

的处境变得非常不平衡。读者不得不参考爱华·王(Aihwa Ong)(1987)对马来西亚的日本跨国公司中年轻马来工人的描述,在这样一段叙述中,埃梅切塔把卡拉巴尔大学描绘成独立后尼日利亚的斗争力量的缩影,包括新基督教运动、伊斯兰教的同一性、种族群体的要求、全球经济中同时来自于家庭和国家的经济限制、农村和大学的矛盾以及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如女权主义)的争议。

所有这些构成了伊特·卡姆巴和恩科之间的爱情结局。一天晚上,这对恋人在村子外发生了关系,此后他心里充满了对恩科的忧虑,由于他们是穿着衣服站着发生关系的,他怀疑恩科是否还是处女。如果要娶她,她仍然是处女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强迫性地询问她的纯洁性,恩科拒绝回答。一种对“处女性”的解构取代了母女之间的母系关联或共同妻子的女性团体作为集体团结象征的各种形象,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各种论点,这些论点是关于起源、真实性,以及在独立后尼日利亚的多样化世界里构建称作“人民”的这一有力单位的过程中女性的地位。这个年轻男人到恩科的村子里向一个长者寻求建议,那人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的教员和一位受美国启发的、有复兴思想的、新基督教运动的领导人。这个教授、宗教领导人和模范家庭好男人曾经性侵犯过他的学生恩科;而且在伊特·卡姆巴拜访之后,这个年长的男人又强迫和她发生性关系,导致了她的怀孕。

恩科告诉伊特·卡姆巴,无论他叫她“处女”、“妓女”还是“妻子”,那些都是他的称呼。她到大学依靠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学位。如果她被迫妥协于施加在她身上的不断收紧的性关系网来获得学位,那么她仍然不会成为被写上后殖民主义“女性”文字的白纸。她不会允许在伊特·卡姆巴对她需要中成形的本土/全球和个人/政治的矛盾成为一种不可能的象征,象征着没有矛盾和纯洁性,用来定义她——和她们——是什么人。或许解读埃梅切塔的小说应该表明,象恩科这样的女性用斗争避免在她们身体领域中被他人写上后殖民的话语,就

像多数的殖民话语一样。或许埃梅切塔正在表明,无论是在殖民者还是本土的民族主义者的口中,非洲女性不再是任何女性伟大形象的代表了——成了处女、妓女、母亲、姐妹或共同妻子。其他事情正在发生,因为它们的名称很少在任何海外英语移民的地区被提及。可能这种过程的一部分意味着,女人们在人、家庭和团体的塑造过程中的作用,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全球的,在女性及其功能的任何一个名称上都不会是固定的。

伊特·卡姆巴将他的困惑和恩科的故事结合写进了布拉沃小姐布置的作业中,并被她点名发言。在对一次教员和学生聚会的精彩描述中,私人、政治和学术的东西都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布拉沃小姐建议伊特·卡姆巴娶他所爱的女人。当文章发回时,这个年轻男人缺席了;他去找恩科了,因为她回村子去埋葬她的父亲。他们的结合留给大家一个悬念。

奥古涅米、克里斯蒂安和我对埃梅切塔的解读都植根于小说所出版的文字;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当代斗争的一部分,用以清楚地表达特定敏感的和集体有力的女性解放话语。包容和排斥都不是由固定的种族、性别、性征或国籍等范畴所预先决定的。“我们”可以解释包容和排斥、认同和分离,这些产生于高度政治化的、称作小说解读的行为中。我们对于谁是可解释的,这是解读本身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部分。所有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一个文本的误读、重读、部分阅读、强迫阅读和想象阅读,最初和最终这个文本绝不会是一个样的。就像这个世界起初就是支离破碎的一样,文本一直陷入纷争的实践和希望中。在当代的女性意识映射的本土/全球和个人/政治领域中,从我们非常特殊的、非单纯的立场来看,这些解读中每一种都是一种教育实践,通过命名承载力量的差异、特点以及联系而起作用,这种联系构建起有力的、改变世界的人工产物,称作“女性经历”。不同的是,一个人的错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第三部分

对不当的他者的差别政策

第七章 一部马克思主义辞典中的 “性别”：一个词的性政治

1983年,诺拉·拉策尔(Nora Rathzel)来自于西德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杂志《辩论》(*Das Argument*)的自治女性集体,写信要求我为一本新的马克思主义辞典写一个“关键词”的词条。《辩论》编辑组承担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将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 Labica and Benussen, 1985)翻译成德语,并且准备了一个单独的德语补充本,尤其要收进法语版本中没有涉及的新社会运动^①。这些运动产生了最近20年来批判性社会理论中的一次国际性变革。它们同

^① 这一项目是如此令人怯步,以至于“补充本”从翻译项目中分裂出来,在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哲学研究所的沃夫尔冈·F.豪格(Wolfgang F. Haug)的一般编辑工作下,以它自身的一个两卷的工作《马克思主义辞典》(*Marxistisches Wörterbuch*)开始起步。上百的编纂者来自于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从1985年编成的清单来看,一些女权主义者特别感兴趣的计划关键词包括:话语(Diskurs)、第三世界(Dritte Welt)、家庭(Familie)、女权主义(Feminismus)、女权主义理论(feministische Theologie)、妇女(Frauen)、妇女运动(Frauenbewegung)、性别(Geschlecht)、同性恋(Homosexualität)、文化的(Kulturarbeit)、控制论(Kybernetik)、卢森堡主义(Luxemburgismus)、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Marxismus-Feminismus)、自然(Natur)、生态学(Ökologie)、父权制(Patriarchat)、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us)、种族(Rasse)、种族主义(Rassismus)、表征(Repräsentation)、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系统(Sex/gender system)、性别主义(Sexismus)、性别极(Sexpol)、姐妹关系(Sisterhood)、技术理性(Technologische Rationalität)、女性美学(weibliche Ästhetik)和女性教育(weibliche Bildung)。这确实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日常词汇。但是明显地,它们的确属于一部20世纪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辞典。

样产生了——并已经部分产生于——同一时期的政治语言的革命。正如拉策尔所表达的，“我们，即女性编辑组，将要提议一些来收入的关键词，而且我们想要重写一些其他的词，因为女性没有出现在她们应该出现的地方”（私人交流，1983年12月2日）。这个温和的保守说法辨识了女性斗争的一个主要舞台——出版行为中语言、政治和历史叙述的规范化，包括标准的参考书。

“女性没有出现在她们应该出现的地方”。这个说法的模糊性是有力和吸引人的。这是一个参与参考文本生产的机会。我有多达5页的任务，即性别(sex/gender)。我鲁莽地写信接受了这个任务。

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可以使用糟糕的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个语言成就上的缺陷反映了我在社会世界中的政治地位，这个世界被美国的霸权项目和白人的无知所扭曲，这种无知是美国公民特别难辞其咎的。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区分sex与gender(性别)的用法。这种区分使许多社会舞台的斗争伤亡惨重，读者将会在后面的讨论中看到。德语中有一个单数词，Geschlecht，它事实上既不同于英语中的sex，也不同于gender。而且，这个辞典项目在将外国编撰者的词条翻译成德语的同时，建议为每个关键词给出德语、汉语（既要表意文字，也要拼音）、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对应词。在这个清单中，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混合历史似乎难以避免。每个关键词都传承了这些历史。

至少我知道英语中正发生在sex和gender上的事儿，与将要发生在género、genre和Geschlecht上的不同。在广阔的全球领域中，这些语言是现存政治的一部分，而妇女运动的特殊历史是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旧的霸权语法学家——包括性学家——已经失去了对性别及其激增的同类词的控制。欧洲和北美洲不能开始对性别的帝国化语言在20世纪中的命运进行规范化。然而，我对于在俄语或汉语中什么组成了性/性别的问题一无所知。对我来说逐渐清楚的是，在英语

中什么组成了性/性别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线索,甚至在美国,更不要说英语世界了。仅在美国就有那么多种类的英语,而且它们所有似乎都突然与这“五页”我许诺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德语辞典的文本有了密切联系,这本辞典脱离了它的法语祖先,目的是为了关注新的社会运动。我的英语带有种族、世代、性别(!)、宗教、阶级、教育和政治史的标志。这种英语怎么能成为我用以产生一般的性/性别的母体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甚至像词汇一样,而不是其他东西,与“一般的性/性别”一样?显然没有。对于辞典的编纂者来说,这些不是新问题,但是我觉得,“鸡”在政治上还是“鸡”。但是,印刷机源源不断地印出文稿,而交稿日也一天天接近了。是拔下羽毛开始写作的时候了。毕竟,在20世纪晚期,我们确实是体现写作技术的我们自己。这是在性和语言中,在生理学和句法学中,性别内爆的一部分,由西方技术科学赋予其能力。

1985年,当我得知这个编辑组真的想要一个关于性/性别系统的词条时,我还算是高兴的。这就帮上了忙;这个术语的首次使用有一个特定的文本位置——盖尔·鲁宾(Gayle Rubin)(1975)在她还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写的令人震惊的文章“贩卖妇女:对性政治经济的几点想法”(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写作由于鲁宾而爆发,我可以仅在这些写作中追踪“性/性别系统”的命运。这个想法提供的抚慰持续了非常短的时间。首先,编辑们指示,每个关键词必须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联的语料库中为自己定位,不管他们是否用了这些确切的词。我想,要是马克思看到这股旧势力仍然指挥着视频显示终端上闪动的光标,他会感到可笑。其次,那些采纳鲁宾表达式的人们这么做是出于很多不同的历史考虑,包括学术利益和政治利益。美国白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生产出最明显的写作体,目的是为了追踪从狭义上考虑的“性/性别系统”。这一事实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一

个解决方法。最近 20 年里最煽动人心的女权主义理论大多都坚持性和种族的联系,它们以这样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种更多地关注性别和阶级相互交织的话语中,将创建“性/性别系统”的种种困难作为问题^①。将种族、性/性别以及阶级解析地放在一起——尽管有着所有最佳意图、作者的呼声以及序言评论,对于女权主义理论来说,这似乎是非常少见的。除此之外,与辩护性/性别系统一样,女权主义者同样有理由为种族/性别系统辩护,而且两者不是属于同一种类的分析行为。那么,阶级又会怎么样呢?证据是建立一种对“差异”理论的需求,这种理论的几何结构、范式和逻辑摆脱了任何模式的二分法、辩证法以及自然/文化的束缚。否则,三元总是被简化为二元,而后再很快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前锋。而且,没有人学会数到 4。这些事情在政治上是重要的。

同样,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就此而言,盖尔·鲁宾——没有为了他们对性/性别或者女性问题的讨论冒险进入性科学、医学或生理学,我也知道我必须这么做。同时,关于性、性征和性别的现代女性写作的其他重要趋势不断与我的解释任务相交织,即使是最普通的解释。其中的大多数,或许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和文学的趋势,并不出现在我关于 *Geschlecht* 的词条中。总的来说,以下词条聚焦于美国女权主义者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并不是一个微

^① 一个奇特的语言学观点在这里出现:没有标记来区分(生理的)种族和(文化的)种族,就像没有标记来区分(生理的)性和(文化的)性别一样,即使自然/文化和生物学/社会的二分性遍布西方种族话语。这一语言状况强调了性别最近不规则地进入了政治词汇,与语法词汇相对。种族的不自然性——它总是而且完全是一个任意的文化构建——能够从语言标记的缺乏来进行强调。但是,轻易地,种族范畴完全崩溃为生物主义是在语言学上被引入的。所有这些事情继续取决于未经检验的生产主义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运作,这一逻辑是如此之多的西方话语的基础。在这一语言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基体中,事件和形式、行动和力量、原材料和获得的产品演完了它们生产和挪用的升级剧目。这里是主体和客体获得出生和无穷新生的地方。

不足道的丑闻^①。

所以,接下来的篇幅显示了6年多来连续重构中的一些奇怪的跳跃。一个百科式词条中的间隙和粗糙之处以及一般形式都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政治的和传统的标准化过程上。可能顺利通过是所有事情中最有启迪作用的;它们真的掩盖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领域。或许只有我需要接受具体的一课,即一个基于任何“关键词”的词条中的问题肯定会有多大。但是,我怀疑我的姐妹们和其他同志们也时不时地只相信他们在一本参考书中查到的东西,而不是记住这种写作方式只是栖息于各种可能世界的另一种过程——试探性地、有希望地、多种声音地并有限地。最后,这个关键词的词条超出了5页打满字的纸,而

① 欧美女权主义话语中的“性别”语言往往是欧洲写作中“性化的主体立场”和“性差异”的语言,尽管不是专有的。查询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中性化的主体”的内容,见 Kuhn and Wolpe(1978)、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选集(1978)、Brown and Adams(1979)、男性/女性杂志、Barrett(1980)。德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于性化的立场是强调女性自我构建中介的辩证法、已构建的社会决定以及部分的重构。这种文学检验了女性如何将自己构建到现存的结构当中,目的是为了找到可能的变化点。如果女性被理论化为将性和性别作为统治系统的被动受害者,那么没有一种解放理论会有可能出现。所以,关于性别问题的社会构建主义绝不可能成为一种封闭的决定论(Haug, 1980, 1982; Haug et al., 1983, 1987; Mouffe, 1983)。女性形式出版社的集体写作中的女性在寻找一种关于经验以及女性如何积极地体现自己的理论时,她们坚持一种描述性/理论的实践,来表现“我们自己生活在身体术语中的方式”(Haug et al., 1987, 第30页)。她们发展了一种称作“记忆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对自传和其他因果解释中自欺欺人的假设提出疑问,同时强调了对“一个陌生人”、一个过去的“记忆中的”自己的叙述被集体批评和写作出来。问题是要解释“性征本身”的出现,“作为在确定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女性的插入及其从属化的过程”(第33页)。讽刺的是,尽管女性被自我构成为性化的女人,她们却不能解释自身或社会(第27页)。这种努力是为了一种标准参考研究而写作,这种研究不可避免地将某些意义凌驾于其他意义之上作为标准,和这种写作努力所调查的所有性、性征和性别的理论一样,女性形式出版社的版本坚持把性别作为一个动名词或动词,而不是一个完成的名词、一个实用名词。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性别意味着在一个可争议的世界中创造和摧毁“身体”;对性别的一种解释是一种经验理论,作为指代的和意义的体现。

且这只鸡也被拔光了毛。写作体成了全文本的,而且撰写的工具不是羽毛,而是鼠标。这种新的写作工具将会为女分析家提供隐喻,正如性/性别系统完全转变为其他必然的、承载权力差异的世界一样。

关 键 词

Gender(英语)、Geschlecht(德语)、Genre(法语)、Género(西班牙语)

[英语词、法语词和西班牙语词的根源是来自于拉丁语动词 *generare*(意思为“产生”)以及拉丁语词干 *gener-*(意思为“种族或种类”)。“to gender”的一个过时的英语意思是“交配”(《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名词“Geschlecht”、“gender”、“genre”、“género”指的是类别、种类和阶级的概念。在英语中,至少从14世纪开始“gender”被不断地用在这种“属类”的意义上。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中,关于“gender”的词是指语法和文学的范畴。现代英语和德语词汇“gender”和“Geschlecht”,紧密地依附于性、性征、性差异、世代、性别化等概念,而法语词和西班牙语词似乎不是马上就有那些意义的。接近“gender”的词汇隐含亲属关系、种族、生理分类、语言和民族的概念。实用名词“Geschlecht”带有性、血统、种族和家庭的意义,而形容词形式“geschlechtlich”在英语翻译中的意义既有性的又有属类的。“gender”是差异系统进行构建和分类的核心。复杂的区分和合并“sex”和“gender”的术语是这些词汇的一部分政治史。贯穿20世纪,英语中有关“sex”的医学意义逐渐增加到“gender”上。医学、动物学、语法和文学意义在现代女权主义中都经历了争议。在身体的生产和记载及其相应的解放和对立的话语系统中,性别同时拥有的民族范畴和性范畴的含义,指向殖民压迫、种族压迫和性压迫

相互交织的现代史。在这些词汇自身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容纳种族压迫和性压迫的困难是并驾齐驱的。这个背景对于理解“性—性别系统”理论概念的共鸣至关重要,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英语女权主义者创建的^①。在女权主义性别理论的所有版本中,它们试图表达出在显著区分性和性别文化环境下女性压迫的特点。这种显著性依赖于一种相关的意义系统,聚集在由对立组构成的家族周围:自然/文化、自然/历史、自然/人类、资源/产物。这种关键的双向对立的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之间的依赖——无论是在功能上、辩证法上、结构上还是在精神分析上理解——都使一些主张出现了问题,即围绕性和性别概念是普遍适用的;这个问题是当前女权主义理论的欧美版本关于跨文化关联的一部分争论(Strathern, 1988)。一个分析性范畴的价值并不一定是被它的历史特征和文化局限的批判性意识所废除的。但是,性别的女权主义概念尖锐地提出了文化比较、语言翻译和政治团结的问题。]

历 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中问题区域的表达 在批判的、政治的意

^① 乔安·斯科特(Joan Scott)(1988,第28~50页)的写作深刻处理了性别作为历史学科中的一个理论范畴的发展。她指出,作用在语法性别差异上的暗指性或性格的比喻有着悠久的历史(第28页)。斯科特引用了《富勒现代英语用法辞典》(*Fowler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中的坚决主张,即使用性别来指男性或女性既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一个笑话,她把这一主张作为自己的警句。这一指令中充满了讽刺。性别的女性用法的语法继承的好处之一是,在那个领域里,“性别被理解为一种现象分类的方法,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区分系统,而不是一种遗传特征的客观描述”(第29页)。

义上,性别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权主义妇女运动的环境中被提出,并逐渐被争议和理论化起来。现代女权主义对性别的概念没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中找到,尽管他们的写作和其他实践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其他人的写作和实践为后来性别的政治化和理论化提供了关键的工具,也设置了障碍。尽管有着重要的差异,性别的所有现代女权主义意义起源于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主张,“没人生来就是女人”(de Beauvir, 1949; 1952, 第149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构建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使她们作为进程中的历史集合主体。性别是一个在斗争的多样舞台中发展起来的、挑战性别差异自然化的概念。围绕性别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寻求解释和改变性别差异的历史系统,“男性”和“女性”是根据这个系统,在等级和敌对的关系中社会地组成和定位的。既然性别的概念是如此紧密地关联于西方对自然和社会或自然和历史的区分,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标准和更广义的西方哲学中,通过性和性别的区分,女权主义性别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与自然概念和劳动概念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不会导致性别的一种政治概念,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女性,和“种族”的人们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写作中是不稳定地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边界上,以至于劳动力的自然性别分工的范畴削弱了他们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努力,原因是一种不可检验的自然异性性征;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经济财产关系理论化为女性在婚姻中受压迫的原因,以至于女性的从属地位可以根据阶级的资本主义关系来检验,而不是根据某种男女之间的性政治。这场争论发生的传统场所是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和国家》(*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一书。恩格斯将家庭作为各种阶级和国家之间的一种调节结构来进行优先分析,“包含了任何将性别划分作为一种敌对划分的个别考虑”

(Coward, 1983, 第 160 页)^①。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家庭形式的历史可变性和女性从属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仍不能从自然异性性征的基础上对性和性别进行历史化。

《德国的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第一部分,关于费尔巴哈的主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劳动力性别分工进行自然化的主要场所,表现在他们对性行为(异性性交)中劳动力前社会分工的假设,及其假定的家庭中男女繁殖活动的自然推论,以及相继无法在历史 and 全社会层面明确定位女性相对男性的关系中。在《1844 年的经济和哲学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一书中,马克思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Marx, 1964b, 第 134 页)。这种假设在《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中得到延续(Marx, 1964a, 第 351 页)。考虑到《德国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以及相应的研究——将家庭放置于历史中心,作为社会分工出现的位置,这种无法完全地历史化女性劳动的现象是矛盾的。最根本的困难是无法对性本身进行历史化;和自然一样,性在分析上起作用,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首要事件或原材料。依赖于马克思在人种学写作上的研究(1972),恩格斯的《起源》(*Origins*, 1884)一书系统化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关于家庭、财产形式、劳动力分工的组织和国家之间相联系的过渡。恩格斯简要地声称,对即时生命的生产和繁殖的一个全唯物主义分析揭示了两方面的特点:存在方式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1884; 1972, 第 71 页),他在这一声称中几乎为特定女性压迫的理论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一特点的探索成了许多欧美马克思主义—女权

^① 见 Coward(1983, 第五、六章),查询 1848 年到大约 1930 年间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家庭概念和女性问题的全面讨论。

主义者发展他们的劳动力性/性别分工理论的出发点。^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女性问题”在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党派中得到广泛争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环境下，两部最有影响力的、涉及女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另一部，奥古斯特·倍倍尔 (August Bebel) 的《社会主义下的女性》(*Women under Socialism*) 写作完成 (1883; 最初叫做《女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Wome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878)。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Alexandra Kollontai) 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女性解放斗争中用到了倍倍尔的书；而且在德国社会民主中，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袖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在她于 1889 年发表的“当前女工和女性的问题” (*The Question of Women Workers and Women at the Present Time*) 一文中发展了倍倍尔的立场^②。

当前是有问题的

性别身份的范式 性别在政治上由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西方女权主义者进行变革，这一故事必须通过性和性别在意义和技术上的构建，构建在正常化的、自由的、干涉主义—治疗法的、经验主义的和功能主义的生命科学中，主要是在美国，包括心理学、精神分析、医学、生理学和社会学。性别被牢牢地定位为一种个人主义的问题，在广义的

^① Rubin (1975), Young and Levidow (1981), Harding (1983, 1986), Hartsock (1983a, b), Hartmann (1981), O'Brien (1981), Chodorow (1978), Jaggar (1983).

^② 见《女性问题》(*The Woman Question*, 1951)、Marx & Aveling (1885~1886)、Kollontai (1977)。

“话语刺激”(Foucault, 1976)范围内,这种刺激是关于资产阶级的、男性主导的和种族主义的社会中的性征。“性别身份”的概念和技术是由某些成分加工而来:一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主义解读;19世纪伟大的性学家(Krafft-Ebing, Eavelock Ellis)及其追随者们对性肉体和心理病理学的聚焦;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正在进行的生化和生理内分泌学的发展;从对比心理学中发展出来的研究性差异的心理生理学;20世纪50年代激增的关于荷尔蒙、染色体和神经的性二态性的假设;以及1960年左右的第一批变性手术(Linden, 1981)。“第二波”女权主义政治围绕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构建论”的对立,以及性/性别差异的生理政治,出现在话语的领域内,这些领域由20世纪50~60年代定形的性别身份的范式所预先构建。性别身份的范式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没人生来就是女人”这一见解的一种功能主义的和提炼的版本。有意义的是,构建算作女人(或男人)的东西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时期成了资产阶级功能主义者和前女权主义存在主义者的问题,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男性主导的世界系统中,女性生命的生活社会基础正在经历基本变革。

1958年,性别身份研究项目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研究双性人和变性人的医学中心建立起来。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史多勒(Robert Stoller)的研究(1968, 1976)讨论并归纳了UCLA项目的发现。1963年,史多勒(1964)向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国际精神分析代表大会介绍了术语“性别身份”。他在生理/文化区分的框架中表述了性别身份的概念,如性是与生理(荷尔蒙、基因、神经系统、形态学)相关的,以及性别是与文化(心理学、社会学)相关的。生理文化研究的产物是核心的、获得的、性别化的人——一个男人或女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要来自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性别身份诊所(成立于1965年)的心理内分泌学家约翰·曼尼(John Money),与他的同事安科·艾尔哈特(Anke Ehrhardt)发展并普及了性别身份范式的互动版

本,其中以功能主义混合的生理和社会原因为无数“性/性别差异”研究和治疗项目提供了空间,包括手术、咨询、教育学、社会服务等等。曼尼和艾尔哈特(1972)的《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Man and Woman, Boy and Girl*)一书成了学院和大学广泛使用的教科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专业的统治精英剥夺了战前表现在生理上的种族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性别身份范式中的区分自然/文化的版本是广义的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由变革的一部分。这些变革没能在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中对充满诸如自然/文化以及相应的性/性别之类的二元范畴的政治社会史提出质疑。这种话语根据自然资源中的文化挪用将世界构建为一种知识对象。最近,许多对立的解放文学批评了这种统治的民族中心主义认识论和语言学的维度,这是用来统治那些栖息在“自然”范畴中或住在二元论调解边界上的人们(女性、有色人种、动物、非人类环境)(Harding, 1986, 第 163~196 页; Fee, 1986)。“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早期批评了自然/文化的二元逻辑,包括关于统治、挪用,或“人类”通过“劳动”调解“自然”的故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辩证版本。但是,这些努力在将批评完全扩展到衍生的性/性别区分的时候有所顾虑。在与普及的生理决定论斗争时,这个区分太有用了,在学校、出版社、诊所等范围内“性别差异”的紧迫政治斗争中,生理决定论总是被用来反对女权主义者。致命的是,在这种受限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早期的批评没有集中地对性别或自然的“被动”范畴进行历史化和文化上的相对化。所以,对一种必要身份的表达式,如女人或男人,在分析上被原封不动地遗留下来,而且它们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通过在政治上和认识论上努力将女性移出自然的范畴,并把她们放入文化作为历史中构建的和自我构建的社会主体,性别的概念被隔离不受性的影响。相应地,正在进行构建的可算作性或女性的东西变得很难理论化,除了“坏科学”以外,其中女性出现为自然的从属者。

“生理”倾向于表示身体本身,而不是一种对干涉开放的社会话语。所以,女权主义者反对“生理决定论”并支持“社会构建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身体(包括性别化和种族化了的身体)是如何在“生理”上出现为知识的对象和干涉的场所,他们的解构力量变弱了。然而,女权主义者有时肯定了自然的范畴和身体作为反抗历史统治的场所,但是这些肯定又模糊了“自然”或“女性身体”的范畴方面和过于武断的方面,作为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资源。相反地,自然似乎就在那里,是一块不受普遍文明褻渎的保留地。接着,“自然”或“女性身体”也不插上范畴决定的标杆,而是轻松地意味着现实的保留核心,区分于父权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歧视、历史、语言等社会强加物。对构建范畴“自然”的抑制可以并已经被女权主义者使用,来理论化女性中介和女性地位作为社会主体,同时又被用来反对女权主义者的这种努力。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89)表明,性别身份话语对于异性连贯的小说来说是本身固有的,而且女权主义者需要学会为一系列不连贯的性别产生叙述的合法性。性别身份话语对女权主义种族歧视来说也是本身固有的,这种歧视坚持男女之间连贯的不可简化性和敌对关系。这个任务是“取消”分析性范畴的资格以及一些会导致单义性的范畴,如性别或自然。这一行动会暴露一种组织起来的性别内核的错觉,并产生一个种族和性别差异的领域,向新的意义开放。许多女权主义者都反对过那些和巴特勒的建议一样的行动,唯恐女性失去一种中介的概念,因为在对核心身份及其组成故事的攻击下,主体的概念会逐渐消失。然而,巴特勒表明,中介在一个授权限制的领域中是一种被制定的实践。对于产生和肯定复杂的中介和责任的女权主义项目来说,一种连贯的内在自我概念,获得的(文化的)或天生的(生理的),是一种不必要的监管故事——事实上是禁止的。

一种相关的“监管故事”作为西方性别概念的基础,坚持母性是自

然的,而父性是文化的:母亲生孩子是自然的、生理上的。母性是一目了然的;父性是推理得出的。斯特拉森(Strathern)(1988,第311~339页)在分析美拉尼西亚人的性别概念和实践时,她竭尽全力去表现显而易见的西方主张“女人造就孩子”中的种族中心主义,也表现出所有预见的推论性质。她表现了女人造就孩子这一信念(及其组合,男人造就自己)的生产主义核心,这种信念对于西方性和性别的表述来说是本身固有的。斯特拉森提出哈根(Hagen)的男人和女人并不存在于永恒的国度里,作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或弗洛伊德(Freud)框架内的主体和客体。哈根人的中介是一种不同的动力和几何结构。对西方人来说,性别差异概念的重要结果是,一个人可能被另一个人转化为客体,并剥夺她或他作为主体的地位。对一个西方人来说,适合的状态是拥有自我所有权,拥有并持有一个核心身份,就好像它是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可能来自于经年累月的各种原材料,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文化生产,或者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性别身份就是这样一种财产。在自我中没有财产就不能成为一个主体,而且也不会有中介。中介追随哈根人的不同路径,他们是由“多种性别化的部分或多种性别化的人组成的,他们作为捐献者和接受者,在维持体内元素的流动过程中进行互动”(Douglas, 1989,第17页)。人与人之间的性统治能够并确实系统地出现,但是它却不能用同样的分析行动来追踪或处理,那些行动对于许多西方社会的意义场来说都是适合的(Strathern, 1988,第334~339页)。巴特勒不能——谨慎地——使用斯特拉森的人种学论点来解释分散性别连贯性的一种方法,而不失去中介的力量。

所以,对大多女权主义理论来说,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持续存在的性/性别区分的策略有用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将它与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范式捆绑在一起,尽管它屡次试图在一种完全政治化和历史化的性别概念中超越那些局限。这一失败一部分在于没有

对性和分析逻辑的历史认识论根源进行历史化和相对化,这些根源隐含在性/性别区分及其每个成员中。在这一层面,现代女权主义为经验主义的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化和斗争,其中它的局限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似,尽管有着令人敬佩的家庭历史化的项目,他们仍无法使自己脱离异性性征中劳动力的自然性别分工。

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学和心理文学中爆发了性/性别差异的话语(这表现在,例如,gender这个词作为关键词出现在《社会学摘要》[*Sociological Abstracts*]从1966年到1970年间的0条词条,到1981年到1985年间的724条和《心理学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s*]从1966年到1970年间的50条关键词摘要词条,到1981年到1985年间的1326条中索引的文章摘要中)。这一爆发是关于性和性别构建的政治和科学的一部分激烈论战,这一构建作为范畴和自然发生的历史现实,其中女性写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处于显著位置,主要是对“生理决定论”和性别主义科技的批评,尤其是生理学和医学方面。许多女权主义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在自然/文化和性/性别的认识论二元框架中被建立起来,他们挪用了性/性别区分和互动主义的范式,在欧美的许多辩论中为文化—性别高于生理—性辩护。这些辩论的范围是从男孩和女孩数学能力的基因差异、神经组织中性别差异的存在和意义、动物研究对人类行为的关联、科研组织中男性统治的原因、语言中性别主义的结构和使用模式、社会生理学辩论、关于性激素异常的意义意义的斗争,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相似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些辩论中,女权主义文学对性别范畴和性/性别二分法的怀疑在不断地增长。这种怀疑是欧美妇女运动中挑战种族歧视的部分结果,以至于该框架的某些

殖民的和种族的根源变得清晰起来^①。

性—性别系统 另一串关于性/性别的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经历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挪用,通过了拉康(Lacan)和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在一种有影响的表达式中由提出“性—性别系统”的盖尔·鲁宾(1975)来进行解读。她的文章出现在美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人类学的第一本选集中。鲁宾和那些得益于她的理论化的人们采用了一种自然/文化区分的版本,但是有很小一部分出自美国经验主义的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它更多地来自于法国的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鲁宾检验了“女性的教化”,其中女人是女性社会生产的原材料,通过人类文化制度中由男人控制的亲属关系的交换系统。她将性—性别系统定义为将生理性征转变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社会关系系统,其中作为结果的特定历史性欲望得到了满足。她接着要求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将性/性别作为人类活动产物,而这些产物在政治斗争中是可变化的。鲁宾把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和欲望的心理构建(尤其是恋母情结的形成)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系统的基础,这些基础授予男性对女性的权力,这是她们对自身所没有的。异性性征是强制性的,目的是为了在男性和女性都无法代替对方的地方实际地存活下来,并满足男人交换女人的性/性别系统中欲望的深层结构。因此,对于女性压迫来说,强制的异性性征是重要的。

如果性财产系统以这样一种方法重新组织:对于女性,男性没有高于一切的权利(如果没有女性交换),而且也没有性别的话,那么整个恋母情结的剧目将成为一种纪念。简言之,女权主

^① 体验用途和批评,见 Sayers(1982)、Hubbard et al. (1982)、Bleier(1984, 1986)、Fausto-Sterling(1985)、Kessler and McKenna(1978)、Thorne and Henley(1975)、West and Zimmermann(1987)、Morawski(1987)、Brighton 女性和科学集团(1980)、Lowe and Hubbard(1983)、Lewontin et al. (1984)。

义必须要求一场亲属关系中的革命。(Rubin, 1975, 第 199 页)

阿德里娜·里奇(Adrienne Rich)(1980)同样将强制的异性性征进行理论化,使之成为女性压迫的根源。里奇将“女同性恋连续体”认作是奠定一种新姐妹关系的有力隐喻。对于里奇来说,跨历史范围内的婚姻抵制是一种构成女同性恋连续体的定义实践。蒙妮克·维蒂(Monique Wittig)(1981)发展了一种独立的论点,同样突出了强制异性性征在女性压迫中的中心地位。一个表达式的作者们将它用来解释与法国女性解放运动(MLF, the Movement pour la Libération des Femmes)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分裂,其中他们联合维蒂表明,所有女性都属于一个阶级,由性差异的等级社会关系组成,它给予男性凌驾于女性的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女性问题》[*Questions féministes*]的编辑们,1980)^①。造就一个女人的东西是一

① 欧洲女权主义的几个分支(其中一些否认这个名字)在 1968 年 5 月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产生出来。来自于西蒙娜·德·波伏娃表达式的分支,尤其是(Monique Wittig, Monique Plaza, Colette Guillaumin)和克里斯汀·德尔菲,出版在法语版的《女性问题》、《女性问题的新闻》(*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和英语版的《女性问题》(*Feminist Issues*)上,而且该分支与“政治的精神分析”团体和/或朱丽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露茜·伊利格瑞、莎拉·考夫曼(Sarah Kofman)和爱莲·希克苏(Hélène Cixous)复杂地联合起来,她们在国际女权主义关于性差异问题的发展中是极具影响力的(查询介绍性总结,见 Marks and de Courtivron, 1980; Gallop, 1982; Moi, 1985; Duchén, 1986)。这些分支应该受到大规模的单独处理;但是在这个词条的环境下,必须标注出这些作家对“性别”理论的两大贡献,他们就在这些问题上深受自己人的反对。第一是维蒂和德尔菲(Delphy)对一种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的论点,她们坚持讨论的问题是“统治”而不是“差异”。第二是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和希克苏(Cixous)的各种方法(互文地定位在与德里达、拉康以及其他人的关系上),她们坚持或许接近主体的最佳方法是通过写作和文本性,而这种主体总是在进行当中,总是被干扰,而且对于女人的观点最终仍然是未结束的、多样的。尽管所有这些理论家在法语分支之间和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对立,他们都拥有着有缺陷的、矛盾的、关键的“女人”的去自然化项目。

个男人挪用的某种关系。与种族一样,性是一种同类的“想象”构成,它产生出现实,包括后来觉察的、先于所有构建的身体。“女人”仅作为这种想象的存在物而存在,而女性是社会挪用关系的产物,被自然化为性。一个女权主义者是为了使女性作为一个阶级而斗争的人,并为了这个阶级的消失而进行斗争。关键的斗争是为了摧毁异性性征的社会系统,因为“性”是被自然化的政治范畴,它将社会建构为不同性别的。所有基于“性”范畴(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必须被推翻。在这种观点下,女同性恋不是“女性”,因为她们处于异性性征的政治经济之外。女同性恋社会破坏了女性作为一个自然群体(Wittig, 1981)。

所以,脱离婚姻在三个不同的框架内被进行理论化,它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鲁宾、里奇和维蒂的政治视野来说是重要的。婚姻包含和繁殖了两个连贯的社会群体——男性和女性之间对抗的关系。在所有三个表达式中,自然/文化的二分法和生产主义的动力都促成了进一步的分析。使女性从婚姻经济中脱离出来是一种脱离男性的有力形象和政治,因此在交换和挪用女性产物(包括婴儿)的过程中,它也是女性在男性的文化制度之外自我构成为个人和历史主体的有力形象和政治。在西方意义中,作为主体意味着在物化关系(如礼物、商品、欲望对象)和挪用(婴儿、性、服务)关系之外重新构成女性。在物化、交换和挪用的过程中,定义范畴的男女关系是这一时期白人女性的女权主义理论主体中“性别”范畴的理论关键,它是进行理解的行动之一,这种理解针对的是种族/性别或种族/性的系统以及白人女权主义者在分析上难以掌握的跨种族“姐妹关系”的障碍。

然而,这些表达式在女权主义的中心对女同性恋主义的突出和合法化起到非常有力的效用。女同性恋的形象屡次成为女权主义辩论的争论中心和生成中心(King, 1986)。奥德丽·罗德(Audre Lorde)将黑人女同性恋放在她对“差异的房屋”的理解中心。

女性联合是不够的。我们是有差异的。女同性恋联合是不够的。我们是有差异的。黑人联合是不够的。我们是有差异的。黑人女性联合是不够的。我们是有差异的。黑人女同性恋联合是不够的。我们是有差异的……等,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正是差异的房屋,而不是对任何一种特定差异的保护,是需要一段时间的。(Lorde,1982,第 226 页)

这个差异的概念为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大部分美国多元文化的女权主义对性别的理论化提供了基础。

鲁宾的性—性别系统被用到了许多地方,也得到了不少批评。一篇文章处于大部分欧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辩论的中心,在这篇文章中,正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她的著作《女性:最长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1966)中及其扩展在《女性的财产》(*Women's Estate*, 1971)中的论点一样,哈特曼(Hartmann)(1981)坚持父权制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物质系统被定义为“男人之间有着物质基础的一组社会关系,尽管是等级化的,却建立或创建了男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团结一致,使其能统治女人”(Hartmann,1981,第 14 页)。在这种框架里,哈特曼试图解释父权制和资本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优先考虑性别歧视的男性主导的社会主义劳动力运动的失败。哈特曼使用了鲁宾的性—性别系统的概念,要求通过男性控制女性的劳动,来理解在父权制的社会关系中人类的生产模式。

在哈特曼的论文所引发的辩论中,艾瑞斯·杨(Iris Young)(1981)批评了对联合压迫阶级和性别的资本和父权制采取“双重系统”的方法。注意种族,包括对白人种族定位的疑问,如何在这些表达式中保持为一种未经探究的系统。杨表明,“父权制关系是与整个生产关系有内部联系的”(1981,第 49 页),以至于聚焦劳动力的性别分

工能揭示一种单一的压迫系统的动力。除了带薪劳动之外,劳动力的性别分工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排除的和未被历史化的劳动范畴,即生儿育女、照顾病人、做饭、家务和性工作,如卖淫,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性别和女性的特定情况带到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中心上来。在这种理论中,既然劳动力的性别分工也是劳动力的第一次分工,人们必须解释在劳动力性别分工的变化中阶级社会的出现。这样的分析并不是假设所有的女性都是一种相同统一的情况;但是它却使女性的历史性区别地位成为中心。如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一种单一的系統,称作资本主义父权制,那么反对阶级和性别压迫的斗争必须是统一的。这场斗争是男人和女人的义务,尽管自发的女性组织仍是一种实用的必需。这一理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现强有力的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方法,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分解单一系统中隐喻的“后现代”行动显得非常有威胁,这一行动支持统治、特权和差异交叉作用的复杂开放领域。杨在1981年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现特定情况下现代主义方法的力量,来提供政治方向。

在对一种女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结果进行探索时,南希·哈尔特索克(1983a,b)也关注了马克思主义未能历史化的一些范畴:(1)女性通过生儿育女在塑造人类中付出的感性劳动;(2)女性在养育和生存中付出的各种各样的劳动。但是,哈尔特索克否定了劳动力性别分工的术语是有利于劳动力性分工的,目的是强调女性活动的身体维度。哈尔特索克同样对鲁宾的性—性别系统的公式持批判态度,因为它为强调亲属关系的交换系统而牺牲了对劳动过程的一种唯物主义分析,这种分析为女性潜在构建革命的起点提供了基础。哈尔特索克依靠马克思人文主义的版本,这些版本被包含在人类自我形成的故事中,人类通过劳动在自然和人性的感性调和中形成自我。在表现女性生命是如何与男性系统的不同时,她的目的是为一种女性主义的唯物主义起点建立基础,这一起点可以成为一种被占用的地位和视

野,从此真正的统治关系会被揭开,这也是解放的现实所为之斗争的。在以权力为特色的男性世界的敌对系统中,她要求探索交流摘要和抽象的男性特征之间的关系。一些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起点理论中相互交织而又独立的版本做出了贡献,其中关于劳动力的性/性别分工的辩论是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积极中介和地位的理论化努力来说,该辩论的基础是在劳动这一范畴,或它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中对繁殖意义的延伸中问题的逐步增加^①。柯林斯(1989a)调整了起点理论,是为了从黑人女性对于自身压迫的自定义视角,对黑人女权主义观点的基础进行特征化。

桑德拉·哈尔丁(Sandra Harding)(1983)认为,女权主义理论的繁荣反映了性—性别系统中存在的矛盾的一种提升,以至于现在可以为基本变化而进行斗争。在将她对性—性别系统的方法延伸到《女权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1986)一书中时,哈尔丁强调了三个以不同方式相互关联的性别要素:(1)一个赋予一切事物意义的基础范畴,(2)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方法,和(3)一种个人身份的结构。分解这三个要素是部分开始理解以性别身份为基础的政治复杂性和有问题的价值。在使用性—性别系统来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性恋运动的性身份政治时,杰弗瑞·艾斯科菲尔(Jeffrey Escoffier)(1985)为一种需求辩护,需要对政治主观性的新形式的出现和局限进行理论化,目的是为了发展一种投入的并已定位的政治,不受形而上学的身份束缚。哈拉维(1985)的《赛博格的宣言》(*Manifesto for Cyborgs*)(见本书原著第149~181页)发展了相似的观点,目的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政治,用以应对女性在科技调和的多民族社会、文化和技术系统中的定位。

^① Smith(1974), Flax(1983), O'Brien(1981), Rose, H. (1983, 1986), Harding(1983).

在另一个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中,当该理论和性别语言受到批评时,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1982,第515页)争论说:

性征对于女权主义来说,就如同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样:也就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然而也是被剥夺得最多的东西……性征是那种创建、组织、表达和指导欲望的社会过程,创造出我们认作为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存在物,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社会……为造福他人对某些工作进行有组织的征用,这定义了一个阶级——工人——因此,为了他人使用而对某些性征进行有组织的征用,定义了这个性别,女人。

色情影片被定义为对女性的暴力和/或对女性公民权的违反,也就是通过她们构建为女性的过程而拒绝女性的公民地位,对于大部分美国反色情影片运动中政治行为的争议性方法来说,麦金农的地位是重要的。麦金农将女性的构建看做是另一方欲望对象的物质和思想构建。所以,女性不只是与她们的劳动产品隔绝;只要她们以“女人”,即性对象的身份存在,她们就不会成为潜在的历史主体。“对于女性来说,物化和异化之间没有区别,因为女性没有授权过这些物化,我们曾是这些物化的过程”(1982,第253~254页)。这一立场在认识论和政治上的后果是影响深远的,而且一直是极具争议性的。对于麦金农来说,女性生产是一种非常唯物的错觉,即“女人”生产的错觉。将这种错觉,即女性的存在现实打开,需要一种培养意识的政治,即麦金农的框架中女权主义政治的特定形式。“性征决定性别”,而且“女性的性征是它的用途,正如我们的女性特征是它的相异性”(第243页)。和拉康的女性主义中独立表达式一样,麦金农的立场在表征的理论化过程中是有成果的,其中“从某人的观点出发创造世界的力量是它男

性形式的力量”(第 249 页)。

特雷萨·德·劳丽蒂斯(1984,1985)在对暴力性别化的分析中赞成麦金农的理论,但却利用了不同的理论和政治资源,她的表征方法引导她将性别看做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中未经检验的悲剧性缺陷,它的错误是两性之间的合约。德·劳丽蒂斯将性别定义为“女人”和“男人”的社会构建以及主观性的符号生产;性别与“意义和经验的历史、实践和叠加”有关;也就是说,与“在社会现实的外部世界和主观性的内部世界的符指过程中相互构成的效果”有关(1984,第 158~186 页)。德·劳丽蒂斯利用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符号理论来发展一种“经验”的方法,那是现代女权主义中最有问题的概念之一,它把经验的详尽体现及其通过指代实践的调解考虑在内。经验绝不是非间接获得的。在电影院和其他区域的记载是,性别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差异,这一观点是关键的和启发潜能的,在对这些记载的理解和斗争上,她的努力是特别有帮助的。德·劳丽蒂斯将性别技术区别于福科对性技术的表达式,在这一过程中,她在性/性别系统中识别了一种特定的女权主义性别化的主体观点。她的表达式与罗德(Lorde)对差异房屋中的居民的理解不谋而合:“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体是跨越多样的话语、观点和意义而构建起来的,这些话语、观点和意义总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是天生的(历史性的)矛盾。”(de Lauretis,1987,第 9~10 页)

哈尔特索克(1983a)在提供一种与麦金农或德·劳丽蒂斯大相径庭的意识理论和意义生产时,她关于劳动力性别分工的探索利用了精神分析法的英语版本,这些版本在美国女权主义理论中尤为重要,特别是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wo)(1978)所发展的对象关系理论。乔多罗没有采用鲁宾总是残缺不全的性征主观性的拉康理论,在她对养育的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她采用了性—性别系统的概念,使女性比男性更有能力掌握非敌对的关系,但是也使女性的从属地位保持

永久不变,途径是通过她们的生产将她们构建为父权制中的母性角色。比起拉康的版本,更偏爱对象关系的精神分析;比起“性征主观性观点的获得”以及这一概念在欧洲大陆的文化/文本理论中的深入,更接近如“性别身份”的概念及其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意义网,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尽管乔多罗的女权主义对象关系理论被批评为一种女性相关性的本质化,它仍有很大的影响,被调整用于探索各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吉里根(Gilligan)(1982)利用并批评了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新康德理论,他同时支持女性更高的语境意识和对普遍化抽象概念的抵抗,例如在道德推理中。

伊芙林·凯勒(Evelyn Keller)发展了一种对象关系理论的版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精神和组织的系统男性统治进行理论化(Keller,1985)。凯勒突出了将女性等同于性别的逻辑错误。^①性别是一种社会关系、象征关系和精神关系的系统,其中男性和女性是有差别地被定位的。凯勒将性别的表达看做是一种认知经验,其中男性的精神个性化产生对非个性、物化和统治的投资,在这种过程中,她把其项目描述为一种对理解“科学—性别系统”(第8页)所做的努力。在强调社会构建并集中于该构建的精神动力方面时,凯勒把“不是女性本身,甚至不是女性和科学:它是对男性、女性和科学的创造,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创造男性和女性如何受到创造科学的影响”(第4页)作为她讨论的主题。她的目标是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项目来研究,而不是一种男性项目。她将她的问题表达为:“性之于性别的关系是否正如自然之于科学的关系?”(Keller,1987)

乔多罗的早期研究在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论文的环境下得到发展,这些文章理论化了女性从属地位中公众/私人分工的关

^① 同样地,将“种族”等同于有色人种也是错误的;白色人种也是一个种族构建,它是如此隐形的,是因为它(男性)占有了未标记的范畴(Frankenberg, 1988; Carby, 1987, 第18页; Haraway, 1989b, 第152、401~402页)。

键作用(Rosaldo and Lamphere, 1974)。在那些文章中,罗萨尔多(Rosaldo)表明当力量注入男性所处的空间时,女性局限于家庭领域的普遍显著性要求公开。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将这种方法与她的结构主义分析相联系,这种分析针对以下命题,女性之于自然正如男性之于文化。在策略性地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女人、文化和社会》(*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和《通往女性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Reiter, 1975)两本书之后,许多欧美的女权主义努力表达出女性的社会定位,这些努力深受那些早期文选中关于性和性别的普遍化和强有力的理论影响。在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中,对早期表达式的批评和结果是丰富的,导致了对性别象征主义的广泛跨文化研究,以及对普遍应用自然/文化组合的基本否决。普遍化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将分析工具错认为现实的例子,而在这些学科中,对这些解释的批评在不断地增多(MacCormack and Strathern, 1980; Rosaldo, 1980; Ortner and Whitehead, 1981; Rubin, 1984)。由于女性人类学偏离了它的早期形式,他们依然坚持,大多数女权主义话语处于人类学科的圈子之外,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立场永远是权威的女性人类学理论,而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历史学科时刻中的一个话语节点。

性—性别系统的普遍化力量以及公私之间的分析性分裂,作为欧洲和欧美女权主义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部分趋势也在政治上被尖锐抨击,尤其是被有色女性抨击。性别的范畴模糊或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他者”。用西方或“白人”的性别概念来特色化一个“第三世界的女人”,这种努力往往导致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的滋生(Mohanty, 1984; Amos et al., 1984)。而且,美国“有色女性”本身是一种复杂和有争议的性征身份的政治构建,它产生了关于生产等级差异系统的关键理论,在这些系统中,种族、民族、性别和阶级都交织在一起,时间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同时也是从20世纪60

年代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出现的妇女运动初期开始的^①。这些女性社会定位的理论奠定并组织了“一般的”女权主义理论,其中像“差异的房屋”(Lorde)、“对立意识”(Sandoval)、“女性主义”(Walker)、“从中心到边缘的往返”(Spivak)、“第三世界女权主义”(Moraga and Smith)、“左手”(Anzaldúa and Moraga)、“混血”(Anzaldúa)、“种族构建的父权制资本主义”(Bhavnani and Coulson, 1986)和“另类”(Trinh, 1986~1987, 1989)等概念构建起女权主义话语领域,因为它在“女权主义”的内外对算做是“女人”的东西进行解码。复杂关联的形象也出现在“白人”女性的女权主义写作中:“性—政治的阶级”(Sofoulis, 1987)、“赛博格”(Haraway, 1985 和本书原著第 149~181 页)、女权主义的女性主题(de Lauretis, 1987)。

20 世纪 80 年代初,“餐桌:有色女性”出版社在纽约建立,并开始出版有色人种女性激进分子的批判性理论写作和其他写作著作。这种发展必须在国际出版业的环境下许多女性的写作风格中见到,她们有意识地写作自身构建的故事,从而动摇西方女权主义的标准以及许多其他话语的标准。由于不一致而又批判性的“有色人种女性”的主题立场在多样化的出版实践中逐步得到了详细说明,“白人”或“西方人”的地位同样也被更容易地看做是一个可争论的场所,而不是一个给定的种族、民族或不可逃避的命运。所以,“白人”女性的称呼可以用来解释她们的积极定位。

鲁宾在 1975 年提出的关于性/性别系统的理论解释了两性(强制的异性性征)的互补性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那是他们在建立文化

^① 例如见 Ware(1970); Combahee River 选集(1979); Bethel and Smith(1979); Joseph and Lewis(1981); hooks(1981, 1984); Moraga and Anzaldúa(1981); Davis(1982); Hull et al.(1982); Lorde(1982, 1984); Aptheker(1982); Moraga(1983); Walker(1983); Smith(1983); Bulkin et al.(1984); Sandoval(未注明出版日期); Christian(1985); Giddings(1985); Anzaldúa(1987); Carby(1987); Spillers(1987); Collins(1989a, 1989b); Hurtado(1989)。

的过程中,通过亲属关系以女性交换为中心前提来实现的。但是,当女性在亲属关系制度中不以类似的方式被定位时,这种方法会怎么样呢?特别是,如果女性和男性的整个群体都被定位在亲属关系制度之外,但却与另一种亲属系统,即统治群体相关,那么性别的观点会怎么样呢?卡比(Carby)(1987)、斯皮勒(Spiller)(1987)和赫尔达多(Hurtado)(1989)通过探索历史和这些事件的后果审查了性别的概念。

卡比澄清了在新世界中,特别是在美国,黑人女性怎么没有像白人女性一样构成为“女人”。相反的,黑人女性是同时在种族和性问题上被构成——带标记的雌性(动物、性化的而且没有权利),而不是作为女人(人类、潜在的妻子、父亲姓氏的通道)——在一种特定的制度中,即奴隶制中,这使她们排除在“文化”之外,文化通过婚姻系统被定义为符号的流通。如果亲属关系将对女性的权力赋予男性,这是女性对自身所没有的,那么奴隶制废除亲属关系的原因是一个法律话语中的群体,它将所有群体的人们生产为可转让的财产(Spillers, 1987)。麦金农(1982, 1987)将女人定义为一种想象成真的形象,即另一方欲望的对象。在奴隶话语中,“想象”的成真形象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象,这种意义使它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异化劳动者的形象,或是女权主义中对欲望对象的“未修饰的”形象。美国白人父权制中的自由女性在一种压迫系统中被交换,但是白人女性继承了黑人女性和男性。正如赫尔达多(1989, 第 841 页)指出的,19 世纪杰出的白人女权主义者嫁给了白人男性,而黑人女权主义者被白人男性所拥有。在一个种族主义的父权制中,白人男性对纯种后代的“需求”将自由和不自由的女性定位在不相容的、不对称的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

女性奴隶被打上了这些差异的烙印,在一种最字面的时尚中——肉体被翻出外面,“为文化和社会中的女性叙述增加了一种词汇的维度”(Spillers, 1987, 第 67~68 页)。这些差异并没有随着正式解放而

终结；它们将确定的结果带入了 20 世纪晚期，而且将继续这么做直到作为新世界奠基制度的种族主义被终结。斯皮勒将这种囚禁和表面损毁的基础关系称为“一种美国语法”（第 68 页）。在对新世界的征服、奴隶制及其结果的条件下，“繁殖、欲望、命名、母性、父性等词汇都被投入了极度危险当中”（第 76 页）。“性别化，在与其同时代的美国黑人女性的照应中，在当前女权主义话语和那些调查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团体内部，暗指一种隐含的未解之谜”（第 78 页）。

斯皮勒 (Spillers) 突出这样的观点，自由的男性和女性从父亲处继承名字，父亲随之对妻儿拥有权力，这是他们对自身没有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在可转让财产的完全意义上拥有他们。不自由的男性和女性从母亲处继承状况，母亲随之在特定情况下不能控制她们的孩子。在列维-施特劳斯或拉康理论化的意义中，她们没有名字。做奴隶的母亲不能传播名字；她们不能成为妻子；她们处于婚姻交换系统之外。奴隶在名字系统中是未定位的、不固定的；他们在特定意义上是没有方位的，因此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在这些话语框架中，白人女性在法律上或象征意义上不是完整的人；奴隶在法律上或象征意义上完全不是人。“在这种主体立场的缺失上，俘获的性征提供了一种生理和生理学上对相异性的表达” (Spillers, 1987, 第 67 页)。(不自由地)生下财产继承人并不等同于(不自由地)生下财产。(Carby, 1987, 第 53 页)

这个小差异是造成美国有色人种女性的“生育权”突出取决于对孩子的全面控制的部分原因——例如，使她们免除通过处以私刑、关押、婴儿死亡、被迫怀孕、强制节育、住房短缺、种族主义教育或毒品上瘾等方式的破坏 (Hurtado, 1989, 第 853 页)。对于白人女性来说，与生育自由相关的对自身的财产概念、自己身体的拥有权更容易聚焦于围绕受孕、怀孕、打胎和生育事件的领域，因为白人父权制系统开启了对合法子女的控制，并且相应地将白人女性构成为女人。而生不生孩

子对女性来说事实上就成了一种主体定义的选择。在特定意义上,黑人女性——以及服从于新世界征服的普遍女性——面临一种更广泛的、不自由生育的社会领域,其中在美国社会的基础霸权话语中,她们的孩子不能继承人类的地位。在这种环境下,黑人母亲的问题不仅仅是她作为主体的自身地位,而且也是她的孩子们和男女性伙伴们的地位。难怪种族提升的形象和对男女范畴分割的拒绝——不逃避一种对有色人种和白人的性别压迫的分析——在新世界的黑人女权主义话语中显得尤为突出(Carby,1987,第6~7页;hooks,1981,1984)。

美国黑人女性的定位和其他有色女性不一样;每种压迫情况都需要特定的分析,该分析拒绝分裂种族、性别和阶级的非身份性,反而坚持它们。这些事件清楚地阐明了为什么在生产和繁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种适当的女权主义性别理论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种族差异的理论。它们同样阐明了为什么一种姐妹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不能建立在共享定位的基础之上,这些定位是存在于一个称为女性和男性的连贯范畴之间的性别差异和跨文化结构对立的系统中。最终,它们阐明了为什么由有色女性产生的女权主义理论构建了替代的女性话语,那些话语破坏了许多西方话语传统中的人文主义。

我们的任务是要为这种不同的社会主体提供空间。这么做,对于加入性别化的女性级别,我们作为女性社会主体更有兴趣获得起义的理由。事实上声明一个女人的怪异带有“命名”的潜力……毕竟“蓝宝石”(Sapphire)可能会重写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授予女性权力的文本。(Spillers,1987,第80页)

“差异”政治来自于这种任务以及其他社会主观性概念的复杂重构及其联系的写作实践,当它对任何统治主体位置的分裂做出基础贡献时,它与测量水平的相对主义是深刻相对立的。人类科学中的非女

权主义理论想要识别“连贯的”或威严的主观性的分裂,作为“主体的死亡”。与在不稳定的新从属立场中的其他人一样,许多女权主义者反抗这一项目的表达式,并质疑它恰好出现在种族化/性别化/殖民化的人们“第一次”开始发言的时刻,即他们声明一种起源的权威,在制度化的出版实践和其他种类的自我构成实践中代表他们自己。“主体”的女权主义者解构是基础性的,而且它们不是对统治连贯性的怀念。相反地,对构建体现的必要政治解释,和女权主义对性别化种族主观性的理论一样,必须肯定地和批判地将出现的、区别的、自我表征的、矛盾的社会客观性考虑在内,连同它们对行为、知识和信仰的要求。这一点涉及对转化的社会变革的承诺、内嵌在性别女权主义理论中的希望时刻以及其他出现的关于统治主观性的分裂和异类的出现的话语(Trinh,1986~1987,1989)。

在这个词条中刻画的女权主义者或其他人是字面(书面)上的“性别”范畴的多种学术根源和其他制度的根源,他们是种族一等级关系系统的一部分,由于有色人种女性的出身、语言和文体——简言之,即从霸权的和帝国化(“白人”)理论的“未标记”的立场来看的“边缘性”、“相异性”和“差异性”,这一系统模糊了她们的出版物。但是“相异性”和“差异性”正好是“性别”在“语法上”相关的东西,是将女权主义构成作为一种政治的一个事实,这种政治由它的竞争领域和对统治理论的屡次拒绝所定义。“性别”被发展为一种范畴,探索什么可算做是“女人”,对先前想当然的东西提出疑问。如果性别的女权主义理论追随了西蒙娜·德·波伏娃“没人天生是女人”的论点,连同该想法的所有后果,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法,用来理解任何最终连贯的主体都是一种幻想,而且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一直是危险地由社会重新构成的(Coward,1983,第265页),那么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书回应了19世纪伟大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索杰纳·特鲁(Sojourner Truth)的书《我是不是一个女人》(*Ain't I a Woman*,

1981),胡克斯的这本煽动性的书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女人”的身份既被要求也被解构了。对于中介、记忆和这些重构术语的斗争是女权主义性/性别政治的中心。

那么,拒绝成为或保持作为一个“性别化的”男人或女人是一种突出的政治坚持,坚持从过于真实的、想象的描述性和种族的噩梦中出现。最终讽刺的是,性别的“社会”范畴的政治和解释力量依靠对性、肉体、身体、生理学、种族和自然的历史化,通过这种二分的、普遍化的对立在女权主义理论中的特定时刻和场所引发性/性别系统的概念,这一对立内爆为表达的、区别的、可解释的、定位的和必然的具体化理论,其中自然不再被想象和制定为对于文化的资源或对于性别的性。这里是我对不同性质的、多种文化的、“西方的”(有色人种、白人、欧洲、美国、亚洲、非洲、太平洋)性别的女权主义理论相互交叉的一种空想主义的场所,这些理论在与矛盾的、敌对的、有成果的、遗传的对立二元论之间奇怪的同属关系中被孵化出来。男权中心主义是由统治主体生下的鸡蛋,统治主体就是孵出永恒的历史小鸡的母鸡。但是,与那个缺乏想象力的鸡蛋一起被放进窝里的还有凤凰的精子,它会代表一个颠倒世界中的所有发言。

第八章 赛博格的宣言：20 世纪晚期的 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①

[^①研究经费由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C)教师学术评议会研究基金提供。这篇论文有一个关于基因工程学的早期版本,题为“亲爱的赛博格作为女神:基因工程学的一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颠覆”(Lieber Kyborg als Göttin: für eine sozialistisch-feministische Unterwanderung der Gentechnologie),收录在贝恩德·彼得·兰格(Bernd-Peter Lange)和安娜·玛丽·斯塔比(Anna Marie Stuby)合编的论文集中(柏林:阿古曼特·桑德班德[Argument-Sonderband]出版社,105,第66~84页,1984年版)。赛博格的宣言从我的以下两篇论文发展起来,“新机器,新身体,新团体:赛博格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困境”(New machines, new bodies, new communities: political dilemma of a cyborg feminist)、“学者和女权主义者 X:技术的问题”(The Scholar and the Feminist X: The Question of Technology),1983年4月,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会议论文。

UCSC 意识史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对这篇论文有重大影响,以至于它读起来更像集体的作品,尽管那些我所引用的作者没有认清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女权主义理论、科学、政治以及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对赛博格的宣言做出了贡献。在此特别感谢,希拉里·克莱因(Hilary Klein)(1989)、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1985)、莉莎·劳(Lisa Lowe)(1986)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1985)。

论文的部分内容来自于我在一个集体发展的会议中的贡献,“诗歌工具和政治身体:高技术文化的女权主义方法”(Poetic Tools and Political Bodies: Feminist Approaches to High Technology Culture),1984年加利福尼亚美国研究协会,及其参与者的贡献:意识史研究生左·索芙莉丝(Zoe Sofoulis)的“木星的空间”(Jupiter Space);凯蒂·金的“女性科幻小说中反复的快乐和鉴别局限:赛博格后对身体的再想象”(The pleasures of repetition and the limits of identification in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reimaginings of the body after the cyborg);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的“女性影视作品中的主体性和反对意识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in feminist film and video)。桑多瓦尔(未注明出版日期)的对立意识理论发表在“女性对种族主义的回应:关于国家女性研究协会会议的报告”(Women respond to racism: A Report on the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一文中。查询索芙莉丝对核文化的符号心理解读,见 Sofia (1984)。金未出版的论文(“质疑传统:标准构成和戴上权力的面纱”[Questioning tradition: canon formation and the veiling of power]、“性别和风格:读乔安娜·露丝的科幻小说”[Gender and genre: reading the science fiction of Joanna Russ]和“瓦利[Varley]的泰坦和巫师:自然、文化和硬件的女性打油诗”[Varley's Titan and Wizard: feminist parodies of nature, culture, and hardware]),都深刻预示了赛博格的宣言。

芭芭拉·爱波斯坦、杰夫·艾斯科菲尔(Jeff Escoffier)、鲁斯坦·霍格聂斯(Rusten Hogness)和杰伊·米勒(Jaye Miller)都参与了广泛的讨论,并给予了编辑上的帮助。UCSC 硅谷研究项目(Silicon Valley Research Project,SVRP)的成员以及SVRP会议和讨论组的参

与者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里克·戈登(Rick Gordon)、琳达·金博尔(Linda Kimball)、南希·斯奈德(Nancy Snyder)、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朱迪斯·斯泰斯(Judith Stacey)、琳达·利姆(Linda Lim)、帕特里夏·费尔南德·凯利(Patricia Fernandez-kelly)和朱迪斯·格里高利(Judith Gregory)。最后,我想要感谢南希·哈尔特索克,感谢她多年的友谊和关于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科幻小说的讨论。我也要感谢伊丽莎白·博德(Elizabeth Bird),因为她开启了我最喜欢的政治按钮:“在地球生存的赛博格(Cyborgs for Earthly Survival)。”]

集成电路中女性共同语言的一个反讽之梦

本章致力于建立一个忠诚于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反讽式的政治神话。或许更多的是对神明的亵渎,而不是虔诚的崇拜和认同。亵渎神明似乎总是需要特别严肃地对待事物。我知道采用的最好立场是来自于美国政治的世俗宗教的福音教派传统内部,包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亵渎神明不但使人免受道德多数派内部的影响,同时又不会失去对社区的需要。亵渎神明并不是对神的背叛。讽刺是关于各种矛盾的这些矛盾不会逐渐变为更大的整体,甚至从辩证的角度看,讽刺是把不相容的事物放到一起而产生的紧张局面,因为这些事物都是必要而真实的。讽刺是关于幽默的,又是严肃的活动。它也是一种修辞策略和政治方法,是我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中更为崇尚的方法。我的讽刺信念即我对神明的亵渎,赛博格的形象就处于它的中心。

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社会现实是现有的社会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筑,是一部改变世界的小说。国际妇女运动已经构建了“女性经历”,并揭示或发现了这个重要的集合对象。这种经历是虚构的,却是最关键的政治事实。自由依赖于意识,即富有想象力的理解以及压迫和可能性的构建。赛博格是一件关于虚构和

过去经历的事情,它改变了20世纪晚期算作女性经历的东西。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是虚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边界是一种视觉上的假象。

当代科幻小说里充斥着赛博格——既是动物又是机器,生活于界线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艺界。现代医学里面也充满着赛博格,充满着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结合,每个都被看做是一种编码装置而亲密地聚在一起,并带着一种不是在性征历史中产生的力量。赛博格的“性别”还原了蕨类植物和无脊椎动物(这种美好的机体预防反对异性繁殖)可爱的巴洛克复制方式。赛博格的复制脱离了有机体的繁殖。现代生产似乎要把赛博格殖民化,这样的美梦给噩梦般的泰勒制管理增添了些许田园色彩。现代战争是一场由C³I编码的赛博格狂欢,是指令—控制—交流—情报,是1984年一个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40亿美元的项目。我要争论的是赛博格,作为一个勾画出社会现实和身体现实的虚构之物以及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资源,这种资源暗示了一些非常有成果的结合。迈克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生物政治学对赛博格政治做出了松散的预言,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

到20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种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怪物凯米拉(chimera),都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将我们的政治赋予我们。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在“西方”科学和政治的传统中——种族主义和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的传统;进步的传统;对大自然的挪用作为文化生产资源的传统;来自于他人反映的自我繁殖的传统——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场边界战争。这场边界战争中争夺的筹码就是生产、繁殖和想象的领地。本章争论了边界混乱的乐趣和边界构建的责任。这也是为促成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和理论所做的一种努力,通过后现代主义、非自然主义的模式和假设一个无

性别世界的空想主义传统,这个世界可能没有起源,也没有尽头。赛博格的化身在救赎的历史之外。它也不会“在俄狄浦恋母情结”的日历上等候时机,试图在一种口头上共生的空想主义或后伊底帕斯的世界末日中来弥补性别的可怕分裂。正如左索芙莉丝在她未出版的手稿《莱克莲恩》(*Lacklein*)中,讨论雅克·拉康、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以及核文化时表明,在赛博格的世界里最可怕或许也是最有前途的怪物带着一种不同的压抑逻辑,化身于非伊底帕斯的叙述中,这种逻辑是为了生存我们所必须理解的。

赛博格是后性别世界中的一种生物;它绝不考虑双性征、前伊底帕斯的共生现象、未被让渡的劳动以及对有机整体的其他诱惑,这些诱惑是通过把所有部件的力量最终挪用为一个更高级的统一体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赛博格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起源故事——“最终的”讽刺,因为对于“西方”统治不断升级的抽象个性化,赛博格也是可怕的世界末日目的论,是一个从所有依赖中最终解放出来的终极自我——一个太空中的人。在“西方”的起源故事中,人文主义的意义依赖于初始的团结、充实、狂喜和恐惧的神话,由所有人都必须脱离的阳具母亲、个人发展的任务和历史的任务、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中记载的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孪生神话所表现出来。希拉里·克莱因(Hilary Klein)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在关于劳动、个性化和性别形成的概念中都依赖于初始团结的情节,而差异必定从中产生,并列于对女性/自然的升级统治的剧目中。赛博格跳过了西方意义中初始团结和自然认同的步骤。这种不合法的承诺可能导致它的目的论被彻底颠覆,其程度不亚于星球大战。

赛博格坚决以偏心、讽刺、亲密和刚愎为己任。它是对立的、空想主义的、完全非单纯的。失去了公众和私人的两极架构,赛博格把技术上的政治群体部分地建立在栖息地,即家庭中一场社会关系革命的基础之上。自然和文化被重新加工;一方不再是为另一方所用的或合

并的资源。部分构成整体的各种关系,包括极性和等级统治的关系,在赛博格的世界中还在探讨。与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创造的怪物所期待的不同,赛博格并没有期待它的父亲通过修复花园来拯救它;也就是说,通过虚构一个异性伴侣,通过它在一个完成的整体,即城市和宇宙中的实现。赛博格没有梦想基于有机家庭模式而建的社区,这一次没有伊底帕斯的计划。赛博格不会认识伊甸园;它不是泥土捏成的,也不想死后化为尘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知道赛博格是否在那种命名敌人的狂躁强迫症中颠覆回归核尘土的启示。赛博格不是虔诚的;它们并不重新组成宇宙。它们对整体论态度谨慎,却需要联系——看起来它们对统一的前沿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却没有先锋政党。当然,赛博格的主要麻烦就是,它们是军国主义、家长制资本主义的私生子,更别说国家社会主义了。但是,私生子常常对其出身极其不忠。毕竟,它们的父亲是无足轻重的。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会回到对赛博格科学幻想的论述,但是现在我想标注三个关键边界的破裂,从而使以后对政治—虚构(政治—科学)的分析成为可能。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科学文化中,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被彻底破坏了。独特性的最后阵地已经被污染了,甚至变成了游乐场——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心理活动,什么都不能真正令人信服地区分人类和动物。而且,很多人不再觉得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实际上,女权主义文化的许多分支肯定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联系的乐趣。动物权运动并不是非理性地否定人类的独特性;这些运动清楚地认识到跨越这种遭贬抑的、违反自然和文化的联系。在过去的二百年里,生物学和进化论同时产生了现代有机体,作为知识的对象,并把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边界简化到重新蚀刻在意识形态斗争或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专业争论中的一个暗淡痕迹。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应该把传授现代基督创生论作为一种虐待儿童的形式而进行打击。

生理决定论的思想只是科学文化中争论人类动物性意义开启的一种立场。激进的政治人物还有很多空间来争辩逾越边界的各种含义。^① 神话中的赛博格恰恰就出现在人类和动物被逾越的边界上。赛博格远不是标记出一种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高墙,而是标记出一种不安而又快乐的紧密结合。兽交在婚姻交换的这一循环中有了新的地位。

第二个有漏洞的区分是动物—人类(有机体)与机器的。前控制论机器可能附着鬼怪;机器中总是闹鬼。二元论构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话,这一对话由一种辩证的成果来解决,即根据不同喜好称为精神或历史的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讲,机器不能自我移动和自我设计,它不是自主式的。它们不能实现人类的梦想,只能模仿它。它们不是人,不能改写自我,而只是一幅描绘那种男权主义繁殖梦想的讽刺画。把它们认作其他东西是妄想的。而现在我们并不是那么确定了。20世纪晚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蠢蠢欲动,而我们自己却迟钝得令人恐惧。

^① 对左翼和/或女权主义激进科学的运动和理论以及生物学/生物技术问题有用的参考书包括:Bleier(1984,1986)、Harding(1986)、Fausto Sterling(1985)、Gould(1981)、Hubbard et al. (1982)、Keller(1985)、Lewontin et al. (1984)、《激进科学杂志》(*Radical Science Journal*, 1987年改名为《科学作为文化》(*Science as Culture*, 26 Freegrove Road, London N7 9RQ)、《人民的科学》(*Science for the People*, 897 Main St, Cambridge, MA 02139)。

技术决定论只是一个由机器和有机体的重新构想所开启的思想空间,这些构想是我们读写世界的密码文本。^① 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事事“文本化”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

^① 对技术和政治的左翼和/或女权主义的方法的出发点包括: Cowan (1983)、Rothschild (1983)、Traweek (1988)、Young and Leviow (1981, 1985)、Weizenbaum (1976)、Winner (1977, 1986)、Zimmerman (1983)、Athanasiou (1987)、Cohn (1987a, 1987b)、Winograd and Flores (1986)、Edwards (1985)。《全球电子报》(*Global Electronics Newsletter*, 867 West Dana St, # 204, Mountain View, CA 94041);《被处理的世界》(*Processed World*, 55 Sutter St, San Francisco, CA 94941); ISIS, 妇女国际信息和交流服务 (PO Box 50 [Cornavin], 1211 Geneva 2, Switzerland and Via Santa Maria Dell'Anima 30, 00186 Rome, Italy)。对科学进行现代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没有延续全部始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自由神秘化,这些方法包括: Knorr-Cetina (1981)、Knorr-Cetina and Mulkay (1983)、Latour and Woolgar (1979)、Young (1979)。在 1984 年,科学、技术和组织的人种学研究网络的目录中列出了许多对改善激进分析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和项目;可联系以下地址获得: NESSTO, PO Box 11442, Stanford, CA 94305。

指责,因为它的空想主义忽视了奠定任意解读“作用”的现有统治关系。^① 后现代主义策略,和我的赛博格神话一样,颠覆了无数有机整体(例如诗歌、原始文化、生物有机体),这当然是真实的。简言之,对什么视为自然的确定性——一种对单纯性的洞察力和承诺的来源——在被削弱,很可能是毁灭性的。解释的超验授权不复存在,“西方”认识论背景下的本体论也随之荡然无存。但是,替代的并不是愤世嫉俗或背信弃义,即抽象存在的某个版本,就像技术决定论者通过“机器”来摧毁“人”,或通过“文本”来破坏“有意义的政治行动”。赛博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84)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和理论进行了煽动性的综合讨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选择、一种在其他人中的风格,而是一种文化主导,需要左翼政治从内部开始进行激进的改造;再没有任何地方从外面能让临界距离的安慰虚构变得有意义。詹姆逊也很清楚地表明,为什么人们既不能支持也不能反抗后现代主义这一主要的卫道士行为。我的立场是,女性主义者(和他者)需要不断的文化改造、后现代主义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赛博格会有机会一试。白人资本主义家长制的陈腐统治现在似乎是清白的:例如,他们把不一致性正常化为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先进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发出了不一致性,而且我们在没有主观性的情况下被击败了,主观性需要深度,即使深度是多么不友好和令人窒息。是时候写作《临床之死》(*The Death of Clinic*)了。临床的方法需要身体和作品;我们有文本和操作台。我们的统治不再是通过医学化和正常化才会起作用;它们通过网络建构、交流的再设计和压力的管理来起作用。正常化让位于自动化,这完全是多余的。迈克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临床的诞生》(*Birth of Clinic*, 1963)、《性征的历史》(*History of Sexuality*, 1976)和《纪律和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为一种力量命名,在它发生内爆的那一刻。生物政治的话语让位于技术行话,这是拼接实用名词的语言;跨国公司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名词。这些是它们的名字,列在一期《科学》(*Science*)杂志上: Tech-Knowledge、Genentech、Allergen、Hybritech、Compupro、Genen-cor、Syntex、Allelix、Agrigenetics Corp.、Syntro、Codon、Repligen、MicroAngelo from Scion Corp.、Percom Data、Inter Systems、Cyborg Corp.、Statcom Corp.、Intertec。如果我们被语言所囚禁,那么要从牢狱逃脱就需要语言诗人,一种切断密码的文化抑制酶;赛博格的宣言是一种激进的文化政治形式。查询赛博格诗歌,见 Perloff(1984)、Fraser(1984)。查询女权主义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的“赛博格”写作,见 HOW(ever), 871 Corbett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31。

格会成为“谁”是一个根本问题；答案生死攸关。连黑猩猩和人工产品都有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该有(de Waal, 1982; Winner, 1980)?

第三个区分是第二个区分的一个子集：对我们来说，身体和非身体之间的界线很不明确。关于量子理论的推论和不确定原则的通俗物理学书籍是一种与禾林言情小说(Harlequin romance)一样流行的科普读物，标志着美国白人异性性征的根本转变：他们错了，但主题是对的。现代机器是典型的微电子装置，它们无处不在却又是看不见的。现代机械是心怀不敬的新生之神，模仿父亲的无处不在和灵性。芯片是一种写入信息的表面；它以分子刻度来蚀刻，这些刻度仅被原子噪音，即对核刻痕的终极干涉所干扰。写作、力量和技术在西方文明起源的故事里是老搭档了，但是微型化改变了机械装置带给我们的体验。原来，微型化是关于力量的；小的与其说是美的，还不如说是特别危险的，比方说巡航导弹。对比一下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电视机或 70 年代的照相机和现在广告中的腕带式电视机或手掌大小的摄像机。我们最好的机器是阳光的产物；它们都是轻巧干净的，因为它们只是信号、电磁波、一段光谱，而且这些机器非常容易携带和移动——关于底特律和新加坡的人们承受巨大痛苦的一件事。再没有像这样人员流动性如此之大的地方了，人们既是客观实在的又是模糊的。赛博格是缥缈的、典型的。

赛博格的无所不在和不可见性正是为什么这些阳光带的机器如此致命。很难从政治上了解它们，就像从物质上解释它们一样。它们是关于意识的——或对意识的模拟。^① 它们是漂流的信号，乘着皮卡穿越欧洲，被流离失所而又如此反常的格林翰女人们的魔法织物所阻

^① Baudrillard(1983).

Jameson(1984, 第 66 页)指出柏拉图(Plato)对模拟物的定义是没有原版的抄袭，例如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纯交换的世界。见《话语》第 9 期(Discourse, 1987 年春/夏)查询一个关于技术(控制论、生态学和后现代想象)的特殊议题。

隔,她们如此了解赛博格的力量网络,以至于她们的阻隔比旧的男权主义政治的战斗力的更为有效,而该政治的自然拥护者需要防御工作。最后,最“难”的科学是关于边界最混乱的领域,即纯数字、纯精神、C³I、密码学和保守有力秘密的领域。新机器是如此的干净和轻巧。它们的工程师是太阳的崇拜者,调解一个与后工业社会之梦相关的新科学革命。这些清洁的机器所引起的疾病“只不过”是免疫系统中一个抗原的微小编码变化,“只不过”是紧张的体验而已。“东方”女性的灵巧手指、维多利亚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小女孩们对娃娃房子的迷恋、女性对细小事物的格外关注在这个世界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维度。也许,有一个叫艾莉克丝的赛博格会想到这些不同的维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常的赛博格女性在亚洲制作芯片、在桑塔丽塔监狱(Santa Rita Jail)旋转起舞,也许正是她们构建的团结会指引有效的对立策略。

所以,我的赛博格神话是有关边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险的可能性,革新主义者会探索这些可能,把它们作为必要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的假设之一是,大多数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在社会实践、象征表达式以及与“高科技”和科学文化相联系的人工产品中,见识了对心智和身体、动物和机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二元论。从《单维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Marcuse, 1964)到《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 Merchant, 1980),革新主义者所发展的分析资源坚持了对术语的必要统治,并使我们回忆起一个想象的有机体来整合我们的反抗。我的另一个假设是,人们团结起来抵制世界范围的集权统治,这一需要从来没有如此紧迫过。但是,对视角些许任性的改变会让我们有更好的能力为意义而战,也为技术所促进的社会其他形式的权力和快乐而战。

从一个角度看,一个赛博格的世界是最后强加在这个星球上的控制网,是体现在以防御为名而发动的星球大战启示中最终的抽象概

念,也是与最终把女性身体挪用到男权主义的战争狂欢中有关(Sofia, 1984);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赛博格的世界也许是现存的社会现实和身体现实,其中人们并不惧怕与动物和机器结合的亲属关系,也不怕永远只有半个身份和相互矛盾的观点。政治斗争要同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因为每个角度都揭露了从另一个有利位置上看不到的统治和可能。单视野与双视野或多头怪兽相比,会产生更严重的错觉。赛博格联合是怪异的、不合法的;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环境里,我们几乎不能期望得到关于反抗和再结合的更有力的神话。我喜欢把利佛莫行动组(the Livermore Action Group, LAG)想象为一种赛博格社会,它致力于真实地转化最能强烈体现并生产出技术启示性工具的实验室,并建立一种政治形式,确实设法使女巫、工程师、年长者、性变态者、基督徒、母亲和列宁主义者结合足够长的时间来解除国家武装。分裂不可能(Fission Impossible),这是我所在城镇中亲密关系组织的名字(亲密关系:不是由血缘决定,而是由选择决定的关系,是一个化学核集团对另一个化学核集团的吸引,即亲和力)①。

① 查询人种学解释和政治评估,见 Epstein(即将出版),Sturgeon(1986)。不带明确的讽刺意味,为宇宙飞船采用从太空拍摄的这个星球的地球/整个地球的徽标,衬托着“爱你的母亲”的标语,内华达的核武器测试机构在1987年5月母亲们和其他人的节日里的这一行动依然考虑了地球各个视角的可悲矛盾。演示者们向肖松尼族(Shoshone)的官员要求官方许可,让他们可以踏上这片土地,该种族的领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修建核武器试验基地时被侵占。演示者们由于非法侵入而被逮捕,他们争辩道,没有正式的官方授权,警察和武器机构的人员都是入侵者。一个女性行动的关联组织称自己是其他人的代理;而且他们支持这些被迫挖地道的生物和炸弹在同一地面上,上演了一个赛博格的出现,出现于一个无异性性征的沙漠巨虫的构建体。

断裂的身份

已经很难用一个形容词来命名一个人的女权主义——甚至在每一种语境下都坚持那个名词。通过命名来进行独占的意识是十分严重的。身份似乎是矛盾的、部分的和策略性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在社会和历史上的构造来之不易，它们并不能为“本质”团结中的信念提供基础。身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天生被束缚。甚至没有“身为”女性这样一个状态，它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范畴，建立在有争议的性别科学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是家长制、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可怕历史经历强加给我们的一种成果。在我的修辞中，谁可以算作“我们”？可以用何种身份来奠定这样一个被称作“我们”的有力政治神话？而且，这个集体出于何种动机吸纳新成员？女权主义者中（更不用说女性中）沿着每条可能的裂纹而生的痛苦碎片，使得女人这个概念晦涩难懂，这是一个借口来形成女性互相统治的矩阵。对我来说——以及对很多与我相似的人而言，都以白人、专业的中产阶级、女性、激进分子、北美人、中年人的身体形式来进行历史定位——政治身份中的危机来源数不胜数。通过无休止的分裂并对新的本质团结的搜寻，大多数美国左翼和美国女权主义的近代史是对这种危机的一种回应。但是，另一种回应也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这种回应是通过联合——亲密关系，而不是

同一性^①。

从称作有色女性的新政治声音形成的特定历史时刻出发,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未注明出版日期,1984)把一个很有希望的政治身份的模型进行理论化,这个政治身份称作“对立意识”,来自于解读权力网络的技巧,权力网络则由种族、性别、阶级这些社会范畴中拒绝成为固定成员的人们构成。“有色女性”,这个名称所包含的人群对它的起源颇有争议,它也是一种历史意识,标志着“西方”传统中所有关于人的标记的系统瓦解,它构建起一种来自于相异性、差别性和特性的后现代主义身份。无论关于其他可能的后现代主义有什么样的说法,这种后现代主义身份完全是政治性的。桑多瓦尔的对立意识是有关矛盾的位置和异时的历法,而不是有关相对主义和多元论。

桑多瓦尔强调,识别谁是有色女性缺少必要的标准。她指出,群体的定义已经被否定有意识地挪用了。例如,一个美籍墨西哥裔妇女或美国黑人妇女已经不能以一个女人或黑人或美籍墨西哥人的身份发言了。因此,她处于层层否定的身份的最底层,甚至被排除在声称要进行重大变革的“女性和黑人”这些作家特许的压迫范畴之外。“女性”这个范畴否定了所有的非白人妇女;“黑人”否定了所有的非黑人,也包括所有的黑人妇女。美国女性肯定了自己作为美国有色女性的历史身份,但是她们中也没有“她”,没有特殊性,却有着很多差异。这种身份标识了一个自己有意意识构建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会肯定基于自然识别的行为能力,而行为能力只能基于有意识的联合、亲密关系和

^① 政治联盟的强大发展在“第三世界”的发言人中出现,在宇宙中被替代的中心,地球这个不知名的地方上发言:“我们生活在靠近太阳第三位的行星上。”——《太阳的诗》(*Sun Poem*),作者是牙买加作家爱德华·卡姆·博列维特(Edward Kamau Braithwaite),由麦基(Mackey)(1984)评论。在构建我们所说的家这个地方的时候,《史密斯》(*Smith* 1983)一书中的作者们精确地颠覆了自然化的身份,颇有讽刺意味。尤见 Reagon(在 *Smith*, 1983, 第 356~368 页)、Trinh T. Minh-ha(1986~1987)。

政治亲属^①。和美国白人妇女运动某些分支的“女性”不一样,这里没有矩阵的自然化,或者至少这就是桑多瓦尔所说的只有通过对立意识的力量才可以得到的东西。

桑多瓦尔的论点不得被视为一个有力的女权主义者表达式,来自于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话语的发展,即瓦解了“西方”及其最高成果的话语的发展——这一成果既不是动物、野人,也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即一个被称为历史的宇宙的缔造者。随着东方学在政治和符号学中的解构,西方的身份,包括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不再稳定^②。桑多瓦尔表明,“有色女性”有机会建立一种有效的团结,并不复制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帝国化和整体化的革命主题,而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也没有面临去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杂乱无章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

凯蒂·金强调了识别的局限,并强调在“诗”,即文化女权主义的生产核心的阅读过程中建立政治/诗的识别手段。从女权主义实践中不同的“时刻”或“对话”出发,金批评了当代女权主义者中的顽固倾向来对妇女运动进行分类,使得自己的政治倾向作为整体的目的论。这些分类倾向于改写女权主义历史,以至于它看起来是一种长久以来持续连贯的类型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那些称作激进—自由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典型单位。确实,其他所有的女权主义要么被合

^① hooks(1981,1984);Hull et al.(1982).

班巴拉(Bambara)(1981)写了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其中有色女性的戏剧组“七姐妹”探讨了一种团结的形式。见 Butler-Evans(1987)的分析。

^② 关于女性作品和其他作品中的东方文化,见 Lowe(1986)、Said(1978)、Mohanty(1984)、《多个声音,一首赞美诗:黑人女性视角》(*Many Voices, One Chant: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s*,1984)。

并,要么被边缘化,往往通过建立一种明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①。女权主义的这些类别产生出各种认识论,来管制对正式女性经历的背离。当然,“女性文化”,和有色女性一样,是被各种机制诱导的亲密关系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诗歌、音乐和某些学术实践形式一直秉持着卓越的礼仪。在美国妇女运动中,种族政治和文化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金和桑多瓦尔的共同成就是学会如何创造一种诗歌/政治上的团结,而不依靠一种挪用、合并和分类识别的逻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通过统治建立团结或通过合并建立团结而进行的斗争,不但削弱了对父权制、殖民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其他各种不令人惋惜的主义的合理化,而且全都要求一种有机的或自然的观点。我认为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损害了他们/我们自身的认识论策略,这是在想象各种可能的团结的过程中有关键价值的一步。是否西方政治人士了解的所有“认识论”都不能完成我们下达的建立有效亲密关系的任务,这还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构建革命的立场和认识论的努力,作为人们致力改变世界的成果,已经成为展示识别局限性的一部分过程。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尖刻工具和关于革命主题的本体论话语的建设性工具可能被视作为了生存利益而消融西方自我过程中的讽刺性联盟。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有着一个历史构成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但是,随着我们的起源不再单纯,我们也就不会被驱逐出伊甸园。我们的政治不再放纵由单纯的天真而生的罪恶。但是,另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政治神话会是什么样的?何种政治会欣然接受个人自我和集体自

^① 凯蒂·金(1986,1987a)对在女性意识形态和论战中作为权力宗谱的女性分类学研究发展出一种理论敏感。金检验了杰格(Jaggar)(1983)的女权主义分类中有问题的案例,使一台小机器生产出期望的最终立场。在此,我的社会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的讽刺漫画也是一个例子。

我的部分的、矛盾的、永无止境的建设,而仍然保持忠诚有效,而且讽刺地保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性质?

我不知道其他哪个历史时期更需要面对有效统治“种族”、“性别”、“性征”和“阶级”的政治团结。我也不知道在其他哪个时候我们可能帮助建设的这种团结会有可能出现。“我们”中不再有人拥有象征的或物质的能力把现实的形状强加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至少“我们”不能声称自己是单纯的,没有参与这些统治的实践。白人女性,包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现了(即在痛苦挣扎中被迫认识到)“女人”这个范畴并不单纯。这种意识改变了所有以前的范畴的位置;它改变了它们的本质,就像热力让脆弱的蛋白质变质一样。赛博格女权主义者不得不争论,“我们”不再想要团结的自然基体了,而且没有一种构建是完整的。单纯以及对牺牲的推论坚持,作为洞察力的唯一理由,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破坏。但是,建构的革命主题也必须给20世纪晚期的人们以喘息的机会。在身份的破裂和构建身份的反思策略中,这种可能开始编织一些东西,而不是掩盖预言性地结束救赎史的世界末日之后的那一天。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同时都自然化了“女人”这一范畴和“女性”社会生命的意识,然后又改变了它们的本质。也许画一幅简略的讽刺画能突出这两种行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植根于一种揭示阶级结构的雇佣劳动分析之中。雇佣关系的结果是系统的异化,正如把工人从他的(碳化硅)产品中分离开来。知识被抽象和假象支配,实践被统治主宰。劳动是一个格外有特权的范畴,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克服假象并找到改变世界所必需的观点。劳动是塑造人的人性化活动;劳动是允许了解一个主体的本体论,所以也是允许了解征服和异化的。

在忠实的出身中,通过与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策略结合,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获得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

权主义者的主要成就都是扩大了劳动的范畴来适应(某些)女性的做法,甚至当雇佣关系从属于资本主义家长制下一种更全面的劳动观点时也是如此。特别要说的是,妇女的家庭劳动和作为母亲的一般女性活动(即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意义上的繁殖),进入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的权威理论。在这里,女性团结依赖于一种基于“劳动”本体结构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没有“自然化”团结;它是以植根于社会关系的一种可能立场为基础的一种可能的成就。本质化的行动是在劳动或其类比,即女性活动的本体结构中。^①马克思人文主义的遗产和它极其西方化的自我,对我来说是个难题。这些构想的贡献在于,它们强调了女性真正的日常责任是建立团结,而不是对它们进行自然化。

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1982,1987)的激进女权主义版本本身,就是对西方的身份奠基行为理论中挪用、合并和整体

^① 在许多认识论的方法中讨论繁殖、看护工作和母亲养育时,精神分析对象关系的不同版本和强烈的普遍化行动的中心作用突出了它们的作者对我所称的后现代主义的抵抗。对我而言,普遍化行动和精神分析的这些版本使得分析“集成电路中女性的位置”难度很大,而且导致了在解释甚至观察性别和性别化的社会生活构建的主要方面中的系统困难。女性观点的争论由以下这些作者发展: Flax(1983)、Harding(1986)、Harding and Hintikka(1983)、Hartsock(1983a, b)、O'Brien(1981)、Rose(1983)、Smith(1974, 1979)。查询对回应批评的女性唯物主义理论和女性观点理论的重新考虑,见 Harding(1986,第 163~196 页),Hartsock(1987) and H. Rose(1986)。

化倾向的一幅讽刺画^①。把最近女性政治中所有冠名为激进女权主义的多样化“时刻”或“对话”都同化为麦金农的版本,这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政治上讲都是错误的。但是,她的理论的目的论逻辑展示了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结合——包括它们的对立面——是如何擦除或监管差异的。麦金农理论中只有一种影响改写了激进女权主义这一多形态领域的历史。主要的影响是产生一种经验理论,一种女性身份的理论,这对所有的革命立场来说都是一种世界末日。也就是说,内置在这一激进女权主义故事中的整体化达成了它的目的——建立女性团结——通过实施根本非存在物的经历和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而言,意识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成就。麦金农的理论消除了人文主义革命主题中的一些难题,却以激进的简化论为代价。

麦金农表明,女权主义必须采取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策略,并不先考虑阶级结构,而是考虑性/性别结构及其生成关系,即男性在性方面对女性的构造和挪用。讽刺的是,麦金农的“本体论”构建了一个非主体,一个非存在。另一种欲望不是自我的劳动,而是“女人”的起源。从而,她发展了一种实施“女性”经历——任何为性侵犯命名的东西,事实上,就“女性”而言,即性本身——的意识理论。女性

^① 我在用“激进的”这个限定词“修饰”麦金农的多个观点时,犯了一个争议性的范畴错误,因此对明确使用那个标记的各种不同写作,产生了我自己的简化评价,通过我在分类学上有兴趣的关于写作的讨论,这种写作没有使用该限定词,不许有限制,因此在单一的意义使一种女权主义共同语言的各种梦想不断增加。我的范畴错误是由一个特殊的分类立场上的写作任务偶然引起的,这种分类立场,对于《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来说,本身就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德·劳丽蒂斯(1985,同见1986,第1~19页)是受益于麦金农的一个评论,不带简化论,却带有对福柯关于性暴力(强奸)的矛盾保守主义的一种简洁的女权主义解释。戈登(1988)是女权主义在理论上对家庭暴力的一次简洁的社会—历史检验,坚持女性的、男性的和孩子的复杂中介,而没有忽略男性统治、种族和阶级的物质结构。

实践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就是，对一种谁不是自己的自我认识。

不同寻常的是，这种女权主义中的性挪用仍然有着劳动的认识论地位；也就是说，一种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分析中的观点必须流动。但是，性/性别结构的结果是性的物化，而不是异化。在知识领域中，性物化的结果是假象和抽象。然而，一个女人不只是疏离她的产品，而从深层次讲，她的存在根本就不作为一种主体，甚至潜在主体，因为她把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归因于性的挪用。由另一方的欲望而构成，与在暴力分割劳动者及其产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疏离并不是同一回事。

麦金农对经验的根本理论是极其整体化的；与其说它边缘化了其他女性政治言行的权威，还不如说它消除了这种权威。它是一种整体化的，产生出西方家长制自身从未实现的东西——女性非存在的女权主义者的意识，而不是作为男性欲望的产物。我认为麦金农正确地指出，没有哪种马克思主义的身份版本能为女性团结打下牢固的根基，但是，在解决任何以女权主义为目的的西方革命主题的矛盾问题中，她发展了一个更为专制的经验教条。如果我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抱怨是，它们无意间消除了反殖民话语和实践中多音的、不可同化的、根本的可见差异，那么，麦金农有意通过女性非存在的“必要”手段来消除所有差异是令人不放心的。

和其他任何分类一样，我的分类法是对历史的再次记载，在这种分类中，激进女权主义可以包容所有被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命名的女性活动，作为不同的劳动形式，只要该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能被性征化。繁殖有两种趋势的不同意义论调，一个植根于劳动，一个植根于性别，它们都把统治的结果以及社会的和个人的现实称作“错误意识”。

除了任何一个作者论述中的困难或贡献以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都没有包含一个局部解释的地位；它们都

被有规律地构成整体。西方的解释已经做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西方的”作者如何才能合并他者呢？每个人都通过类比、简单列举或附加来扩展统治的基本范畴，以此试图增加统治的其他形式。白人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中，关于种族的尴尬沉默是一种主要的毁灭性政治结果。历史和多音性消失在试图建立谱系的政治分类学中。在理论中并没有种族（或对很多其他东西）的结构空间，能声称对女人这个范畴和女性这个社会群体的构建进行揭示，女性社会群体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或可以整合的整体。我的讽刺描述的结构如下：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阶级结构//雇佣劳动//异化劳动，通过类比繁殖，通过扩展性，通过附加种族

激进女权主义——性别结构//性挪用//物化

性，通过类比劳动，通过扩展繁殖，通过附加种族

在另一个环境里，法国理论家朱丽叶·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声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妇女作为一个历史群体出现，和青年这样的群体一起。她推断的日期是可疑的；但是，现在我们习惯于记住以下这一点：“种族”并不总是存在，“阶级”有一种历史起源，而“同性恋”是最近才出现的，并作为知识的对象和历史的角色。在这个星球上，人们之间的关系网变得空前多样、满溢和复杂，与此同时，男性家庭的象征系统——与女性的本质——分裂开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先进的资本主义”不足以传达这一历史时刻的结构。从“西方的”意义上讲，人类的终点变得岌岌可危。在我们的时代，女人分离出来进入女性中并不是偶然的。或许，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产生本质主义理论这一点上，并无实质的过错，这一理论压制了女性的特殊性和相互矛盾的利益。我想我们是有过错的，至少在不加反思地参与到白人人文主义的逻辑、语言和实践中的，在寻找一个单一的统治领域来保卫革命的声音中。现在，我们更

没有借口了。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失败时,我们就冒险陷入无尽的差异中,并冒险放弃创建局部的、真正的联系这一令人困惑的任务。有些差异不必当真;而有些是世界历史统治体系的支柱。“认识论”就是要认识差异。

统治信息学

在认识论和政治位置的这一尝试中,我想画一幅对可能的团结的素描——一幅受惠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设计原则的画。它的框架是由世界范围内与科技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中重排的范围和重要性所设定的。我支持一种政治,它所立足的主张是关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本质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处于一种世界秩序的新兴系统中,其创新性和范围可以和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相媲美;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运动,从有机的工业社会到多形态的信息系统——从完全工作到完全游戏,一个致命的游戏。这些二分的概念既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可以用下面的图表描述从自在的旧等级统治过渡到恐怖的新网络系统,也就是我所称的统治信息学:

表征	模拟
中产阶级小说,现实主义	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
有机体	生物组元
深度,整合	表层,边界
热力	噪音
生物学作为临床实践	理论生物学作为记载
生理学	通讯工程学
小群体	次系统
完善	优化
优生学	人口控制
衰落,《魔法山脉》(<i>Magic Mountain</i>)	退化,《未来的冲击》(<i>Future Shock</i>)
卫生	压力管理
微生物学,肺结核	免疫学,艾滋病
劳动力的有机分工	人类工程学/劳动力控制论
功能专业化	模块化结构
繁殖	复制
有机性角色的专业化	最佳基因策略
生理决定论	进化惯性,限制
社会生态学	生态系统
种族生存链	新帝国主义,联合国人文主义
家庭/工厂中的科学管理	全球工厂/电子村舍
家庭/市场/工厂	集成电路中的女性
家庭工资	可比价值
公共/私人	赛博格公民
自然/文化	差异领域
合作	交流强化
弗洛伊德	拉康
性	基因工程
劳动	机器人科学
心智	人工智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星球大战
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制	统治信息学

这张表暗示了几件有趣的事情。^① 首先,右侧的事物不能编码为“自然的”,这种理解也颠覆了左侧的自然主义编码。我们不可能在意识上或物质上回到过去。这并不只是“男神”之死也是“女神”之亡;或者二者都在承载微电子和生物技术政治的世界中复活。关于生物组元这样的事物,我们不能根据本质属性来思考,而必须根据设计、边界限制、流动速度、系统逻辑、降低限制的成本来思考。性繁殖是许多繁殖策略中的一种,它把成本和利润作为系统环境的一种功能。性繁殖的意识形态不再合理地呼吁性和性角色这样的观念,不再将它们作为有机体和家庭这些自然物体的有机方面。这样的推理将会被揭开,就像爱看《花花公子》(*Playboy*)的公司主管和反色情作品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会成为奇怪的同床人一样,他们将一起摘掉非理性主义的假面具。

同样的,对于种族来说,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意识形态不得不根据参数的频率来进行表述,比如血型或智力值。调用“原始的”、“文明的”这样的概念是“不合理的”。对于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来说,对完整社会体系的寻求让位于一种叫做“实验人种学”的新实践,其中一个有机物体消散在对写作活动的注意力中。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我们看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被转化为发达和不发达的语言,即现代化的速度和限制。任何人或物都能通过拆分和重组来进行合理的考虑;“自然的”建筑都不会限制系统设计。全世界所有城市的金融区以及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都宣布了这一“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能被科学认知的整个宇宙的物体必须被表述为通信工程(对管理者来说)或文本理论(对那些反抗者来说)中的问题。二者都属于赛博格符

^① 这张图表出版于1985年。之前我把生物学理解为一种控制论的命令—控制话语以及作为“知识的自然—技术对象”的有机体,见 Haraway(1979,1983,1984)。这个二分表的1979年版本出现在本书的第三章;查询1989年的版本,见第十章。它们的不同之处显示了争论中的一些改变。

号学。

人们应该期望把控制策略集中在边界条件和边界界面上,放在跨边界的流动速度上——而不是放在自然物体的完整性上。西方自我的“完整”和“真实”让位于决策程序和专家系统。例如,应用于女性生育能力的控制策略会在人口控制和个体决策者的目标成就最大化这两方面得到发展。控制策略会通过速度、限制的成本、自由程度被确切地表述。人类,像其他组件和子系统一样,必须在一个系统建筑中被本土化,该建筑的基本操作模式是概率的、统计的。没有物体、空间或身体本身就是神圣的;如果标准适当、编码适当,任何组件都能和其他组件连接,能被构建起来在一种共同的语言中处理信号。这个世界中的交换超越了普遍转化,这一转化是由马克思分析得极为透彻的资本市场所实现的。影响宇宙中各种组件的首要病因就是压力——交流的崩溃(Hogness, 1983)。赛博格没有屈服于福柯的生物政治学;赛博格模拟了政治这个更为强大的操作领域。

科学和文化知识对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历史性地出现,对它们的分析让我们注意到女权主义分析中的一些重要缺陷。女权主义分析一直进行下去,就好像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国家”中以有机的、等级的二元论排序的话语仍在充当主宰。它们已经被同类吃掉了,或者如左·索芙莉丝(Zoe Sofoulis)所说的,它们已经被“技术一消化”了。心智和身体、动物和人类、有机体和机器、公众和私人、自然和文化、男性和女性、原始和文明都在意识形态上存有疑问。女性的实际情况是,她们被整合/利用进入一个生产/繁殖以及被称作统治信息学的通讯世界体系。家、工作场所、市场、公共场所、身体本身——都可以用无限的、多种形态的方式进行分散和连接,给妇女和其他人带来重大后果——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后果本身也是不同的,这些后果使得对立的国际运动强大得超出想象,并且成为生存的关键。重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处理科学和技术的社

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关键包括神话系统和构筑我们想象的意义。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和重组,是后现代的集体自我和个人自我。这是女权主义者必须编码的自我。

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我们身体再造的决定性工具。这些工具体现并执行了世界范围女性的新社会关系。技术和科学话语可被部分地理解为对构成它们的流动互动关系的形式化,例如,就像凝固的时刻,但是它们也应该被视为执行意义的工具。工具和神话、工具和概念、社会关系的历史系统,以及对可能身体的历史解剖,包括知识对象的历史解剖,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事实上,神话和工具相互构成彼此。

此外,通讯科学和现代生物学由一种共同的行动所构建——把世界转化成一个编码的问题,即寻求一种共同语言,其中所有对工具控制的反抗都消失了,所有的异质性都会屈服于拆分、重组、投入和交换。

在通讯科学中,把世界转化成一个编码的问题可以通过考虑控制(反馈控制)的系统理论加以说明,这些理论应用于电话技术、计算机设计、武器部署或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在每种情况下,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依靠一种语言和控制的理论;关键的操作是决定一种量的流动速率、方向和概率,这种量被称为信息。世界按照边界可渗透信息的不同再被细分。信息只是那种可量化的元素(单位,团结的基础),允许普遍转化和相应不受阻碍的工具性力量(被称作有效交流)。这种力量的最大威胁是交流的中断。任何系统的崩溃都是压力的作用。这种技术的基本原则可被浓缩为 C³I 的隐喻,即指令—控制—交流—情报,这是它操作理论的军事符号。

在现代生物学中,把世界转化成一个编码的问题可以通过分子遗传学、生态学、社会生物进化论和免疫生物学加以说明。有机体被转化成基因编码和读出的问题。生物技术,一种写入技术,广义地影响

了研究。^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机体不再作为知识对象而存在,它让位于生物组元,例如,某些特殊种类的信息处理装置。生态学中的类似行动可以通过探索历史和利用生态系统的概念得到检验。免疫生物学和相关的医学实践为编码系统和认知系统的特权提供了丰富的范例,对我们来说,这些系统是作为知识的对象,作为身体现实的构建。在这里,生物学是一种密码学。研究必定是一种智力活动。一切充满了讽刺。一种被强调的系统出了差错;它的交流过程崩溃了;它不能意识到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拥有狒狒心脏的人类婴儿引起了全国的伦理困惑——支持动物权利的积极分子至少等同于人类纯洁性的卫道士。在美国,男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者都是一场免疫系统疾病的“首要”受害者,这一疾病标志着(铭刻在身体上)边界的混乱和道德的污染(Treichler,1987)。

但是,这种涉足通讯科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还很少;我声称,这些科学和技术向我们表明了世界结构的基本转变,一个平凡的大体经济现实为我的说法提供了依据。通讯技术依靠的是电子学。现代国家、跨国公司、军事力量、国家福利设施、卫星系统、政治进程、我们想象的组合、劳动控制系统、我们身体的医学构造、色情业、劳动力国际分工和宗教福音传道都密切依赖于电子学。微电子技术是拟像的技术基础;也就是无原始拷贝的技术基础。

微电子技术介入以下转变:劳动转化为机器人学和文字处理;性转化为基因工程和繁殖技术;心智转化为人工智能和决策过程。新的生物技术关注的不只是人类的繁殖。生物学作为一门重新设计物质和过程的强大工程科学,对工业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或许当前在发酵、

^① 查询关于生物技术争论的逐步分析和行动:《基因观察,可靠遗传学委员会公告》(*GeneWatch, a Bulletin of the Committee for Responsible Genetics*, 5 Doane St, 4th Floor, Boston, MA 02109);基因普查研究组(以前是人民科学的社会生物学研究组),Cambridge, MA; Wright(1982,1986);Yoxen(1983)。

农业、能源这些领域最为明显。通讯科学和生物学是对自然技术知识对象的建构,其中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区别变得完全模糊不清;思维、身体和工具之间关系密切。对日常生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跨国”材料组织,与对文化和想象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符号组织之间似乎也相互关联。维持边界的形象,如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共和私人,或物质和想象,似乎从未如此站不住脚。

我曾用瑞秋·格罗斯曼(Rachel Grossman)(1980)提及的集成电路中的女性形象来命名一个世界中女性的状况,这个世界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得以密切重构的^①。我用了“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个啰嗦的说法,表明我们不是在和一种技术决定论打交道,而是在处理一种依赖于人们之间所建立关系的历史体系。但是,这个说法也表明了科学和技术提供了新的力量源泉,而我们需要分析和政治行动的新源泉(Latour, 1984)。高技术促成的社会关系中种族、性和阶级的某些重组可以使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更有效地促进政治的发展。

“家庭”之外的“家庭工作经济”

“新工业革命”正在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新工人阶级,包括新的性征和种族特征。资本的极端流动性和新出现的劳动力国际分工,与新出现的集体和熟悉分组的减弱交织在一起。这些发展既不是性别中立的,也不是种族中立的。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白人男性近来变得容易长期失业,而女性失业的速度没有男性那么快。不能简单地说,

^① “集成电路中的女性”的初级参考文献: D’Onofrio-Flores and Pfafflin (1982)、Fernandez-Kelly (1983)、Fuentes and Ehrenreich (1983)、Grossman (1980)、Nash and Fernandez-Kelly (1983)、Ong (1987)、科学政策研究组 (1982)。

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在出口加工部门,特别是在电子行业,受到以科学为基础的跨国公司的青睐。这幅图画要更具系统性,涵盖再生产、性征、文化、消费和生产。在典型的硅谷里,许多女性的生命是围绕受聘于电子学的相关工作而构建起来的,而且她们的私密现实包括连续的单配偶(短暂的婚姻)、协商照顾孩子、与远亲或大多数其他形式的传统团体的疏远,以及她们老时孤独和经济极度脆弱的高度可能性。硅谷女性的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构建了一种文化、家庭、宗教、教育和语言中差异冲突的缩影。

理查德·戈登把这个新情况叫做“家庭工作经济”^①。尽管戈登涵盖了与电子装配线连带出现的字面意义上的家庭工作现象,但是他想用“家庭工作经济”来命名一种工作的重组,这种工作重组在广义上具有先前属于女性工作的特点,即字面上只能由女性完成的工作特点。无论由男性还是女性完成,工作在字面上都被重新定义为女性的和女性化的。女性化意味着变得极其脆弱;能够被拆分、重组、利用作为一种储备劳动力;不被看做工人,而被看做服务员;服从有薪工作的上下班时间安排,使争取有限工作日的努力成为徒劳;引导了一种生活方式,总是近乎淫秽、格格不入,而且总可以简化为性。最近,机械去技能化这个老方法被用到了以前享有特权的工人身上。然而,家庭工作经济指的不只是大规模的机械去技能化,它也没有否认新的高技术领域正在出现,甚至对先前被排除在熟练工雇佣之外的男性和女性来说也是如此。而这个概念表明的是,工厂、家庭和市场在一个新的范围内被整合起来,而且女性的地位是重要的——并需要在各种情况

^① 查询“家庭以外的家庭工作经济”和相关的论点:Gordon(1983);Gordon and Kimball(1985);Stacey(1987);Reskin and Hartmann(1986);《妇女和贫穷》(*Women and Poverty*)(1984);S. Rose(1986);Collins(1982);Burr(1982);Gregory and Nussbaum(1982);Piven and Coward(1982);微电子学小组(1980);Stallard et al.(1983),包含一份有用的组织和资源的名单。

下为了女性之间的差异和男女之间关系的意义而对女性地位进行分析。

新技术使得(并不直接导致)家庭工作经济作为一种世界的资本主义组织结构成为可能。攻击那些相对享有特权的、大多是白人的、有工会组织的男性工作取得了成功,这与新通讯技术的力量是联系在一起的,被用来整合和控制劳动力,尽管劳动力分布地广泛分散。女性能感受到的新技术带来的结果是,家庭(男性)收入的减少(如果他们曾经有过这种白人特权的话)以及女性自身工作的性质变化,其中资本变得越来越密集,比方说,从事办公室工作和护理工作。

新经济和技术的措施也与福利国家的衰落有关,与随之而来的女性需求的增强有关。这些需求是要维持自己、丈夫、孩子和老人的日常生活。贫穷的女性化——生成于逐渐衰落的福利国家,生成于少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工作经济,并且靠着这样一种期望来支撑:对抚养孩子来说,几个女人的工资比不上一个男人的收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焦点。各种家庭被女性主导的原因是种族、阶级或性别的作用;但它们越来越普遍的特点是,在很多问题上女性联合的基础。女性规律性地维持日常生活,作为她们强化的母亲地位的一部分作用,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与全面的资本主义经济和逐渐以战争为基础的经济的结合类型,才是新的东西。比方说,美国黑人妇女成功地从(几乎没)有薪的家庭服务中逃离,她们大量从事办公室文员以及类似的工作,她们的特定压力对有工作的黑人贫困继续加强有着重大影响。第三世界工业化地区的少女逐渐发现自己成为家庭现金收入的唯一或主要来源,而获取土地却越来越成问题。在精神动力学以及性别和种族的政治领域中,这些发展必定会带来重大后果。

在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阶段(商业/早期工业、垄断、跨国公司)的框架中——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跨国主义相关,也和詹姆逊的三个主导的美学时期相关,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

要讨论的是,特定的家庭形式与资本的各种形式及其政治和文化的伴随物是辩证相关的。尽管存在着问题和不平等性,这些家庭的理想形式可以简单扼要地表示为:(1)家长制核心家庭,由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二分法建构,伴随着各种单独领域的白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19世纪英美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2)现代家庭,由福利国家和诸如家庭工资之类的制度来调解(或强化),伴随着一种非女权主义者的异性征意识形态的繁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些意识形态在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表现的各种激进的版本;(3)家庭工作经济的“家庭”,伴随着女性为主导家庭的矛盾结构,突增女权主义以及性别本身自相矛盾的加强和腐蚀。在这个背景下,新技术导致的世界结构性失业的预测成为家庭工作经济图的一部分。由于机器人学和相关技术在“发达”国家中把男性从工作中替代出来,并加剧了未能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产生男性工作的失败,而随着办公自动化连在劳动力剩余的国家中也成为主导,工作的女性化加强了。美国黑人女性一直都很清楚面对黑人男性的结构性失业(“女性化”),以及她们自己在薪资经济中高度脆弱的地位会是什么样子的。性征、再生产、家庭、社会生活都以区别白人与黑人女性境况的多种方式,与这种经济结构相互交织,这不再是秘密了。还有很多的男人和女人要应付类似的情况,这使跨性别和种族的联盟在维持基本生命(有工作或没工作)的问题上成为一种必要,而不只是一种好方法。

新技术也对饥饿和维持世界的粮食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雷·莱瑟·布鲁姆伯格(Rae Lessor Blumberg)(1983)估计女性生产了大约

50%的维持世界生存的粮食。^① 不断增长的食品和能量作物的高科技商品化一般来说并没有让女性获利,她们的日子变得更艰苦,因为她们担负的提供食物的责任没有减少,而她们的生育境况变得更加复杂。绿色革命技术和其他高科技工业生产交互作用,改变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和有差别的性别迁移模式。

新技术似乎深刻涉及了罗斯·皮切斯基(Ros Petchesky)(1981)所分析的“私有化”的形式,其中军事化、右翼家庭意识形态和政策以及像私有财产一样的公司(和国家)财产的强化定义在一起相互作用^②。新的通讯技术成为每个人消除“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促使一种永久的高科技军事设施迅速增长,以大多数人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花费为代价,尤其是女性的。像视频游戏和高度微型化电视这样的技术,似乎在“私人生活”的现代模式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视频游戏的文化大多是定位于个人竞争和星际战争的。高科技的性别化想象在这里产生,想象可以接受星球的毁灭,并科幻地脱离它的影响。被军事化的不只是我们的想象;其他在电子和核方面的竞争现实也不可避免。这些就是保证终极流动性和完美交流的技术——并偶然地带动了旅游业这一流动和交流的完美实践,使之出现为世界上最大的

^① 绿色革命的社会关系与诸如植物基因工程的生物技术之间的结合使得第三世界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1984年世界粮食日上使用的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的估计(《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1984年10月14日)是,妇女在非洲生产大约50%农村粮食供给,在亚洲大约60%~80%,在近东地区和拉丁美洲提供农业劳动力的40%。布鲁姆伯格指责,世界组织的农业政治,以及第三世界跨国公司和国家政府的农业政治,一般会忽视劳动力性分工上的一些基本问题。现在非洲的饥荒惨剧可能也要归罪于男权至上,就像饥荒归因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雨水模式一样。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通常在结构上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同见 Blumberg(1981); Hacker(1984); Hacker and Bovit(1981); Busch and Lacy(1983); Wilfred(1982); Sachs(1983);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1985); Bird(1984)。

^② 同见 Enloe(1983a, b)。

单一产业。

新技术影响了性征和繁殖两者各自的社会关系,而且并不是总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性征和工具性之间、把身体看做一种私人满足的观点和看做一种效用最大化机器的观点之间的紧密结合,被细致地描述在社会生物学的起源故事中,这些故事强调一种基因计算,并解释了支配男女性别角色中不可避免的对立^①。这些社会生物学的故事依赖于一种高科技的视角,把身体视为一个生物组件或者控制论通讯系统。医学转化在许多对繁殖状况的转化中,在这一转化下,女性的身体有一些边界最近对于“可视化”和“介入”来说是可渗透的。当然,在医学解释学领域,谁控制着身体边界的解释是一个主要的女权主义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子宫镜成为女性要求拥有自己身体的标志;在赛博格繁殖实践中,这一手工的工具不足以在对现实的协商中表达我们所需的身体政治。自我帮助是不够的。可视化技术使人想起用照相机抓拍这一重要的文化实践和一种摄像意识的深层掠夺本质^②。性、性征和繁殖是高科技神话体系中的主要角色,构建起我们对个人和社会可能性的诸多想象。

新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对大量科技劳动力的期望以及文化、工作和繁殖的变革。一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危险是形成一个强大的二元社会结构,和所有族群的众多男男女女一起,特别是有色人种,他们被限制在家庭经济、各种各样的文盲以及普遍的裁员和无能力中,由从娱乐到监视和消失这样的高科技镇压机构所控制。合格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应该在特权职业的范畴中讨论

① 查询这个逻辑的女性版本,见 Hrdy(1981)。查询对科学女性的讲故事行为的分析,特别是有关围绕虐童和杀婴的进化论之争的社会生物学,见本书第五章。

② 查询对一个美国的城市移民公众而言,在建构对自然的通俗意义中从用枪打猎到用相机抓拍的转变时刻,见 Haraway(1984~1985,1989b)、Nash(1979)、Sontag(1977)、Preston(1984)。

女性,特别是在构建科学—技术的话语、过程和对象的科技生产中。^①

这个问题只是探讨一种女性科学的一个方面的可能性,却是非常重要的。从事科学事业的新群体在生产知识、想象和实践的过程中有何种构成作用呢?这些群体如何能够和进步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联合?哪种政治解释性能跨越分离我们的科学技术等级,把女性联合到一起?在和反军事科学设施的转变行动组联合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发展女权主义科学/技术政治的方法吗?很多硅谷的科学和技术工人,包括高科技的牛仔,都不想从事军事科学方面的工作。^②在女性(包括有色女性)队伍日益壮大的专业中产阶级中,这些个人喜好和文化倾向能结合为进步政治吗?

集成电路中的女性

让我概括一下先进工业社会里女性的历史地位这一情况,因为这些位置部分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来重建的。如果有可能通过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由以下形象表明:把工人阶级的生活分为工厂和家庭;把资产阶级的生活分为市场和家庭;把性别存在分为个人领域和政治领域——从意识形态上描绘女性的生命特征,那么现在它是一个完全误导的意识形态,即使用它来表明在实践和理论上这些二分法的两方面是如何相互构建的。我更喜欢一种意识形态的网络

① 查询指导对美国女性从事科学研究历史的政治/文化/种族含义的思考,见 Haas and Perucci (1984); Hacker (1981); Keller (1983); 国家科学基金会 (1988); Rossiter (1982); Schiebinger (1987); Haraway (1989b)。

② 见 Markoff and Siegel (1983)。为实现和平的高技术专业人员和为实现社会责任感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是有希望的组织。

化形象,表明空间和身份的丰富性以及个人身体和国家政体中边界的可渗透性。“网络构建”既是一种女权主义实践,又是一个跨国公司的策略——交织到一起是为了对立的赛博格。

所以,让我回到统治信息学的早期形象,追踪集成电路中女性“位置”的一个观点,主要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出发,只涉及几个理想化的社会位置:家庭、市场、有酬的工作场所、国家、学校、诊所—医院和教堂。这些理想化空间中的每一个在逻辑和实践上都在另一个地点被暗示,或许就像一张全息摄影的照片。我想表明的是社会关系的影响力,为了帮助制定所需的分析和实际工作,新技术调解并加强了这些社会关系。然而,在这些网络中没有女性的位置,只有对女性赛博格身份至关重要的差异和矛盾的几何结构。如果我们学会如何解读这些权力和社会生活的网络,我们可能就会了解新的组合、新的联盟。只从一种“识别”的角度,一种单一自我的角度,是无法解读以下清单的。这个问题是分散的。这个任务就是要在离散中生存。

家庭:女性主导的家庭、连续的单配偶(短暂的婚姻)、男人的离去、独居的老妇人、家务劳动的技术、有酬家庭工作、家庭血汗工厂的重新出现、基于家庭的商业和远程通讯、电子村落、城市的无家可归者、迁移、模块结构、强化(模拟)的核心家庭、严重的家庭暴力。

市场:女性持续的消费工作,新近目标是从新技术那里购买的大量新生产(特别是,被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中的竞争民族为了避免大量失业的危险,需要为明显更少需求的商品找到更大的新市场);二元模态的购买力,伴随着以大量富裕群体为目标的广告以及对以前的大众市场的忽略;与富足的高科技市场结构平行的、劳动力和商品的非正式市场越来越重要;通过电子资金转账的监督系统;市场经验的抽象化(商品化)加强,导致无效的空

想主义或同等愤世嫉俗的团体理论；市场/金融系统的极端流动性(抽象化)；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互相渗透；抽象和异化消费的性征化加强。

有酬的工作场所：劳动力的性和种族分工继续加强，但在特权职业范畴里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大量增加；新技术对办公室、服务业、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农业、电子业的女性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工人阶级的跨国重组；促进家庭经济发展的新时间安排的发展(弹性时间、业余时间、加班时间、没有时间)；家庭工作和在外工作；双层工资结构的压力增加；全世界范围内没有经验也没有进一步希望找到稳定工作，依赖现金的人数众多；大多数劳动力被“边缘化”或“女性化”。

国家：对福利国家的持续侵蚀；伴随增加的监督和控制而出现的分散化；依靠远程信息服务的公民身份；存在于信息富裕/信息贫瘠区别中广义的帝国主义和政治权力；高科技军事化的加强，越来越多地遭到众多社会群体的反对；公务员工作的缩减，作为办公室工作的资本密集化提高的结果，暗示有色女性的职业流动性；物质和精神的生活和文化日益私有化；私有化和军事化之间、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高技术形式之间的紧密结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互不可见性，与相信抽象敌人存在的心理机制相关。

学校：深化各种高科技的资本需求，与按种族、阶级和性别区分的各个层次的公共教育的结合；教育的改革和退款中涉及的管理阶级，牺牲为孩子和教师不断发展的教育民主结构；在技术统治和军事化的文化中为大众的无知和压制所进行的教育；反对派和激进派的政治运动中增长的反科学的神秘崇拜；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中在科学上持续的相对无知；以科学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尤其是依赖于电子和生物技术的公司)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

育)不断增长的工业导向;在一个逐步二元化的社会中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

诊所—医院:机器和身体的关系加强;对传达个人身体经验的公共隐喻的重新商讨,特别是和繁殖、免疫系统功能和“压力”现象有关的隐喻;繁殖政治的加强,回应了女性未被察觉地潜在控制她们对繁殖的关系这些世界历史含义;新的特定历史性疾病的出现;在高科技的产品和过程普及的环境里对健康的意义和手段所进行的斗争;健康工作的继续女性化;为健康而对国家责任感所进行的斗争加强;大众健康运动的持续心理作用,作为美国政治的一个主要形式。

教堂:电子“超级拯救者”的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庄重宣布电子资本和自动化物神的结合;在抵制军事化国家中教堂的重要性增强;在宗教中为争取女性意义和权威而进行的主要斗争;在政治斗争中与性别和健康交织的精神性持续相关。

对控制信息学进行概括的唯一方法要在最脆弱的人的生存网络的常见故障里寻求(这些故障大大增强了不安全感和文化贫瘠)。由于这种状况的大部分都与科技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所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投身于科学和技术的迫切性就不足为奇了。正在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政治工作的理由也很丰富。例如,为使女性得到有酬工作就发展各种形式的集体斗争所做的努力,如 SEIU 的 925 区^①,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该优先考虑的。这些努力深深地依赖于劳动过程的技术重构和工人阶级的改革。这些努力也让我们理解了一种更全面的劳动组织,涉及在大部分白人男性工会从未优先讨论过的社区、性

^① 服务业员工国际联合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在美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组织。——译者注

别和家庭问题。

与科技的社会关系相关的结构重组激发了强烈的矛盾心理。但是,没有必要为20世纪晚期女性在工作、文化、知识生产、性征、繁殖所有方面的关联而产生的影响感到极度沮丧。出于极好的理由,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看好统治,却不能理解什么只能被看做虚假意识,以及在资本主义晚期人们自身统治的共谋联系。关键是要记住失去的东西往往是多种恶意的压迫形式,或许特别是从女性视角来看,在面对当前的违反行为时这些压迫形式被怀旧地认作是自然的。由高科技介入的矛盾心理针对被扰乱的团结,它不需要把意识归类到“有远见的批评奠定一种牢固的政治认识论”对抗“被操纵的错误意识”这些范畴中,而是要敏锐地理解正在出现的快乐、经验和有着巨大潜力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

有理由在新兴的基础上对跨民族、性别、阶级团结的新种类抱有希望,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分析的基本单位历经多种转变。与科技的社会关系相关联,世界范围的苦难严重地加剧。但是,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并不显而易见,而且我们缺少用来共同建筑有效经验理论的足够微妙的联系。用当前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的、人类学的——甚至来阐明“我们的”经验都是不充分的。

我意识到我的历史地位——在前苏联的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对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政策的影响下,由一位爱尔兰的天主教女孩成为生物学博士——带给我的奇怪视角。我有一个由妇女运动建构的身体和心智,同样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备竞赛和冷战建构。有更多的理由希望关注于政治的相互矛盾的影响,而不是关注于当前的失败,这种政治是为了产生忠诚的美国技术专家而设计的,结果也产生了大量反对者。

女权主义观点中永久的偏袒性影响了我们对政治组织形式和参

与形式的期待。我们不需要一个整体来进行有效的工作。女权主义者梦想有一种共同语言,像所有对完全正确的语言的梦想一样,由完全真实的经历命名,它是一种整体化和帝国化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辩证法也是一种理想的语言,它渴望化解矛盾。讽刺的是,我们可以从与动物和机器的融合中得知如何不成为人,即西方标志的化身。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些有力的却又禁忌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乐趣,从这一视角来看,或许真的有一种女权主义科学。

赛博格:一个关于政治身份的神话

我想用一个关于身份和边界的神话来做总结,它们影响了20世纪晚期的政治想象(第一幅画)。这个故事归功于诸如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赛缪尔·R.德拉尼(Samuel R. Delany)、约翰·瓦尔里(John Varley)、小詹姆斯·提普垂(James Tiptree)、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蒙妮克·维蒂(Monique Wittig)和冯达·麦金泰尔(Vonda McIntyre)之类的作家^①。这些人是我们故事的讲述

^① 见 King(1984)。一个支持本文主题的女性科幻小说简表: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野种》(*Wild Seed*)、《我的思想之思想》(*Mind of My Mind*)、《血缘》(*Kindred*)、《幸存者》(*Survivor*);苏兹·麦基·查纳斯(Suzy McKee Charnas)的《慈母心》(*Motherliness*);赛缪尔·R.德拉尼(Samuel R. Delany)的内维扬系列(*the Neveryon series*);安妮·麦卡弗瑞(Anne McCaffrey)的《唱歌的船》(*The Ship Who Sang*)、《恐龙星球》(*Dinosaur Planet*);冯达·麦金泰尔的《超光速》(*Superluminal*)、《梦想之蛇》(*Dreamsnake*);乔安娜·露丝的《艾莉克丝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lyx*)、《女身男人》(*The Female Man*);小詹姆斯·提普垂的《古老灵长类的星星之歌》(*Star Songs of an Old Primate*)、《在世界的围墙上》(*Up the Walls of the World*);约翰·瓦尔里的《泰坦》(*Titan*)、《巫师》(*Wizard*)、《魔鬼》(*Demon*)。

者,探索高科技世界里具体化的含义。他们是赛博格的理论家。在探索身体边界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66,1970)在帮助我们意识到身体意象对世界观以至政治语言的基础作用上应该是有功劳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如露茜·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蒙妮克·维蒂,尽管存在着差异,但她们知道如何描述身体,如何从具体化的意象出发,尤其是维蒂,从身体切分和重构的意象出发,来编织色情描写、宇宙论和政治学^①。

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如苏珊·格瑞芬(Susan Griffin)、奥德利·罗德和阿德里娜·里奇,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想象——而且或许过多地限制了我们认为是友好的身体和政治语言的东西^②。他们坚持有机的东西,用它来反对技术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象征体系以及生态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异端的相关立场充斥着机体说,只能在桑多瓦尔的术语中才能被理解,作为适用于20世纪晚期的对立意识。他们仅会对那些未被机器和晚期资本主义意识迷住的人感到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赛博格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在明确地接受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清晰区分以及构建西方自我的类似区分的崩溃中本身固有的可能性时,女权主义者也会得到巨大的财富。正是两个崩溃发生的同时性破坏了统治的基体,并开启了几何的可能性。从个人和政治的“技术”污染中,可能会学到什么?我简要地观察了文本中两个重合的群体:女性科幻小说中有色女性和怪异自我的构建,寻找

① 法国女权主义对丰富的赛博格作品做出了贡献:Burke(1981);Irigaray(1977,1979);Marks and de Courtivron(1980);《标志》(*Signs*,1981年秋);Wittig(1973);Duchen(1986)。查询法语女权主义一些分支的英文翻译,见《女性问题:女权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期刊》(*Feminist Issu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1980)。

② 但是所有这些诗人都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对说谎的、色情的、去中心的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这些主题的处理。见Griffin(1978)、Lorde(1984)、Rich(1978)。

他们的洞察力,对于一个可能会有帮助的赛博格神话的构建。

早些时候,我就建议把“有色女性”理解为一种赛博格的身份,一种强大的主观性,来自于对外部身份融合的综合化,也存在于她的“生命神话”《赞米》(*Zami*, Lorde, 1982; King, 1987a, 1987b)的复杂政治历史分层中。物质和文化的网络能投射出这种可能,奥德丽·罗德(1984)在她的《姐姐奥赛德》(*Sister Outsider*)中抓住了这个论调。在我的政治神话中,姐姐奥赛德是一个离岸的外人,美国工人妇女和女性化的美国工人都应该把她看做是阻止她们团结、威胁她们安全的敌人。在岸上,在美国境内,姐姐奥德赛有可能存在于妇女的种族和民族身份中,在同一产业中出于区分、竞争、剥削的目的,这些妇女被人操纵。对基于科学的产业来说,“有色女性”是更好的劳动力,世界范围的性市场、劳动力市场和繁殖政治千变万化地进入日常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她们是真正的女性。受雇于性产业和电子组装线上的年轻韩国女子从高中生中招募而来,接受集成电路方面的教育。读写能力,特别是英语的读写能力,使得这些“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对跨国公司特别有吸引力。

与“原始口头”的东方刻板印象相反,读写能力是有色女性的特殊标志,是美国黑人女性和男性一起通过冒着死亡的危险教学读写的历史所获得的。书写对所有被殖民的群体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写作对西方神话中区分口述文化与书写文化、原始思想和文明思想至关重要,而且最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那种区分的侵蚀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侵蚀用以抨击西方的男性中心主义,连带它对一神论、阳物、权威和单一的研究以及独特而完美的名字的崇拜^①。对写作意义的争论是当代政治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释放写作的作用是极其严

^① 见 Derrida(1976,特别是第二部分);列维-施特劳斯(1961,特别是“写作课”[*The Writing Lesson*]一文);Gates(1985);Kahn & Neumaier(1985);Ong(1982);Kramarae & Treichler(1985)。

重的。美国有色女性的诗歌和故事反复提到写作,提到象征力量的获得;但是,这一次这种力量既不是阳物崇拜,也不是单纯的。赛博格的写作必定不是关于衰落的,即一个很久以前的整体性想象,在语言、书写和人类产生之前。赛博格写作是关于生存力量的,不是以原始单纯为基础,而是以掌握标记世界的工具为基础,而这一世界把他们标记为他者。

这些工具往往是故事,复述的故事,颠倒和替换自然身份等级二元论的版本。在复述起源故事的过程中,赛博格的作者们推翻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中心神话。我们一直都被那些起源神话殖民化了,包括它们在世界末日中对圆满的渴望。对女权主义赛博格最重要的男性中心主义起源故事被建构在文字技术中——书写世界、生物技术和微电子的技术——这些技术最近把我们的身体文本化为C³I网格中的编码问题。女权主义赛博格故事的任务是重新编码交流和智力来颠覆命令和控制。

从比喻和字面上说,语言政治遍布着有色女性的斗争;而且关于语言的故事在丰富的美国有色女性当代作品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例如,土著妇麦林奇(Malinche)是新世界梅斯蒂索人(mestizo)“杂种”的母亲,精通多门语言,柯蒂斯(Cortés)的情妇,她的故事复述对奇卡纳(Chicana)(墨西哥裔美国人)身份的建构有着特殊的意义。切丽·莫拉加(Cherrie Moraga)(1983)在《爱在战争年代》(*Loving in the War Years*)中,探索了身份的主题,当一个人从来没有掌握过原有语言,从来没有讲过起源故事,从来就不属于文化花园中合法异性性征的和谐,就不能把身份建立在一个神话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一个衰

落的基础上,这一衰落来自于单纯和继承自然(父母)名字的权利^①。莫拉加的写作,即她出色的文笔展现在她的诗歌中,就像麦林奇掌握了征服者的语言这一违反行为一样——一种违反行为,一种非法的生产,却使生存成为可能。莫拉加的语言不是“整体的”;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拼接,是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征服者语言的嵌合体。但是,正是这个嵌合的怪物,在违反之前没有要求拥有一种原有的语言,却加工出有色女性色情的、胜任的、有力的身份。姐姐奥赛德暗示了在世界生存的可能性,不是因为她的单纯,而是因为她有能力在边界上生存,有能力在没有初始完整性的基础神话下写作,这个神话伴随着它不可逃避的世界末日,即最终回归死一般的浑然一体,人类把这种浑然一体想象成单纯和全能的母亲,最终被她的儿子从另一个挪用旋涡中解救出来。写作标记了莫拉加的身体,确定它是一位有色妇女的身体,反对把它归入盎格鲁父亲的无标记范畴,或者一位母亲“初始文盲”的东方神话,而她从来就不是文盲。麦林奇在这里是母亲,而不是吃禁果之前的夏娃。写作肯定了姐姐奥赛德,不是男性中心主义家庭需要的开始书写之前的女人。

写作特别是赛博格的技术,被蚀刻在 20 世纪晚期的表面上。赛博格政治为了语言而斗争,反对完美的交流,反对一种能完美转化所有意义的法规,即男性中心主义的重要教条。那就是为什么赛博格政治坚持噪音,宣传污染,为动物和机器的非法融合而感到欣喜。这些是让男人和女人变得如此有问题的结合,颠覆了欲望结构,即为生成

^① 有色人种女性对于作为主题和政治的写作的明确关系可以通过以下作品来处理:1985年10月,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次国际文学大会上“黑人妇女和移民现象:隐藏的关联和延长的致谢词”的计划;Evans(1984);Christian(1985);Carby(1987);Fisher(1980);《前沿》(*Frontiers*, 1980, 1983);Kingston(1977);Lerner(1973);Giddings(1985);Moraga and Anzaldúa(1981);Morgan(1984)。欧洲和欧美的英语女性也加工了对她们写作的特殊关系,作为一种有力的标志:Gilbert and Gubar(1979),Russ(1983)。

语言和性别而想象的力量,因此颠覆了“西方”身份、自然和文化、镜子和眼睛、奴隶和主人、身体和心智的再生产的结构和模式。“我们”起初并不选择成为赛博格,然而选择奠定了一种自由的政治和认识论,在更广泛的“文本”复制之前对个人的繁殖进行想象。

从赛博格的视角来看,我们能看到强大的可能,不需要把政治植根于“我们”优先的压迫地位中,这种地位包含了所有其他的统治,仅算作侵犯的单纯性以及那些更接近自然的基础。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认识论的必要性上搁浅,这些必要性要从一个压迫等级的角度和/或一个道德优势、单纯和更接近自然的潜在立场,来构建一个革命主题。把“自己”认作完全蕴涵于世界之中,这一认识没有一种共同语言的初始梦想,也没有初始的共生关系承诺保护不受敌对“男性”分离的影响,而是被写入一个最终没有特权解读或救赎史的文本作用中,使我们从把政治根植于身份证明、先锋政党、纯洁性和母性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剥去身份的外衣,杂种种族传授着边缘力量和像麦林奇这样一位母亲的重要性。有色女性已经把她从一个惧怕男权、道德败坏的母亲转变成为一个教授生存之道、原本就会读写的母亲。

这不仅仅是文学的解构,而是阈限的转化。每一个以初始单纯为开头并有特权回归整体性的故事,都把人生的剧目想象为个性化、分离、自我的诞生、自治的悲剧、开始写作、异化;也就是,由想象他人内心的暂缓而得到缓和的战争。这些情节被一种繁殖政治所操纵——无缺陷、完美、抽象的再生。在这个情节中,对女性的想象是境况要么更好,要么更坏,却都一致同意她们更加缺少自我和个性,更多结合口述和母亲,在男性自治中风险更小。但是,在男性自治中还有另一条风险更小的途径,不是通过女人、原始人、零点、镜像阶段及其想象这个途径,而是通过女性和当前其他非法的赛博格,他们不是女人所生的,为了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他们拒绝接受使他人受害的意识形态资源。这些赛博格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拒绝就在这个时候消失,无论一

个“西方”评论员多少次评论了被“西方”技术、写作所杀的另一个原始、有机群体的不幸灭亡^①。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赛博格(例如,爱华·王[Aihwa Ong]描写的在日本和美国电子公司工作的东南亚农村女工)都在积极地改写关于她们身体和社会的文本。生存是这一解读游戏中的赌注。

概括起来,某些二元论一直在西方传统中延续;对于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来说——简言之,对统治所有构成为他者的、任务是反映自我的人来说——它们都是系统化的。这些令人烦恼的二元论中重要的是: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表象、整体/部分、代理/资源、创造者/被造者、主动/被动、正确/错误、真相/假象、整体/局部、上帝/人类。自我不是被统治的一方,通过他者服务而知道这一点,而他者掌握未来的一方,通过统治经验而知道这一点,这证明了自我的自治是不真实的。要成为那个人是成为自治的人,成为强大的人,成为上帝;但是,成为那个人是一种假象,因而是和他者一起涉及在一种世界末日的辩证法中。然而,成为他者是变得多样的、无明显边界的、磨损的、非实质的。一个太少,而两个又太多。

高科技文化以各种有趣的方式挑战这些二元论。在人类和机器的关系中,分不清谁是制造者和谁是被制造的。在分解为编码实践的机器中,也分不清什么是心智、什么是身体。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无论在正式话语中(例如,生物学),还是在日常实践中(例如,集成电路

^① 通过宣传军事化的高科技应用在残疾人/不同行为能力的人的言语和运动问题上,在意识形态上制服军事化的高科技这一传统显示了一种特殊的讽刺,当电脑生成的语言能使一个不能讲话的男孩在他的受戒仪式上吟诵哈夫塔拉时,这种讽刺就体现在一神论的、家长制的和频繁地反犹太主义的文化中。见 Sussman(1986)。军事高科技使得总是与环境相关的“能力”的社会定义特别清晰,通过这一点,它有一种在定义上使人类残疾的方法,是大多数自动化的战场以及星球大战的研发中一个不近情理的方面。见 Welford(1986年7月1日)。

中的家庭经济),我们都发现自己变成了赛博格、混血儿、镶嵌画、怪物凯米拉。生物有机体已经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生物系统和通讯装置。在我们关于机器和有机体、技术和有机的正式知识中,没有根本的本体论区分。在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导演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复制人瑞奇(Richel)代表了赛博格文化中恐惧、爱和困惑的形象。

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工具的关联意识加强了。很多电脑使用者体验过的恍惚状态变成了科幻电影和文化戏谑的主要内容。或许截瘫病人和其他重度残疾的人们(有时)能够对和其他交流装置的复杂混合有最强烈的体会^①。安妮·麦卡弗瑞的前女权主义作品《唱歌的船》(*The Ship Who Sang*, 1969)探索了一个由女孩大脑和复杂机械结合而成的赛博格的意识,形成于一个严重残疾的孩子出生后。性别、性征、化身、技能——所有这一切在这个故事里被重新构造。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应该止于皮肤,或者至多包括由皮肤包裹的其他存在物?从17世纪至今,机器被赋予了生命——被赋予了幽灵般的灵魂,使他们能说会动,或用以解释他们有条不紊的发展和心理能力。或者说有机体能够被机械化——简化到被理解成心智之源的身体。这些机器/有机体的关系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对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实践中,机器能作为修复装置、亲密的组件、友好的自我。我们不需要有机整体论来给出不可渗透的整体性、完整的女人及其女权主义变体(变异?)。我会在第二组文本,即女权主义的科幻小说中,通过一个对赛博格怪物逻辑的非常片面的解读来总结这一点。

赛博格在女性科幻小说中很常见,他们使得男人或女人、人类、人工制品、一个种族中的成员、单个实体或身体的处境问题重重。凯蒂·金

^① 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1985, 1988)主张,连续的文化改造被认可,而那些被西方帝国化实践“标记”的东西顽固地不肯消失。他的话是很有说服力的。

澄清了阅读这些小说的乐趣主要并不是以身份证明为基础。当学生们第一次面对乔安娜·露丝时,这些学生已经学会毫不退缩地对待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或弗古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而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构成了《艾莉克丝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lyx*)或《女身男人》(*The Female Man*),在实现英雄追求、旺盛性欲和严肃政治的愿望时,这些书中的角色拒绝读者搜寻纯粹的完整性。《女身男人》是关于一个基因型的四个版本的故事,她们四个相遇,但是即使聚到一起也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解决激烈的道德行为的困境,或消除日益严重的性别丑闻。塞缪尔·R. 德拉尼(Samuel R. Delany)的女性科幻小说,特别是《内维扬的故事》(*Tales of Nevèryon*),通过重新进行新石器时代革命,重新演绎西方文明的基础行动来嘲笑起源故事,颠覆它们可信性的伪装。小詹姆斯·提普垂这个作家的小说在她的“真实”性别被揭露之前被认为特别有男子气概,她讲述了以非哺乳动物的技术为基础的繁殖故事,这些技术是像男性育儿袋和男性哺育的生殖替代方式。约翰·瓦尔里在对大地女神盖娅(Gaea)的主要女权主义探索中,构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赛博格,一个疯狂的女神—行星—骗子—老妪—技术的装置,在其表面繁衍出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后赛博格共生体。奥克塔维亚·巴特勒描写了一个非洲女巫用她的变形术来对抗她的对手对基因的操纵(《野种》, *Wild Seed*);她描写了时间的扭曲把一位现代美国黑人女性带到了奴隶制时代,在那里她的行为与她的白人主人—祖先相关,决定了她自己出生的可能性(《血缘》, *Kindred*);她还描写了一个被收养的混血儿对身份和团体的不合法的洞察力,他把敌人认作自我(《幸存者》, *Survivor*)。在《异种生殖》(*Xenogenesis*)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黎明》(*Dawn*, 1987)中,巴特勒讲述了莉莉丝·伊亚珀(Lilith Iyapo)的故事,她的名字使人想起了亚当的第一任弃妻,而她的姓标记了她作为一个嫁给美国的尼日利亚移民后代的寡妇身份。作为一个黑人妇女和失去孩子的母亲,莉莉丝通过与外星的情人/拯救者/破坏者/

基因工程师交换基因,介入了人类的转化,这些外星人在核灾难之后改变了地球的居住环境,并强迫幸存的人类和他们亲密结合。这是一部由20世纪晚期的种族和性别建构的小说,它在一种神话领域中对繁殖政治、语言政治和核政治提出了疑问。

由于冯达·麦金泰尔的《超光速》(*Superluminal*)一书对边界越轨有着特别丰富的描写,这本书能结束这样一个被截的目录,关于有前途而又危险的怪物的目录,这些怪物有助于重新界定具体化和女性写作中的喜悦和政治。在一本没有一个角色“只是”人类的小说中,人类的地位是很有问题的。奥卡(Orca),一个基因改良的潜水员,能和杀人鲸对话并在深海条件下存活,但是她渴望做一名飞行员来探索太空,这使仿生移植成为必要,而这些移植会危及她与潜水员和鲸目动物的亲属关系。转化受到携带一种新发展代码的病毒载体的影响,也受到移植手术、微电子设备的植入和模拟复制和其他方式的影响。拉埃内阿(Laenea)通过接受心脏移植和其他种种改变,能在超光速运行的状态下存活,成为一名飞行员。拉杜·德拉库(Radu Dracul)在外部世界的星球上从一场由病毒导致的瘟疫中幸存下来,他发现自己的时间意识改变了整个物种对空间感知的边界。所有这些角色都探索着语言的界限、交流经验的梦想;甚至在这个经历变化无常的转化和联系的世界中局限、偏袒和亲密的必要性。《超光速》也在另一个意义上代表了一个赛博格世界的界定矛盾;在本章中我提及的这本科幻小说中,它在文本上体现了女权主义理论和殖民话语的交叉。这是一种与漫长历史的结合,而许多“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试图抑制这种结合,也包括在解读《超光速》时的我自己,在我被左·索芙莉丝责问之前,她在世界系统的统治信息学中的不同位置使她敏锐地意识到所有科幻小说文化的帝国主义时刻,包括女性科幻小说。出于澳大利亚女性的敏感,索芙莉丝更乐意把麦金泰尔记成电视系列剧《星际迷航》(*Star Trek*)中柯克(Kirk)船长和史波克(Spock)历险记的作者,而不

是记住她在《超光速》中改写的言情故事。

怪物总是在西方的想象中界定团体的界限。古希腊的半人马(Centaurs)和女战士(Amazons)通过破坏婚姻以及污染勇士与动物和女人之间的边界,建立了希腊男人中心城邦的界限。连体双胞胎和阴阳人在现代法国早期是混乱的人类材料,他们奠定了关于自然和超自然、医学和法律、前兆和疾病的话语——对现代身份的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①。关于猴和猿的进化论和行为科学标记了20世纪晚期工业身份的多种边界。女性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怪物定义了很多完全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和政治界限,来自于男人和女人的世俗小说所提议的那些界限。

不认真地把赛博格的意象认作我们的敌人,会带来几种后果。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身体是力量和身份的地图。赛博格也不例外。赛博格的身体不是单纯的;它不是在花园里出生的;它不寻求单一的身份,因此产生了无止境的(或者直到世界末日才消失的)对立二元论;它认为讽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太少,而两个只是一种可能。技能,即机器技能中的强烈乐趣,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化身的一个方面。这种机器不是一个它,被赋予生命,受崇拜,并受统治。这种机器是我们,我们的过程,我们化身的一个方面。我们能对机器负责;它们不会统治或威胁我们。我们要对边界负责;我们就是它们。(从很久以前)直到现在,女性化身似乎是被给予的,有机的,必要的;而女性化身似乎意味着育儿技巧及其隐喻性延伸。只有通过置身其外,我们才能享受机器的极度乐趣,然后借口说,毕竟这是适合女性的有机活动。赛博格有时或许会更认真地看待性与性别化身的偏袒、流动的方面。毕竟性别可能不是全球身份,即使它涉及的历史极为广泛和深远。

^① 见 DuBois(1982)、Daston and Park(未注明出版日期)、Park and Daston(1981)。名词“怪物”(monster)和动词“演示”(to demonstrate)有着相同的词根。

什么算是诸如经验之类的日常活动,这一承载着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利用赛博格的形象来解决。女权主义者最近声称,女性热衷于日常生活,与男性相比,女性以某种方式更多地维系日常生活,因此她们可能拥有一种认识论的优先立场。这一声称的牵强之处是,使不受重视的女性活动进入人们的视野,并称之为生活的基础。但这是生活的基础?那么女性的所有无知以及她们对知识和技能的所有排斥和失败呢?那么男性获得日常能力,知道如何建造东西、拆开东西、进行游戏呢?那么其他的体现呢?赛博格的性别是一种本土的可能性,展开全球范围的复仇。种族、性别和资本需要一种整体和部分的赛博格理论。赛博格没有产生完整理论的驱动力,但是对边界的建构和解构有一种密切的体验。有一种神话系统等待着成为一种政治语言,来奠定一种看待科学技术和挑战统治信息学的方法——目的是起到更有力的作用。

最后一个形象:有机体和机体的、全面的政治依赖于新生的隐喻,并始终如一地呼吁繁殖的性资源。我会提出,赛博格和再生的关系不只是这些,赛博格对繁殖母体和大多数分娩表示怀疑。对于蝾螈来说,受伤后,比方失去一条腿,它的再生包括结构的再生和功能的恢复,伴随着双生的恒定可能,或者在原有伤处有其他奇怪的形状产生。新长出来的腿可能会很怪异,也可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有力的。我们都深受伤害。我们需要再生,而不是新生,而且我们再构的可能包含了期望一个无性别的怪诞世界这个空想主义梦想。

在这篇文章中,赛博格的意象有助于阐述两个关键的论点:第一,生产一个普遍的、整体化的理论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它遗漏了大多数的事实,或许总是如此,但至少现在属实;第二,对科技的社会关系负责意味着拒绝一种反科学的形而上学,一种对技术的鬼神学研究,因此也就意味着接受重构日常生活的边界这个技术任务,这一任务与他者部分相关,与我们所有的组件相沟通。这不仅仅是说,科学和技术

是极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可能手段,也是各种复杂统治的母体。赛博格的意象暗示了一条走出二元论迷宫的途径,我们曾经在这个迷宫中向自己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和工具。这是一个梦想,不是关于一种共同的语言,而是关于多种有力的异端邪说。它是一种想象,想象一个女权主义者用不同的腔调发言,使拥有新权利的电路超级救星感到恐惧。它意味着制造并破坏各种机器、身份、范畴、关系和太空故事。尽管两者在旋转舞中相互制约,我还是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

第九章 情境中的知识：女权主义的 科学问题和偏袒角度的特权^①

学术界和积极分子的女性调查已屡次试图接受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用“客观性”这一奇怪而又不可避免的术语可能指什么？我们用了很多有毒的笔墨和用来制成纸张的树木，来谴责他们指什么以及它如何伤害我们。这个想象的“他们”组成了一种隐形的阴谋，由充满资金和实验室的男权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并且这个想象的“我们”是具体的他者，即那些不允许不拥有身体、有限观点的人们，因此在我们自身的小圈子之外对结果的任何讨论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被取消资格，并受到侮辱性歧视，在这个小圈子里，一本“大众”订阅的杂志可能有几千名读者，而且大部分都是憎恶科学的人。至少，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女性文学中，我以自己的名义承认这些隐藏在出版的复杂感想中的偏执幻想和学术厌恶。我们，在科技辩论中的女权主义者，是里根时代认识论高深领域中的“特殊利益群体”，其中，传统上可算作知识的东西是由哲学家的编纂认知标准法则来管辖的。当然，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用里根的定义来说，是任何集体的历史主体，敢于反

^① 本章原本是对哈尔丁(1986)的一篇评论，发表于1987年3月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哲学协会西区会议上。对本文写作的经济资助是由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阿尔法基金会慷慨解囊的。特别感谢乔安·斯科特、雷纳·拉帕、朱迪·牛顿、朱迪·巴特勒、里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和朵琳·康多(Dorinne Kondo)。

抗精简的星球大战原子论、大型超市、后现代的和媒体模拟的公民身份。麦克斯·海德鲁(Max Headroom)没有身体;因此,只有他看到了全球网络这一伟大交流者王国中的一切。难怪麦克斯有着一一种天真的幽默感和一种前恋母情结性征的快乐回归,一种我们矛盾地——危险地、不正确地——想象的性征,这是为女性身体和殖民化身体的终身囚犯所保留的,也可能是为单独囚禁在电子牢笼中的白人男性计算机黑客所保留的。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者选择性地并灵活地使用客观性问题上一种诱人的二分法的两极,同时又被它们所俘虏。当然我在此为自己辩护,而且我提出的推测是,在这些事情上有一种集体话语。一方面,最近对科技的社会研究使得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构成主义论点可用于所有知识形式的主张,大部分肯定是而且特别是科学的形式^①。在这些诱人的意见中,没有一个内部人士的角度是有特权的,因为知识中所有内外边界的划分都被理论化为权力的行动,而不是追求真相的行动。所以,从社会构成主义的强大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被科学家们对自己活动和成就的描述所吓住;他们及其赞助人有资本用沙子蒙住我们的眼睛。另一方面,他们在创始的最初几年里给学生讲述有关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寓言故事,然而没有一个高等科学艺术的从

^① 例如,见 Knorr-Cetina and Mulkay(1983)、Bijker 等(1987);以及特别是 Latour(1984,1988)。借用于米歇尔·图尼埃尔(Michel Tournier)的《耶稣受难日》(*Vendredi*,1967),拉托尔睿智而激烈的格言式争论反对所有形式的简化论,成为了女权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注意纯洁性;是对灵魂的中伤。”(Latour,1984,第171页)除此之外,拉托尔不是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但他通过悖谬的解读可能会成为一位,正如那些他用来组成实验室的解读一样悖谬,这个实验室是产生有意义谬误的巨大机器,速度比其他任何人都快,所以它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力量。拉托尔的实验室是关于认识论的铁路工业,其中事实只能在从实验室向外的铁轨上运行。那些控制铁路的人控制着周边地区。我们怎么会忘记了呢?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废弃铁路不像卫星网络那么多。现在这些日子,事实是在光束上运行。

业人员会因为按照课本行事而出丑。社会构成主义者清楚地表明,关于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如何真正产生科学知识这一问题的指导是特别糟糕的。正如对我们中的其他人来说,科学家们所相信或所说的自己做的事与他们真正做的事是有很大差别的。

最终真正相信,女神保佑,并按照空洞的科学客观性的意识形态教条行事的人们都是非科学家,包括少数非常轻信他人的哲学家,而这些教条在小学课本和技术科学推进的文学中被奉为神明。当然,我对最后这群人的称号可能只是一种残余的学科沙文主义的反映,来自于科学史学家的共鸣,也是在一种学科上的前恋母情结、现代主义的诗学时刻,当细胞是细胞、有机体是有机体时,成年早期在显微镜上花费过多时间的反映。请格特鲁德·斯坦(Gertude Stein)原谅。然而,父亲的法律及其对客观性问题的解决接踵而至,这个问题总是被已不存在的指称对象、推迟的所指、分裂的主语以及无穷的能指作用所解决。谁长大会变得扭曲?性别、种族和世界本身——都似乎只是在一个宇宙力场里能指作用的高速效应。所有的真相都成了一个超现实模拟空间中的高速效应。但是,我们不能提供这些词汇的特定作用——关于“自然”世界的可靠知识的加工项目不能专用于偏执或讽刺的科幻小说类型。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社会构成主义不允许退化成讽刺主义的四处发散。

在任何情况下,社会构成主义者坚持,想出科学方法的意识形态教条和所有关于认识论的哲学措辞,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通过科学实践有效认识世界中转移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科学——我们必须参与的、城市中的真实游戏——是修辞,说服相关社会执行者相信人们加工的知识是一种路径,通往非常客观的权力理想形式。这些说服必须把事实和人造产物的结构考虑在内,还包括知识游戏中以语言调解的执行者。在这里,人造产物和事实是有力修辞艺术的构成部分。实践是说服,而且重点主要是放在实践上。所有的知识在竞赛的

权力场上都是一个浓缩的节点。知识社会学中的强大程序与符号学和解构中可爱而又可恶的工具相结合,坚持真相的修辞本性,包括科学真相。历史是西方文化爱好者之间相互讲述的故事;科学是可争论的文本和权力场;内容就是形式^①。到此为止。科学中的形式是人为一社会的修辞,将世界加工为有效的对象。这是一种改变世界的说服实践,以惊人的新对象形式出现——如微生物、夸克和基因。

但是,不管它们是否有修辞对象的结构和属性,20世纪晚期的科学实体——传染媒介(微生物)、基础粒子(夸克)和生物分子密码(基因)——不是带有连贯性内部法则的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对象^②。它们是由权力场聚焦的暂时性轨迹,或者在由识别和误识行为所命令的有限具体和高度可变的指代过程中,它们是信息的传染媒介。在染色体组和其他的记载方式中编码的人类本性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就像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1980)中想象的秘密迷宫一样。人类本性这一文本的稳定和储藏保证比它的记载成本更高。这对于我们中那些仍然喜欢谈论现实

① 查询对这一论点非卡通版本的一个简洁而非常有帮助的解释,见 White (1987)。我仍然想要更多;而且未实现的渴望可能会成为改变故事的一颗强大的种子。

② 她的分析是在人种学和人类学中探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线——其中高风险的是授权或禁止加工跨“文化”的比较知识,从一些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有利位置,要么在任何分析单位的内部、外部,要么在与分析单位的对话关系中——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1987a)做出了重要观察,并不是书面的人种学平行于作为知识对象的艺术品,而是文化。在科学和其他文化实践中,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自然—技术的知识对象站在这一划分的一边。后现代主义形成物站在另一边,带着它反美学的永恒分裂的、有问题的、总是消退和延缓的知识和实践“对象”,包括符号、有机体、系统、自我和文化。“客观性”在一个后现代框架中不会与没有问题的物体有关;它必须与特定的假体和转化有关。客观性从根源上讲是有关比较知识的加工(如何对事物命名,使之稳定并彼此相似),它成为一个重划界线的政治问题,目的是拥有不清白的对话和关联。在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危在旦夕的是身体和语言之间和内部的关系模式。

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对身体与语言关系的可怕观点,比起我们允许基督徒们谈论第二次高潮的权利以及他们从世界最终毁灭中获得的狂喜来,他们更有自信。我们倾向于这么想,比起一种远离讽刺主义的绝望挫败和一种信仰行为,如其他任何宗教习俗,我们更多地求助于真实的世界,不管我们将多少空间慷慨地施与所有丰富的而且总是历史特定的调解,通过这些调解,我们和其他所有人才能了解世界。

所以,我越深入留意对激进社会构成主义的方案和一种特定版本的后现代主义的描述,与人文科学中批判话语的尖刻工具相结合,我就变得越紧张。和所有神经官能症一样,我所植根于隐喻问题的,也就是身体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全部文本化和编码的世界里,对行动的权力场意象是为后现代主义服务的许多社会协商现实论点的基体。仅对发起者来说,这个编码的世界是一个高科技的军事场,一种自动的学术战场,其中灯的闪烁召唤着选手瓦解(多么恰当的比喻!)彼此,以达到留在知识和权力游戏中的目的。技术科学和科幻小说在它们放射性的现实(非现实)——战争的照射下分崩离析^①。不应该花费几十年的女权主义理论来感觉这里的敌人。南希·哈尔特索克(1983b)将这一点清晰地写入她关于抽象男性气质的概念。

我,还有他人,开始想要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解构敌对科学的真实主张,通过显示根本的历史特性,以致显示在科技构造每一层次上的可争议性,而且我们最终获得了一种认识论的电击疗法,不是将我们引入挑战公共真理的高风险赌桌,而是把我们放在桌上展示自身导致的多重人格障碍。我们想要一种方法,来超越对科学偏见的显示(总之,那太简单了),并且超越从坏的偏见和误用中对好科学的分离。

^① 左·索芙莉丝(1988)提出了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方法,处理技术科学、科幻小说文化的精神分析以及外星主义的隐喻,包括一种绝妙的聚焦,把焦点集中在西方科技神话中光线、启示和发现的意识形态和哲学上。在与索芙莉丝的博士论文中的论点和隐喻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修改了我的文章。

这么做似乎是有前途的,通过最有可能的构成主义论点,这一论点不留任何漏洞,不会将问题只简化到偏见对立于客观、用法对立于误用、科学对立于伪科学。我们揭开了客观性的教条,因为它们威胁了我们对集体历史主观性和施动者的朦胧感觉,也威胁了我们对真相的“具体”描述,而且我们最终获得了不学习任何后牛顿时代的物理学的另一个借口,以及抛弃旧女权主义自己修车这一自助行为的另一条理由。不管怎么说,它们只是文本,所以把它们还给男孩们。除此之外,这些文本化的后现代世界是吓人的,而且我们更喜欢我们的科幻小说变得更加乌托邦一点,或许像《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或甚至《漫步场》(*Wanderground*)一样。

我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在这些拆分和掩盖的时代里保持理智,通过坚持要求客观性的女权主义版本。由许多相同的政治渴望所激发,这里是客观性这一欺骗性问题诱人的另一端。人文马克思主义在源头被污染了,被它在男人自我构建中对统治自然的结构存在论及其紧密关联的无能力所污染,不能为女性所做的任何不具备薪金资格的事情赋予历史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有希望的资源,以认识论的女性思想卫生的形式出现,寻找我们自身对客观视觉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提供工具,达到我们自己的起点理论、持续的体现、霸权批判的丰富传统不带剥夺力量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以及微妙的调解理论。精神分析的一些版本极大地辅助了这一方法,尤其是英语对象的关系理论,而这一理论对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帮助曾一度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写的任何东西还要多,更不用说阿尔都塞(Althusser),或任何作为后人处理意识形态和科学主题的后期伪装者了^①。

^① 对这一讨论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 Harding (1986)、Keller (1985)、Hartsock (1983a, 1983b)、Flax (1983, 1987)、Keller and Grontkowski (1983)、H. Rose (1986)、Haraway (1985; 本书第 149~181 页) and Petchesky (1987)。

另一个方法，“女权主义的经验主义”，也与马克思资源的女权主义用途相汇合，来获得一种科学理论，继续坚持客观性的合法意义，并且保持一种激进构成主义的机警，它是与符号学和叙述学相结合的（Harding, 1986, 第 24~26、161~162 页）。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坚持一种对世界更好的描述；仅显示根本的历史偶然性和所有事物的构成模式是不够的。在这里，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发现自己固执地与许多从业科学家的话语相结合，当一切被说出和做完时，他们大多相信他们在描述和发现的事情，通过他们所有构建和争论的方式。伊芙林·凯勒（Evelyn Keller）尤其坚持这一基础事件，而哈尔丁将这些方法的目标称为一种“后继科学”。后继科学的计划提供一种对世界更充分、更丰富和更完善的描述，女权主义者在其中享有资本，目的是在这个世界中过得好，并批判地、反射地关联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统治行为，以及构成所有地位的特权和压迫的不平等部分。在传统的哲学范畴中，道德和政治的问题可能更甚于认识论的。

所以，我认为我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同时拥有一种对所有知识主张和认识对象的根本历史偶然性的描述，一种识别我们自身用以产生意义的“符号技术”的评判性实践，以及一种忠实描述“真实”世界的严肃承诺，而这个世界可以部分共享，并友好面对世界范围内有限自由、充足物资、痛苦的适度含义和有限快乐的计划。哈尔丁将这种必要的多重渴望称为一种对后继科学项目和后现代坚持的需要，坚持本土知识中不可简化的差异和根本的复杂性。这种渴望的所有成分都是矛盾和危险的，它们的组合既是矛盾的又是必需的。女权主义者不需要一种承诺超越的客观性教条，一个失去了调解线索的故事，而那正是某人可能要对某事负责的地方，同时还失去了无限的工具力量。我们不想要一种单纯力量的理论来表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语言和身体都落入了机体共生的幸福中。我们也不想根据全球体系对这个世界进行理论化，更不用说在其内部行动了，但是我们的确需

要一个全球范围的关系网,包括能够部分翻译非常不同的——和力量区分的——群体中的知识。我们需要现代批判理论的力量,关于意义和身体是如何产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否认意义和身体,而是为了生活在未来有机会生存的意义和身体里。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总是牵涉于类似的希望之中。科学成了一种对翻译、可转换性、意义灵活性和普遍性的搜索——当一种语言(猜猜是谁的)必须作为所有翻译和转换的标准来实施时,我将普遍性称为简化论。金钱在资本主义的兑换秩序中起了什么作用,简化论就在全球科学的强大思想秩序中起什么作用:最终只有一个等式。正是这种致命的幻想,女权主义者和他者在客观性教条的某些版本中发现的,为算做是知识的东西的等级序列和实证序列服务。这是那些关于客观性的争论在隐喻或其他方面重要的原因之一。永生和万能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能使用一些可实施的、可靠的事物描述,不能简化为权力行为和地位高的好战修辞游戏,或简化为科学家的实证主义式傲慢。无论我们是否在讨论基因、社会阶级、基础粒子、性别、种族或文本,这一点都是适用的;这一点适用于确切的、自然的、社会的和人文的科学,尽管当我们围绕着话语区域滑行时,客观性和科学这两个词有着含糊的歧义。在我们努力攀爬一根通往可用客观性教条的油杆时,我和其他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在客观性的辩论中交替地或甚至同时地继续坚持二分法的两端,哈尔丁根据后继科学的计划和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对立解释来描述二分法,而我在本章中勾画为激进的构成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批判经验主义之间的对立。当然,当你同时或交替地坚持把握杆的两端,攀爬是很困难的。所以,是时候转换隐喻了。

视觉的持续^①

我要继续谈下去,将隐喻信赖置于女权主义话语中遭到恣意诽谤的感官系统:视觉。视觉有利于避免双向对立。我想要坚持所有视觉的具体本质,并因此取回感官系统,它已被用来表示跳出有标记的身体,进入一种莫名的征服凝视。这是一种神秘地铭刻在所有标记的身体上的凝视,使得未标记的范畴获得看到和不被看到的力量以及逃避表征时的表现力量。这种凝视表示男人和白人的未标记的地位,在科技、后工业、军事化、种族主义和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即在这里,怪物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美国,由女权主义者听来,它是世界客观性的许多卑劣声音之一。我想要一种具体客观性的教条,来适应矛盾和批判的女权主义科学项目:女权主义的客观性指的就是情境知识。

① 约翰·瓦尔里的科幻小说称作“视野的持续”(The Persistence of Vision)的短篇故事是产生这一节的部分灵感。在这个故事里,瓦尔里构建了一个由聋盲人设计并建造的乌托邦社区。然后,他探索了这些人的技术和其他交流中介,以及他们与正常视力的孩子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Varley,1978)。在“蓝色香槟”(Blue Champagne)的故事中,瓦尔里(1986)改变了对亲密性和技术的政治提出质疑的主题,为了一名半身不遂的年轻女子,她的修复装置,即金吉普赛,允许她完全移动身体。她作为一个媒体明星为一个星际通讯娱乐的集团工作,制作“感觉艺术”,但是,自从这个集团拥有了这个极其昂贵的装置,她只有保持她技术的、私密的、赋予能力的自我,来交换她在所有体验的商业化中的复杂性。她对于重塑可售经验的极限是什么?是在模拟标志下的个人政治吗?瓦尔里反复调查最终总是有限的体现、不同行为能力的存在体、修复技术和赛博格触及的极限,尽管它们不同寻常地超越了“有机”秩序,解读这些调查的一种方法是在20世纪晚期的历史神话时代,即技术—生物政治的时代中找到一种对个人和政治的寓言。假体成了一种了解我们最私密自我的基础范畴。假体是符号学,是意义和身体的建构,不是为了超越,而是为了承载着力量的交流。

眼睛被用来表示一种反常的能力——在与军事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男权至上相连的科学史中打磨得趋于完美——为了自由力量的利益将认知主体远离每个人和每件事。在多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形象化工具合成了这些分离的意义。这些形象化技术是没有明显界限的；任何和我们一样的普通灵长类的眼睛都能无限地增强，通过超声波系统、磁共振成像、人工智能连接的图像操纵系统、扫描电子显微镜、计算机辅助 X 线断层扫描仪、色彩加强技巧、卫星监控系统、家庭和办公室的视频数据终端、各种用途的照相机，从拍摄住在大陆板块断层带的排出气体中的一种海洋蠕虫的肠腔黏膜，到映射太阳系中其他地方的一个行星半球。在这种技术盛宴中，视觉变得毫无节制；所有角度都让步于无限灵活的视觉，它不再只是神秘地与上帝从不知何处看到一切的伎俩有关，而是把神话放入了普通行为中。并且，就像上帝的伎俩一样，这个眼睛欺骗世界来生产技术怪物。左·索芙莉丝(1988)将这种眼睛称作男权主义外星人计划的食人者之眼，使排泄物获得新生。

向直接的、贪婪的、再生的和无限制的视觉这一意识形态致敬，它的技术调解是同时被歌颂和表现为完全透明的，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的百年华诞专辑结束了它对杂志探索文学的调查，通过它惊人的摄像来实现，还包括两个并列的章节。第一章是关于“空间”的，引言介绍说“选择是宇宙——或是虚无”(Bryan, 1987, 第 352 页)。正是如此。这一章详细叙述了太空竞赛的功绩，并展现了外太空行星的色彩加强的“快照”，那些是将穿越浩瀚太空传送的数字化信号重组后得来的，是观者“体验”发现即时成像“物体”的时刻^①。这些难以置信的物体向我们走来，同时也是作为对显而易见的东西的明确记载，作

^① 我对这些照片经验的理解要归功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吉姆·克利福德(Jim Clifford)，他发现了他们“看到陆地啦！”的惊呼对读者的影响。

为科技生产的英雄壮举。下一章是外太空的孪生兄弟：“内部空间”，引言介绍说“星球物质变得活跃起来”（Bryan, 1987, 第 454 页）。在这里，读者被带到了无限小的国度，这一国度是通过类人动物“通常”能感知的波长以外的射线而变得具体的，如激光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光束，它们的信号被处理成保护 T 细胞和侵略性病毒的精彩全色快照。

然而，那种无限视觉的观点当然是一种假象，一种神的伎俩。我们在隐喻上坚持所有视觉的特性和体现（尽管不一定是机体体现并包括技术调解），不屈服于诱人的视觉神话作为一种分离和新生的路径，我想要暗示这种坚持是如何允许我们构建一种可用的而非一种单纯的客观性教条。我想要一种对身体的女性写作，再一次在隐喻上强调视觉，因为我们需要恢复那种感觉来找到我们的路，通过转变客观性辩论中所有现代科技的形象化伎俩和力量。通过身体，并赋有灵长类的彩色和立体的视觉，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将目标附加到我们的理论和政治的扫描仪中，目的是命名我们达成了什么或没达成什么，而在心理和生理空间的维度上我们不知道如何命名。所以，不那么顽固地，客观性最终表现出与特定和特殊的具体化相关，而肯定不是与保证超越所有界限和责任的错误视觉相关。这种精神是简单的：只有偏袒的角度能承诺客观的视觉。这是一种客观的视觉，开创而不是关闭所有视觉行为传承的责任问题。偏袒的角度可以用作解释它有希望而又具毁灭性的怪物。所有西方文化关于客观性的叙述都是我们称之为心智和身体之间以及距离和责任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寓言，包含在女权主义的科学问题之中。女权主义的客观性是关于有限方位和情境知识的，不是关于主体和客体的超越和分类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回答我们学习如何看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我一边遛狗一边思考时学到的东西。我想弄明白如果没有形成彩色视觉的中央窝和极少数视网膜细胞，但有巨大的嗅觉神经处理和感觉区域，世界看上去会是什么样。这是可以

从相片学到的东西,对于昆虫的复眼来说,或者甚至从监测卫星的摄像头或“靠近”木星的太空探索—感知差异的数字传送信号来看,世界看上去会怎样,而那些信号被转换成咖啡桌上的彩色相片。这些“眼睛”在现代的技术科学中成为可能,击碎了任何被动视觉的想法;这些假体装置向我们表示,所有眼睛,包括我们自身机体的,都是活跃的感知系统,内置在翻译和特定的观察方式里,即生活的方式。对身体和机器的科学解释中,没有无媒介的相片或被动的暗箱;只有高度特定的视觉可能性,每一种可能都有着一种特别详细、活跃和偏袒的世界组织方式。所有这些世界的相片不应该成为关于无限灵活性和互换性的寓言,而应是关于精密的特性和差异以及体贴的寓言,人们能用这种体贴来学习如何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忠实的观察,即使这里的另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机器。那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对于女权主义版本的客观性来说,那是可能的寓言。了解这些视觉系统在技术上、社会上和精神上是如何工作的,应该是一种体现女权主义客观性的方法。

许多女权主义思潮试图理论化信任的基础,尤其是被征服人们的有利位置;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从强者的辉煌空间平台之下往上看视觉更好(Harsock, 1983a; Sandoval, 未标明出版日期; Harding, 1986; Anzaldúa, 1987)。本章是一个与这种怀疑相联系的论点,支持情境知识和具体知识,反对不能定位的,以致不负责任的不同形式的知识主张。不负责任意味着不能被考虑在内。从边缘和深处建立观察的能力是受到重视的。但是这里有一种严重的危险,即人们要求从他们的位置看时,他们浪漫化和/或挪用了弱势群体的视觉。从下往上看既不是容易学的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我们”“自然地”栖息于被征服的知识的伟大地下区域。这种被征服人们的定位不能免除批判的再审、解码、解构和解释;也就是说,是从批判探究的符号学模式和解释学模式出发的。被征服人们的观点不是“单纯”的立场。相反地,他们被偏袒,是因为原则上他们最不可能被所有知识的批判性和解释性核

心所否定。当他们要求综合观察时,他们通过抑制、遗忘和消失的行为——一无是处的方法——来了解否定模式。被征服的人们有很好的机会识破上帝的伎俩及其所有灿烂的——所以刺目的光芒。“被征服”的立场受到偏袒,是因为它们似乎保证了对世界有更充分、持久、客观和转化的描述。但是,如何从下往上看是一个问题,至少和“最高的”技术科学形象化一样,需要许多对身体和语言的技巧以及视觉调解的技巧。

这种偏袒的定位对相对主义的各种形式和科学权威的所有主张都是敌视的。但是,对相对主义来说,选择不是整体化和单个视野,因为那最终总会成为未标记的范畴,其力量依靠于系统的狭义化和模糊化。相对主义的选择是偏袒的、可定位的、批判的知识,支撑着关系网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网在政治中被称为团结,在认识论中被称为共享对话。当要求处处平等时,相对主义是一种一无是处的方法。定位的“平等”是一种对责任和批判探究的否定。相对主义与客观性意识形态中的整体化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两者都否定在方位、体现和偏袒角度中的筹码;两者都使人们不可能看清楚。相对主义和整体化都是“神的伎俩”,平等并完整地保证无处不在的视觉,即围绕科学的修辞中的一般神话。但是,持续的、理性的和客观的探究恰好处于偏袒角度的政治和认识论中。

所以,和许多其他女权主义者一起,我想要为客观性的教条和实践辩护,客观性将特权给予竞争、解构、激情建构、网络化联系,同时我还希望转变知识系统和观察方式。但是,并非任何偏袒角度能做到;我们必须敌对于用总结和归纳部分而建立起来的简单相对主义和整体论。“激情的分离”(Kuhn, 1982)不仅需要承认的和自我批判的偏袒。我们也必定要从某些观点中寻找角度,那些观点不可能预先得知,并保证非凡成就,即构建世界的有力知识,而不是依靠统治轴心来组织的知识。在这样一种观点中,未标记的范畴将真正消失——与只

是重复一种消失的行为完全不同。想象的和理性的——幻觉的和客观的视觉在一起紧密地盘旋。我认为,必须解读哈尔丁对一种后继科学和后现代敏感性的要求,争论这种近距离接触希望而转换知识的幻想因素以及对持续批判探究的严格检查和刺激,这是任何对客观性或理性的可信权利的共同基础,这种权利并没有充满惊人的否定和抑制。根据这种理性和客观性的女权主义教条,阅读科学革命的纪录甚至是可能的。科学从头开始成了空想的和幻觉的;这是“我们”需要它的一个理由。

对可变定位和激情分离的承诺依赖于不可能的单纯“身份”政治和认识论,这些政治和认识论是从被征服人们的立场进行观察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看得清楚。如果一个人想要看到并从这些立场批判性地观察,他不能“是”细胞或分子——或是一个女人、被殖民者、劳动者或其他。“存在”有着更多的问题和偶然性。同样,如果不能解释这一运动,那么一个人不能重新定位在任何可能的有利位置中。视觉总是一个观察力的问题——而且或许是一个隐含在我们的形象化实践中的暴力问题。我的眼睛是用谁的鲜血造就的?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来自“自我”立场的证明。我们不是马上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自我知识需要一种连接意义和身体的符号—物质技术。自我身份是一种糟糕的视觉系统。融合是一种糟糕的定位策略。人类科学中的男孩们把这种自我存在的疑问称作“主体的死亡”,即意志和意识的那个订货点。这种看法对我来说似乎是异乎寻常的。我倾向将这种生成性疑问称为非同构主体、施动者和故事领域的开端,从巨大和饱满的主体眼睛的有利位置来看,这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的眼睛基本上是流浪的眼睛、旅游的镜头。这些游历往往是暴力的,并坚持一种征服自我的镜像——但却不总是如此。西方女权主义者也继承了一些学会参与重新具体化世界的技巧,这些世界在对主人观点的重大挑战中被颠倒了。所有一切都不是从头开始的。

分裂和矛盾的自我是一个能够质疑定位和可解释的自我,是一个能构建并连接理性对话和改变历史的美妙想象的自我^①。分裂,而非存在,是女权主义科学知识认识论的特权形象。在这种环境中,“分裂”应该是有关各种各样的复杂性的,而这些复杂性是必要的,同时又不能被塞进同构的位置或累加的名单中去。这种几何结构在主体内部和之间适用。对主观性的局部解剖是多维度的;所以,视觉也是多维度的。知晓的自我在所有伪装下是片面的,是永无完结的、整体的、就在那里的和原创的;它总是被不完美地构建和缝合在一起,所以能够与另一个自我相连来一起观察,而不必要求成为另一个自我。这里是客观性的承诺:一个了解科学的人寻求主体地位,不是身份的,而是客观性的;也就是部分关联。同时“存在”于所有由性别、种族、国家和阶级所构建的特权(被征服)地位中,或者整体地“存在”于任何这些地位中,都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是一个批判地位的简短名单。搜寻这样一种“全面”和完整地位,是在对历史中搜寻完美的拜物主体,有时这一搜寻出现在女权主义理论中,作为本质化的第三世界女性(Mohanty,1984)。征服不是产生一种本体论的理由;它可能是一种视觉线索。视觉需要视觉工具;一种光学是一种定位政治。视觉工具调解立场;从被征服者的立场来看,没有一种即时视觉。身份,包括自我身份,并不产生科学;而批判性定位,即客观性,产生科学。只有那些占据统治者地位的人们才是自我一致的、未标记的、分散的、无媒介

① 乔安·斯科特提醒我,特雷萨·德·劳丽蒂斯(1986a,第14~15页)对它进行了如下表达:

女性中的差异可能比女性内部的差异更好理解……但是一旦在她们的构成力量中认识到——即一旦认识到,这些差异不仅构成了每个女人的意识和主观界限,而且还一起定义了女权主义中的女性主题,正是以其独特性来定义,即其本身固有的而且至少现在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这些差异不能在一个固定的身份中再次消除,即一种所有女性的同一性来作为女人,或一种女权主义的表现来作为一种连贯的、可获得的形象。

的、卓越的和重生的。对被征服者来说不幸的是,渴望甚至挤进那一主体地位是可能的——然后从视线中消失。从未标记的观点出发的知识是真正幻想的、歪曲的以及如此不合理的。客观性不可能实施和兑现的唯一位置是主人的立场,即男人,唯一的上帝,他的眼睛产生、挪用和命令所有的差异。没有人曾经因为客观性的一神论而指责过上帝,只有因为冷漠。上帝的伎俩是自我一致的,而我们把它误认为创新和知识,甚至是无所不知的。

因此,定位是关键性的实践,为围绕视觉意象组织起来的知识奠定基础,而西方科学和哲学的话语也是如此组织起来的。定位隐含了对我们的授权实践负责。它遵循,政治和道德为争夺所谓的理性知识的竞赛奠定基础。也就是说,不管承认与否,政治和道德为确切的、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类科学中知识项目的斗争奠定基础。否则,理性就根本是不可能的,是一种从不知何处全面投射的光学错觉。与技术史一样,科学史可能被有力地讲述。这些技术是生活、社会秩序、形象化实践的方式。技术是熟练的实践。怎么看?从哪里看?视觉界限是什么?看的目的是什么?与谁一起看?谁会有不止一个观点?谁会眨眼?谁戴眼罩?谁解释视觉领域?除了视觉之外,我们还希望培养什么其他的感官能力?道德和政治的话语应该是在视觉的意象和技术中的理性话语范式。桑德拉·哈尔丁主张或观察到,社会革命的运动已经为科学进步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这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关于新定位技术的知识结果的主张。但是,我希望哈尔丁花更多的时间记住社会和科学的革命不总是解放的,即使它们总是幻想的。可能另一个短语抓住了这一点:军事中的科学问题。什么会被认为是对世界的理性描述,对这一点的斗争是关于怎么看的斗争。视觉的术语:殖民主义中的科学问题;极端主义中的科学问题(Sofoulis, 1988);女权主义中的科学问题。

在政治上攻击不同的经验主义、简化论或其他版本的科学权威,

这应该不是相对主义的问题,而是方位的问题。表达这一观点的二分图可能是这样的:

普遍理性	民族哲学
共同语言	多语现象
新原则	解构
统一场论	对立定位
世界体系	本土知识
主宰理论	网状解释

但是一个二分图以一种批判的方式误解了我想要刻画的具体客观性的地位。主要的歪曲是二分图中对称的错觉,使得任何地位表现为:第一,简单交替的;第二,相互排斥的。紧张和共鸣映射在一个引起激烈反应的二分法的固定两端之间,这种映射更好地表现了具体的因而可解释的客观性中的有力政治和认识论。例如,本土知识与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这种结构在知识和权力的网络中强迫不平等的翻译和交换——物质和符号。网络能够有系统属性,甚至中心构建的全球系统的属性,带有深入的细丝和黏性的卷须进入时间、空间和意识,即世界史的维度。女权主义的可解释性需要一种调到共鸣的知识,而不是调到二分法。性别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差异的领域,其中极端地方化、亲密个人和个体化身体的论调在同一领域随着全球的高压释放一起振动。然后,女权主义的体现不是与一个具化身体里(女性或其他)的固定方位有关,而是与场、取向变化和物质—符号意义场的差异责任中的节点有关。体现是有意义的修复术;当算作对象的东西正是世界史最终成为的东西时,客观性不能是固定视觉。

为了在这种紧张、共鸣、转换、反抗和复杂性的情况下进行观察,一个人应该如何定位?在这里,灵长类的视觉不会马上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隐喻或技术,来阐明女权主义的政治—认识论,因为它似乎将

已处理过的和客观化的场呈现在意识面前；事物似乎已经固定并隔离开来。但是，视觉隐喻允许一个人超越作为唯一最终产品的固定外表。隐喻邀请我们调查视觉生产的不同装置，包括在我们生理的眼睛和大脑交界层面上的修复技术。而且在这里，我们发现高度特定的机械，来处理进入我们描绘的世界的电磁光谱区域。正是在这些我们陷入的错综复杂的形象化技术中，我们将会找到理解和介入世界客观化类型的隐喻和方法，那也就是我们必须解释的现实类型。在这些隐喻中，我们找到了方法，可以同时欣赏具体的、“真实”的方面以及在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中的符号和生产方面。

我在为方位、定位和情境的政治和认识论辩护，其中偏袒，而非普遍性，是聆听理性知识主张的条件。这些是关于人们生活的主张；来自于一个身体的视野，总是一个复杂、矛盾、构建和被构建的身体，与之对立的视野来自上面，来自不知名处，来自简单。只有上帝的伎俩是被禁止的。这里是一种决定科学问题的军国主义标准，军国主义是有着完美语言、完美交流、最终秩序的那种理想科学/技术。

女权主义热爱的是另一种科学：关于解释、翻译、口吃和部分理解的科学和政治。女权主义是带有（至少）双视野的多个主体的科学。女权主义是一种批判性视觉，尾随在异质的性别化社会空间中一种批

判性定位之后。^① 翻译总是解释性的、批判性的和片面的。这里是一种对话、理性和客观性的领域——它是对权力敏感的“对话”，而非多元的。它甚至不是物理和数学的神话卡通——在反科学的意识形态中被错误地讽刺为确切的、超简单的知识——那些卡通是用来表现敌

^① 哈尔丁(1986,第18页)暗示性别有三个维度,每个都有历史特定性:性别象征主义、劳动力的社会—性分工以及个人性别化身份的构建过程。我将扩充她的观点来表明,没有理由认为这三种维度会共同变化或共同决定彼此,至少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性别象征主义中对立项之间的极陡梯度很可能不是与劳动力或社会力量的社会—性的鲜明分工相互关联的,但可能与鲜明的种族等级或其他东西紧密关联。同样的,性别化主题的形成过程可能不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由受检验的劳动力性分工或性别象征主义的知识直接启发的。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应该期待这些维度中的调解关系。这些调解可能会通过完全不同的组织象征、实践和身份(如种族)的社会轴心来移动。而且反过来也一样。我也暗示,科学,连同性别或种族,可能会分裂为这样一种象征主义、社会实践和主题立场的多个部分的体系。在做各种比较时,表明自己态度的不只有三个维度。例如,性别、种族和科学的不同维度可能会在一张平行列表上调解维度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劳动力的种族分工可能会调解科学或性别图表上的象征联系与个人主体立场形成之间的关联模式。或者,性别化或种族主观性的形成可能会调解劳动力的科学社会分工与科学象征模式之间的关系。

以下图表开始了一种并行切分的分析。在此图表中(以及现实中?),性别和科学在分析上都是不对称的,比方说,每一项都包含并模糊了一种建构的等级化二元论,性/性别和自然/科学。每一种二元论通过一种挪用逻辑来命令无声的一方,就像资源对产品、自然对文化、潜在对实在。二元论的两极都是辩证地相互构建和组织起来的。在每个有声的或显性的一项中,不对称的分裂可以进一步发掘,比如性别可以分为男性对女性,而科学可以分为硬科学对软科学。这是一个要点,记住一种特定的分析工具是如何工作的,不管你愿不愿意、想要不想要。这一图表反映了科学和性别话语的一般意识形态方面,并可能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帮助打开神秘化的单位,如科学或女人。

<p>性 别 象征系统 劳动力的社会分工 (通过性、种族等) 个体身份/主体立场 (渴望的/被渴望的; 自治的/关联的) 材料文化 (性别装备和日常性别技术:性差异 运行的狭窄轨道) 构建和发现的辩证法</p>	<p>科 学 象征系统 劳动力的社会分工 (通过加工、工业或后工业逻辑) 个体身份/主体立场 (知者/被知者; 科学家/其他) 材料文化 (实验室:现实运行的狭窄轨道) 构建和发现的辩证法</p>
--	---

对的另一方,敌对于科学知识的女权主义范式模型,然而高科技中众所周知的理想是永久的军事化科学生产和科学定位,即上帝对一种星球大战范例的理性知识的伎俩。所以,方位与弱点有关;方位反抗封闭、终结的政治,或者,借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女权主义客观性反抗“最后的简化”。那是因为女权主义的体现反抗固定,而且它对区别定位网络的好奇心永远得不到满足。没有一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是单一的,因为我们的地图需要为那种隐喻提供太多的维度,来奠定我们的视觉。但是,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家的一种认识论的目标及其使用的、可解释的定位政治仍然是非常有力的。这个目标是对世界更好的描述,即“科学”。

总之,理性知识不是自称置身事外:表现得来自于四面八方,所以是无处不在的,表现得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表征,表现得完全独立或完全形式化。理性知识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批判性解释过程,处于解释者和解码者的“领域”之中。理性知识是对权力敏感的对话(King, 1987a):

知识:团体::知识:权力

解释学:符号学::批判性解释:代码。

解码和译码加上翻译和批评;所有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科学成了范式模型,不是封闭的,而是可竞争的和被竞争的。科学成了神话,不是关于在超越争斗的国度中什么逃脱了人类机构和责任,而是关于翻译和团结的可解释性和责任,连接不和谐的视觉和幻想的声音,表现出被征服人们的知识特征。一种感官的分裂,一种语音和视觉的混淆,而不是清晰和明显的想法,成了理性领域的隐喻。我们搜寻的不是男性中心主义所支配的知识(怀旧一个真实单词的存在)和分散的视觉,而是那些由偏袒的视野和有限的语音所支配的知识。我们不是

为了偏袒本身而去搜寻它,而是为了关联和意料之外的机会,情境知识使这些机会成为可能。找到一个更高视野的唯一方法是处于特定的某个地方。女权主义中的科学问题是关于客观性的,作为定位的理性。它的形象不是逃避和超越界限的产物,即自上而下的视野,而是将片面的视野和犹豫的声音结合进一种集合主体的地位,这种地位保证了一种视野,关于进行中的有限体现的方式,关于在界限和矛盾内部生活,也就是说,关于来自某处的视野。

对象作为执行者:身体生产的装置

贯穿这种对“客观性”的思考,在不区分它非同寻常的语境范围的情况下,我拒绝解决涉及科学的模糊性。通过这种持续的模糊性,我强调了一个共同特性的领域,将确切的、生理的、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生物的和人类的科学结合在一起;而且,我将这整个多样的学术(和工业,例如在印刷业、武器制造和制药业中)制度化的知识生产领域与一种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坚持其力量的科学意义结合起来。但是,我想要提出解决一种模糊性的方法,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充分发挥科学话语意义的特性和高度可渗透的界限。贯穿由意义构成的科学领域,共同特性之一是关于任何知识对象的地位,以及我们描述“真实世界”的忠实性的相关主张的地位,无论对我们来说这些对象是多么间接,无论这些世界可能是多么复杂和矛盾。女权主义者,作为最积极科学评论家的他者及其主张或相关意识形态避开了科学客观性的教条,部分原因是怀疑知识“对象”是一个被动的和惰性的东西。描述这些对象,要么是挪用一個固定和确定的世界,简化为破坏性的西方社会中演奏家的项目资源,要么被看做是利益的伪装,通常是统治利益。

例如,“性”作为一种生物知识的对象有规律地出现在生理决定论的伪装中,威胁着社会构成主义和批判性理论的易碎空间及其伴随的积极和转换性干预的可能性,这些干预的可能性由女权主义的性别概念所创造,用来作为社会上、历史上和符号上的定位差异。然而,性建立了与性别,即其对立方多产的紧张关系,失去对性的权威生理描述,似乎失去太多的东西;好像失去的不只是一种特定的西方传统内部的分析力量,而是身体本身,它绝不会作为社会记载中空白的一页,包括那些生物话语在内。损失的同一问题伴随着一种对物理对象或任何其他科学对象的“简化”,彻底简化到话语生产和社会构建的短暂事物^①。

但是困难和损失不是必需的。它们部分来自于分析传统,主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和“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转换史(我们如何为这种可耻的事物命名?)。它把一切都转换成了挪用的资源,其中知识对象本身最终只是与知者的生殖力、行为有关。在这里,对象同时保证和更新知者的力量,但是在知识生产中任何作为施动者的地位都必须否定对象。简言之,它——世界——必须被物化为事物,而不是施动者;它必须与知识生产中唯一社会存在的自我形成有关,即人类知者。左·索芙莉丝(1988)发现了技术科学中这种知识模式的结构,作为“资源化”——通过将所有世界体同化为人类顽固计划的资源来使其获得重生。自然只是文化的原材料,被占用、保存、奴役、提升,或者在资本殖民主义的逻辑中由文化灵活处置。同样的,性只是与性别行为有关;生产主义逻辑在西方二元论传统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析的和历史的叙述逻辑解释了我女权主义理论近代史中关于性/性别区分的不安。性被“资源化”了,将它再现为“我们”可以控制的性别。避免挪用主义者统治逻辑

^① 伊芙林·凯勒(1987)坚持重要的可能性由构建性/性别区分和自然/科学区分的交叉来开启。她也坚持需要紧握一些“性”和“自然”中的非话语基础,“性”和“自然”或许就是我称之为“身体”和“世界”的东西。

的陷阱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内置于自然/文化二元论及其生成性传统中,包括性/性别区分。

本章刻画的女权主义对客观性和具体化——即世界——或类似的描述需要遗传的西方分析传统内部一种看似简单的操纵,一种始于辩证法的操纵,却止于所需修改的缺乏。情境知识要求,知识对象应该被设想为一个执行者和施动者,而不是一个屏幕、背景或资源,绝不能最终成为奴隶,而其主人在其代理和授权“客观”知识的独特方式中将辩证法隔离出去。这一点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批判性方法中的清晰程度堪称典范,在这些科学中被研究的人类机构本身转变了产生社会理论的整个项目。其实,向被研究的“对象”机构妥协是在这些科学中避免严重错误和多种假知识的唯一方法。但是,相同的观点必须应用于称为科学的其他知识项目。道德和政治隐性或显性地提供客观性的基础,在作为一个异质整体的科学中,而不是仅在社会科学中,这种坚持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的“对象”授予施动者/执行者的地位。执行者以多种奇妙的形式出现。然后,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并不依赖于一种“发现”的逻辑,而是依赖于一种承载权力的“对话”社会关系。这个世界本身既不开口说话,也不为了支持一个主要解码者而消失。世界的代码不是静止不变的,只等在那里被人解读。世界不是人类化的原材料;对人文主义的彻底袭击,即“主体死亡”话语的另一分支,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某些由社会或机构的拙劣范畴不成熟地暗示的批判意义上,知识项目中邂逅的世界是一个主动的实体。科学描述能作为知识对象参与到这种世界维度中,就此而言,忠实的知识能够被想象,并向我们提出要求。但是,没有特定的表征或解码或发现的教条能保证任何事。我所推荐的方法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版本,而在接触世界的主动机构时它被证明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方法。

我的这些简单的或许单纯的尝试在西方哲学中显然并非是新颖的,但是,对于女权主义的科学问题以及性别作为情境差别和女性具

体化的相关问题,它却有一种特殊的女性优势。生态女权主义者的态度或许是最强硬的了,坚持要求世界的某些版本作为主动主体,而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或男权主义项目中被映射和挪用的资源。承认知识中的世界机构为某些未解的可能性提供空间,包括一种世界的独立幽默感。对于人文主义者和忠于世界作为资源的其他者来说,这种幽默感是令人不舒服的。女权主义将世界形象化为睿智的施动者,具有丰富感召力的形象为此存在。我们不需要倒退到求助于一个原始母亲反抗成为资源。当我们放弃掌握权,却保持对忠诚性的搜寻,始终清楚我们会被蒙蔽,我们的处境被体现在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描述中的土狼或骗子所表明。我认为,对可能成为我们盟友的科学家来说,这些都是有用的神话。女权主义的客观性在所有知识生产的中心为意外和讽刺提供空间;我们并不是掌管着世界。我们只是住在这里,并试图通过我们的假体装置,包括我们的形象化技术,开始有意识的对话。难怪科幻小说在最近的女权主义理论中成为如此丰富的写作实践。我高兴地看到,女权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改造的土狼话语,在多种多样的世界描述中有责任成为能力的来源。

最近 20 年以来,科学中另一种丰富的女权主义实践特别清楚地阐明了“激活”知识对象中先前被动的范畴。这种激活将性和性别之类的二元区分永久地问题化了,然而它们的策略功用却没有消除。我指的是灵长类动物学的重构,但尤其不仅仅是科学解释中女性作为灵长目动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对于可算作性的东西,尤其是女性进行的实践(Haraway, 1989b)。身体,生物话语的对象,本身成了一种最投入的存在物。生理决定论的主张永远不可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当女“性”被彻底地再理论化和再形象化,以至于它与“心智”实际不可区分时,在生物学范畴上发生了一些基本的变化。占据当前生理行为描述的生理女性几乎已没有被动属性的残留。她在每个方面进行建构,并活跃于其中;“身体”是一个施动者,而不是一种

资源。从基因到觅食类型的每个层面,差异在生理上被理论化为情境的,而不是本身固有的,因此它从基础上改变着身体的生物政治。性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必须在这些知识框架内部从范畴上进行修改。我想要在生物学的解释策略中建议这种趋势,作为一种干预的寓言,这些干预忠实于女权主义的客观性计划。这一观点不是说这些生理女性的新形象是完全正确的,或者不向竞争和对话开放。恰恰相反。然而,这些形象强调了知识,作为每个知识表达层面上的情境对话。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边界在这个寓言中是赌注之一,也包括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边界。

所以,我将用一个有益于情境知识的女权主义理论的最终范畴来结束讨论:身体生产的装置。在对诗歌生产这一文学价值对象的分析中,凯蒂·金提供了工具,来澄清女权主义者之间客观性辩论中的问题。金建议用“文学生产的装置”这个术语,来强调在艺术、商务和技术的交叉点上出现的体现为文学的东西。文学生产的装置是一种产生“文学”的基体。集中在被称为“诗歌”这一有力的价值对象上,金将她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女性和写作技术(King, 1987b)。我想要调整她的研究,使之适应对生成身体以及科学知识项目中其他价值对象——真正的生产和繁殖——的了解。乍一看,使用金的计划有一个局限性,这是生物话语的“真实性”所固有的,而在文学话语及其知识主张中都是没有的。生理的身体是和诗歌一样的,在同一个强大意义上被“制造”或“生成”的吗?从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的早期冲击来看,许多诗人和生物学家相信诗歌和有机体是亲兄弟。《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可能被解读为对这个命题的一种促成。我继续相信这一有力的命题,但是以一种后现代的而非浪漫主义的信念方式。我希望把“真实性”和“有机性”的意识形态维度转化为一种累赘的实体,称为“材料—符号行动器”。这一繁琐的术语是想要强调知识对象作为身体生产装置的一个积极的、生成意义的轴心,而不曾暗示这些对象

的即时存在,或者,同样地,暗示他们在某个历史关头对什么可算作客观知识所做的最终或独特的决定。金称作“诗歌”的对象是文学生产基地,其中语言也是一个独立于意向和作者的行动者,如这些对象一样,身体,作为知识的对象,是材料—符号的生成节点。它们的边界在社会互动中成为现实。边界是由映射实践划出的;严格说来,“对象”不会预先存在。对象是边界项目。但是边界从内部开始变化;边界是非常狡猾的。边界临时包含的东西保留了意义和身体的生成性和能产性。选择(瞄准)边界是一种危险的实践。

客观性不是关乎脱离,而关乎相互的、通常是不平等的构建,关乎在世界上承担的风险。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永远都是凡人,也就是说,不是“终极”掌控者。最终,我们没有清晰明确的想法。各种具有竞争性的生理身体出现在生物学研究和写作、医学和其他行业的实践以及技术的交接点,如本章中列为隐喻的形象化技术。但是,同样被邀请进入那个交接点的是生动语言的相似物,它积极地与文学价值的产出交织在一起:作为智慧的施动者和执行者——这一世界的土狼化身和多变化身。或许世界对被简化为仅是资源而进行反抗,因为它不是母亲/事情/抱怨——而是土狼,一种总是成问题的、总是有力地连接意义和身体的形象。女权主义的体现,女权主义对偏袒、客观性和情境知识的希望,在可能的身体和意义领域这个有力节点上开启了对话和代码。这里是科学、科学幻想和科幻小说在女权主义的客观性问题上汇合的地方。或许,我们对可解释性、政治、生态女权主义的种种希望取决于将世界修正为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对话的编码骗子。

第十章 后现代身体的生物政治：免疫系统话语中的自我构造^①

纪念爱好和平并死于艾滋病的罗伯特·费罗曼诺(Robert Filomeno)
(1949~1986)。

(第 2 幅图)

如果必须实现科氏(Koch)的假设,在重写艾滋病教科书的过程中来辨识一种带有特定疾病的特定微生物,把“特纳(Turner)的假设”考虑在内或许会有帮助(1984,第 209 页):(1)疾病是一种语言;(2)身体是一种表征;(3)药物是一种政治实践。(Treichler,1987,第 27 页)

非自我:一种覆盖一切的术语,明显不同于一种动物的自身组成。
(Playfair,1984,第 1 页)

免疫系统必须以某种形式识别自己,目的是对外来的东西做出反应。(Golub,1987,第 484 页)

① 特别感谢斯科特·吉尔伯特、鲁斯坦·霍格奈斯、杰伊·米勒、雷纳·拉帕和乔安·斯科特。这一项目的研究和写作由阿尔法基金会和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教师学术评议会研究资助和 UCSC 的硅谷研究项目提供支持。克丽丝多·格雷(Crystal Gray)是一位优秀的研究助理。这篇文章从很多人的评论中获益,它首次出现于 1988 年 3 月 5~13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温那·格林(Wenner Gren)基金会的医学人类学大会上。

块状话语与生物学和医学的变质主体

在充斥着生物研究、生物技术、科学医学的当代世界里,任何有关疾病的社会协商中都有多样且具体的文化方言相互交织在一起,对此进行强调是很常见的。生物医学的语言在授权意义的领域中永远不会落单,而且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面临痛苦时符号和行动的一致性。波拉·特莱希勒(Paula Treichler)(1987)在她的文章题目中,将备受争议的艾滋病的意义表达为“含义传染病”这一精彩短语,它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疾病的社会文本中。生物医学语言的力量——及其令人吃惊的产品、形象、建筑、社会形式和技术——构成成千上万疾病和死亡的不平等经历,是来源于各种各样正在进行中的社会过程的一个社会事实。生物医学和生物科技的力量不断地再生,否则它就会停止。这种力量不是一种固定和永恒的事物,而是内嵌于可塑体中,并准备着被历史学家或评论家切分来进行微观检查。与这种力量相比,生物医学的身体和自我生产的文化和材料权威是更易受影响、更动态、更难懂和更有力的。

但是,如果伴随着工业化世界中构建死亡的具体化符号过程的生物医学,对许多非科学、副科学、反科学或外科学的语言有一定的认识,那么在经常被不假思索地标记为科学的领域内部,找到对多种语言的强调就不是那么常见了。“据科学说”被表征为一种单义的语言。然而,甚至“科学”中有力词汇的结合性质都暗示着一种勉强包含的、不和谐的异质性。重叠话语及其知识对象的词汇,以及话语构建工作的具体位置上抽象共同名字的词汇——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生物医学(biomedicine)、精神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免

疫基因学(immunogenetics)、免疫内分泌学(immunoendocrinology)、神经内分泌学(neuroendocrinology)、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ies)、杂交瘤细胞(hybridomas)、白介素(interleukines)、基因泰克(Genentech)、安博士(Embrex)、免疫泰克(Immunetech)、生命源(Biogen),暗示了技术人员交际方法的直截了当的简略性,也暗示了在“科学”内部的意义边界上无法控制的压力和困惑。

本章探索了一些流行和技术的争论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现代科学文化中构建起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身体和自我。科学话语是“块状的”;它们为意义和实践容纳并制定浓缩的论争。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有力而多形态的信念、知识和实践的对象上,称作免疫系统。我的论点是,免疫系统是资本主义晚期符号和材料上“差异”主系统的精细图标。免疫系统明显是一个20世纪的对象,它是一张地图,在西方生物政治的辩证法中指导对自我和他者的识别和误识。也就是说,免疫系统是一种计划,使有意义的行为在正常和病态的关键领域中构建和维持区别自身和他者的边界。免疫系统是一种历史特定的区域,其中全球和本土政治;赢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多语言文化生产(从流行的饮食行为、女性科幻小说、宗教意象和儿童游戏,到照相技术和军事策略理论);临床医学实践;风险资本投资策略;商业和技术中改变世界的发展;在体现、弱点、力量和死亡上最深远的个人和集体经验,以一种配合的强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可能只限于性和繁殖的生物政治范围内。^①

【①即使不怎么考虑意识和文化的问题,免疫学的话语和人工制品的广泛重要性也有许多诊断标志:(1)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了一个原始发展,即白喉抗毒素的使用。随着许多介于其间的奖项,自1970年以来诺贝尔奖在免疫学中的速度令人吃惊,涵盖关于抗体多样性的产生、组织相容性系统、单克隆抗体和杂交瘤、免疫调节的网络假设以及放射免疫分析系统等方面的研究。(2)免疫学的产品和过程进入当前和预计的医学、制药以及其他产业实践。这一情况由单克隆抗体作为例示,这些抗体能被用来作为极其特殊的工具,在分子级别上

鉴别、隔离并操纵生产的组件,然后又以空前的特殊性和纯度来准备一种工业规模,其对象为一大批企业——从食品调味技术,到工业化学品的设计和制造,到化疗中的运载系统(见“免疫学和相关学科中的单克隆抗体的应用”[Application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in immun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Nicholas,1985,第12页)。《研究简报》(Research Briefings)为科学和技术政策联邦办公室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联邦部门和机构服务,1983年,它发现了免疫学,连同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可靠的地球科学、计算机设计和制造以及化学的区域,作为研究领域,“可能会报以最高科学利润作为递增的联邦投资的结果”(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1983)。这些领域中的利润不可能仅是“科学的”。“在这些项目中,主要的摇钱树无疑是杂交瘤技术及其主要产品,单克隆抗体”(Nicholas,1985,序言)。(3)免疫学领域本身是一种国际增长产业。免疫学的第一届国际代表大会于1971年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参与者大多是这一领域的世界主要研究者,来自45个国家的3500人。8000多人参加了1980年的第四届国际代表大会(Klein,1982,第623页)。这一领域的杂志数量从1970年的12本,增长到1984年的80多本。这一主题的书籍和专题著作到1980年大大超过了1000本。以新的生物科技为特色的工业和大学的合作遍布免疫学的研究安排,如分子生物学,随着这些安排,这种合作进行广泛的交叉作用,例如巴塞尔(Basel)免疫学研究所,完全由罗氏药厂(Hoffman-La Roche)资助,却以学术实践的所有成效为特色,包括出版自由。免疫学协会的国际联盟始于1969年,有10个国家协会,到1984年增长到33个(Nicholas,1985)。免疫学将会成为全球生物技术不平等性和“技术迁移”斗争的中心。它的重要性接近全球科学政治中信息技术的重要性。(4)关于免疫系统的写作方式也是决定那些疾病——及其解释的方法——将会在法庭、医院、国际资助机构、国家政策、战争老兵、平民的回忆和应对中盛行。例如,见对立人群的努力,如劳动力和消费者保护团体,来建立一种称为“化学艾滋病”的范畴,唤起人们对后工业社会中广泛的、未命名(“无定形”)的疾病的关注,这种疾病被公认与其产品和环境有联系,他们还努力将这种疾病与传染性艾滋病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政治策略(Hayes,1987;Marshall,1986)。关于传染性艾滋病的话语是决定什么可以算做是“一般人群”的一部分机制,以至于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有超过一百万的感染人群,更不用提感染的全球维度了,能通过把他们不包括在一般人群内的方式来进行命名,包括对国家医学、保险和法律政策的重要影响。在美国,许多重要的免疫学课本为过敏或自体免疫疾病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超过了寄生虫病,这一分配可能会引导诺贝尔奖获得者进入研究的某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而且必定不会引导本科生或医科学生为全球疾病的差异和不平等性承担责任(对比Golub[1987]和Desowitz[1987],查看一个细胞免疫研究者和一个寄生虫学家的敏感性)。谁可以算作一个个体与谁可以算作一般人群不是毫无关系的。】

免疫系统是高科技文化中的一个图标性神话对象,也是一个首要的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主体。神话、实验室和临床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平凡的观点是从1986~1987年《在版书目》(*Books in Print*)的标题名单中偶然获得的,我当时正在其中搜索某一本免疫学的本科生教科书。根据英语的字母排列顺序,以“immuno-”前缀打头的词条的这些书页以《科幻小说之神》(*Immortals of Science Fiction*)为开头,以《神之永恒》(*The Immutability of God*)为结束。在《在版书目》的指引下检查教科书的最后一部分《免疫学:一个综合体》(*Immunology: A Synthesis*, Golub, 1987)时,我发现了我正要找的东西:免疫学规律理论的图表化历史进程以及图表制造者的讣告,即一个重要的免疫学家,理查德·K. 格申(Richard K. Gershon),是他“发现”了抑制剂T细胞。这个标准的讣告比喻为科学家定好了基调,即他“必须拥有最早探索者所拥有的东西,即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要成为看到某物第一人,知道自己处于无人到过的地方”。这个英雄式的科学家“因为相互关联的免疫反应复杂性层面之上的层面而欣喜。他因为看到一种无人见过的复杂性层面而激动”(Golub, 1987, 第531~532页)。有理由假设本教科书的所有可能读者是听着介绍《星际迷航》中联邦恒星飞船“进取号”(*Enterprise*)的太空旅行而长大的——勇敢地去往无人去过的地方。科学仍是西方探险和旅游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文体。同样的,没有一个读者,无论多么没有想象力,能免除性别化的性欲比喻,描绘英雄探索自然的层层秘密,因为层叠的复杂性而欣喜,也为其自身进入更深的技术—性欲接触而自豪。科学作为英雄式的探索和应用于自然身体的性欲技巧是完全传统的形象。它们在20世纪晚期的免疫系统话语中呈现出一种特定的优势,在这种话语中核灭绝主义、太空冒险、外星主义、外来入侵者和军事高科技的主题是普遍的。

但是,戈卢布(Golub)和格申有意图的、清晰的教科书不是和星球大战的类型一样关于太空入侵者和免疫系统的。他们的主题是对复

杂性和亲密的自然身体技术的热爱,这些技术产生了有机生命的和谐。在四幅插图中——确定年代为1968年、1974年、1977年和1982年——格申勾画了他关于“免疫逻辑管弦乐队”的理念(Golub,1987,第533~536页)。这个管弦乐队是免疫系统在神话维度和技术维度上的一个绝佳画面(第3~6幅图)。所有的解释都是关于合作和控制的,即从18世纪晚期开始的有机体生物学主题。从淋巴结根源的指挥立场出发,第一幅插图中,G. O. D. (the Generator of Diversity,多样性生产者)指挥着管弦乐队的T细胞和B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在体内行进并演奏它们特定的声部(第3幅图)。这些淋巴细胞看起来都像鬼马小精灵卡斯柏(Casper),在它们无形身体的中心有着适当辨别的核结构。拿着指挥棒,G. O. D.的手臂像一个交响乐指挥一样高高举起。G. O. D.使人回忆起另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生物宗教的、获诺贝尔奖的“笑话”,关于后DNA生物学和医学的编码身体文本——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教义,指明“信息”的流向只能从DNA(脱氧核糖核酸)到RNA(核糖核酸),然后再到蛋白质。这三者被称为世俗化圣体的神圣三位一体,而且分子生物学的伟大探险史可以被命名为《创世纪的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Judson, 1979),这是一种形象,在当前如基因泰克(Genentech)一样的生物科技公司的风险资本和政治环境中呈现出某种讽刺。在分子生物学的科技—神话系统中,编码规则体现出结构和功能,绝不能颠倒。身体被理论化为一种编码文本,它的秘密只服从于适当的阅读传统,而且实验室似乎被特征化为技术和有机记载手段的一个巨大集合,在这个时候,创世纪成了一个严重的笑话。这个中心教义是与代码信息流的一个主控系统有关,代码决定了伟大技术交际系统中的意义,这些系统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机体逐步形成的。这种身体是一种人工智能系统,而且复制和原版的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然后又被推翻。

G. O. D. 是多样性的生产者,多形态的识别和误识系统被我们称

作免疫系统,多样性的生产者是该系统惊人的多种特性的来源。到了第2幅插图(1974),多样性的生产者不再位于免疫管弦乐队的前面,而是站在淋巴结的顶端,手臂交叉,看上去威严但不忙碌,被音乐的淋巴细胞所围绕(第4幅图)。一个特殊的细胞,即T抑制细胞,接管了指挥的角色。到1977年,插图(第5幅图)中不再是单个的指挥了,而是由三个T细胞的神秘次集合“指导”,它们拿着总共12根指挥棒表示它们给出方向的表面身份标记;而多样性的生产者则在专制的混乱状态下苦思冥想。但是,免疫乐队的演奏仍在继续。在最终的插图中,从1982年开始(第6幅图),“多样性的生产者似乎服从于帮助天使和抑制天使的矛盾命令”,这些天使栖息在他的左右肩上(Golub, 1987,第536页)。除了多样性的生产者和两个天使外,还有一个T细胞指挥和两个矛盾的提词人,“各自敦促其自身的解释”。在这个交响乐系统中,单一巧妙控制机体和谐的玩笑对“自我”的完整性负责,已经成了一种多个中心和边缘的后现代大杂烩,其中此页介绍的免疫音乐必定听起来象幼儿园的空间音乐。所有曾经站在台上饰演明确和连贯的生物政治主体的演员仍然在场,而他们的和谐肯定是有点问题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免疫系统明显是一个后现代对象——从符号、技术和政治上说。凯瑟琳·海勒丝(Katherine Hayles)(1987b)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特征化,根据发生在“文化内部多个地点(包括文学和科学)的三次发展浪潮”。她的考古学始于使符号系统“改变性质”的索绪尔语言学。内部产生的关系差异,而非模拟,主宰着意指过程。海勒丝目睹了这种方法在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世纪中期信息统计理论中的累积,这一理论的发展是为了贝尔电话公司的传送线上打包最多数量的信号,并且扩展覆盖一般交际行为,包括那些在动物行为学或分子生物学中由身体符号学代码指导的行为。因此,“信息”的生产和处理系统是后现代的对象,内嵌在一种内部区分的能

指理论中,并远离作为模拟的表征学说。作为一种改变历史的人工制品,“信息”只存在于特定种类的宇宙中^①。逐渐地,世界和符号似乎存在于无法衡量的宇宙中——确实没有衡量的尺度可连接它们,而且所有文本的阅读传统都变得类似于那些科幻小说所需的阅读传统;出现的是一种全球技术,“将文本从语境中分离成为家常便饭”。海勒丝的第二次浪潮,“由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动力,使稳定可再生的语境消失成为一种国际现象……语境不再是每次经历的一个自然的部分,而是一种不能任意更改的人工产品”。海勒丝的第三次变质浪潮关乎时间。“始于相对性的特殊理论,时间越来越不被看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进程,沿着所有人服从的线性刻度,而被看做是一种以不同方法构思出来的构造”。

语言不再是天主圣言的一种重复,而是一种技术构造,作用于内部产生的差异的规则上。对几何学或宇宙通讯语言撰写的自然文本的一种解释,如果由早期的现代自然哲学家或文艺复兴的医生来指导,那么后现代科学家仍在为了生计而阅读,但却拥有一种识别编码系统作为文本——易受误识病理的影响——体现在与计算机网络和免疫系统一样的对象上。这种语言和技术之间不同寻常的紧密联系,很难在后现代主义中受到重视。这个“构造”处于注意力的中心;制作、阅读、写作和意义似乎都接近同一个事物。对于“影响”着医学人类学当代研究趋势的政治经济、符号和科学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来说,这种在技术、身体和符号之间近乎同一的性质暗示了某种优势。

^① 如本文读者和其他作者所居住的宇宙。

身体生产的装置：参与的技术—生物政治

那么，身体不是天生的；它们是后天制造的（第7幅图）。和符号、语境及时间一样，身体被彻底改变了性质。20世纪晚期的身体不是从浪漫主义中理论化的内部和谐规则发展而来的。它们也不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领域内被发现的。没有人天生是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正确地坚持这一论点。需要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认识论领域来坚持德·波伏娃这一论点的联合文本：没有人天生是有机体。有机体是后天制造的；它们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构造。有机体边界的构建，即免疫学话语的工作，对于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人们来说，是疾病和死亡经历的特别有力的调解者。

在这个过于武断的语境中，我将讽刺地——而且不可逃避地——建立一种构建主义的概念，作为一种分析手段来追求一种对居住在宇宙中的单位、自我和个人种类的理解，这个宇宙是由免疫系统话语构建的：这种概念工具，即“身体生产的装置”，先前在第197~201页（原著）被讨论过（King, 1987b）。科学身体不是意识形态的构建。身体总是在根本上具有特定历史性，因此它们有着一种不同的特殊性和有效性，而且，它们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参与和干涉。这种“材料—符号执行者”的概念意图强调知识对象，将其作为身体生产装置的一个积极部分，而从没有隐含过这些对象的即时存在，或者同一回事，它们的最终或独特决定，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决定什么可算作生物医学身体的客观知识。身体作为知识的对象，是材料—符号生成的节点。它们的边界在社会互动中变得具体起来，如身体之类的“对象”不会那样预先存在。科学客观性（对象的位置和视野）不是与分散的发现有关，而是

与相互的、总是不平等的构建有关,与承担风险有关。各种竞争的生理身体出现在以下这些事物的交叉点上:生物学的研究、写作和出版;医学和其他行业的实践;所有种类的文化生产(包括可用的修辞和记叙)以及技术(如形象化技术,使色彩强化的杀手 T 细胞和发育胚胎的私照进入每家中产阶级的高亮艺术相册里)(Nilsson,1977,1987)。

但同样被引入那个交节点的,是积极地交织在文学价值生产中生动语言的相似物:一个世界的土狼化身和多变化身,作为风趣的行动者和执行者。或许在后现代框架的技术生物政治中,我们对可解释性的希望依赖于重新修正这个作为编码骗子的世界,它是我们必须学会对话的对象。和受到强调的蛋白质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可能是彻底改变了性质,但是它的必然性一点也没有减少。所以,当 20 世纪晚期免疫系统作为身体生产精密装置的一种构造时,免疫系统和任何其他改变世界的生物医学体——如细菌——都不是一种虚无的幻想。土狼不是一种鬼魂,它只是一个多变的骗子。

下表中对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身体的生物医学生产的两个历史时期进行了抽象化和二分化。该表强调了在这个世纪中科学身体构建的可能竞争的认识论、文化和政治方面。该表本身是一个传统的小机器,来生产特定意义。它不是一种描述,必须作为一个论点来解读,而且是一个依赖于意义生产的可疑技术——二分法的论点。

表 征	模 拟
中产阶级小说	科幻小说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有机体	生物组元,代码
工作	文本
模仿	能指的作用
深度,完整性	表面,边界
热力	噪音
生物学作为临床实践	生物学作为记载
生理学	交际工程学
微观生物学,肺结核	免疫学,艾滋病
神奇子弹	免疫调节
小群体	次系统
完善	优化
优生学	基因工程学
衰落	退化
卫生	压力管理
劳动力的有机分工	人类工程学,控制论
功能专业化	模块构建
生理决定论	系统限制
繁殖	复制
个人	复制子
群体生态学	生态系统
存在体的种族链	联合国人文主义
殖民主义	跨国资本主义
自然/文化	差异领域
合作	交际强化
弗洛伊德	拉康
性	代孕
劳动	机器人学
心智	人工智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星球大战
白人资本家长制	统治的信息学

在此表格的右栏中不可能看到诸如“自然的”之类的词条,这也是颠覆左栏中的自然地位的一种意识。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性

别、种族和阶级的伟大历史构建被包含在女人、殖民或奴隶以及工人的有机标记的身体内。对于普通未标记的人种,即一个连贯主体的虚构理性自我来说,那些栖息在有标记身体内的构建是符号上的他者。有标记的有机身体是文化和政治竞争的关键场所,对解放的身份政治语言和统治系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系统利用广泛共享的自然语言,作为文化挪用的来源。例如,在英国和美国 19 世纪中产阶级医疗建议文学中的性征化身体,以围绕母性功能和子宫的生理位置而组织起来的女性形式,以及由精子经济命令的并与神经系统紧密相联的男性形式出现,这是详尽的有机经济话语的一部分。这些身体活动的叙述领域产生关于理性公民权、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以及预防性污染和低效(如卖淫、犯罪或种族自杀)的描述。一些女权主义政治要求女性完全包含在国家政体中,理由是家庭经济中的母性功能延伸到了公众世界。后来进入 20 世纪,男女同性恋政治讽刺并批判地接受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性学和性别身份医学中构建起来的有标记身体,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性解放人文主义话语。黑人文化认同、女性写作、各种分离主义和其他最近的文化运动都吸收并颠覆了自然化的逻辑,在殖民化和男权至上的历史中,它是种族和性别的生物医学话语的核心。在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相互对立联系的政治和生物医学描述中,身体仍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身份、机构、劳动和等级化功能的场所。科学人文主义和生理决定论都能根据 18 世纪后生命科学中制造的生物有机体来进行认证和争论。

但是,生理和医学的身体被当做符号来动手术,不是作为一种工作系统,由劳动力的等级分工来组织,由高度局部化的神经功能和繁殖功能之间的一种特权辩证法来命令,而是作为一种编码文本,组织成一种工程化的交际系统,由一种液体和传播的命令控制智能网络来命令,在这个时候,正常叙述和病理叙述是如何起作用的?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生物医学话语围绕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和实践被逐步组

织起来,这套技术和实践动摇了等级的、局部化的、有机的身体的符号特权。同时——来自于一些同样的历史基体:非殖民化、多国资本主义、世界高科技军事化,以及本地和全球政治内部从那些先前被分配沉默劳力的人之中出现的新集体政治执行者——“差异”的问题动摇了以身份和实质团结的政治为基础的人文主义解放话语。女权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话语实践,产生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以西方关于自然的科学语言和政治语言的翻译为特征,范围从那些工作、局部化和有标记身体为基础的语言,到那些以代码、传播和网络构建、切分的后现代主体为基础的语言。一种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身体描述必须始于基因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多种分子界面。生物学是与识别和误识、编码错误、身体的阅读实践(例如,移码变异)以及人类基因组排序的上亿美金项目有关,这些项目将出版并储存在国家基因“图书馆”中。身体被认为是一种策略系统,在意象和实践的关键舞台上被高度军事化了。性、性征和繁殖根据本地投资策略被理论化了;身体不再是一种稳定的规范化功能的空间地图,而是以一种高度可变的策略差异领域出现。这种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身体是一种符号系统、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领域,因此,免疫学话语,即关于识别/误识的中心生物医学话语,从很多意义上说,成了一种高风险的实践。

有关诸如生物组元和代码的物体,人们不能根据生长法则和基本属性,而必须根据设计策略、边界限制、流动速度、系统逻辑和降低限制的成本来考虑。性繁殖成了许多策略中可能的一种,将成本和效益理论化为一种系统环境的功能。疾病是信息故障和交际病态的亚种;疾病是一种误识的过程,或是对一种称为自我的策略集合边界的逾越。性繁殖的意识形态不再轻易地要求没有问题的性和性角色的概念,作为“健康的”自然物体(如有机体和家庭)中的有机方面。种族方面也是一样,人类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必须根据参数频率和承载权力的

差异领域而发展起来,而不是根据本质和自然根源或自然发源地。种族和性别,与个体一样,是由知识和权力的话语联系所维持或破坏的产品。任何物体或人都能根据解体和重组而被合理地考虑;没有一种“自然的”建筑限制系统设计。设计依然是高度受限的。什么可算作一个“单位”、一个整体,是很成问题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给定的东西。个体性是一个策略防御问题。

人们应该期望控制策略集中在边界的条件和界面上,在跨边界的流动速度上,而不是集中在自然物体的完整性上。西方自我的“完整性”或“真实性”为决定步骤、专家系统和资源投资策略让路。“自由度”成了政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比喻。人类,与其他任何成分或次系统一样,必须局限于一个系统建筑中,其基本的操作模式是随机的。没有一个物体、空间或身体是害怕自我的;如果适当的标准、适当的代码能在一种普通语言中构建起来处理信号,那么任何成分都能与任何其他成分连接。特别是,没有理由在本体论上反对有机的、技术的和文本的东西^①。但是,也没有任何理由将神话的东西用来对抗有机的、文本的和技术的东西。比起残余的对抗性来,它们的汇合更为重要。影响这个宇宙中各种成分的特权病态是压力——交际故障。在身体中,压力是通过“压制”免疫系统来理论化而进行操作的。身体成

^① 这种本体论上的持续性实现了对感染计算机软件的“病毒”程序这个不断增长的实际问题的讨论(McLellan, 1988)。这些传染性、侵略性的信息片断寄生于它们的寄主有利于它们自身的复制和程序命令的代码中,它们不只是在隐喻上像生物病毒。而且和不受欢迎的身体侵入者一样,这些软件病毒根据病理学被讨论为交际恐怖主义,需要策略安全手段的形式进行治疗。有一种人工智能体系的病毒传染的流行病学,而且无论是大公司或军事系统还是个人电脑,都没有很好的免疫防御。它们都极易受到外来代码的恐怖主义袭击和迅速蔓延,这种代码无声地复制并颠覆它们的正常功能。杀毒的免疫程序,如数字调度有限公司(Digital Dispatch, Inc.)的数据医生,正在市场上出售。1985年,数据医生的购买者一半以上来自军事机构。每次我打开我的苹果电脑,那上面就显示出它的防毒程序标志——一支注射针管。

了赛博格——模控有机体——混合技术——有机的化身和文本性的合成物(Haraway, 1985 原著第 149~181 页)。赛博格是文本、机器、身体和比喻——都是在实践中根据交际被理论化和使用的。

存活于世的赛博格^①

然而,正如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有机体适应了一种文化、政治、金融、理论和技术竞争的多样化领域,赛博格因此也是一种竞争和异质的构造。它能够在研究实践、文化生产和政治干涉的层面维持对立和解放的项目。对这一大主题的介绍可能是通过检验 20 世纪晚期生物科技身体的对比构建,或其他同时代的后现代交际系统的对比构建。这些构造可能由至少两个对立的模式来构思和建造:(1)根据主控原则,在一种语言和具体化的理性主义范式内部提出;或(2)根据复杂的、结构上内嵌的意指过程,与许多“多样性生产者”一起,存在于一种反理性主义(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话语或西方科学和哲学中已有的启发式/情境主义/构建主义话语内部。维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和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1986)在《理解计算机和认知》(*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中的合作研究特别推荐考虑在免疫学话语内部关于表征技术和“差异”体现的文化/科学/政治争论的可能性,在免疫学话语中,知识对象是一种“生理身体的人工智

^① 感谢伊丽莎白·博德(Elizabeth Bird)创造了这一口号的政治按钮。我打着这个口号,作为一个称为“代理他者”的亲密关系群体的成员之一,参与了 1987 年 5 月在内华达克试验基地的“母亲和其他人的节日行动”。

能/语言/交际系统”^①。

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指导了一种对理性主义范式的详细评论，来理解具体的(或“由结构决定的”)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并且设计出能够在人类项目中作起到假体功能的计算机。在理性主义认知模式的简单形式中，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存在这一种客观现实，它的组成物承载着各种属性，并建立起各种关系。一个认知存在体收集这些事物的“信息”，并建立起一种心理“模型”，这种模型会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对现实的一种忠实表征)，而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知识是一种表征的仓库，能够被要求做出推理并译成语言。思考是一种操纵这些表征的过程。(Winograd, Edwards & Gordon 的论文集，即将发表)

正是这种表征的学说，维诺格拉德发现它在许多意义上是错误的，包括通常在科学写作中被抑制的政治和道德的话语层面。他继续说，为进一步引导软件设计中的研究，这一学说在技术上也是错误的：

① 在当代神经免疫学或心理神经免疫学中孕育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关系，可能是在这里定位一个更全面论点的理想场所。随着发现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细胞所共有的受体和产品，把分散而联网的免疫系统作为心智和身体之间的调解者，这一假设对“硬”科学家来说开始讲得通了。这对大众和官方的治疗法的影响数不胜数，例如，关于称作“压力”这一多义实体的。见 Barnes(1986, 1987); Wechsler(1987); Kanigel(1986)。生物学隐喻被引用来命名免疫系统，也作为一个有力的调解者用来促进或阻碍免疫系统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主控系统或超武装防御部门。例如，发展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在教学中把免疫系统作为一种生态系统，而神经免疫学研究家埃德温·布雷拉克(Edwin Blalock)把免疫系统称作一个感觉器官。这些隐喻对星球大战意象中超理性的人工智能免疫身体来说是对立的。同样的，它们在研究设计以及教学和治疗法中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

“与共识不同,在这一传统中固有的语言、想法和理性的‘常识’理解最终阻碍了计算机技术有成效地应用于人类生活和工作。”吸取海德格尔(Heidegger)、伽达默尔(Gadamer)、马图拉纳(Maturana)和其他人的思想,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发展了一种学说,即解释者和被解释的东西是相互依赖的,两者不是分离的和独立的实体。预先的情境理解对于所有的交际和行为都是关键的。“由结构决定的系统”,与“结构结合”过程中定型的历史一起,给出了一种比表征学说更好的感知方法。

环境的变化在神经系统中本身有着改变相对活动类型的潜在力量,接着指导有机体行为的方向。这种视角使我们获得环境表征的假设失效。也就是说,阐释作为一种生物存在体结构的必然后果出现了。(Winograd, Edwards & Gordon 的论文集,即将发表)

根据语言、交际和构建的隐喻——而不是根据一种关于心智和语言的理性主义学说或一种空洞的工具主义,维诺格拉德来构思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的、有机体互相之间的,或是有机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内外世界的结合。语言行为涉及共享的解释行为,而且在一个构建的世界中,它们基本上是依赖于使用场所。语境是一个基本事件,不是作为环境“信息”,而是作为共有结构或共有文本。对于维诺格拉德来说,认知、参与和情境依赖在技术上和哲学上是相关联的概念。语言不是与描述有关,而是与承诺有关。这一点适用于“自然”语言和“人造”语言。

这种对交际术语和生物制品的理论化方法是如何影响身体“技术”的免疫系统话语的,这种技术在后现代文化中识别自身和他者,并调解“心智”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正如计算机设计是一种地图,来自

于生活方式并服务于生活方式的,而在面对自我边界和死亡的问题时,免疫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关系的图表和行动的指南。免疫系统话语是关于进入一个世界的限制和可能性,这个世界充满了“差异”,充斥着非自我。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的方法包含了一种争夺病理学概念或“故障”概念的方法,而不用武装身体的区域。

故障在人类理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故障不是一个可以避免的负面情况,而是一个非显而易见的情况,其中我们正在使用的工具网络的某些方面被曝光……一个故障揭示我们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关系联结……这创造了一个明确的设计目标——预见故障的形式,并提供故障发生时行动可能性的空间。(Winograd, Edwards & Gordon 的论文集,即将发表)

这不是一场星球大战,也不是一种对易损性的战略计算计划关系,但它也不否定治疗行为。它坚持根据情境目的,来定位治疗重构行为(所以在理论上是善解人意的),而不是根据作为自动武装化工厂这一身体中自我完全防御的幻想,即当机器人战斗管理者以外来信息的比特形式进行侵略,威胁要接管主控代码时,遇见敌人(非自我)的一种终极自我。

情境目的一定是有限的,植根于偏袒性以及一种同一和差异、维持和分散之间的微妙作用。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的语言系统是“被改变性质的”、完全构建主义的实体;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后现代的赛博格,并不依赖于有机的、技术的和文本的东西之间不可渗透的边界。但是,他们的语言系统和交际系统明显对立一个“信息社会”的人工智能赛博格,也包括信息社会最终提取于易损性以致具

体化的灭绝主义病态^①。

唯一和大量：自我、个体、单位和主体

是什么构成了后现代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话语内部的个体？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即使是最可靠的西方个体化身体，即一家设备齐全的实验室里的老鼠和人，既不止于皮肤，也不从皮肤开始，皮肤本身是某种鱼龙混杂之地，威胁着非法融合，尤其是从电子扫描显微镜下看。在一个确定的基因图书馆中，“人类基因组”排序这种几十亿美金的项目对于“人”构建为科学“主体”的问题来说，可能会被视为是一个实用的回答。基因组项目是一种后现代人文主义的技术，通过对它的阅读和写作来定义“该”基因组。这种特别的读写能力所需要的技术是由麦考金(Macro Gene)(宏观基因)工作站的广告所推荐的。“缺少的环节”从水里爬上陆地，在这一引发图中，该广告把神话

^① 我开始认为自己妄想有人真的梦想超验分离，作为生命和心智的目的论，这时我发现了类似以下引文中的东西，引自计算机设计师 W. 丹尼尔·希利斯(W. Daniel Hillis)在 1988 年冬季号的《泰达路斯》(*Daedalus*)上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

当然，我了解这只是一个梦，而且我会承认我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希望，而不是成功的可能。但是如果这种人工心智可以自我维持，自行生长，那么人类的思维将第一次脱离肉体而存在，将我们被剥夺的人间的永生赋予这个心智之子。(Hillis, 1988, 第 189 页)

感谢伊芙林·凯勒向我指出了这一引文。见她的“来自生命的秘密，死亡的秘密”(From secrets of life, secrets of death, 1990)。我对核灭绝主义、外星主义和同类相食的象征和神话的分析，从左·索芙莉丝(1984; Sofoulis, 1988)中受益匪浅。

的、有机的、技术的和文本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加上文字“在 LKB 麦考金(宏观基因)工作站(用来排列核酸)中,没有‘缺少的环节’”(见第 8 幅图)。怪兽鱼石螈在地球的一次巨大变动时爬出深海,它是 20 世纪晚期身体和技术变形的一个完美形象。一个使人文理论家暂停的规范化行为,即标准的参考工作称作人类基因组,会在由一个国家和国际标准基因局所保存的详尽代码中,成为驯服人类多样性及其病态的方法。这个巨大词典的储存成本将可能会超出它的生产成本,但这对于任何图书管理员来说一点也不稀奇(Roberts, 1987a, b, c; Kanigel, 1987)。对于“人类”来说,进入这种标准会是一件取决于国际金融、专利和类似斗争的事情。本书中的人们最终将拥有一个标准的起源故事。一开始就是它的副本。

人类基因组项目可能会定义后现代物种存在体(请哲学家们原谅),但是个体存在体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延伸的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中提出这一难解的问题。他指出,1912 年,朱利安·赫胥黎用生物学术语将个体性定义为“字面上的不可分割性——充分不一致的性质,切成两半后导致无功能”(Dawkins, 1982, 第 250 页)。这似乎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用赫胥黎的话说,你或我当然会被看做是一个个体,而许多蠕虫则不能。即使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高度,蠕虫的个体性也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没有理由去担心。但是,赫胥黎的定义并没有回答哪种功能

正在被讨论。在摘要中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它依赖于已完成的事项。^① 你或我(无论这些代词有着多么成问题的称呼)可能是一种个体,为了某种目的,而不是为了他者。这是一种关于赛博格们和女人们的正常本体论状况,不然就是关于亚里士多德们和男人们的。功能与行动有关。道金斯提出了一种个体性的观点,它在每个意义层次都是有策略的,这时,他在这里有了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对道金斯来说,有许多种类的个体,但有一种是占首位的。“我们搜寻一种‘选择单位’的全部目的是发现一种合适的执行者,在我们的目的隐喻中发挥领导作用”(1982,第91页)。这种“目的隐喻”归结为一条单一的底线:复制。“一个成功的复制基因以副本的形式成功地世代相传,并且成功地繁殖出许多自身的副本”(1982,第87~88页)。

① 当然,那就是为什么女性在现代西方话语中算作个体是如此麻烦。她们个人的、有界限的个性是由她们身体制造他人身体这一令人不安的天赋构成的,而这些他人的个性可以高于她们自己的个性,甚至当这些小身体还完全在体内孕育,不靠主要的光学技术是看不见的(Petchesky,1987)。在某种意义上,女性可被切成两半,并保留她们的母性功能——目睹她们死后身体被保持下来维系另一个个体的生命。母性个性的特殊模糊性——最终,或许比蠕虫更能抵制完全自由的人性——在怀孕期间延伸到对免疫功能的描述。生物医学的老问题是,为什么母亲不把这个小入侵者作为外来者而排斥它进入呢?毕竟,胚胎和胎儿都被所有普通的免疫学标准清楚地标记为“他者”;而且在某些称为滋养层的胎盘细胞的位置上,胎儿和母体的组织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与直觉相反,结果是“免疫系统活动低下”的女性最终在免疫上排斥她们的胎儿,通过形成反对它们的抗体。通常来说,女性产生特殊的抗体,来掩盖胎儿营养层的外来警报信号,以至于母亲的免疫监视系统对胎儿的存在视而不见。用来自于她们的“丈夫”或其他基因上不相关的捐献者的细胞对那些“排斥型”女性进行免疫,她们的免疫系统可引发产生阻断抗体。看上去,大多数女性都被引发产生这种抗体,作为性交过程中她们的“丈夫”的精子“免疫化”的结果。但是,如果“丈夫”与潜在母亲在基因上太接近,那么有些女性就不会把他的精子看做是外来的,而她们的免疫系统就不会产生阻断抗体。所以,婴儿就被看做是外来的。但是,即使这一恶性行为也不会把这个女性变为一个良好的个体,因为这是由她不能对性交过程中最初违反她边界的行为作出适当反应所导致的(Kolata,1988a3、b)。有一点似乎非常清楚:为了女权主义的目的,个性化的生物政治话语有它们自己的界限!

复制基因片段中最终最为重要的是个体性,在演化论的构建时间里,复制基因片段不是特别“单一的”。对于它服务的所有对象来说,对于道金斯来说,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复制基因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并且它的内部范围仍是可变异的。但是,这些单位还是必须比一个“单一”的蛋白质基因编码要小一点。单位仅够维持复制技术。和复制子的边缘一样,其他策略集合的边界也不是固定的——在一个自我和他者都非常危险的世界中,这全部必须与复制策略撒下的大网有关。

完整的多细胞有机体是一种现象,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原始自私的复制基因上出现。它雇佣复制基因表现出群体性短期内“和谐”结束了。保证它们存活的表型力量大体上是延伸的、无限的。在实践中,这种有机体作为一种部分限制的局部浓缩体出现,即一种复制基因力量的共享节点。(Dawkins, 1982, 第 264 页)

“大体上延伸的、无限的”——这是一个关于相互联结性的出色论断,但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论断,引导现存世界理论化为一个巨大的武装民族。“延伸出身体外面的表型不是必须成为无生命的人工制品:它们自身可以由有生命的组织构建起来……我将显示,把寄生基因看做是寄主身体和行为中具有表型表达的东西,在逻辑上是合理的”(1982,第 210 页,强调我的观点)。但是,作为他者表型的存在体本身是和其自身的复制端一起,由繁殖体构成的。“一种动物不一定会被动地服从,被人操纵,而且一个演化的‘武装民族’预期会得到发展”(1982,第 39 页)。这是一个武装民族,必须把身体生产方法的发展阶段及其维持成本考虑在内。

多细胞的身体是一种生产单细胞繁殖体的机器。和大象一样,巨大的身体最好是被看做重型工厂和机械,即一个暂时的资源消耗,为了促进以后的繁殖体生产而进行投资。在某种意义上,种系“想”要降低重型机械中的资本投资……(1982,第254页)

大的资本事实上是一种消耗;小的是一种美。但是,你我需要大资本的投资,不只是在基因方面。或许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种系,尤其是自从“我们”——成年哺乳动物的非种系成分(除非你等同于你的单倍体配子及其内含物,而且有些是等同的)——不能成为复制单位时。“我们”只能力争一种防御的自我,而不是复制的忠实度,即别种单位的属性。在“我们”内部存在着最具威胁性的他者——繁殖体,我们暂时是它们的表型。

所有这些都与作为资本主义晚期“差异”系统地图的免疫学话语有什么关系?让我试着表达出这个称作人类免疫系统的奇妙身体对象的表征意味,选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和研究报告。免疫系统由大约10~12个细胞组成,比神经系统多两个数量级细胞。一生之中,这些细胞从具有多能性的干细胞中重新生成,这些干细胞本身保持着不可区分性。从胚胎到成年,免疫系统位于一些相对无定形的组织和器官里,包括胸腺、骨髓、脾脏和淋巴结;但是,它的一大部分细胞是位于血液和淋巴循环系统以及体内的液体和空间里。有两个主要的细胞种类与这一系统直接相关。第一是淋巴细胞,包括多种T细胞(助手、抑制者、杀手以及所有这些的变体)和B细胞(每一种仅能产生各种潜在循环抗体中的一种)。T细胞和B细胞有着特定的特征,不管工业化学变得多么聪明,它们都能够识别几乎任何可能存在的适合大小的分子列。这种特征是靠一种巴洛克式的身体变异机制、克隆选择以及一种多基因受体或标记系统所促成。第二个免疫细胞的种

类是单核白细胞系统,包括多才多艺的巨噬细胞,它们除了另外的识别技能和联系外,似乎也与神经细胞分享受体和一些激素肽产品。除了细胞室以外,免疫系统还包括五花八门的循环非细胞产品,如抗体、淋巴因子和补充成分。这些分子不仅促成免疫系统成分间的交流,而且还促成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间的交流,因此起到了连接身体多项控制和协调的场所和功能的作用。免疫系统细胞的基因学,与它们产生完成的表面受体和抗体的身体变异和基因产品的高速拼接与重排一起,甚至在“一个”身体内部嘲笑一个恒定基因组的概念。旧的等级身体已经给一个真正惊人的复杂性和特征的网络身体让路。免疫系统无处不在。它的特性是不确定的,否则就是无限的,而且它们随机地出现;然而,这些不同寻常的变体是维持个体身体连贯的关键手段。

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奖的免疫学家尼尔斯·杰尼(Niels Jerne)提出了一个免疫系统自我调节的理论,称为网络理论,必定能完成这一最简主义的解释(Jerne,1985;Golub,1987,第379~392页)。“网络理论与其他免疫学思考不同,因为它将仅用自身来自我调节的能力赋予免疫系统”(Golub,1987,第379页)。杰尼的基本思想是,任何抗体分子必须能够在功能上既充当对于某些抗原的抗体,也充当对于自身某种抗体生产的抗原,尽管是在另一个“自我”的领域。所有这些场所都获得了一种专业的命名,有足够的威慑力无限期地抵制该理论的大众理解,但基本理念是很简单的。内部的识别和反应的联结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在一系列关于免疫球蛋白分子站点的内部镜像中,以至于免疫系统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内部反应的状态。它绝不会是被动的、“静止”的,等待着一个来自于敌对外界的激活刺激。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一种外来的抗体结构,没有一种“侵入者”,是免疫系统没有“见过”和内部映射的。“自我”和“他者”失去了它们理性主义的对立性质,并且成为部分映射的解读和反应的微妙作用。这种内部

形象的概念是该理论的关键,而且它包含了一种假设,即免疫系统的每个成员都能与其他每个成员进行互动。与道金斯的延伸表型一起,一种关于联结的根本理念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后现代行动的中心。

这是一种独特的想法,如果正确的话,那就意味着免疫系统,与抗原决定基一起,能在动物以外的世界中实施的所有可能反应,已经在动物以内已有的互补位和独特位的内部系统中得到了解释。(Golub,1987,第 382~383 页)

杰尼的理念回顾了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在其感知方法中对结构结合系统和由结构决定的系统的坚持。关键问题是系统的内部结构化活动,而不是在交际系统的“内部”世界,即有机体中“外部”世界的形式表征。杰尼和维诺格拉德的表达式都反对概念化手段,一种理性主义的识别和表征理论最容易促成这些手段。在讨论杰尼称作免疫系统的深层结构和生成语法时,他表明“同一种结构能出现在许多语境中的许多结构上,而且能由读者或免疫系统做出反应”(引用自 Golub,1987,第 384 页)①。

免疫系统——通过其识别行为,流动的、传播的、网络构建的技术——有机——文本——神话的系统连接身体中更为枯燥和局部的中心——是否以一个连贯的生理自我的协调手段的形式,代表着向整体

① 很明显杰尼获益于乔姆斯基(Chomsky)的结构主义,就像与任何这种版本的机构主义内在整体性有关的困难一样。我的观点是,这里可看的東西不只是一个操之过急的批评所允许的范围。杰尼和乔姆斯基对彼此的印象并不是分别提出现存动物和语言的理论而占据同一个知识领域。见 Foucault(福柯)《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70)。记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把话语定义为“系统地来自于它们所说的事物的实践”(Foucault,1972,第 49 页)。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家族关系是我现在要回避的东西。

演化的利他主义终极标志？一句话，不是，至少在利奥·巴斯(Leo Buss)(1987)的《个体性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ity*)有说服力的后现代理论方案中不是。

在构成一种技术整体论的过程中，对生理身体的最早的模控交际系统理论方法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特权协调，依靠“循环因果反馈机制”起效。在20世纪50年代，生理身体成了技术交际系统，但是它们完全不能重构为“差异”的场所，在后现代意义上——能指和复制基因在一个策略场中的作用，这个场的意义充其量只能是成问题地依赖于外部世界本身。甚至社会生物学的第一次合成宣言，尤其是E. O.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新综合体》(*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1975)，维持了一种关于模控有机体或赛博格的技术—有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基础本体论，通过自然选择规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延伸和修改在演化论中重新定位。演化理论学家们严厉指责了威尔逊和一些其他社会生物学家们的这种“保守的”维度，他们在生物组织的每个层面上，从基因片段到生态系统，就改变机体生物学协调原则的性质，已经走得更远了。内含适应度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坚持用一种信封包裹有机体及其亲属，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进化论中，这个信封已被屡次打开。

道金斯(1976, 1982)已成为赛博格生物整体论的最激进的辩论者之一，而且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受到的一种后现代意识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在这种意识中，文本、技术和生物之间的渗透性逻辑以及深刻理论化所有可能的文本和身体作为策略集合的逻辑，使“有机体”或“个体”的概念变得极为有问题。他忽略了神话，但神话却在他的文本中遍布。“有机体”和“个体”并没有消失；而是它们完全改变了性质。也就是说，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它们是本体论上的偶然构造，而不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或女权主义科学史学家的信口胡诌而已。

利奥·巴斯重新解释了继续抵制这种变质的两个重要余留过程

或对象：(1)胚胎发育，正是一个个体构建的过程；(2)免疫系统的互动，一个个体面对许多人时维持其整体的标志性手段。他对于免疫系统的基本论点是，它由一些易变的细胞种类组成，每种都参与了其自身的复制“端”。这些竞争的细胞种类执行着身体功能，因为：

保证运送强化生长的促细胞分裂剂的受体也引起了身体功能。和被巨噬细胞用来激活那个细胞种类的另一受体的编排一起，细胞毒素 T 细胞识别出其目标。同一受体强迫袭击受感染的细胞，需要从助手细胞那里获得促细胞分裂剂……通过利用细胞的固有倾向，免疫系统以促进细胞自身的复制速度来起作用。
(Buss, 1987, 第 87 页)

个体是一种受限制的意外，而不是地球史上劳动的最高成果。在原生动物的有机体中，至少有两种选择单位是相关的：细胞单位和个体单位；而且它们的“和谐”是高度偶然的。这些部分不是为了整体。在任何亚里士多德认识的意义上，根本没有部分/整体的关系。病态是由细胞和有机体的选择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因此，巴斯重组了多细胞有机体的自我识别手段，即维持“整体”的手段，范围从生物学和医学本体论中的一种协调特权解释，到每个个体性构造中不可简化的易损性、多样性和偶然性的一个主要目击者。

对于西方生物医学内部的病理学和治疗学来说，这种行动的潜在意义至少可以说是有吸引力的。有没有一种方法，将杰尼、道金斯和巴斯所建议的话语转化为一种对立的/交替的/解放的方法，类似于认知和计算机研究中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的方法？这种后现代身体，即这种总是脆弱和偶然的个体性构造，是否一定是在 20 世纪末西方科学身体隐秘内部的当前外星人空间里的一种自动化星球大战战场？在形象化实践、自助学说、生物学家的隐喻、对免疫系统疾病的讨论以

及科幻小说中,通过关注许多免疫系统的当代表征,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什么了解?这是一次大探究,在后面的篇幅中,我只是开始勾画由后现代免疫系统促成的身体近来的少量文化生产,它们有时是有希望的,但往往是非常令人不安的^①。在这一阶段,分析只能使问题尖锐化,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免疫力量:形象、虚构和固定

本章的开头提醒人们,科学已成为一种旅游话语,与其他殖民和解放的伟大阅读和写作密切牵连,这些阅读和写作是现代构成和分解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标记身体的基础。殖民和解放、构成和分解相互关联为内部形象。所以,1986年当我们在大学校长办公室等待开会时,我继续这次贯穿免疫学文化的科学博物馆的游览,和我的同事詹姆斯·克利福德描述的“看到陆地啦!”的效应一起。校长办公室的墙上以色彩强化的漂亮照片为特色,这些照片是地球太阳系的外行星图像。每张“照片”对到那里的观众创造效应。看上去,一些其他的观察者必定是到过那里,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感知系统并有一个好相机;不知何故,当木星和土星穿过太空的空旷地带时,必定会有可能看到它们的大片陆地进入伟大的“航行者”宇宙飞船的视野。20世纪的人们习惯于这种想法:所有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构造,而且一张照片显现出的一种“没有代码的信息”,也就是拍摄就在那里的东西,是一种多层历史的效果,明显包括技术(Barthes, 1982; Haraway, 1984~

^① 艾米丽·马丁(Emily Martin)已经开始了一个3年期实地研究项目,针对实验室、媒体以及艾滋病患者和非艾滋病患者中的免疫学话语网络。

1985; Petchesky, 1987)。但是,外行星的照片通过数量级就这个问题提高了要求。这些奇妙的照片经历了构建过程,这些过程使“相机之眼”的隐喻成了误导。校长的木星快照是一种后现代相片图像——一种一阶的性质变化构造,有完全的自然现实主义效应。有人在那里。看到陆地啦!但是,那个人是一艘宇宙飞船,将数字化信号传回到一个遥远地方的一整个世界的变压器和成像器,在这个称为“地球”的地方,艺术照片可以制造出来,对木星的存在,而且不是偶然的,也对太空人的存在,或者至少是虚拟太空人,给出一种可靠的感觉,与地球灵长类动物一样,那些虚拟太空人的眼睛能用同样的色谱看东西。

同样的分析必须与观察这些奇妙照片以及免疫系统成分的其他影像沉淀同时发生。《免疫学:一种综合体》(*Immunology: A Synthesis*, Golub, 1987)一书的封面以书名提及的综合体的一种象征性复制为特色:一个胰岛素三维结构的计算机多彩色图形,显示其抗原决定簇聚集在某些区域。戈卢布(Golub)在其贡献中引发了这些形象构建性质的意识:“由约翰·A. 特恩纳(John A. Tainer)和伊丽莎白·D. 盖特佐夫(Elizabeth D. Getzoff)创造的形象。”事实上,把科学家比作艺术家的传统隐喻遍布戈卢布的文本,以至于科学构建呈现出高雅艺术和天才的特定共鸣,不只是后现代身体生产批判理论的共鸣。但是,伦纳特·尼尔森(Lennart Nilsson)的照片出版在咖啡桌艺术书《身体的胜利》(*The Body Victorious*, Nilsson, 1987)和《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Jaret, 1986)中,允许“看到陆地啦!”效应的无媒介范围(第9和10幅图)。破碎的场景、豪华的纹理、有感召力的颜色以及免疫景观的外星怪物就在那里,在我们内部。一种伪足巨噬细胞的白色突出卷须使一种细菌落入陷阱;荷尔蒙的小丘被击倒躺在某种其他行星像月球一样的蓝色表面;一种被感染的细胞萌发出致命细菌粒子的金字塔,进入内部空间范围,在那里更多细胞会受到伤害;在无生命世界里,自动免疫遭疾病破坏的股骨圆头在一种夕阳中泛出

红光；癌细胞被杀手 T 细胞的致命流动小分队所包围，它们将化学毒素投入自我的恶性叛徒细胞中。

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的等式以及它们关于外星主义、终极尖端和高科技战争的联合话语的等式，在庆祝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成立 100 周年的正史中是相当字面化的（Bryan, 1987）。有一个章节详述了《国家地理》对水星号、双子星号、阿波罗号和水手号航行的涵盖，因此本章被称为“太空”，并在引语中介绍为“选择是宇宙——或虚无”。最后一章充满了尼尔森和其他生物医学的形象，题为“内部空间”，并在引语中介绍为“星球物质开始活跃起来”（Bryan, 1987, 第 454、352 页）。正是照相技术说服了观众相信内外空间亲如手足的联系。但奇怪的是，在外部空间里，我们见到太空人进入适合的探索飞船或者像个性化的宇宙胚胎一样四处漂浮，而在我们自身内部假设的泥土空间里，我们见到的是非人类的陌生者，它们应该是我们身体维持我们的整体性和个体性的手段，事实上是我们面对他者世界时的人性。我们似乎被侵略了，不仅是被免疫系统所防范的威胁性“非自我”，而且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说，是被我们自身的陌生部分所侵略。难怪自动免疫疾病带来如此糟糕的意义，区别于 1901 年由摩根卢斯（Morgenroth）和埃利希（Ehrlich）“恐怖的自体毒性”这一术语对其存在的首度怀疑。

太空入侵者的比喻引发了一个关于旅游方向性的特定问题：什么方向存在着侵略？从太空到地球？从外部到内部？颠倒过来？边界是否得到了对称防御？内部/外部是一种等级化对立吗？在殖民化语境中，扩张主义的西方医学话语沉迷于对健康身体的传染和恶意渗透的观念，还有来自于内部的恐怖主义和叛乱的观念。这种针对疾病的方法涉及一种惊人的逆转：被殖民者认为是入侵者。伴随着欧洲“渗透”地球，面临疾病使种族灭绝时，殖民化的“有色”身体被构建成传染、污染、紊乱等邪恶来源，威胁要征服白色人种（城市、文明、家庭、白

人的个人身体)及其颓废的机构实体。在建立非洲游戏园时,欧洲法律把该“自然保留地”的当地人类居民变成了自身地域的偷猎者、入侵者或野生动物的一部分。不应该低估这种 20 世纪晚期的免疫话语中殖民热带医学史和自然史的残留。关于寄生疾病和艾滋病的话语提供了过多的例子。

殖民话语的声音同样在《免疫学:非自我歧视的科学》(*Immunology: The Science of Non-Self Discrimination*)中也可以听到,书中以几乎猥亵的方式详述了个体性的危险。第一个危险是“个体的融合”:

在丛林或海底,有机体——尤其是植物,但也包括所有种类的固体动物——通常是非常近似的,以至于它们处于因融合而丧失其个体性这一无休止的危险之中……但是只有在一个艺术家的想象中,竭尽全力的融合才会发生;在现实中,有机体基本上保持非常独立,无论它们的生活和生长是多么的接近彼此。(Klein, 1982, 第 3 页)

在那些异域的、同素异形的地方,任何接触方式都可能会威胁到哺乳动物的适当自我定义。有机体的和谐,即生物学家最喜欢的主题,是根据个体性的进攻防御来进行解释的;而且,克莱茵(Klein)提倡在本科生物学课程中对防御投入的时间与基因学和演化的一样多。这听起来有点像防御部门与社会服务预算在竞争联邦基金。对克莱茵来说,免疫学是“内部机体的防御反作用”,跟随在“识别、处理和反应”之后。克莱茵将“自我”定义为“构成一个给定个体的组成部分的所有东西”(1982, 第 5 页;初稿中强调)。那么,什么可算作是一个个体,是这个问题的要点。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非自我”,并在跨越边界时引发一种防御反作用。但是,在生物学和医学的话语范围内,本

章屡次试图在减少算作自我的东西在整个后现代世界中的问题。

在最近的一本免疫学课本中,一张“识别系统的演化”图表阐明了各个主题的交叉,包括字面上“奇妙的”多样性、不断升级的复杂性、作为一种防御堡垒的自我以及外星主义(第 11 幅图)。根据一张哺乳动物演化最高点的图表,以一只老鼠和一个全副装备的太空人^①为默认的代表,或许在月球表面,下文将解释谁好像要走出来:

从寻找食物的卑微的变形虫(左上角),到有着复杂的体液机制和细胞免疫机制的哺乳动物(右下角),“自我对抗非自我的识别”过程表现了一种稳定的发展趋势,与动物不断增长的需求保持同步,在一个敌对环境中保持它们的整体性。因此,“免疫学”

① 老鼠和“男性”在免疫话语中是时常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同属动物的身体特征被最好地表现在免疫实验室中。例如,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the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一种基因的复合体,编码一系列关键的表面标记,这些标记几乎在所有关键的免疫反应识别事件都有涉及。这种复合体很好地表现了每个物种的特征,它在老鼠中称为 H2 基因位点,在人类中称为 HLA 基因位点。MHC 为被认作是“自我”的东西编码。基因位点在特殊性的“限制”中是重点涉及的。MHC 是高度多基因和多等位基因的,或许是允许自我和非自我之间区别的主要系统。“非自我”必须在“自我的环境下”提交给一个免疫系统的细胞;也就是,与 MHC 编码的表面标记相联系。对 MHC 抗原的比较研究以及免疫反应(抗体、T 细胞区别抗原)中其他关键执行者的分子结构引起“免疫球蛋白超级家族”的概念,其特征由其广泛的序列同源性表现,暗示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基因祖先的一种进化细节(Golub, 1987, 第 203~233 页)。被发展成为用以构建 MHC 知识的概念工具和实验室工具,是一种了解免疫系统身体生产设备的缩影。各种由 MHC 编码的抗原赋予“公共的”或“私人的”特殊性,这些项标明共有抗原对区分抗原的程度,反对一种遗传近似的背景,而不是遗传同一。免疫学可以作为科学来处理,它构建了这种类似语言的器官交流系统的“区别性”特征。最近对于“忍耐性”的研究以及胸腺细胞(T 细胞)“教育”其他细胞关于什么是“自我”、什么不是“自我”的方式,引起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提出疑问,是否这就等同于在免疫学上去了解“你的自我”这一指令(个人交流)。解读免疫学语言需要极端的字面意识,也需要一种对比喻的感受。珍妮弗·特瑞(Jennifer Terry)把艾滋病作为一种“比喻的流行病”来检验(未发表的文章,UCSC)。

出现时所做的决定就是一个纯粹的语义学决定。(Playfair, 1984, 第3页;初稿中强调)

这些是防御和侵略的语义学。何时一个自我能足以成为一个自我,即它的边界对医学、战争和商业中整个制度化的话语变得至关重要?免疫性和易损性是相互交叉的概念,核文化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不能将死亡和限度的经验纳入可得自由话语范围内,这种话语是关于集体的个人和个人的个人。生命是一个易损性的窗口。关闭它似乎是一种错误。完善全面防御的、“胜利的”自我是一种恐怖幻想,在一种世界末日后外星主义的演化科技中,将吞噬的变形虫和航行月球的人类连接起来吞食地球。这是一种恐怖的幻想,不管是位于抽象的国家话语空间还是位于同样抽象的我们内部身体空间。

免疫系统的形象作为战场,在日报的科学版和流行杂志中是很丰富的,例如,1984年《时代》(*Time*)杂志上艾滋病毒“入侵”细胞工厂的画面。该病毒被画成一辆坦克的形象,并且准备从侵占细胞出发的病毒们像坦克一样排列好,准备继续在作为生产力的身体上行进。《国家地理》题为“Jaret的‘内部战争’(The Wars Within)中的细胞大战”的图画(1986,第708~709页),明确地用上了星球大战的双关语。战争意象是传统的,并不仅存在于一种核战争和冷战的年代,但它呈现出那些特定历史危机的所有特定标记。武装自动化工厂是免疫系统插画家和照片处理者最喜欢的一个传统。保留星战个体性的特定历

史标记^①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科技的形象化技术促成的,这些技术对于后现代战争、科学和商业的指导物资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计算机辅助图画、人工智能软件和多种扫描系统。

“成像”或“形象化”在自助和临床环境中也成了治疗实践的一部分,而且关于生物医学科技、身体、自我和他者的矛盾可能性和有力模糊性尖锐地出现在这里。免疫系统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实践的有利领域,一个引发和锻炼力量竞争形式的场景。在《伯格(Berger)医生的免疫力餐》(*Dr. Berger's Immune Power Diet*)一书要求“战无不胜的你”通过使用你的“免疫商值 IQ(Immune Quotient)”(Berger, 1985, 第 186 页)使“免疫力为你服务”。在福音教会讲道的伟大传统中,读者被问道:“你是否已准备好做出免疫力的承诺?”(1985, 第 4 页)在形象化自助中,受害者学会在一种深度放松的状态下形成疾病和治疗过程的图像,目的是为了在多种感觉中获得更多的控制,并从后现代身体的微观场所中一个具体的有利位置参与到一种对生死意义的冥想中。这些形象化练习不需要成为星球大战的原型,但是它们往往处于劝诫文学中。在描述这种类似的努力时,《国家地理》赞成这种方法:“结合娱乐和治疗,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安德森医学博士医院,一个年轻的癌症患者在‘杀手 T 细胞’的视频游戏中猛击癌细胞”(Jaret, 1987,

① 不止是免疫系统勾画者从军事文化中吸取教训;军事文化也利用免疫系统话语,就像策略制定者直接吸取教训并对视频游戏活动和科幻小说做出贡献。例如,在《军事评论》(*Military Review*)中,弗雷德里克·蒂默曼(Frederick Timmerman)上校用以下表达论证未来军队中一个特别的突袭战士精英部队:

描述这一系统如何工作的最适当例子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生物模型——身体的免疫系统。身体内部存在着一批异常复杂的内部卫士部队。在绝对数量上,它们占少数——仅占身体细胞的百分之一。但是,它们组成为侦察专家、杀手、重构专家和通讯人员,能够找出入侵者,拉响警报,迅速复制,群起攻击来驱逐敌人……在这方面,1986年7月这一期的《国家地理》有一篇关于身体的免疫系统如何运作的详细描述。(Timmerman, 1987, 第 52 页)

第 705 页)。其他研究者设计了医疗方案,来决定攻击性意象在促成形象化疗法的治疗工作中是否有效,或者放松技巧和非攻击性意象是否会“起效”。因为不管有何种功能,对仍未检验的东西来说是“起效”的,而且不只是根据对癌症幸存者的统计。成像是遍布后现代疗法文化中“意指传染”的传播媒介之一。冒险的是集体自我和个人自我的种类,将被构建在这个有机—技术—神秘—文本的符指过程中。和这个意义领域的赛博格一样,“我们”,即 20 世纪末的西方人,如何能够将我们的易损性形成生命中一扇窗的形象?

对免疫性的构思也能根据共享特性;根据能与他者(人类和非人类、内部和外部)接触的半透性自我,但总是伴随着有限的结果;根据个体化和鉴定的情境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还根据部分的融合和危险。成问题的后现代自我的多样性,在免疫学块状话语中被如此有力地描绘和抑制,必定会进入其他新兴的关于健康、疾病、个体性、人性和死亡的西方话语和多文化话语中。

美国黑人科幻小说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对这一重大文化课题进行了清醒而有希望思考。巴特勒利用黑人和女性的历史和解放运动的资源,对于算作人类的东西的边界、对于概念的界限和宣称“自我财产”作为“人类”个体性和自我的原因这一实践,提出种种疑问。在《克雷的方舟》(*Clay's Ark*, 1984)一书中,巴特勒探索回归太空人的身体中一种外星疾病侵略地球的结果。入侵者成了被感染身体的所有细胞中的一个私密部分,在人类最基本自我的层面上改变着他们。入侵者有着一种迫切的需要施加在其寄主身上:复制。事实上,《克雷的方舟》读起来像是《延伸的表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令人不安的是,入侵者看起来就像选择的“终极”单位,不断缠绕着后现代演化理论家和经济策划者的生物政治想象。在巴特勒深度错位的故事中,人们在面对他们遭遇的疾病时,努力维持他们自身的选择和自我定义的领域。他们的部分任务是对于他们自身内部的他者,以及对

于感染双亲所生的孩子们,制造一种转化的关系。后代的四足形式将他们典型地标记为野兽本身,但他们也是人类意义的未来。这场疾病将会是全球性的。在《克雷的方舟》中,多种族男女的任务是要在内外空间里以外星主义显示的新兴符指传染病中,改造自我和他者的辩证法。本书中并没有对成功做出判断,只是开始讨论任务的命名。

在巴特勒的《异配生殖》(*Xenogenesis*)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黎明》(*Dawn*)中,全球大屠杀的主题以及威胁性亲密他者作为自我的主题再次出现。巴特勒的虚构小说是以收养的自然状态和非自然的亲属暴力为基础的。巴特勒探索人类、机器、非人类的动物或外星人以及他们的突变体之间的交错接合,尤其是关于身体交换和心理沟通的亲密性。她在《异配生殖》的开篇小说中的虚构是关于怪兽的恐惧和希望,即孩子千万不要像其家长一样。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家长。与其词根相比,怪物(monster)与动词“demonstrate”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怪物有象征意义。巴特勒的虚构反抗重新创造同一性神圣形象的必要(Butler,1978)。巴特勒就像“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玛吉·皮尔希(Marge Piercy)、乔安娜·露丝(Joanna Russ)、乌苏拉·勒奎恩(Ursula LeGuin)、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一样,对他们来说重新铭刻对灾难的叙述,使他们参与到发明一个交替的虚构世界中,其中另一种(性别、种族、物种)不再从属于同一性”(Brewer,1987,第46页)。

灾难、幸存和变形是巴特勒永恒的主题。从基于变异、变形和分散的本体论角度来看,恢复一个原有的神圣形象会是一个拙劣的笑话。对巴特勒的人们来说,物种起源正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但类型则是另一回事了。在《黎明》的结尾,巴特勒使莉莉丝——她的名字使我们回想起那个不忠的原型,即亚当的弃妻——怀的孩子有五种祖先,他们来自于两个物种,至少有三种性别、两种性和不定数量的种族。巴特勒关注于标记的身体,所以她不写凯恩(Cain)或汉姆(Ham),而

是写莉莉丝,即有色人种的女性。当面对多次终极灾难时,她与自我、幸存和繁殖术语的对立预示着一种讽刺的救世史,有益地扭曲了一个女性的承诺,她将击碎撒旦的蛇头。巴特勒的救世史不是空想主义的,而是为所有交际中关于力量的矛盾和问题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所以,她的叙述有可能描绘的一些东西不是神圣形象的第二次高潮。一些其他的差异秩序在《异配生殖》——和免疫学中会成为可能。

在这个故事中,莉莉丝·伊亚珀是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女性,从一个核战争掌控下的地球那里获救,身上残留着各种各样的人性。和所有幸存的人们一样,莉莉丝失去了一切。她的儿子和美国第二代尼日利亚后裔的丈夫死于战前的一次意外。她回到了学校,迷迷糊糊地想她或许会成为一个人类学家。但是,与奴隶贸易和历史上其他种族灭绝的大事件相比,核灾难更为根本地、全面地剥夺了她和其他每个人与过去和将来的所有理性联系和自然联系。除了审问的间歇,残余的人类被欧安卡利(Oankali)以假死的状态保持了250年。欧安卡利是外星物种,最初相信人类想要自杀,所以相信试图营救人类太过危险。欧安卡利缺少人类的感觉器官,是梯形体的美杜沙形象,他们的头和身体覆盖着多才多艺的触须,和一个地球海底无脊椎动物的一样。这些蛇形人对这个女人说话,并要求她亲密地触摸他们,这样会导致人类产生一种怪异的变形。莉莉丝被多次脱光衣服,而她在塑造意义可能性的多变边界上为存活、自立和选择而斗争。

欧安卡利拯救人类的目的是,不仅仅是将他们原封不动地送返到复原的地球上。通过时空深处的一长串合并和交换,他们丧失了自身的起源,欧安卡利是基因商人。他们的实质是具体的商业、对话、交际——这真出乎意料。他们的本质总是辅助自身作为他者。他们的身体本身是免疫技术和基因技术,被驱使着进入跨越自我和他者边界的交换、复制和危险的亲密关系以及形象力量中,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但和我们不一样的是,多头的欧安卡利不会构建非生命的技术,去促

成他们的自我形成和改良。相反,他们被复杂地编织进一个宇宙的现有机器中,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他们身体生产装置中的伙伴,包括拍摄《黎明》所用的飞船。但是,俘虏被塞进外星人飞船体内,他们与世隔绝的人性片段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可怕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央航路,这一航路将莉莉丝的祖先带到了“新世界”。也有以一种不自由的“基因贸易”为前提的存活条件,为所有的贸易“伙伴”永远地改变了自我和他者的意义。在巴特勒科幻小说的“中央航路”中,休息的人们睡在类似于驯化的食肉动物工厂的荚状舱中,而欧安卡利尽其所能修复被破坏的世界。许多东西永远消失了,但是能够维系其他生命的脆弱生命层被恢复了,使地球为大型动物的重新殖民化做好了准备。欧安卡利有着强烈的兴趣把人类作为潜在的交换伙伴,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类是从如此美妙和危险的基因结构构建而来的。欧安卡利相信人类有着致命的但可修补的缺陷,这是由他们智慧而等级化的基因本质所决定的。相反的,外星人生活在后现代几何的广大网络和关系中,其中个体的节点仍是相当重要的。这些网络很难避免权力和暴力;等级不是权力的唯一形状——对外星人或人类来说。欧安卡利给他们的所有难民“照相”,而且他们能从这些心理—有机—技术的形象中复制出人类。这些复制允许大量的基因贸易。欧安卡利也被莉莉丝的癌“天分”所吸引,她的好几个亲戚都死于癌症,但癌症在欧安卡利的“手”中成了一种再生和变形技术。但是,欧安卡利想从人类那里获得更多东西;他们想要一种完整的交易,那需要性混合和具体怀孕的亲密行为,这些行为在亚马逊流域所有地方冒着一种共享的殖民风险。欧安卡利的交际技术将其他存在体以符号、形象和记忆的形式转化为他们自身,与这种技术相比,人类的个体性将受到更大的挑战。怀孕提出了认同、自我财产和人类将其自身看做神圣形象(同一性符号)的热爱这一棘手的问题。欧安卡利打算作为残余人类的贸易伙伴回归地球。它的区别是,对唯一的错觉损失的东西是不可恢复的。

莉莉丝被选中训练和领导第一批觉醒的人类。她将成为一名助产士/母亲,帮助这些基本上已原子化的人们从他们的茧中孵化出来。他们的任务将是形成一个团体。但是,首先莉莉丝在一个欧安卡利家庭中与变形前的少年,一个欧洛伊(Oolio)、尼坎基(Nikanj)配对。她打算向尼坎基学习,他微妙地改变着她的心理和身体,以至于她能更自由地生活在欧安卡利家庭中;而且,她打算在他变形期间保护它,他们两个从变形中出现,深深地相互结合在一起。一个成年的欧洛伊被赋予了第二对手臂,他是欧安卡利的第三种性别,一个中性的存在体,使用他特殊的附属肢体来促成和设计物种与每个家庭的基因交易。每个欧安卡利的孩子都有一个雌雄同体的家长,往往是互相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个来自其他群体、种族或另外一半的欧洛伊。在欧安卡利语言中,对欧洛伊的一种翻译是“宝贵的陌生人”。在跨物种计划孩子的其他四个家长之中,欧洛伊将会是调解人。如果进行更复杂的调节,异性性征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的社会主体,从另一种体现反抗强制异性繁殖政治中出现的不同性别,并不存在于这本《黎明》中。

“宝贵的陌生人”能给予跨越群体、性、性别和物种边界的强烈快感。正是一种致命的快感为其他觉醒的人们标记出莉莉丝,即使她还没有同意怀孕。面对她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以及她与尼坎基的结合,其他人不相信她还是人类,不管她是否怀上了人类—外星人的孩子。莉莉丝也不相信自己。她担心自己仍是一只头羊,承担着训练人类的任务,打算让他们一回到地球就会存活和逃跑,就像他们之前的人们一样保持其人性。在训练阶段,每个女性人类都与一个男性人类配对,然后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每一对儿都由一个成年欧洛伊收养。莉莉丝失去了她的中美混血的情人约瑟夫(Joseph),他被一些怀疑和激怒的人们所杀。最终,第一批人类疏远了他们的欧洛伊并希望逃跑,准备离开前往地球。很难说他们没有了欧洛伊是否还能繁殖。或许,不只是一个性繁殖物种的个体总是拥有一个以上的家长;该物种或许在其

复制生物政治中也需要多种调解。莉莉丝发现她必须留下来训练另一群人,她的回归地球被无限期地延后了。但是,尼坎基用约瑟夫的精子和它自己配偶的基因使她怀孕了。莉莉丝并没有同意,而且《异配生殖》系列的第一部留给给她的是欧洛伊不理解的安慰,“差异会被掩盖直到变形”(Butler,1987,第 263 页)。莉莉丝仍然不甘心:“但是他们不会成为人类。那才是重要的。你不会理解,但那才是重要的。”“宝贵的陌生人”回答说,“你体内的孩子是重要的”(第 263 页)。巴特勒没有解决这一难题。在任何可能的将来,在一个存活岌岌可危的当代环球世界中,特定文化、生物技术和政治边界分隔和连接动物、人类和机器,对跨越这些边界的交易尚未完成的叙述中,同一和差异的竞争状况是有风险的。最后,不管我们同意与否,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竞争世界。“莉莉丝苦笑道:‘我想我会把这认作是现场工作——但是我到底怎么离开这个现场呢?’”(1987,第 71 页)。

没有出口可以逃离这个差异领域,那里满是赛博格化身和情境知识的承诺和恐慌。作为可能自我的人类学家,我们是可实现未来的技术人员。科学是文化。

Bibliography(原文参考文献)

A

- Aberle, Sophie and Corner, George W. (1953) *Twenty-five Years of Sex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for Research on Problems of Sex, 1922-47*. Philadelphia: Saunders.
- Allee, W.C. (1938) *The Social Life of Animals*. New York: Norton.
- Allen, Paula Gunn (1986)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 Boston: Beacon.
- Altmann, Jeanne (1980) *Baboon Mothers and Infa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ltmann, S.A., ed. (1967) *Social Communication among Prim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mos, Valerie, Lewis, Gail, Mama, Amina, and Parmar, Pratibha, eds (1984) *Many Voices, One Chant: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s*, *Feminist Review* 17, 118 pp.
- Angyal, Andras (1941) *Foundations of a Science of Person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n Arbor Science for the People (1977) *Biology as a Social Weapon*. Minneapolis: Burgess.
- Anzaldúa, Gloria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San Francisco: Spinsters/Aunt Lute.
- Aptheker, Betina (1982) *Woman's Legacy: Essays on Race, Sex, and Class in American Histor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Ardrey, Robert (1966) *Territorial Imperative*. New York: Atheneum.
- (1970) *The Social Contract*. New York: Atheneum.
- Aristotle (1979) *Generation of Animals*, A.L. Peck, tran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XIII. London: Heinemann.
- Ashby, W. Ross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Athanasiou, Tom (1987) 'High-tech politics: the ca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alist Review* 92: 7-35.

B

- Bacon, Francis (1893) *Novum Organum*, J. Spedding, trans. London: G. Routledge.
- (1942) *Essays and New Atlantis*. London: Walter J. Black.
- Bambara, Toni Cade (1981) *The Salt Eaters*.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 Barash, D.P. (1977) *Sociobiology and Behavior*. New York: Elsevier North Holland.
- (1979) *The Whisperings Within: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 Baritz, Leon (1960) *Servants of Power*.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Deborah M. (1986) 'Nervous and immune system disorders linked in a variety of diseases', *Science* 232: 160-1.
- (1987) 'Neuroimmunology sits on broad research base', *Science* 237: 1568-9.
- Barrett, Michèle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London: Verso.
- Barthes, Roland (1982) 'The photographic message', in Susan Sontag, ed. *A Barthes Reader*. New York: Hill & Wang.

- Baudrillard, Jean (1983) *Simulations*, P. Foss, P. Patton, P. Beitchman, trans. New York: Semiotext[e].
- Bebel, August (1883) *Woman under Socialism*, D. De Leon, trans. New York: Schocken, 1971; (orig. *Women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878).
- Berger, Stewart (1985) *Dr. Berger's Immune Power Die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Bethel, Lorraine and Smith, Barbara, eds (1979) *The Black Women's Issue, Conditions 5*.
- Bhavnani, Kum-Kum and Coulson, Margaret (1986) 'Transforming socialist-feminism: the challenge of racism', *Feminist Review* 23: 81-92.
- Bijker, Wiebe E., Hughes, Thomas, P., and Pinch, Trevor, eds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ingham, Harold C. (1928) 'Sex Development in Apes', *Comparative Psychology Monographs* 5: 1-165.
- Bird, Elizabeth (1984) 'Green Revolution imperialism, I & II', papers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Blalock, J. Edwin (1984) 'The immune system as a sensory organ', *Journal of Immunology* 132(3): 1067-70.
- Bleier, Ruth (1984) *Science and Gender: A Critique of Biology and Its Themes on Women*. New York: Pergamon.
- , ed. (1986) *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 New York: Pergamon.
- Blumberg, Rae Lessor (1981) *Stratification: Socioeconomic and Sexual Inequality*. Boston: Brown.
- (1983) 'A general theory of sex stratifi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positions of women in today's world economy', paper delivered to Sociology Bo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 Bogess, Jane (1976) 'The social behavior of the Himalayan langur (*Presbytis entellus*) in eastern Nep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thesis.
- (1979) 'Troop male membership changes and infant killing in langurs (*Presbytis entellus*)', *Folia Primatologica* 32: 65-107.
- (1980) 'Intermale relations and troop male membership changes in langurs (*Presbytis entellus*) in Nep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1(2): 233-74.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Brewer, Mária Minich (1987) 'Surviving fictions: gender and difference in postmodern and postnuclear narrative', *Discourse* 9: 37-52.
- Brighton Women and Science Group (1980) *Alice through the Microscope*. London: Virago.
- Brown, Beverley and Adams, Parveen (1979) 'The feminine body and feminist politics', *m/f* 3: 35-57.
- Brown, Lloyd, ed. (1981) *Women Writers of Black Afric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Brown, Norman O. (1966) *Love's Bod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runer, Charlotte H., ed. (1983) *Unwinding Threads: Writing by Women in Africa*. London and Ibadan: Heinemann.
- Bryan, C.D.B. (1987)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00 Years of Adventure and Discovery*. New York: Abrams.
- Buckley, Walter, ed. (1968) *Modern Systems Research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tist*. Chicago: Aldine.
- Bulkin, Elly, Pratt, Minnie Bruce, and Smith, Barbara (1984) *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New York: Long Haul.
- Burke, Carolyn (1981) 'Irigara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Feminist Studies* 7(2): 288-306.
- Burr, Sara G. (1982) 'Women and work', in Barbara K. Haber, ed. *The Women's Annual, 1981*. Boston: G.K. Hall.
- Burt, E.A. (1952)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Humanities.
- Busch, Lawrence and Lacy, William (1983) *Science, Agri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arch*. Boulder, CO: Westview.

- Buss, Leo (1987)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8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Octavia (1984) *Clay's Ark*. New York: St Martin's.
- (1987) *Dawn*. New York: Warner.
- Butler-Evans, Elliott (1987) 'Race, gender and desire: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ideology in the fiction of Toni Cade Bambara, Toni Morrison and Alice Walk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thesis.

C

- Caplan, Arthur L. (1978)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New York: Harper & Row.
- Carby, Hazel (1987) *Reconstructing Womanhood: The Emergence of the Afro-American Woman Nove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on, Joseph (1977) 'Animal cooperation in the ecology of W.C. Alle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Joint Atlantic Seminar in the History of Biology, Montreal.
- Carpenter, Clarence R. (1945)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primate sociometry', *Sociometry* 8: 56-61.
- (1964) *Naturalistic Behavior of Nonhuman Primat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72) 'The applications of less complex instructional technologies', in W. Schramm, ed. *Quality Instructional Television*.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p. 191-205.
- Chasin, Barbara (1977) 'Sociobiology: a sexist synthesis', *Science for the People* 9: 27-31.
- Chevalier-Skolnikoff, Suzanne (1971) 'The female sexual response in stump-tail monkeys (*Macaca speciosa*), and its broad implications for female mammalian sexu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s, New York City.
- (1974) 'Male-female, female-female, and male-male sexual behavior in the stump-tail monkey,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emale orgasm',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 96-116.
- and Poirier, F.E., eds (1977) *Primate Bio-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Press.
- Chicanas en el ambiente nacional* (1980) *Frontiers* 5(2).
- Child, Charles Manning (1928)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22: 26-42.
- Chodorow, Nancy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ristian, Barbara (1985)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Perspectives on Black Women Writers*. New York: Pergamon.
- Clifford, James (1985)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yne, N. and Klynes, M. (1961) *Drugs, Space and Cybernetics. Evolution to Cybor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Stanley (1976) 'Foundation officials and fellowships: innovation in the patronage of science', *Minerva* 14: 225-40.
- Cohn, Carol (1987a) 'Nuclear language and how we learned to pat the bomb',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pp. 17-24.
- (1987b) 'Sex and death in the rational world of defense intellectuals', *Signs* 12(4): 687-718.

- Collingwood, R.G. (1945) *The Idea of N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ollins, Patricia Hill (1982) 'Third World women in America', in Barbara K. Haber, ed. *The Women's Annual, 1981*. Boston: G.K. Hall.
- (1989a)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igns* 14(4): 745-73.
- (1989b) 'A comparison of two works on Black family life', *Signs* 14(4): 875-84.
-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9)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in Zillah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Committe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and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1983) *Research Briefings 1983*.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Cooter, Roger (1979) 'The power of the body: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Barry Barnes and Stephen Shapin, eds *Natural Order: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Culture*. Beverly Hills: Sage, pp. 73-96.
- Cowan, Ruth Schwartz (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 Coward, Rosalind (1983) *Patriarchal Precedents: Sexu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owdry, E.V., ed. (1930) *Human Biology and Racial Welfare*. New York: Hoeber.
- Cravens, Hamilton (1978) *Triumph of Evolu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rook, J.H., ed. (1970) *Social Behavior in Birds and Mamm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and Gartlan, J.S. (1966) 'Evolution of Primate Societies', *Nature* 210(5042): 1200-3.

D

- Daston, Lorraine and Park, Katherine (n.d.) 'Hermaphrodites in Renaissance France', unpublished paper.
- Davies, Carole Boyce and Graves, Anne Adams, eds (1986) *Ngambika: Studies of Women in African Literature*. Trenton: Africa World.
- Davis, Angela (1982) *Women, Race, and Class*. London: Women's Press.
- Dawkins, Richard (1976)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The Extended Phenotype: The Gene as the Unit of Sel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Beauvoir, Simone (1949)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Gallimard.
- (1952) *The Second Sex*, H.M. Parshley, trans. New York: Bantam.
- de Lauretis, Teresa (1984) *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5) 'The violence of rhetoric: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on and gender', *Semiotica* 54: 11-31.
- (1986a)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issues, terms, and contexts', in de Lauretis (1986b), pp. 1-19.
- , ed. (1986b)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uysen, Andreas, and Woodward, Kathleen, eds (1980) *The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Theories and Fictions*. Madison: Coda.
- de Waal, Frans (1982)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the Apes*. New York: Harper & Row.
- Derrida, Jacques (1976) *Of Grammatology*, G.C. Spivak, trans. and intro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sowitz, Robert S. (1987) *The Immune System and How It Works*. New York: Norton.

- DeVore, Irven (1962) 'The social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of baboon troop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thesis.
- , ed. (1965) *Primate Behavior: Field Studies of Monkeys and Ap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Dillard, Annie (1975)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New York: Bantam.
- Dinnerstein, Dorothy (1977)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 New York: Harper & Row.
- Dolhinow, Phyllis (1972) 'The North Indian langur', in Dolhinow (1972), pp. 181–238.
- , ed. (1972) *Primate Pattern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D'Onofrio-Flores, Pamela and Pfafflin, Sheila M., eds (1982)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Boulder: Westview.
- Douglas, 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70) *Natural Symbols*. London: Cresset Press.
- (1973) *Rules and Mean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89) 'A gentle deconstructio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4 May, pp. 17–18.
- DuBois, Page (1982) *Centaurs and Amaz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uchen, Claire (1986) *Feminism in France from May '68 to Mitterra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u Plessis, Rachel Blau (1985) *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wentieth Century Women Wri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

- Eastman, David (1958)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Eco, Umberto (1980) *Il nome della rosa*. Milano: Bompiani.
- (1983) *The Name of the Rose*, William Weaver,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Editors of *Questions féministes* (1980) 'Variations on some common themes', *Feminist Issues* 1(1): 3–22.
- Edwards, Paul (1985) 'Border wars: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adical America* 19(6): 39–52.
- Eimerl, Sarel and DeVore, Irven (1965) *The Primates*. New York: Time-Life Nature Library.
- Eisenstein, Zillah, ed. (1979)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Ellis, P.E., ed. (1965)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nimal communities', *Symposium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4.
- Emecheta, Buchi (1972) *In the Ditch*.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9
- (1975) *Second Class Citizen*. New York: Braziller.
- (1976) *The Bride Price*. New York: Braziller.
- (1977) *The Slave Girl*. New York: Braziller.
- (1979) *The Joys of Motherhood*. New York: Braziller.
- (1982) *Destination Biafra*.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2;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 Sons, Fontana African Fiction, 1983.
- (1983a) *Double Yoke*. New York: Braziller; London and Ibadan: Ogwugwu Afor.
- (1983b) *The Rape of Shavi*. London and Ibadan: Ogwugwu Afor, 1983; New York: Braziller, 1985.
- Emerson, A.E. (1954) 'Dynamic homeostasis, a unifying principle in organic, social, and ethical evolution', *Scientific Monthly* 78: 67–85.
- Emery, F.E., ed. (1969) *Systems Thinking*. New York: Penguin.
- Engels, Frederick (1884)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Eleanor B.

- Leacock,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2.
- (1940) *Dialectics of Nature*, Clemens Dutt, trans. and e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Enloe, Cynthia (1983a) 'Women textile workers in the militar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 Nash and Fernandez-Kelly (1983), pp. 407-25.
- (1983b) *Does Khaki Become You? The Militarization of Women's Lives*. Boston: South End.
- Epstein, Barbara (forthcoming) *Political Protest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scoffier, Jeffrey (1985) 'Sexual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ay identity', *Socialist Review* 82/83: 119-53.
- Evans, Mari, ed. (1984) *Black Women Writers: A Critical Evalua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Anchor.

F

- Farley, Michael (1977) 'Formations et transformations de la synthèse écologique aux États-Unis, 1949-1971', L'Institut d'Histoire et de Sociopolitique des Sciences,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Master's thesis.
- Fausto-Sterling, Anne (1985) *Myths of Gender: 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Women and Men*. New York: Basic.
- Fedigan, Linda Marie (1982) *Primate Paradigms: Sex Roles and Social Bonds*. Montreal: Eden Press.
- Fee, Elizabeth (1986) 'Critiques of modern science: the relationship of feminism to other radical epistemologies', in Ruth Bleier, ed. *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 New York: Pergamon, pp. 42-56.
- Feminisms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1983) *Frontiers* 7.
- Fernandez-Kelly, Maria Patricia (1983) *For We Are Sold, I and My Peopl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Firestone, Shulamith (1970)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Morrow.
- Fisher, Dexter, ed. (1980) *The Third Woman: Minority Women Wri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Flax, Jane (1983)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patriarchal unconscious: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 in Harding and Hintikka (1983), pp. 245-82.
- (1987)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Signs* 12(4): 621-43.
- Ford, Barbara (1976, May) 'Murder and mothering among the sacred monkeys', *Science Digest*, pp. 23-32.
- Fosdick, Raymond (1952)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Foucault, Michel (196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A.M. Smith, trans. New York: Vintage, 1975.
-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lan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lan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1979.
- (197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Robert Hurley,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1978.
- Fox, Robin (1967) 'In the beginning', *Man* 2: 415-33.
- Frankenberg, Ruth (1988)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thesis.
- Fraser, Kathleen (1984) *Something. Even Human Voices. In the Foreground, a Lake*. Berkeley, CA: Kelsey St Press.
- French Feminism*, special issue (Autumn 1981) *Signs* 7(1).

- Freud, Sigmund (1930)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1962.
- Frisch, J.E. (1959) 'Research on primate behavior in Jap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1: 584-96.
- Fuentes, Annette and Ehrenreich, Barbara (1983) *Women in the Global Factory*. Boston: South End.

G

- Gallop, Jane (1982)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Macmillan.
- Gates, Henry Louis (1985) 'Writing "race" and the difference it makes', in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special issue, *Critical Inquiry* 12(1): 1-20.
- Ghiselin, Michael T. (1974) *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ings, Paula (1985) *When and Where I Enter: The Impact of Black Women on Race and Sex in America*. Toronto: Bantam.
- Gilbert, Sandra M. and Gubar, Susan (1979)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man, Emma (1931) *Living my Life*. New York: Knopf.
- Goleman, Daniel (1987) 'The mind over the body',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27 September, pp. 36-7, 59-60.
- Golub, Edward S. (1987) *Immunology: A Synthesis*. Sunderland, MA: Sinauer Associates.
- Goodall, Jane (1971) *In the Shadow of M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ordon, Linda (1976) *Woman's Body, Woman's Right: A Social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in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 (1988) *Heroes of Their Own Lives.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Family Violence, Boston 1880-1960*.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 Gordon, Richard (1983) 'The computerization of daily life,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homework economy', Silicon Valley Workshop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 and Kimball, Linda (1985) 'High-technology, employment and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on', Silicon Valley Research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
- Gould, Stephen J. (1981)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 Gray, J.S. (1963) 'A physiologist looks at engineering', *Science* 140: 461-4.
- Gregory, Judith and Nussbaum, Karen (1982) 'Race against time: automation of the office', *Office: Technology and People* 1: 197-236
- Gregory, Michael, Silver, Anita, and Sutch, Diane, eds (1978) *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and Defens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resham, Jewell Handy (1989) 'The scapegoating of the black family in America', *The Nation*, 24-31 July, pp. 116-22.
- Griffin, Susan (1978)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 & Row.
- Grossman, Rachel (1980) 'Women's place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Radical America* 14(1): 29-50.

H

- Haas, Violet and Perucci, Carolyn, eds (1984) *Women in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Profess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70)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Boston: Beacon.

- Hacker, Sally (1981) 'The culture of engineering: women, workplace, and machin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4(3): 341-53.
- (1984) 'Doing it the hard way: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the agribusiness and engineering classroom', paper delivered at the California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Pomona.
- and Bovit, Liza (1981) 'Agriculture to agribusiness: technical imperatives and changing role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Milwaukee.
- Hall, Diana Long (1974) 'Biology, sex hormones and sexism in the 1920s', *Philosophical Forum* 5: 81-96.
- Hall, K.R.L. and DeVore, Irvn (1972) 'Baboon social behavior', in Dolhinow (1972), pp. 125-80.
- Haller, J.S. (1971) *Outcasts from Evolution*.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Hamilton, G.V. (1929) *A Research in Marriage*. New York: Boni.
- Hamilton, W.D. (1964) 'The genetical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I,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52.
- Haraway, Donna J. (1978a) 'Animal sociology and a natural economy of the body politic, part I: a political physiology of dominance', *Signs* 4(1): 21-36. (This vol. pp. 7-20.)
- (1978b) 'Animal sociology and a natural economy of the body politic, part II: the past is the contested zone: human nature and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primate behavior studies', *Signs* 4(1): 37-60. (This vol. pp. 21-42.)
- (1979) 'The biological enterprise: sex, mind, and profit from human engineering to sociobiolog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 206-37. (This vol. pp. 43-68.)
- (1981-82) 'The high cost of information in post-World War II evolutionary biology', *Philosophical Forum* 13(2-3): 244-78.
- (1983) 'Signs of dominance: from a physiology to a cybernetics of primate society', *Studies in History of Biology* 6: 129-219.
- (1984) 'Class, race, sex, scientific objects of knowledge: a socialist-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ve knowledge and som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Violet Haas and Carolyn Perucci (1984), pp. 212-29.
- (1984-5) 'Teddy bear patriarchy: taxidermy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w York City, 1908-36', *Social Text* 11: 20-64.
- (1985)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80: 65-108. (This vol. pp. 149-81.)
- (1989a) 'Review of A. Ong,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Signs* 14(4): 945-7.
- (1989b)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ing, Sandra (1978) 'What causes gender privilege and class privile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 (1983) 'Why has the sex/gender system become visible only now?', in Harding and Hintikka (1983), pp. 311-24.
-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nd Hintikka, Merrill, eds (1983)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 Reidel.
- Hartmann, Heidi (1981)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in Sargent (1981), pp. 1-41.
- Hartsock, Nancy (1983a)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arding and Hintikka (1983), pp. 283-310.
- (1983b) *Money, Sex,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987) 'Rethinking modernism: minority and majority theories', *Cultural Critique* 7: 187–206.
- Haug, Frigga, ed. (1980) *Frauenformen: Alltagsgeschichten und Entwurf einer Theorie weiblicher Sozialisation*. Berlin: Argument Sonderband 45.
- (1982) 'Frauen und Theorie', *Das Argument* 136(11/12).
- , et al. (1983) *Sexualisierung: Frauenformen 2*. Berlin: Argument-Verlag.
- , et al. (1987) *Female Sexualization: A Collective Work of Memory*. London: Verso.
- Haug, Wolfgang Fritz and others, eds (forthcoming) *Marxistisches Wörterbuch*. Berlin: Argument-Verlag.
- Hayes, Dennis (1987) 'Making chips with dust-free poison', *Science as Culture* 1: 89–104.
- Hayles, Katherine (1984) *The Cosmic Web: Scientific Field Models and Literary Strateg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7a) 'Text out of context: situating postmodernism with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Discourse* 9: 24–36.
- (1987b) 'Denaturalizing experience: postmoder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abstract, meetings of the Society for Literature and Science, 8–11 October,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 Heidegger, Martin (1970)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 Henderson, Lawrence J. (1935) *Pareto's General Sociology: A Physiologist's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enry, Alice (1982, January) 'Review of *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ved*', *Off Our Backs*, pp. 18–19.
- Herschberger, Ruth (1948) *Adam's Rib*. New York: Pellegrine & Cudhay.
- Heyl, Barbara (1968) 'The Harvard Pareto circ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4: 316–34.
- Hilgard, Ernest R. (1965) 'Robert Mearns Yerkes',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38: 384–425.
- Hillis, W. Daniel (1988) 'Intelligence as an emergent behavior; or, the songs of Eden', *Daedalus*, winter, pp. 175–89.
- Hogness, E. Rusten (1983) 'Why stress? A look at the making of stress, 1936–56', unpublished paper available from the author, 4437 Mill Creek Rd, Healdsburg, CA 95448.
- hooks, bell (1981) *Ain't I a Woman*. Boston: South End.
-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 Hooton, E.A. (1931) *Up from the Ape*. New York: Macmillan.
- (1942) *Man's Poor Relations*. New York: Doubleday.
- Hrdy, Sarah Blaffer (1975) 'Male and female strategies of reproduction among the langurs of Abu', Harvard University, PhD thesis.
- (1977) *The Langurs of Abu: Female and Male Strategies of Reprod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v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Williams, George C. (1983) 'Behavioral biology and the double standard', in Sam Wasser, ed. *Female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3–17.
- Hubbard, Ruth and Lowe, Marian, eds (1979) *Genes and Gender*, vol. 2, *Pitfalls in Research on Sex and Gender*. Staten Island: Gordian Press.
- Hubbard, Ruth, Henifin, Mary Sue, and Fried, Barbara, eds (1979) *Women Look at Biology Looking at Women: A Collection of Feminist Critiques*. Cambridge, MA: Schenkman.
- , eds (1982) *Biological Woman, the Convenient Myth*. Cambridge, MA: Schenkman.
- Hull, Gloria, Scott, Patricia Bell, and Smith, Barbara, eds (1982)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 the Men Are Black,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Old Westbury: The Feminist Press.
- Hurtado, Aida (1989) 'Relating to privilege: seduction and rejection in the subordination of white women and women of color', *Signs* 14(4): 833-55.
- Hutchinson, G. Evelyn (1978)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Ec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I

- Illich, Ivan (1982) *Gender*. New York: Pantheon.
-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985) *IFAD Experience Relating to Rural Women, 1977-84*. Rome: IFAD, 37.
- Irigaray, Luce (1977) *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 Paris: Minuit.
- (1979) *Et l'une ne bouge pas sans l'autre*. Paris: Minuit.

J

- Jacob, François (1974) *Logic of Life*, Betty Spillman,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 Jaggar, Alison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man & Allenheld.
- Jameson, Fredric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2.
- (1986)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65-88.
- Jaret, Peter (1986) 'Our immune system: the wars within', *National Geographic* 169(6): 701-35.
- and Mizel, Steven B. (1985) *In Self-Defen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Jay, Phyllis (1962) 'Aspects of maternal behavior among langur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02: 468-76.
- (1963a) 'The social behavior of the langur monk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thesis.
- (1963b) 'The Indian langur monkey (*Presbytis entellus*)', in C.H. Southwick, ed. *Primate Social Behavior*. Princeton: Van Nostrand, pp. 114-23.
- (1965) 'The common langur of north India', in DeVore (1965), pp. 197-249.
- Jerne, Niels K. (1985) 'The generative grammar of the immune system', *Science* 229: 1057-9.
- Jordanova, Ludmilla, ed. (1987) *Languages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Joseph, Gloria and Lewis, Jill (1981) *Common Differences*. New York: Anchor.
- Judson, Horace Freeland (1979) *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K

- Kahn, Douglas and Neumaier, Diane, eds (1985) *Cultures in Contention*. Seattle: Real Comet.
- Kanigel, Robert (1986) 'Where mind and body meet', *Mosaic* 17(2): 52-60.
- (1987) 'The genome project',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13 December, pp. 44, 98-101, 106.
- Kaplan, Caren (1986-7) 'The politics of displacement in *Buenos Aires*', *Discourse* 8: 84-100.
- (1987a) 'The poetics of displacement: exile, immigration,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thesis.
- (1987b) 'Deterritorializations: the rewriting of home and exile in Western feminist discourse', *Cultural Critique* 6: 187-98.
- Keller, Evelyn Fox (1983)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San Francisco: Freeman.
- (1985)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he gender/science system: or, is sex to gender as nature is to science?', *Hypatia* 2(3): 37-49.

- (1990) 'From secrets of life to secrets of death', in M. Jacobus, E.F. Keller, and S. Shuttleworth, eds *Body/Politics: Women and the Discourses of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pp. 177-91.
- and Grontkowski, Christine (1983) 'The mind's eye', in Harding and Hintikka (1983), pp. 207-24.
- Kessler, Suzanne and McKenna, Wendy (1978) *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vles, Daniel (1968) 'Testing the army's intelligence: psychologists and the military in World War 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5: 565-81.
- King, Katie (1984) 'The pleasure of repetition and the limits of identification in 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reimaginings of the body after the cyborg', paper delivered at the California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Pomona.
- (1986) 'The situation of lesbianism as feminism's magical sign: contests for meaning and the U.S. women's movement, 1968-72', *Communication* 9(1): 65-92.
- (1987a) 'Canons without innoc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thesis.
- (1987b) *The Passing Dreams of Choice . . . Once Before and After: Audre Lorde and the Apparatu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book prospectu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 (1987c) 'Prospectus for research on feminism and writing technolog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 (1988) 'Audre Lorde's lacquered layerings: the lesbian bar as a sit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2(3): 321-42.
- (forthcoming) 'Producing sex, theory, and culture: gay/straight remappings in contemporary feminism', in Marianne Hirsch and Evelyn Keller, eds, *Conflicts in Feminism*.
- Kingston, Maxine Hong (1976) *The Woman Warrior*. New York: Knopf.
- (1977) *China Men*. New York: Knopf.
- Klein, Hilary (1989) 'Marxism, psychoanalysis, and mother nature', *Feminist Studies* 15(2): 255-78.
- Klein, Jan (1982) *Immunology: The Science of Non-Self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 Knorr-Cetina, Karin (1981)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Oxford: Pergamon.
- and Mulkay, Michael, eds (1983)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Beverly Hills: Sage.
- Kohler, Robert (1976) 'The management of science: the experience of Warren Weaver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Programme in Molecular Biology', *Minerva* 14: 279-306.
- Kolata, Gina (1988a) 'New treatments may aid women who have miscarriages', *The New York Times* 5 January, p. c3.
- (1988b) 'New research yields clues in fight against autoimmune disease', *The New York Times*, 19 January, p. c3.
- Kollontai, Alexandra (1977)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Allison & Busby.
- Koshland, D.E., Jr, ed. (1986) *Biotechnology: The Renewable Frontier*. Washingto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Kramarae, Cherie and Treichler, Paula (1985) *A Feminist Dictionary*. Boston: Pandora.
- Kroeber, A.L. (1917) 'The super-organ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 163-213.
- Kropotkin, Peter (1902) *Mutual Aid*. London: Heinemann.
- Kuhn, Annette (1978) 'Structures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in the family', in Kuhn and Wolpe (1978), pp. 42-67.
- (1982) *Women's Pictures: Feminism and Cinem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and Wolpe, AnnMarie, eds (1978)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ummer, Hans (1968) *Social Organization of Hamadryas Babo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

Labica, Georges and Benussen, Gérard, eds (1985)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8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ancaster, Jane (1967) 'Primate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the emergence of huma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hD thesis.

— (1968) 'On the evolution of tool using behavi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0: 56-66.

— (1971) 'Play mothe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juveniles and young infants among free-ranging vervet monkeys (*Cercopithecus aethiops*)', *Folia Primatologica* 15: 161-82.

— (1973) 'In praise of the achieving female monkey', *Psychology Today*, September, pp. 30-6, 90.

— (1985) *Primate Behavior and the Emergence of Human Cultur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1978) 'Carrying and sharing in human evolution', *Human Nature*, February, pp. 82-9.

— (1979) 'Sex and gender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H.A. Katchadourian, ed. *Human Sexuality: A Comparative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51-80.

— and Lee, Richard (1965) 'The annual reproductive cycle in monkeys and apes', in DeVore (1965), pp. 486-513.

Lange, Bernd-Peter and Stuby, Anna Marie, eds (1984) 1984. Berlin: Argument Sonderband 105.

Lasswell, H.D. and Kaplan, Abraham (1950) *Power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84) *Les microbes, guerre et paix, suivi des irréductions*. Paris: Métailié.

— (1988)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followed by Irreductions: A Politico-Scientific Ess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Woolgar, Steve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Leacock, Eleanor (1972) 'Introduction', in Frederick Engels,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Lem, Stanislaw (1964) *Summa technologiae*. Craco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Lerner, Gerda, ed. (1973) *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Lettvin, J.Y., Maturana, H.R., McCulloch, W.S., and Pitts, W.H. (1959) '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 47: 1940-51.

Lévi-Strauss, Claude (1971) *Tristes Tropiques*, John Russell, trans. New York: Atheneum.

Lewontin, R.C., Rose, Steven, and Kamin, Leon J.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ntheon.

Lilienfeld, Robert (1978) *The Rise of Systems Theory*. New York: Wiley.

Lindberg, Donald (1967) 'A field study of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the rhesus monk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hD thesis.

Linden, Robin Ruth (198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gender identity paradig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Sociology Board, Bachelor of Arts senior essay.

Linnaeus, Carl (1758) *Systema naturae per regna tria naturae, secundum classes, ordines, genera, species, cum characteribus, differentiis, synonymis, locis*, 10th edn. Holmiae: Laurentii Salvi.

- (1972) *L'équilibre de la nature*, Bernard Jasmin, trans., Camille Limoges, intro. and notes.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Urin.
- Lloyd, G.E.R. (1968) *Aristotle: The Growth of His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cke, Steven E. and Hornig-Rohan, Mady (1983) *Mind and Immunity: Behavioral Immunolog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76-82*. 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
- Lorde, Audre (1982) *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 Trumansberg, NY: Crossing, 1983.
- (1984) *Sister Outsider*. Trumansberg, NY: Crossing.
- Lovejoy, Owen (1981) 'The origin of man', *Science* 211: 341-50.
- Lowe, Lisa (1986) 'French literary Orientalism: The representation of "others" in the texts of Montesquieu, Flaubert, and Kristev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thesis.
- Lowe, Marian and Hubbard, Ruth, eds (1983) *Woman's Nature: Rationalization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Pergamon.

M

- MacArthur, R.H. and Wilson, E.O. (1967) *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cCaffrey, Anne (1969) *The Ship Who Sang*. New York: Ballantine.
- MacCormack, Carol (1977) 'Biological events and cultural control', *Signs* 3: 93-100.
- and Strathern, Marilyn, eds (1980) *Nature, Culture,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key, Nathaniel (1984) 'Review', *Sulfur* 2: 200-5.
- MacKinnon, Catherine (1982)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7(3): 515-44.
- (1987)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Lellan, Vin (1988) 'Computer systems under siege', *New York Times* 31 January, Sec. 3: 1, 8.
- Malamud, Bernard (1982) *God's Gr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 Mani, Lata (1987)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 as tradit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engal', *Cultural Critique* 7: 119-56.
- Many Voices, One Chant: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s* (1984) *Feminist Review* 17, special issue.
-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 Markoff, John and Siegel, Lenny (1983) 'Military micros', paper presented at Silicon Valley Research Project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 Marks, Elaine and de Courtivron, Isabelle, eds (1980) *New French Feminism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Marrack, Philippa and Kappler, John (1987) 'The T cell receptor', *Science* 238: 1073-9.
- Marshall, Eliot (1986) 'Immune system theories on trial', *Science* 234: 1490-2.
- Marx, Eleanor and Aveling, E. (1885-6) *The Woman Question*. London: Swann & Sonnenschein.
- Marx, Karl (1964a)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1964b)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1972)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Laurence Krader, trans. and ed. Assen Van Gorcum.

- and Engels, Frederick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ist-Feminist Literature Collective (1978) 'Women's writing',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1(3): 27-48.
- May, Mark A. and Doob, Leonard W. (1937)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 Mayo, Elton (1933) *The Human Problem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Mead, Margaret (1935)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Morrow.
- (1937)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 New York: McGraw-Hill.
- Merchant, Carolyn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Mesarovic, M.D., ed. (1968) *Systems Theory and Biolog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Microelectronics Group (1980) *Microelectronics: Capitalist Technology and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CSE.
- Miles, C.C. and Terman, Lewis (1929) 'Sex difference in association of idea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165-206.
- Mitchell, Juliet (1966)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40: 11-37.
- (1971) *Women's Estate*. New York: Pantheon.
- and Oakley, Ann, eds (1986) *What Is Feminism?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Pantheon.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84)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 *Boundary 2*, 3 (12/13): 333-58.
- (1988) 'Feminist encounters: locat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Copyright* 1: 30-44.
- Moi, Toril (1985) *Sexual/Textu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 Money, John and Ehrhardt, Anke (1972) *Man and Woman, Boy and Girl*.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4.
- Moraga, Cherríe (1983) *Loving in the War Years: lo que nunca pasó por sus labios*. Boston: South End.
- and Anzaldúa, Gloria, eds (1981)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Watertown: Persephone.
- Morawski, J.G. (1987) 'The troubled quest for masculinity, femininity and androgyny',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 44-69.
- Morgan, Elaine (1972) *The Descent of Woman*. New York: Stein & Day.
- Morgan, Robin, ed. (1984) *Sisterhood Is Global*. Garden City, NY: Anchor/Doubleday.
- Morris, C.W. (1938)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ss, Cynthia (1975) *Portraits in the Wi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Mouffe, Chantal (1983) 'The sex-gender system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Rethinking Ideology*. Berlin: Argument Sonderband 84.
- Murrell, K.F.H. (1965) *Ergonomics: Man in His Working Environmen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N

- Nash, June and Fernandez-Kelly, Maria Patricia, eds (1983) *Women and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ash, Roderick (1979) 'The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of nature: nature-appreciation as a commodity, 1850-1980',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3: 517-60.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88)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ashington: NSF.
- Nicholas, Robin (1985) *Immunology: An Information Profile*. London: Mansell.
- Nilsson, Lennart (1977) *A Child Is Born*. New York: Dell.

- (1987) *The Body Victorious: The Illustrated Story of our Immune System and Other Defenses of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Delacorte.
- Noble, David F. (1977) *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O

- O'Brien, Mary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Odum, E.P. (1955, 1959, 1971) *Fundamentals of Ecology*, 3 edns. Philadelphia: Saunders.
- (1977) 'The emergence of ecology as a new integrative discipline', *Science* 195: 1289-93.
- Ogunyemi, Chickwenye Okonjo (1983) 'The shaping of a self: a study of Buchi Emecheta's novels', *Komparatistische Hefte* 8: 65-77.
- (1985) 'Womanism: the dynamics of the contemporary Black female novel in English', *Signs* 11(1): 63-80.
- On Technology* (1987) *Discourse* 9, special issue on Cybernetics, Ecology and the Postmodern Imagination.
- Ong, Aihwa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rkers in Malays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88) '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 feminis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Inscriptions* 3/4: 79-93.
- Ong, Walter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New York: Methuen.
- Optner, Stanford L., ed. (1973) *Systems Analysis*. Baltimore: Penguin.
- Ortner, Sherry B.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Rosaldo and Lamphere (1974), pp. 67-87.
- and Whitehead, Harriet, eds (1981) *Sexual Meaning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 Park, Katherine and Daston, Lorraine J. (1981) 'Unnatural conceptions: the study of monster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92: 20-54.
- Parsons, Talcott (1970) 'On building social system theory: a personal history', *Daedalus* 99(4): 826-81.
- Perloff, Marjorie (1984) 'Dirty language and scramble systems', *Sulfur* 11: 178-83.
- Petchesky, Rosalind Pollack (1981) 'Abortion, anti-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Right', *Feminist Studies* 7(2): 206-46.
- (1987) 'Fetal images: the power of visual culture i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Feminist Studies* 13(2): 263-92.
- Peterfreund, Emanuel and Schwartz, J.T. (1966)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 Piercy, Marge (1976)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 New York: Knopf.
- Piven, Frances Fox and Cloward, Richard (1982) *The New Class War: Reagan's Attack on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antheon.
- Playfair, J.H.L. (1984) *Immunology at a Glance*, 3rd edn. Oxford: Blackwell.
- Porush, David (1985) *The Soft Machine: Cybernetic Fiction*. New York: Methuen.
- (1987) 'Reading in the servo-mechanical loop', *Discourse* 9: 53-62.
- Potter, Van Rensselaer (1971) *Bioethics, Bridge to the Futu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Preston, Douglas (1984) 'Shooting in paradise', *Natural History* 93(12): 14-19.
- Pugh, D.S., ed. (1971) *Organization Theory*. New York: Penguin.
- Pynchon, Thomas (1974) *Gravity's Rainbow*. New York: Bantam.

R

- Reagon, Bernice Johnson (1983) 'Coalition politics: turning the century', in Smith (1983) pp. 356-68.
- Redfield, Robert, ed. (1942) *Levels of Integration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Lancaster, PA: Cattell.
- Reed, James (1978) *From Private Vice to Public Virtue: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and American Society since 1830*. New York: Basic.
- Reiter, Rayna Rapp, ed. (1975)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Reskin, Barbara F. and Hartmann, Heidi, eds (1986) *Women's Work, Men's Work*.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Rich, Adrienne (1978) *The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 New York: Norton.
-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Signs* 5(4): 631-60.
- (1986) '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 in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 1979-85*, pp. 210-31. New York: Norton.
- Ripley, Suzanne (1965) 'The ecology and social behavior of the Ceylon grey langur (*Presbytis entellus thersi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thesis.
- (1980) 'Infanticide in langurs and man: adaptive advantage or social pathology?', in M.N. Cohen, R.S. Malpass, and H.G. Klein, eds *Biosocial Mechanisms of Population Regu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349-90.
- Roberts, Leslie (1987a) 'Who owns the human genome?', *Science* 237: 358-61.
- (1987b) 'Human genome. questions of cost', *Science* 237: 1411-12.
- (1987c) 'New sequencers take on the genome', *Science* 238: 271-3.
- Rosaldo, Michelle (1980) 'The use and abuse of anthropology', *Signs* 5: 389-417.
- and Lamphere, Louise, eds (1974)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 Hilary (1983) 'Hand, brain, and heart: a feminist epistemolog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Signs* 9(1): 73-90.
- (1986) 'Women's work: women's knowledge', in Juliet Mitchell and Ann Oakley, eds, *What Is Feminism?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Pantheon, pp. 161-83.
- Rose, Stephen (1986) *The American Profile Poster: Who Owns What, Who Makes How Much, Who Works Where, and Who Lives with Whom?* New York: Pantheon.
- Rossiter, Margaret (1982) *Women Scientists 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othschild, Joan, ed. (1983) *Machina ex Dea: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New York: Pergamon.
- Rowell, Thelma E. (1966a) 'Forest-living baboons in Uganda', *Journal of Zoology* 149: 344-64.
- (1966b) 'Hierarchy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 captive baboon group', *Animal Behaviour* 14: 430-43.
- (1970) 'Baboon menstrual cycles affected by soci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Reproduction and Fertility* 21: 133-41.
- (1972) *Social Behaviour of Monkeys*. Baltimore: Penguin.
- (1974) 'The concept of social dominance', *Behavioral Biology* 11: 131-54.
- Rubin, Gayle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app Reiter (1975), pp. 157-210.
-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arol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267-319.
- Ruch, Theodore (1941) *Bibliographia Primatologica*. Baltimore: Charles Thomas.
- Russ, Joanna (1983) *How to Suppress Women's Writing*.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

- Sachs, Carolyn (1983) *The Invisible Farmers: Wome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towa: Rowman & Allenheld.
- Sahlins, Marshall (1976) *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aid, Edward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 Sandoval, Chela (1984) 'Dis-illusionment and the poetry of the future: the making of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qualifying essay.
- (n.d.) *Yours in Struggle: Women Respond to Racism, a Report on the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Oakland, CA: Center for Third World Organizing.
- Sargent, Lydia, ed. (1981) *Women and Revolution*. Boston: South End.
- Sayers, Janet (1982) *Biological Politics: Feminist and Anti-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Tavistock.
- Schiebinger, Londa (1987)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women in science: a review essay', *Signs* 12(2): 305-32.
- Schipper, Mineke (1985)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Africa', in Mineke Schipper, ed. *Unheard Words: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Africa, the Arab World, Asia, the Caribbean and Latin America*, Barbara Potter Fasting, trans. London: Allison & Busby, pp. 22-58.
- Schjelderup-Ebbe, Thorlief (1935) 'Social behavior of birds', in Carl Murchison,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 947-72. Worcester,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1982) *Microelectronics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Britain*. University of Sussex.
- Scott, Joan Wallach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ebeok, T.A., ed. (1968) *Animal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of Study and Results of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hirek-Ellefson, Judith (1967)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Macaca ir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hD thesis.
- Singh, Jagjit (1966) *Great Ideas in Information Theory, Language, and Cybernetics*. New York: Dover.
- Smith, Barbara (1977) '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in Elaine Showalter,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5, pp. 168-85.
- , ed. (1983)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 Smith, Dorothy (1974) '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 44.
- (1979) 'A sociology of women', in J. Sherman and E.T. Beck, eds *The Prism of Sex*.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ochurek, Howard (1987) 'Medicine's new vision', *National Geographic* 171(1): 2-41.
- Sofia, Zoe (also Zoe Sofoulis) (1984) 'Exterminating fetuses: abortion, disarmament, and the sexo-semiotics of extra-terrestrialism', *Diacritics* 14(2): 47-59.
- Sofoulis, Zoe (1984) 'Jupiter Spac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Pomona, CA.
- (1987) 'Lackl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unpublished essay.
- (1988) 'Through the lumen: Frankenstein and the optics of re-origin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thesis.
- Somit, Albert, ed. (1976) *Biology and Politics: Recent Explorations*.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 Sontag, Susan (1977)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Dell.

- Spillers, Hortense (1987) 'Mama's baby, papa's maybe: an American grammar book', *Diacritics* 17(2): 65-81.
- Spivak, Gayatri (1985)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1): 243-61.
- Stacey, Judith (1987) 'Sexism by a subtler name? Postindustrial conditions and postfeminist consciousness', *Socialist Review* 96: 7-28.
- Stallard, Karin, Ehrenreich, Barbara, and Sklar, Holly (1983) *Poverty in the American Dream*. Boston: South End.
- Stanley, Manfred (1978) *The Technological Con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Stoller, Robert (1964)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gende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5: 220-6.
- (1968 and 1976) *Sex and Gender*, vol. I, New York: Science House; vol. II, New York: Jason Aronson.
- Strathern, Marilyn (1987a) 'Out of context: the persuasive fictions of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28(3): 251-81.
- (1987b) 'Partial connection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unro Lecture.
- (1988)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urgeon, Noel (1986) 'Feminism, anarchism, and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PhD qualifying essay.
- Sugiyama, Yukimaru (1967) 'Social Organization of Hanuman langurs', in Altmann (1967), pp. 221-36.
- Sussman, Vic (1986) 'Personal tech. Technology lends a hand', *The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9 November, pp. 45-56.

T

- Taiwo, Oladele (1984) *Female Novelists of Modern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 Tanner, Nancy (1981) *On Becoming Hu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Zihlman, Adrienne (1976) 'Women in evolution. Part I: innovation and selection in human origins', *Signs* 1(3): 585-608.
- The Woman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195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Thorne, Barrie and Henley, Nancy, eds (1975) *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 Rowley, MA: Newbury.
- Timmerman, Colonel Frederick W., Jr (1987, September) 'Future warriors', *Military Review*, pp. 44-55.
- Toulmin, Stephen (1982) *The Return of Cosmology: Postmodern Science and the Theology of N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ournier, Michel (1967) *Vendredi*. Paris: Gallimard.
- Traweek, Sharon (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reichler, Paula (1987) 'AIDS, homophobia, and biomedical discourse: an 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 *October* 43: 31-70.
- Trinh T. Minh-ha (1986-7) 'Introduction', and 'Difference: "a special third world women issue"',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Media and Culture* 8: 3-38.
- , ed. (1986-7) *She, the Inappropriate/d Other*, *Discourse* 8.
- (1988) 'Not you/like you: post-colonial women and the interlocking question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scriptions* 3/4: 71-6.

- (1989)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rivers, R.L. (1971)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35-7.
- (1972)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Bernard Campbell, ed.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Chicago: Aldine, pp. 136-79.
- Turner, Bryan S. (1984) *The Body and Society*. New York: Blackwell.

V

- Varley, John (1978) 'The persistence of vision', in *The Persistence of Vision*. New York: Dell, pp. 263-316.
- (1986) 'Blue champagne', in *Blue Champagne*. New York: Berkeley, pp. 17-79.
- von Bertalanffy, Ludwig (1968) *General Systems Theory*. New York: Braziller.

W

- Waddington, C.H. (1957) *The Strategy of the Gene*. London: Allen & Unwin.
- Walker, Alice (1983)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 Ware, Celestine (1970) *Woman Power*. New York: Tower.
- Washburn, Sherwood L. (1951a) 'The new physical anthrop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series 2, 13(7): 298-304.
- (1951b) 'The analysis of primate evolu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man',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um of Quantitative Biology* 15: 67-78.
- (1963) 'The study of r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5: 521-32.
- (1978) 'Human behavior and the behavior of other anim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405-18.
- and Avis, Virginia (1958)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Anne Roe and George Gaylord Simpson, eds *Behavior and 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421-36.
- and DeVore, Irvén (1961) 'Social behavior of baboons and early man', in S.L. Washburn, ed. *Social Life of Early Man*, New York: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pp. 91-105.
- and Hamburg, David (1965) 'The implications of primate research', in DeVore (1965), pp. 607-22.
- (1968) 'Aggressive behavior in Old World monkeys and apes', in Dolhinow (1972), pp. 276-96.
- and Lancaster, C.S. (1968) 'The evolution of hunting', in Richard Lee and Irvén DeVore, eds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pp. 293-303.
- Watson, J.D. (1976)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3rd edn. Menlo Park: Benjamin.
- Weaver, Warren (1948) 'Science and Complexity', *American Scientist* 36: 536-44.
- Wechsler, Rob (1987, February) 'A new prescription: mind over malady', *Discover*: 51-61.
- Weill, Jean-Claude and Reynaud, Claude-Agnès (1987) 'The chicken B cell compartment', *Science* 238: 1094-8.
- Weiner, Norbert (1954)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New York: Avon, 1967.
- Weinrich, James D. (1977) 'Human sociobiology: pair-bonding and resource predictability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and race)', *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2: 91-116.
- Weizenbaum, Joseph (1976)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San Francisco: Freeman.
- Welford, John Noble (1 July, 1986) 'Pilot's helmet helps interpret high speed world', *New York Times*, pp. 21, 24.

- West, Candace and Zimmermann, D.H.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2): 125-51.
- Westinghous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87) 'The fighting edge', a television programme in the series, 'Life Quest'.
- Wheeler, W.M. (1939)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B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ayden (1987)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ilfred, Denis (1982) 'Capital and agriculture, a review of Marxian problema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7: 127-54.
- Wilson, E.O. (1962) 'Chemical communication among workers of the fire ant, *Solemopsis saevissima* (Fr. Smith)', *Animal Behaviour* 10(1-2): 134-64.
- (1963) 'The social biology of ants', *Annual Review of Entomology* 8: 345-68.
- (1968) 'The ergonomics of caste in social insects', *American Naturalist* 102: 41-66.
- (1971) *Insect Socie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Eisner, T., Briggs, W.R., Dickerson, R.E., Metzenberg, R.L., O'Brien, R.D., Sussman, M. and Boggs, W.E. (1978) *Life on Earth*, 2nd edn. Sunderland, MA: Sinauer.
- Winner, Langdon (1977) *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 out of 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80)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109(1): 121-36.
- (1986)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nograd, Terry (forthcoming) 'Computers and rationality: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in Paul N. Edwards and Richard Gordon, eds, *Strategic Computing: Defense Research and High Technology*.
- and Flores, Fernando (1986) *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 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 Norwood, NJ: Ablex.
- Wittig, Monique (1973) *The Lesbian Body*, David LeVay, trans. New York: Avon, 1975 (*Le corps lesbien*, 1973).
- (1981) 'One is not born a woman', *Feminist Issues* 2: 47-54.
- Women and Poverty*, special issue (1984) *Signs* 10(2).
- Woodward, Kathleen (1983) 'Cybernetic modeling in recent American writing', *North Dakota Quarterly* 51: 57-73.
- ed. (1980) *The Myth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st-Industri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Wright, Susan (1982, July/August) 'Recombinant DNA: the status of hazards and controls', *Environment* 24(6): 12-20, 51-53.
- (1986)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and i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72-82', *Osiris*, 2nd series, 2: 303-60.
- Wynne-Edwards, V.C. (1962) *Animal Dispersion in Relation to Social Behaviour*. Edinburgh: Oliver & Boyd.

Y

- Yerkes, R.M. (1900) 'Reaction of *Entomostraca* to stimulation by light,' Part II, 'Reactions of *Daphnia* and *Cypri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4: 405-22.
- (1907) *The Dancing Mouse*. New York: Macmillan.
- (1913) 'Comparative psychology in relation to medicine', *Boston Medical Surgery Journal* 169: 779-81.

- (1919) 'The measur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rain power in the army', *Science* 44: 221-6, 251-9.
- (1920) 'What psychology contributed to the war', in *The New World of Science*. New York: Century.
- (1921) 'The relations of psychology to medicine', *Science* 53: 106-11.
- (1922) 'What is personnel research?', *Journal Personnel Research* 1: 56-63.
- (1927a) 'A program of anthropoid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 181-99.
- (1927b) 'The mind of a gorilla', Parts I, II,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2: 1-193, 375-551.
- (1928) 'The mind of a gorilla', Part III, *Comparative Psychology Monographs* 5: 1-92.
- (1932) 'Yale Laboratories of Comparative Psychobiology', *Comparative Psychology Monographs* 8: 1-33.
- (1935-6) 'The significance of chimpanzee culture for biological research', *Harvey Lectures* 31: 57-73.
- (1939) 'Social dominance and sexual status in the chimpanze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4(2): 115-36.
- (1943) *Chimpanzees, A Laboratory Colo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nd Yerkes, A.W. (1929) *The Great Ap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Bridges, J.W., and Hardwick, R.S. (1915) *A Point Scale for Measuring Mental Ability*. Baltimore: Warwick & York.
- Young, Iris (1981)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Sargent (1981), pp. 44-69.
- Young, Robert M. (1969) 'Malthus and the evolutionists: the common context of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 *Past and Present* 43: 109-41.
- (1973) 'The historiographic and ideological context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debate on man's place in nature', in Young (1985), pp. 164-248.
- (1977) 'Science is social relations',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5: 65-129.
- (1979, March) 'Interpreting the production of science', *New Scientist* 29: 1026-8.
- (1985) *Darwin's Metaphor: Nature's Place in Victorian Cultur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Levidow, Les, eds (1981, 1985)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Labour Process*, 2 vols. London: CSE and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Yoxen, Edward (1983) *The Gene Business*. New York: Harper & Row.

Z

- Zacharias, Kristin (1980)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imate order: taxonomy and comparative anatomy in establish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 1735-1916',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hD thesis.
- Zaki, Hoda M. (1988) 'Fantasies of differenc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V(4): 13-14.
- Zihlman, Adrienne (1967) 'Human locomotion: a reappraisal of functional and anatomical evid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thesis.
- (1978a) 'Women in evolution, part II: subsiste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early hominids', *Signs* 4(1): 4-20.
- (1978b) 'Motherhood in transition: from ape to human', in W. Miller and Lucille Newman, eds *First Child and Family Formation*. North Carolina: 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 Publications.
- (1978c) 'Gathering and the hominid adaptation', in Lionel Tiger and Heather Fowler, eds *Female Hierarchies*. Chicago: Beresford.

- Zimmerman, Jan, ed. (1983) *The Technological Woman: Interfacing with Tomorrow*. New York: Praeger.
- Zuckerman, Solly (1932) *The Social Life of Monkeys and Ap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1933) *Functional Affinities of Man, Monkeys, and Apes: A Study of the Bearings of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on the Taxonomy and Phylogeny of Lemurs, Monkeys, Apes and 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1972) *Beyond the Ivory Tower: The Frontier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ience*. New York: Talpinger.
- (1978) *From Apes to Warlords: The Autobiography of Solly Zuck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译 后 记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源自西方,是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思想、言论及政治行为。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就是男女平等,与此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意识和创造力的培养,挖掘并发挥自身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解放而努力。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女权主义的。然而,本书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是从科学进化史的角度讨论女权主义的。唐娜·哈拉维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猿猴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知识和行为,讨论了女权主义者关于自然界生产和繁殖理论的争议;第二部分讨论了评判自然和经验故事的权力竞争;第三部分讨论了赛博格具体化、女权主义性别概念的命运和女权主义道德规范,甚至还将免疫系统看做是后现代世界中的一种主要差别系统的生物政治地图。现代女权主义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关注科学(生物学)视角的以及思考科学视角是如何与人类文化理念相关联的,都将对科学历史学家哈拉维所写的这十章内容感兴趣。它们改编自哈拉维在1978~1989年出版的文章中,勾画出了这一时期她观点上的变化:她最早期的作品反映了一种马克思解析主义的影响,而后期的作品还显示出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我对女权主义的偏爱始于读硕期间,当时毕业论文做的课题是“从会话分析的角度看性别语言的刻板印象”。为了完成这一课题,我翻阅了大量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和语用学等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收集

了数 10 个小时两性对话作为语料,从会话结构、会话策略和会话风格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有了这段研究经历,我对女权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我也对女权主义如何在当代世界中继续追求平等、实现自身价值这一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我所涉猎的领域也仅限于语言学的范畴。翻译了哈拉维教授的《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一书后,我对女权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唐娜·哈拉维对于科学史所做出的批判性努力是十分睿智的:她采纳了身体、客观性、权利和自然的常规理念,却抽去了构筑起这些理念的家长制形而上学的基底。自然是如何产生的?是一日促就还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她在书中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关于创造自然的历史性叙述、解释和故事。她在书中运用了著名理论家的一些理论来论证她的观点,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社会构建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身体政治。

这是一本富有洞察力的书,但也是一本非常难读懂的书。阅读本书需要消化大量复杂的信息,在此过程中要辨识出作者确切的观点并非易事。其中一个难点是,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不熟悉的术语,甚至一些从未见过的生词。我发现自己需要不断地查字典才能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另一个难点是,本书谈论的许多理论和观点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比方说索利·祖克曼和塔尔玛·罗维尔的繁殖理论。这对于那些专门研究这些理论的专家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对于我,一个专门研究语言的人而言,本书就显得有些晦涩难懂了。但是,我对书中的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哈拉维将当代人看做是赛博格,因为我们将许多科技的东西融入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用一种颇具想象力的方式来讨论我们当前这个技术世界。

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处在读博的第二学年,所需的课程学分都已修完,而毕业论文的构思还只是一个雏形。每日翻看资料和思考毕业课题之余,花上几个小时译上几页,将整天思考语言学问题的头

脑转换一下,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放松,现在想来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对每一个章节,我都先粗略地翻译一遍,出来的成品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上面的疤痕瑕疵清晰可见。然后,我把初译稿对照原文反复推敲,把玩每字每句,希望能将顽石雕琢成器。当然,是石是玉,还是得请读者亲自玩瞻。

本书的完稿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首先,我要感谢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张珊编辑,她认真细致的校对和编辑工作令人钦佩。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永远是支撑我前进的最大动力。最后,我要感谢一起翻译本书的同事们,由于时间仓促,她们为此书的完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翻译稿不可能毫无缺漏地重现原稿的精神,我只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人理解原著。如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 静

2011年12月于杭州